中共黨史

毛澤東

（上冊）

何方 著

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利文出版

“**我**是15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的。那時確實十分單純，抱着為抗日救國和人類解放的決心，真有點不惜犧牲一切，被國民黨扣留關押後仍逃跑出來奔赴延安。進入抗大（抗日軍政大學），也確實看見一派新氣象，開始感受到了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當時大家雖然生活清貧，但精神愉快，多能以學為樂，以苦為榮。平日所學和所談，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古今中外，國家前途，自由討論，很少顧忌……可是三四年後，開始了**延安整風，在反對教條主義和確立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也把這些自由思想和民主作風當作小資產階級思想和自由主義表現給基本上整掉了。**我們當時也確實自覺地進行改造，力爭使自己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加之整風中又來了一場歷時兩三年的搶救運動，弄得人人自危，萬馬齊喑，思想有點麻木，頭腦也更加簡單。從此就一直跟着毛主席幹革命了。但是後來的實際，卻和我們當年的理念漸行漸遠。**根據自己六十餘年的觀察體會和近一個長時期的研究反思，首先想的就是，我們那時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為什麼奮鬥了幾輩子，卻總還是看不見**，反而大批共產黨員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更不用說工農群眾了。究竟是誰在專誰的政？尋根究底，不能不追到延安整風。因為**延安整風不僅如李維漢所說，教育了‘老長征’和‘三八式’整整兩代人，做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更重要的還是為黨和國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體制和模式。**這就是在個人崇拜的旗號下，意識形態上的嚴格管理和輿論一律，政治體制上的一元化領導和人治。它既有助於革命取得勝利，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也導致了建國後三十年的經濟文化落後和不斷的政治運動及其帶來的各種災難。”

ISBN 962-988-131-4
9 789629 881313
（上下冊）HK$148.00

中共黨史的轉捩點

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何方 著

利文出版

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2005年4月初版

著者 何 方

責編 危丁明

出版 利文出版社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1304室
Tel. 2390 9736 Fax. 2390 9465
E-mail:leeman@pacific.net.hk

發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九龍灣宏通街1號啟福工業中心地下6號
Tel. 2381 8251 Fax. 2397 1519
E-mail:lysaltd@netvigator.com

美國 華文書報雜誌社
發行 Chinese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507 S.Stoneman Avenue
Alhambra. CA 91801 U.S.A.
Tel.(818)282 0361 (818)282 0387

印刷 彩迅印務有限公司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ISBN 962-988-131-4
©2005年 利文出版社

前言

現在奉獻給讀者的，是我六年來學習中共黨史的一束筆記，也算門外史談。至於我為什麼在進入耄耋之年，還要放棄從事過五十年的國際問題研究，而改行學習黨史，其中緣故，倒要稍作交代。

1959年廬山會議後，在中央召開的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我由於個人崇拜的思想信仰和自己過關的私心雜念，對於直接領導我工作學習十多年的張聞天進行了“揭發批判”。事後一直感到內疚，認為是個人生平犯的一次重大政治錯誤。1979年我隨張聞天一起得到平反，就想着要設法贖罪補過。此後在同張聞天夫人劉英以百次計的接觸拜訪中，更加深了我對他們夫婦高尚品德的瞭解，也增加了對自己錯誤的認識，並逐漸形成了一個想法，就是在離開工作崗位後要投入對張聞天的研究。1999年初，我辦了離休手續，隨即完全改行，一面學習，一面也寫點有關張聞天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由於張聞天是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時期名副其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所以研究張聞天不能不學習黨史。而學習黨史卻又加劇了也許是老年人共有的現象：對以往的反思和懷念。特別是回想起初參加革命和延安生活的情景，真是感慨萬分！

我是15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的。那時確實十分單純，抱着為抗日救國和人類解放的決心，真有點不惜犧牲一切，被國民黨扣留關押後仍逃跑出來奔赴延安。進入抗大（抗日軍政大學），也確實看見一派新氣象，開始感受到了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當時大家雖然生活清貧，但精神愉快，多能以學為樂，以苦為榮。平日所學和所談，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古今中外，國家前途，自由討論，很少顧忌，還經常引用《共產黨宣言》上的話：“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鄙的。”（現譯為“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可是三四年後，開始了延安整風，在反對教條主義和確立毛澤東思想的同時，也把這些自由思想和民主作風當作小資產階級思

想和自由主義表現給基本上整掉了。我們當時也確實自覺地進行改造，力爭使自己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加之整風中又來了一場歷時兩三年的搶救運動，弄得人人自危，萬馬齊喑，思想有點麻木，頭腦也更加簡單。從此就一直跟着毛主席幹革命了。但是後來的實際，卻和我們當年的理念漸行漸遠。根據自己六十餘年的觀察體會和近一個長時期的研究反思，首先想的就是，我們那時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為什麼奮鬥了幾輩子，卻總還是看不見，反而大批共產黨員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更不用說工農群眾了。究竟是誰在專誰的政？尋根究底，不能不追到延安整風。因為延安整風不僅如李維漢所說，教育了“老長征”和“三八式”整整兩代人，做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更重要的還是為黨和國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體制和模式。這就是在個人崇拜的旗號下，意識形態上的嚴格管理和輿論一律，政治體制上的一元化領導和人治。它既有助於革命取得勝利，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也導致了建國後三十年的經濟文化落後和不斷的政治運動及其帶來的各種災難。例如胡喬木就說，“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延安整風正是學斯大林理論，照搬蘇聯一切，並有自己的很大發展。現在我們雖然實行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上卻仍然嚴格堅持延安整風定下的模式，使我們在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上只能一條腿（還不完全）走路。這恐怕絕不是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而當前社會上存在的許多問題，根子也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實在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其影響之大之久，恐怕要超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這就是我為什麼在學習黨史中，重點從張聞天轉向了延安整風的原因。當然這只是個人的一家言，但我仍以熱愛革命、熱愛黨和熱愛祖國的初衷，本着“共產黨人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鄙的”精神表而出之，接下來就是敬候批評了。

還有幾點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包括在本書內的只是一批學習筆記，各自成篇，沒求系統，因此不完全連貫，在引語和舉例上也難免重複。第二，本書所用資料均係公開文獻和別人研究成果。本人既不能查閱檔案，也無力跑圖書館，只能靠自己有限的藏書和可以在市場上買到的書刊，幾乎完全是一個人閉門造車，錯情必定不少。第三，

本書每篇成文後曾分別送請一些老同志和老同學閱提意見。例如頭兩篇（也只是這兩篇）就曾送劉英同志審閱並得到她的認可。還有幾位老朋友對每篇都經過認真閱讀，提出寶貴意見。在此特向他們表示我內心的感謝。

何 方

2004 年 12 月 30 日

目錄

上冊

前言……iii

第一篇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1

一，問題的提起……1

黨史學界普遍說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是延安整風後形成的一種個人崇拜的說法，並非歷史事實。

二，關於對全軍的領導……4

遵義會議不可能確立什麼人對全國紅軍的領導，即使只算中央紅軍，確定的最高統帥也是周恩來。

三，關於對全黨的領導……6

遵義會議確立的全黨領導，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只是其中一員，說確立了他對全黨的領導不能成立。

(一) 會議推舉出的總書記是張聞天……6

(二) 在遵義會議後的長時期裏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8

(三) 這一時期實施對全黨的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9

(四) 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也是張聞天為首……10

(五) 代表黨中央和以中央名義行事的是張聞天……14

(六)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19

(七) "五朝領袖"之說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相互矛盾……21

(八) 原有論斷既違背黨的章程和制度，也

有損於黨及其領導人的形象……23
第二篇　再談與遵義會議有關的三個問題……28
一，《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的嗎？……28
說張聞天是按照毛澤東會上的發言起草《決議》，既無根據，也有悖常理。
二，遵義會議為什麼沒提政治路線問題？……35
毛澤東和黨史界關於出於策略考慮的說法，不是事實。
三，張聞天是遵義會議上當選為總書記
還是會後分工負總責？……44
（一）從《遵義會議文獻》談起……44
《遵義會議文獻》中陳雲的《傳達提綱》和《答覆》 以及所附《調查報告》，存在許多矛盾。
（二）張聞天出任總書記史實確鑿無庸置疑……49
（三）為什麼要將總書記改成“負總責”……55

第三篇　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以及
兩人的差異與比較……63
一，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63
（一）紅軍長征前的張毛關係……63
（二）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的張毛關係……66
（三）延安整風後的張毛關係……74
二，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差異和比較……82
（一）領導才能……82
（二）政策思想……83
（三）理論與實際……85
（四）國際與外交……87
（五）民主與集中……89
（六）群眾運動與群眾路線……91
（七）批評與自我批評……92
（八）“文化人”與“山大王”……94
（九）性格、愛好和作風……97
（十）毛澤東成為領袖的原因……101

第四篇　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111
一，整風開始，張聞天首當其衝……111
延安整風後長時間並未以王明為主要對象。
二，關於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各種整風檢討……122
(一) 張聞天《反省筆記》的來龍去脈和寫作背景……122
(二)《反省筆記》中過頭檢討舉例……126
(三) 關於張聞天的七大發言和參與製造個人崇拜問題……131
(四) 如何看待過頭檢討……136
(五) 附帶談一個如何看待《回憶錄》的問題……138

第五篇　張聞天與所謂教條宗派……145
一，如何理解反黨宗派……145
(一) 從張聞天被批判三次參加反黨宗派說起……145
(二) 對中共黨史中“宗派”概念的理解……146
二，所謂“教條宗派”和共產國際的關係……151
三，張聞天與所謂“二十八個半”……156
(一) 如何看待“二十八個半”……156
(二) 張聞天和“二十八個半”的關係……161
四，六屆四中全會的歷史地位及張聞天同它的關係……162
(一) 應該客觀地歷史地看待四中全會……162
(二) 張聞天與四中全會的關係……167
五，如何看待臨時中央和張聞天的作用……169
(一) 對臨時中央也要一分為二……169
(二) 張聞天在臨時中央的地位和作用……176

第六篇　三十年代中共黨內真有兩大宗派嗎？……183
一，從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談起……183
(一) 說在中央蘇區有兩大宗派，說不清也說不通……183
(二) 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活動同教條宗派掛不上鈎……186
二，說三十年代存在兩大宗派缺乏根據……188
(一) 從上層關係看，兩大宗派之說不能成立……188
(二) 張聞天、周恩來不是搞宗派活動的人……192

三，對反宗派鬥爭的幾點看法……201
（一）反宗派鬥爭的必然性和作用……201
（二）反宗派鬥爭的由來……202
（三）路線鬥爭往往也是整人的帽子和棍子……203
（四）反宗派鬥爭過去長盛不衰的原因……204

第七篇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209
一，對延安整風應該重新研究並進行新的總結……209
（一）從我學習黨史和回顧延安整風說起……209
（二）重新研究延安整風是歷史發展的需要……211
二，必須分清延安整風的不同層次……212
（一）現行對延安整風的定性並不準確……212
（二）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進行……213
（三）上層整風的一些來龍去脈和抗戰初期
毛澤東同長江局的分歧……214
三，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221
（一）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221
（二）在看待延安整風問題上的偏向……222
1，全盤肯定論
2，持攻擊態度
3，其他傾向
如高華的強調個人間爭權奪利和王若水的“整風壓倒啟蒙”說。
（三）延安整風的主要收穫和成就……228
1，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
2，牢固確立毛澤東的最高領袖地位，實現了一元化領導體制
3，創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風與工作方法
4，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一定成效
（四）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及影響……235
此處列了八條，下面將分篇論述。

第八篇　普遍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242
一，知識分子成為普遍整風主要對象的原因……242
（一）國際共運有一個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243
（二）中國黨背負長期封建社會的歷史包袱……244
（三）知識分子本身的原因……245
（四）出於對黨內主要不良傾向的估計……247
二，普遍整風中的一些實際情況……248
（一）關於學習文件……248
（二）關於聯繫實際……250
（三）告別和風細雨……252
三，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的一些消極影響……254
（一）開創了輕視知識的風氣與傳統……254
（二）加深了對知識分子的輕視與蔑視……256
（三）使整個一代“三八式”沒能起到應有的歷史作用……259
（四）給日後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損失……263

第九篇　延安整風不能說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271
一，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的提法與實際不符……271
（一）先談幾個用詞問題……271
（二）延安整風學的是斯大林理論……274
二，整風前倒是進行了幾年馬克思主義教育……277
（一）延安時期以前中國黨的理論水平不高……277
（二）延安前期的理論學習……278
三，整風中斷了馬克思主義學習熱潮和延安
的理論繁榮時期……282
（一）整風停止了馬克思主義學習……282
（二）整風一開始，馬克思主義就不香了……283
（三）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工作基本停止……283
（四）有利於學習熱潮與理論繁榮的對外開放一時中斷……284
（五）整風停止了一切理論學習和理論研究……285
四，延安整風對後來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影響……286
（一）延安整風使學習馬克思主義之風日下，反而增加

不少扭曲和誤解……287
(二) 只學斯大林也為建國後一切照搬蘇聯奠定理論基礎…289
(三) 中共自身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優良傳統也遭到損害……291

第十篇 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之一
——關於搶救運動的評估、資料和一些提法問題……300
一，關於搶救運動的評價……301
二，研究和討論整風搶救所用資料問題……306
(一) 對所用資料必須去偽存真……306
(二)《回憶錄》不可靠的舉例……310
三，對搶救運動中幾個具體提法的辨析……316
(一) 是"搶救運動"還是"審幹運動"……317
(二) 搶救運動的時間到底多長……319
(三) 整風和搶救的關係……322
(四) 向搶救錯了的人賠禮道歉問題……324

第十一篇 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之二
——關於搶救運動的發起和領導問題……332
一，關於搶救運動的發起……332
(一) 問題的提起……332
(二) 搶救運動是由誰和怎樣發起的……335
二，關於搶救運動的領導……344
(一) 搶救運動始終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344
(二) 劉少奇參與搶救運動的領導……350
(三) 搶救運動中的中央黨校……354
1，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中的地位
2，中央黨校是延安搶救運動的重災區
(四) 地方和單位領導所起作用更重要……363

下冊

第十二篇　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之三
——康生其人和搶救運動……377
一，為什麼要談一下康生……377
二，關於康生的一點評介……379
(一) 康生一生中的重大罪行……379
(二) 康生的兩副面孔……383
三，關於康生和毛澤東的關係……386
(一) 政治上的結合……386
(二) 康毛的個人關係和家庭關係……387
(三) 毛澤東對康生始終信賴……388
四，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作用和態度……389
(一) 康生算不得搶救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390
(二) 關於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392
(三) 康生為什麼不作檢討……394
五，康生和審幹九條……397
(一) 審幹九條的形成過程……397
(二) 康生報告和《審幹決定》並不矛盾……399
(三) 簡評《審幹決定》(即“九條方針”)……401

第十三篇　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之四
——發起搶救運動的前因後果……410
一，主流黨史學論搶救運動的因果……410
二，造成搶救運動的原因……412
(一) 肅反上一貫的極左路線……412
1，全盤接受蘇聯的建黨理論和肅反經驗
2，繼承中國專制主義傳統
(二) 毛澤東的肅反情結……416
1，鬥爭哲學
2，不顧惜人命

3，疑心太重
4，一定的政治權術
(三) 其他因素……422
三，搶救運動的後果和影響……422
(一) 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423
(二) 造成同志間的隔閡和結怨……424
特別是高級幹部，如劉少奇和柯慶施，林彪和賀龍，林彪和陸定一，陶鑄和古大存等。
(三) 嚴重摧殘新革命知識分子和影響對他們的使用……428
(四) 妨礙充分利用大發展的良好機會……430
(五) 開創了運動模式，加劇了不正之風……432
1，所反對的“三風”反而得到發展
2，搶救運動發揮了威懾手段的作用
3，加強了黨管一切和個人獨斷作風
4，助長和養成說假話、順着來佔便宜，說真話、提意見吃虧的不良風氣
(六) 結束了黨史上第二個生動活潑時期……438
整風前和整風後延安生活的比較

第十四篇　從“博古路線”到所謂“王明路線”……452
一，延安整風突出路線問題及其對後來的影響……452
二，從提出路線問題到定名“博古路線”……456
三，整風開始只提博古路線沒提王明路線的原因……459
四，清算第三次“左”傾為什麼遲遲未針對王明……462
(一) 對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路線的估計……462
(二) 內戰後期毛澤東受排擠不是王明之過……464
五，王明路線的出現和定型……465
六，博古路線為什麼和怎樣變成王明路線的……468
七，值得探討的幾個問題……475
(一) 有沒有個王明路線和什麼是王明路線……475
(二) 黨內鬥爭和黨史研究都應該講科學……476
(三) 不應在黨史中繼續製造個人崇拜……477

(四) 對黨史教科書應進行實事求是的修正……478

第十五篇　延安整風與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上）……484
一，什麼是個人崇拜及其相關的幾個問題……484
(一) 關於什麼是個人崇拜……484
(二) 個人崇拜與個人迷信……485
(三) 個人崇拜沒有正確與錯誤之分……486
(四)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起於何時……487
(五) 個人崇拜的標誌和條件……489
二，延安整風中個人崇拜的重要表現……491
(一) 打破了中國黨不突出個人的優良傳統……491
(二) 獨斷專行、以人劃線得到全黨認同並走向合法化……492
(三) 整風中的蒙昧主義……495
(四) 建立嚴格的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497
(五) 喊萬歲和唱《東方紅》……499
(六) 個人崇拜在中共七大的表現……501
三，提出毛澤東思想也是個人崇拜的重要標誌……504
(一) 以活人命名思想或主義開創了國際共運的先例……504
(二) 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命運……505
(三) 對個人在毛澤東思想認識上的一點修正……512

第十六篇　延安整風與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519
四，個人崇拜的形成和發展……519
(一) 造成個人崇拜的根源和條件……519
(二) 個人崇拜是怎樣形成的……523
1，毛澤東本人的作用
2，參與製造個人崇拜的人們
3，個人崇拜的發展路線

第十七篇　延安整風與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下）……551
五，“文革”後的毛澤東個人崇拜仍長盛不衰……551
(一) 為什麼能長盛不衰……551

1，個人崇拜的社會政治基礎依然存在
2，個人崇拜沒有得到認真清算
3，個人崇拜一直得到維護
(二)“文革”後個人崇拜的主要表現……554
1，為維護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十種做法
2，鄧小平是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巨人，也是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主要維護者
3，維護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表面理由和真實原因
4，個人崇拜是一個複雜現象
崇拜的不同動機和表現；一些領導人對毛澤東崇拜舉例。
(三) 結束語……583
1，如何看待個人崇拜的長盛不衰
2，判斷一些史實的是非問題
3，黨章規定和實際執行
4，破除個人崇拜的主要障礙是一元化的人治
5，解決個人崇拜的根本途徑是實行民主和法治

第十八篇　延安整風與一元化領導體制的建立……598
一，什麼是一元化……598
(一) 一元化是“黨的領導”的具體化……598
(二) 一元化是個人崇拜在政治體制上的體現……600
(三) 一元化是民主集中制的實施和表現……601
(四) 一元化是織成嚴密治理黨和國家的一張網……603
二，一元化探源……604
(一) 一元化源於封建專制主義的長期影響……604
(二) 一元化也源於共產國際高度集權的傳統……606
(三) 一元化是毛澤東對列寧、斯大林民主集中制建黨學說的重大發展……609
三，一元化在中國的形成和實踐……610
(一) 中國黨內兩種傳統的較量……610
(二) 一元化體制的逐漸形成……611
(三) 一元化體制的規定和實踐……613

四，關於一元化的幾點評價……616
(一) 一元化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617
(二) 一元化有助於政權鞏固和社會穩定……618
(三) 一元化是和民主不相容的……618
(四) 一元化和實行法治相衝突……620
(五) 一元化排斥監督……622
(六) 要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必須改變一元化領導……623
如：黨政分開；民主選舉；落實公開性；真正以法治國等。

第十九篇　延安整風創建了中共黨史編纂學（上）……633
一，上層整風就是研究和清算黨的歷史……633
(一) 關於整風前的中共黨史研究……633
(二) 整風為什麼要從研究黨史着手……634
(三) 從編“黨書”到作《決議》……635
二，《歷史決議》為中共黨史編纂學奠定基礎……642
(一)《歷史決議》為黨史學確定了原則和規範……642
(二)《歷史決議》的三大缺陷……642
《決議》有三大缺陷：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黨史只是路線鬥爭史；黨內鬥爭是階級鬥爭的反映。
(三) 略談第二個《歷史決議》……646
三，中共黨史研究中的喬木胡繩學派……651
(一) 胡喬木被稱為中共黨史研究的開拓者……651
(二) 對作為黨史學家胡喬木的一些看法……653
(三) 胡喬木參與製造和積極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657

第二十篇　延安整風創建了中共黨史編纂學（下）……680
四，黨史學中幾個比較突出的問題……680
(一) 始終貫徹個人崇拜精神……680
(二) 重“實用”而輕“求真”……682
(三) 黨史研究中的“人治”……683
(四) 關於三代核心說……684
(五) 黨史中的公式化和片面性……685

（六）關於如何對待黨史文獻和資料的問題……686
五，高華、王若水在延安整風研究中的誤區……688
（一）關於高華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689
（二）王若水關於延安整風的研究……690
（三）在王明問題上的誤區……692
（四）在延安整風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關係上的誤區……694
六，漫談“信史”與“良史”……697
（一）現行主流中共黨史很難稱得上信史……697
（二）為什麼黨史在許多問題上做不到實事求是……699
（三）也談“良史”……700
（四）為黨史進一步成為信史而努力……702

第一篇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

（紀念張聞天同志誕辰100周年）

1935年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此後幾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對黨實現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長期以來，他在這個時期所起的作用卻遭到埋沒和抹煞，至今還沒有完全改正過來。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誕辰，特撰此文作點辨析，以期引起討論和求得專家們的指正。

一，問題的提起

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後來通常說成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這是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寫進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從此成為歷史定論。一切黨史著作和許多老同志的回憶錄，都嚴格遵守了這一口徑。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申。[2]長期以來，使這個問題不只是在學術界，就是在群眾中也已成為一種常識。但是只要詳加考察，就會看出原來這一論斷並不確切，只是一種個人崇拜影響下並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黨史研究在擺脫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束縛上有很大進步，對不少問題進行了撥

*原發表於《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亂反正，恢復或接近了歷史本來面目。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中一個關鍵性人物張聞天，過去長期受到壓制和埋沒，二十年來也得到一定研究，並獲得顯著成就。特別是張培森主編的《張聞天在 1935 － 1938（年譜）》[3] 的出版，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翔實可靠的材料，對弄清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很有幫助。但是由於以上兩個中央決議的約束和長期以來正統說法的影響，對於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許多研究仍然是只重複原有結論，即籠統肯定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而不提論據，不加分析，似乎這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論證了。

但是由於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發現，原來那種籠統提法就顯得很難自圓其說。例如至今的許多黨史和傳記著作，幾乎都是在敘述了毛澤東當選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來的助手後，緊接着筆鋒一轉，就得出結論說，遵義會議“在關鍵時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卻並不提成為領導的表現和做出這一結論的根據。把另一個常委軍事指揮上的助手說成全黨全軍的領導，實在有點牽強。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較客觀的著作，在這個問題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論述黨的六屆領袖的書《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確有一些獨到的見解，但卻一方面肯定“1935 年 1 月到 1937 年 12 月，張聞天既是組織上的最高領導人，也在實際工作中起到‘負總責’的作用”；[4] 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標題卻是“一個矛盾的歷史現象——名義領袖與實際領袖的分離”，就不但讓兩個論斷相互打架，名義領袖之說還把張聞天置於掛名的總書記向忠發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澤東在博古之後就已是實際領袖，那就只是五屆，也談不上六屆了。還有新出版的《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對張聞天在這段重要歷史時期的作用和貢獻，作了比較全面和客觀的介紹，但也無法擺脫這個矛盾。在一共四頁書裏就有這樣一些前後矛盾的斷語：先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緊接着談到項英會後的來電時又說，“這真是到了十萬火急、刻不容緩的地步，而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更換問題卻還沒有解決。”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於是得出結論：“從此，張聞天開始了作為在黨內‘負總的責任’的黨中央核心領導人的重要活動時期。”還補

充說，“張聞天當時的思想水平、理論水平、已經達到作為黨的總負責人的要求。”[5] 又如後面一節用了《擁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的標題，講的內容卻是：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會議上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意毛澤東作為成員之一的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的建議，以及會理會議上毛澤東產生對張聞天的長期誤會等，就都顯得有點文不對題。至於隨後說的，“在危難的時候，張聞天總是樂觀地對人們說：我們的黨經過艱苦曲折的過程，終於找到了正確的領導人，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我們不但能戰勝長征路上的危難，而且能夠克服今後革命路上的種種困難。”[6] 這些話恐怕只能是作者的想象或延安整風後才有的提法，當時大約是不可能發生的。該書既然肯定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那還談什麼張聞天“負總責”和“在總書記崗位上”。博古的總書記本來是完全有職有權的，遵義會議對這個崗位的權限也沒有做出特別決定，甚至連暗示都沒有，為什麼張聞天一接手就變成了掛名的虛位？

應該說，上面提到的這兩本書還是近年來所看到的對張聞天寫得比較客觀、公正、也許更接近實際一些的。它們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遠的書就不用說了。看來，堅守長期以來的這個固定論斷，既成了陷於矛盾而無法解決的死結，大概也是難以通過的關口，就是說：都得這樣寫。

由此可見，關於遵義會議後黨的領導問題還應該進一步展開討論，解決各種疑難，恢復歷史真相。其實，現在資料已相當豐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問題並不難解決。關鍵只在於要不要繼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對待已有的結論(包括各種決議、權威言論、以至當事人的反省和各種回憶），是採取“兩個凡是”的態度呢，還是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如果只能以中央決議和當事人的反省或回憶為准，那 1959 年廬山會議的案子永遠也翻不成，更不用說“文化大革命”了，黨提出的思想路線也成了一紙空文，實事求是只不過是並不兑現的口頭禪。

實際上，根據現有材料，大概已經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

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遵義會議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會上，只是經張聞天和王稼祥提議，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從此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是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在新領導集體中為首和成為核心。如果會議情況確實像後來人們所說的那樣，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那為什麼不推舉他接任總書記，反而推舉張聞天呢？有一種說法也值得懷疑，即: 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7] 如果屬實，那會議起碼也會推舉毛澤東代替周恩來任軍委書記，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軍事小組時也會以他為組長，而不會是周恩來。既然連國際顧問都可以讓其靠邊，總書記都可以更換，改變軍事領導首長是更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會力辭。然而這一切卻都並未出現，可見長期以來流傳的那些說法是多麼地不可靠。

既然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於理於法都顯得缺乏根據，那改為“實際上”確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實事求是的話，應該說“實際上”也並未確立。

下面就利用二十年來黨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現有的文獻和史料作些辨析。

二，關於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沒有也不可能確立毛澤東對全體紅軍的領導，這是無可爭議的。因為會後一個相當時期，紅軍都處於極端分散的狀態，無論毛澤東還是黨中央都談不上對全國紅軍的領導。四方面軍在北上到達陝北會師前就一直不服從指揮。二、六軍團有八個月反而受張國燾節制。中央蘇區留守的紅軍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聯繫。長征到達哈達鋪，中央才瞭解到陝北紅軍活動的情況。可見，說確立對全軍的領導本來就是一句空話。

那麼能否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中央紅軍（一方面軍）的領導呢？大概也不能這樣說。會議決定和常委分工都規定得很明確，就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

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8]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鑒於以前博古（實為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和實行個人包辦的惡劣作風，會議強調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所以會後幾乎每天都要開政治局或常委的擴大會，討論作戰計劃和行軍路線，然後以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的命令行之。作為毛澤東自稱“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也必須變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實現。毛澤東這時只能作為會議的一個參加者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的意見也不見得大家都聽。例如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由於對當時的軍事指揮不大信任，遂提議並經政治局會議討論決定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也是以中革軍委朱（德）周（恩來）王（稼祥）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還明確周恩來仍是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9] 幾天後在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鴨溪會議上，竟然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並撤消了他的政委職務。[10] 毛澤東也只能連夜去找周恩來，建議晚點下命令。當時那種軍事上的集體領導，現在看來好像有點矯枉過正，但在沒有建立起軍事領導權威的情況下還是需要的，否則毛澤東就很難發揮作用。所以半年後的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還提議要發揮常委會作用，每周至少開會一次。[11] 說明他並不嫌開會多。因為這時毛澤東的領導威信還不是後來人們所說的那麼高。鴨溪會議上意見遭多數否決，以及會理會議前林彪寫信、彭德懷發牢騷以及劉少奇與楊尚昆發電報等不信任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事件，都是證明。在個人權威還不足以保證自己主張得以實現的情況下，一般都會強調集體領導，主張多開會；一旦成為權威，才往往容易感到會多了麻煩。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看作確立毛澤東軍事領導的證據，也是不大可靠的。因為三人小組隸屬於中央軍委，不但職權同遵義會議前的三人團不同，而且組長還是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毛澤東只是組員之一。[12] 在一、四方面軍會合的兩河口會議上，代表軍委作報告和結論的就是周恩來。[13] 沙窩會議決定恢復一方面軍，還是任命周恩來為司令員兼政委。[14] 所以正如有的黨史研究者所講，從黎平會議到毛爾蓋（沙窩）會議這8個月期間，“不管是從職位上看，還是從實際作用上看，周恩來都是全軍的最高統帥”。（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頁）毛澤東開始走上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地

位，是在最後一次沙窩會議上，因周恩來生病，張聞天提議常委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以後，特別是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毛澤東出任政委以後。張聞天在 1943 年的《反省筆記》[15] 中也說，“出了草地以後，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實際上，直到長征結束中央抵達陝北，在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又是張聞天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這才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對一方面軍（還有十五軍團）的領導。但由於張國燾鬧獨立，尚未同二、四方面軍會合，有些紅軍又失掉聯繫，所以還遠談不上對全軍的領導。

遵義會議過了將近兩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陝北，中革軍委進行了改組，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這時雖然實際上已經實現了統一指揮，但領導關係在公眾印象中還不夠明確，有些責任還分不清，致使1937年3月西路軍的完全失敗，責任在中央軍委還是張國燾，就長期說法不一。明確和穩定地確立起毛澤東對全軍的領導，還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洛川會議上。從此，毛澤東無論名義上還是實際上，都是中央軍委主席和軍隊的最高統帥，直到四十年後去世。但還不能說洛川會義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這又是一年多以後的事了。

三，關於對全黨的領導

為什麼不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呢？下面就試舉八條論據進行討論。

（一）會議推舉出的總書記[16]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沒有選舉毛澤東代替博古，出任總書記，是因為當時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毛澤東由於創建紅軍和蘇區，所以名氣很大，與朱德並列，以“朱毛”著稱，國內外以至蘇區軍民多把他看作紅軍和共產黨的領袖，知道向忠發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張聞天的反倒很少。這也是蘇聯和共產國際重視毛澤東，使“左”傾中央對他不能為

所欲為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他在黨內的地位卻一直不高，六屆四中全會後還受到“左”傾中央的壓制和排擠，五中全會上才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地位仍在會議選出的中央書記（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之下，且沒什麼實權。毫無疑問，當時反對“左”傾中央和“左”傾軍事路線的靈魂是毛澤東。但是他在中央勢孤力單，掀不起一場有望解決問題的鬥爭，只能長時間保持沉默。所以張聞天、王稼祥從“左”傾中央分化出來極為重要。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來，只能推舉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代表正確路線方面作“反報告”。這也使會議推舉張聞天起草決議並取代博古出任總書記，成為順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義會議沒有推舉毛澤東出任總書記，有的說是出於毛澤東的謙辭。這自然是沒有根據的推測。因為毛澤東自己就常說，“我是不讓權的”，“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他還有一句著名的話，就是：“什麼偉大的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17] 何況當時的情況完全不同於六屆六中全會他已實際上成為全黨全軍領袖以後，革命又處於危機關頭，謙讓就是推卸責任。例如會後張聞天提議讓他出任前敵總指揮，毛澤東就沒有推辭。還有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先讓張聞天“過渡”一下，是為了好向國際交代。這也是實在說不過去的。遵義會議既然敢於把國際派來的顧問和國際批准並一直承認的總書記拉下馬，為什麼對民主選舉替代的人就這麼多顧慮呢？而且此說至今並無任何足可證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憶錄都沒提到當時的什麼人曾有此考慮。相反地，中央領導人倒是知道過去國際是支持毛澤東而不支持張聞天的。例如六屆五中全會選張聞天為書記之一，國際回電就不同意，後經博古去電解釋才予批准。[18] 而“左”傾中央會前還計劃取消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國際不但不准，還力主把他選為正式委員。對於去掉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換成張聞天，中共代表團也來信說，“莫斯科很不滿意”，還一再通報國際對毛澤東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極為重視，說“國際已將毛同志作為中共和蘇區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傳和肯定了”。[19] 其實，在這之前國際對毛澤東的宣傳就很多，而無論以前還是以後對張聞天都沒有什麼宣傳。

至於說遵義會議推選張聞天並非出於多數人的意願，“大家都擁護毛主席出來領導”，“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但是毛澤東說服了大家，“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20]這種說法大約只會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碼也是延安整風以後，在遵義會議時是幾乎不可想像的。而且事實上，所有這些，在延安整風中專門清算歷史問題時都沒有特別涉及，可見這些說法只是出於一些人事後的認識或某種需要。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新的領導集體，卻是當時各種具體條件決定的，帶有很大的歷史必然性。

（二）在遵義會議後的長時期裏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

按照毛澤東的定義，“為首”就是召開會議。[21] 可是遵義會議後的幾年裏，毛澤東並沒有召開和主持過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各種大小會議。遵義會議是在大家要求下，經政治局黎平會議決定，由總書記博古主持召開的。說遵義會議是在毛澤東領導下舉行的，只是延安整風後一些人使用的一種抽象說法。如果意思指是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導下舉行的，也許還說得過去，但談不上領導，因為他既未召開和主持，也未作報告和結論。至於遵義會議後幾年的中央會議，則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的，據張培森同志統計，前後多達137次。所以在紀念張聞天85 周年誕辰前夕，王震還特意向鄧力群提出建議，“請你、喬木、胡繩同志考慮，能在修改黨史時，將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特別是長征結束後）主持會議的史實載入史冊”，說“許多同志似不知張聞天同志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歷史事實。歷史要真實”。[22] 楊尚昆1997年3月22日同劉英談話中，提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也說，“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23]

《毛澤東年譜1893—1949》對於出席和參加、主持和召開中央會議有較嚴格的區分，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後參加中央各種會議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後則一律用“主持”。這是講求分寸和實事求是的。只有一次例外，即1936年12月13日寫的是：“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24] 正是這一例外恰恰與事實不符。因為遵義會議後形成的慣例和制度，就是一切中央的會議（政治局和常委）都由總書記張聞天召開和主持，如無特殊情況，毛澤東是不會違背這一制度自己出面去召集會議的。而且當時擔任政

治局會議記錄住在張聞天隔壁的李華生、也與張聞天為鄰並列席這次會議的郭洪濤、開會時在場並作了簡單發言的張聞天夫人劉英，都一再證明和堅持認為，13日會是由張聞天主持並在他的住處舉行的。[25]

1938年以前，張聞天召開和主持中央的會議，還不像六屆六中全會後實際上已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那樣，“只在形式上當當主席”，而是認真準備，確定會議議程和報告人，最後往往還要作總結發言，實為會議結論。因為自張聞天主持中央工作後，就竭力發揚民主，推行集體領導，摒棄博古時期那種個人包辦和獨斷專行，所以不但開會多(同外地領導人磋商的電函也多)，重要問題會議上定，而且還按所討論的問題由分工主管的人對某項議題提出報告和在討論後作結論。這樣，作為會議主持人，他的最後講話就被稱為“總結發言”。

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在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時期，只有他可以召開中央的會議，毛澤東則只能建議張聞天召開。在中央駐瓦窰堡期間，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會議，就是在毛澤東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其中有些會還就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做出了決定，有的事先徵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有的只是事後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晉西會議後，張聞天回到後方，毛澤東仍在前線，在這一個多月裏張聞天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紅軍渡河回陝前，毛澤東要求開政治局會議，4月28日致電張聞天，內稱：“提議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新的行動方向及其他與其關聯的問題。”[26] 可見，召開政治局會議是張聞天的職責，毛澤東只可提出建議而無權自行決定。

（三）這一時期實施對全黨的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後三四年，代表黨中央同各方面聯繫和處理重大組織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當時的重要組織關係和組織問題，都是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或總書記身份出面管理和負責處理的。這方面的事例很多，包括：打通和保持同共產國際的組織關係(多通過中共代表團)，進行請示匯報、要求援助、接受指示等；管理全國黨組織，如向各路紅軍和各中央局傳達中央重要會議決議(遵義會議、瓦窰堡會議等)。特別明顯的例子是，長征後博古放棄了對全國黨和紅軍的領導，以致項英1935年2月4日來電說，“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

回音，也不對全國佈置總方針。”[27]張聞天接任總書記後，就很快開會討論，作了答覆，隨後又向蘇區中央局、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發去他自己起草的傳達遵義會議的《決議大綱》；發佈中央決定和指示，接受並處理各地發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幹部(提出建議、交待任務、接受匯報、保持聯繫等)，如長征路上派陳雲、潘漢年去上海，到陝北後派劉少奇領導華北局和派馮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黨委，其中成立陝甘寧省委派李富春為書記，成立甘肅省工委以劉曉為書記，改陝甘特委為陝甘省委由朱理治任書記，派戴季英去陝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張聞天主持會議通過，再電告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的。而且連毛澤東本人的幾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張聞天建議並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討論決定的。如遵義會議後，“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楊尚昆語。見他為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一書所寫的《序》），提議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同意毛澤東成立三人軍事小組的意見，長征途中沙窩政治局常委會上提議毛澤東分工主管軍事，到達陝北後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等等。

由此可見，這個時期毛澤東並沒有管中央和全黨的組織工作，仍然像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所說，“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28]但更重要的是由於不在其位。這和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的情況明顯不同，更不用說1943年中央機構改組後的情況了。

（四）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也是張聞天為首

遵義會議後的三四年是中國革命的轉折時期，不但勝利完成長征，而且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作為新領導集體的一員，毛澤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他分工主管的軍事方面。由於當時實行比較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作報告和起草決議也基本限於軍事問題(後來又加上統戰問題)。而有關全局的政治形勢和策略方針的報告以及決議的起草，都是由總書記張聞天完成的。

一直有一種說法，毛澤東雖然沒有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但實際上

是新領導的核心，因為一切重大問題都是他出主意大家同意後定下來的。如果是指某些具體軍事問題，也許可以這樣說；但如指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情況卻並非如此。這只要對《張聞天文集》和《毛澤東文集》(均包括《選集》) 這個時期的文稿以及兩人同一時期的《年譜》作一對照，就可明顯看出在政治領導和決策中各人所起的作用了。例如1935年甚至包括1936年，在整個形勢和黨的政策方面重要文件極多，但毛澤東卻幾為空白。有兩件在戰略轉變上有重大意義而由他署名的文件，卻是張聞天代為起草和發佈的。第一件是著名的《抗日救國宣言》(包括十大綱領)，毛澤東從前方覆信給張聞天說，“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內容及具體的口號與綱領完全同意，宣言請即發。”第二件是《關於改變對富農政策的命令》，他在信中表示“基本同意”，只是提了些修改的意見。[29] 如按胡喬木說的辦法，“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30] 那麼把六中全會以前和以後的毛澤東文稿一對比，也就可分清核心和非核心、為首和不為首的區別了。

下面再從幾次重要會議中看這一時期張聞天在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代表正確路線一方作《反報告》和受委托起草決議，現在已得到公認。需要一提的是，有些著作為了突出毛澤東和減弱張聞天的作用，提出《遵義會議決議》是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的。這一說法的缺乏根據和於理不通是很明顯的。對此，將另有專文論述。

遵義會議後長征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一、四方面軍的會合與確定北上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兩軍會合後，張聞天主持召開了幾次重要的政治局會議，如兩河口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等，在會上分別作政治報告或結論，並先後起草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和《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31] 在兩河口會議通過第一個決議的前幾天，張聞天就發表了一篇《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32] 的署名文章，成為最早系統闡述北上建立根據地的重要文獻，這就不能說決定和決議的起草是根據別人的發言和意見了（但有些史書上仍說是張聞天支持了“毛澤東的北上方針”，不知有何根據）。此後由於張國燾違背上述決議和對抗中央，

張聞天又主持了反國燾路線的鬥爭。直到延安後，有關批判張國燾的報告和決議也都是他作的。中央安家陝北，當然是領導集體決定，但肯定有張聞天的重要貢獻。因為從現存文獻看，首先透露出這個意思的就是張聞天在哈達鋪寫的一篇《讀報筆記》，[33] 說明他注意這個問題，早有這個意向。其他各種說法，如毛澤東看到《大公報》才知道有陝北紅軍等，可能都有，但卻於文獻無據，仍屬於傳說。

標誌着黨的政治路線徹底轉變的瓦窑堡會議，是遵義會議後的又一極為重要的會議，準備工作是完全在張聞天主持下，而毛澤東因在前方打仗未能直接參與下進行的(其實，中央到達陝北後，在吳起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就首先提出了戰略轉變問題)。當時由張聞天主持，同後方的政治局委員一起，根據張浩傳達的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討論確定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相關的策略，然後寫信徵求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前方領導人的意見。毛澤東也很快覆信表示完全同意和對改變富農策略“基本同意”。當毛澤東回到瓦窑堡三天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召開，張聞天作政治形勢與策略問題報告，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張聞天會前起草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通稱《瓦窑堡會議決議》)。[34] 延安整風以後，一些黨史著作和回憶錄，為了突出毛澤東，往往不提會議的政治決議或者一筆帶過，而大講特講會後毛澤東的傳達報告，[35] 自然是不確切也不妥當的。

頗能說明問題的還有對西安事變的處理。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這次事變，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如何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是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關鍵。事變第二天的12月13日，張聞天就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分析形勢，討論對策。依慣例由分工管軍事和統戰的毛澤東作報告和結論。由於事出突然，一時發生意見分歧和某種感情用事也在所難免。毛澤東就在肯定事變的積極意義和強調抗日的同時，提出了兩條互有關聯的主張：一是“我們應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二是“除蔣”、“審蔣”(兩天後毛澤東領銜的紅軍將領通電中還公開提出“審蔣”)。張聞天在發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見，主張“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後來的事變發展證明，中央執行的不是毛

澤東的主張，而是張聞天提出的方針。19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西安事變的意見已趨於一致，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確定和闡明了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會上張聞天還批評了“審蔣”的意見，說“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一個多月後的1937年1月24日，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也提到“審蔣”的口號不對。這期間留在後方主持大計的中央常委只有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他們密切合作，指導全局，分頭或以“洛、毛”聯名發出了大量電報。張聞天還起草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著名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在緊急時刻，作為“第一把手”的張聞天又親赴西安，指導談判和研究對策。這也象徵着黨中央一時到了西安(這時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員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無疑問，毛澤東也是運籌帷幄（19日政治局會議舉行的當天就起草和發出14份電報），在處理西安事變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針和工作中抓總的卻是張聞天。[36] 只是由於長期遭到埋沒和抹煞，至今論及西安事變的書籍以及文藝作品仍然不承認他的領導作用，甚至忽視他的存在。

其他一些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如1936年3月的晉西會議，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等，也都是張聞天作政治報告和結論，毛澤東只按分工作軍事和統戰問題的報告。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這四年間，除以上列舉，黨中央的其他重要文件包括政治決議和政策指示，也多是張聞天起草的，更沒有證據說明哪些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或發言。

這一時期還有些重大的戰略決策和工作轉變，也是在張聞天的主持下實現的。例如白區工作的轉變就是在他的領導（出主意，用幹部)下進行的，見之於他同劉少奇的通訊和在白區代表會議上的報告等。改變青年運動的工作方向和組織形式，取消共青團（少共）的決定，也是張聞天做出的。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如張聞天是少數民族工作的開創者。據李維漢說，“中國共產黨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少數民族工作是黨中央到陝北以後，從組成西北工作委員會開始的。”當時張聞天主管西北工作委員會，任書記。委員會提供的關於蒙古和回民工作兩個報告的實施，“為黨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礎”。[37] 又如據李華生說，張聞天在抓黨內學習、指導編《黨員課本》時還在

中國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黨員的權利與義務”的問題。[38]

從以上列舉的事例看，至少1938年前，在政治上還不能說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而是張聞天在履行着名副其實的總書記的職責，並不是什麼“名義的領袖”。

（五）代表黨中央和以中央名義行事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後，新的領導集體以張聞天為首，張聞天在中央負總責，這是當時得到公認的，也包括毛澤東本人。下面數例就足以說明。

1，如上所述，代表中共中央同共產國際打交道。1936年6月16日，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發電報，通過中共代表團向國際報告中央到達陝北後黨和紅軍的全面情況。其中談到黨的領導機構說，“現在中央集中的組織，政治局：洛甫、恩來、博古、澤東、鄧發、凱豐、稼祥、仲丹（即張浩）、德懷，常委：洛甫（書記）、恩來、博古、澤東四人”，還要求國際提供經濟援助。國際派回國的代表張浩，也是先向張聞天傳達和匯報，共同商討貫徹國際七大精神和籌備具有歷史意義的瓦窑堡會議。後來張浩又以駐國際代表名義協助代表黨中央的張聞天，共同處理中央同四方面軍的關係。[39]

2，全國的黨組織都承認張聞天的為首地位。例如1936年9月26日，張國燾等給張浩、洛甫等的電報就說，“統一領導萬分重要……因此我們提議，請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義指導我們。”同日任弼時等的電報中也說，“你們提議以洛甫等用中央名義統一黨和軍事方針之領導，……我們認為是最適當的建議。”[40] 至於地方黨組織如北方局的劉少奇、上海的潘漢年和馮雪峰，也都是向張聞天請示匯報的。著名的北平草嵐子監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出獄案就是張聞天批的。直到1978年12月中央批准中組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中還說，“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總書記，他的批覆，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41] 各地來到中央的領導幹部，多按組織關係向張聞天報到和談工作問題(一度在張住延安鳳凰山麓時，有些人還開玩笑說成是進“皇宮”）。如潘漢年、張浩等初次回來還臨時住在張的家裏。潘漢年從莫斯科回來就是由張聞天領他去見了一次毛澤東，其餘都是張瞭解情況、佈置工作，親自談的。[42] 但是至今還有些材料和文學作

品（如許多電視劇）描寫當時某些黨的活動家回到中央只見毛澤東不見張聞天，或以見毛為主，見張陪襯。這只能是：或者由於不瞭解情況，或者有意要突出毛澤東。

3，張聞天在哪裏就意味着黨中央在哪裏。長征到達陝北後，中央兵分兩路，兩個常委毛澤東、周恩來去前方指揮打仗，兩個常委張聞天和博古到瓦窑堡安家。在此期間，只能説中央在瓦窑堡，而且不論人數多少，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都是合法的。1936年2月紅軍東征山西，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隨軍行動”，實際上就是指張聞天隨軍行動（有人戲稱為“御駕親征”）。雖然有半數常委（周恩來和博古）留在後方，但卻只能成立中央局。晉西會議決定“中央不再隨軍行動”，於是張聞天就回到了瓦窑堡，中央局也隨之取消。[43] 又如，1936年4月28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提出東征紅軍西渡回陝，並建議在延長舉行政治局會議。張聞天覆電同意，《毛澤東傳 1893—1949》就説成是“中央批准了這個決策”和“張聞天採納了這個建議”。[44]

4，名次排列多為張先毛後。延安整風前，名次排列順序不很嚴格，特別是早期，有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紀錄甚至把非政治局委員排在了第一名，但多數場合還是按地位高低排先後，一般為“洛、博、周、毛……”，也有“洛、毛、周、博……”，極少以毛打頭的。要是以常委聯署發電報，大都是“洛、恩、博、澤”，如1936年8月25日致駐國際代表王明電，8月9日致張學良電，多次致朱德、張國燾電等。[45] 由於到陝北後毛澤東已成為中央紅軍的統帥，作為黨中央第一把手的張聞天，需要在工作上同毛澤東緊密合作，所以這一時期他們兩人聯名發的電報也最多。據統計，從1935年10月長征結束到六屆六中全會，張聞天簽署或同別人聯署的電報共有451份，其中同毛聯署的為286份，佔64%，主要都是1938年以前兩年發的。[46] 另據張培森編輯《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後抄送來的材料，這期間署名“洛毛”的電報有220封；署名“毛洛”的為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會議以後。1938年二人聯署電報已大為減少，其中署“洛毛”的只有1/3。六屆六中全會後聯署電報更少了，而且都是毛領銜。[47] 當然，這也要考慮到中國的某些傳統作法，如聯署的起草人往往把自己的名字放到後面，或者非起草者審閱簽署時改了名次。洛毛或毛洛

的聯署自然會有這種情況。但是第一，會議記錄總不是他們兩人出於謙讓而有意安排的，看來還是有某種慣例。至於少數脫離常規的作法，則可能是記錄者以到會先後為序。第二，張聞天是個勤於動筆的人，在位期間的決議和文件多為他起草，大概不會把絕大多數聯署電報的起草推給毛澤東。而毛的性格也不是總喜歡位列人後。張聞天本人簽發給駐國際代表報告中央組織情況的電報，就以洛、恩、博、澤為序。1938年後的電報則多以毛打頭。這都說明署名先後那時也還是有些規矩的。從這些情況中也可看出領導地位的變動，同時證明1938年前在黨中央為首或處於領導地位的確是張聞天。從延安整風到現在，許多黨史著作，不管什麼場合，都把毛澤東放到第一位，特別是遵義會議以後，連寫到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時，明明組長是周恩來，也要寫成毛周王，有的乾脆說成“以毛澤東為首”（如被定為《遵義會議文獻》的伍修權的回憶文章[48]）。這就不能說是歷史主義的了。

5，張聞天和毛澤東都遵守遵義會議的決議和維護會後形成的領導體制。張聞天是個一貫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辦事的人。他在堅持集體領導和實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別認真，可以說在中共黨史上開了一代風氣。他又十分尊重毛澤東，注意徵求和採納毛澤東的意見，以致王稼祥譏笑他是個“泥菩薩”，[49] 他則以“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走”相回敬。但在遵義會議後幾年，特別是1937年12月會議改組書記處以前三年，他卻並沒有把毛澤東看成領導和上級，而是嚴格履行總書記（負總責）的職責，主持日常工作，召開中央會議，出主意，用幹部，做到了在其位謀其政。直到1938年，還為反映許多幹部的意見寫信勸毛澤東不要和江青結婚而引起毛澤東的大怒。[50] 沒有讓毛澤東發揮全面領導作用，曾是張聞天後來在整風中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例如上引的《反省筆記》中就說，“我還不瞭解使毛澤東負起領導的全責，發揮他的全部的指導力量，如最近兩年來（按：指六中全會後）所做的那樣。”還檢討他在行使總書記職權中的一些錯誤，包括在“用幹部”上的信任羅邁讓他當中組部長、重用郭洪濤讓他先後任中組部副部長、陝北省委和山東分局的書記等。可見張聞天當時還是有實權真管事的，不像後來那樣“只在形式上當當主席”。抹煞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擔任總書記的作用，或說他只是名義上和形式上的領袖，都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毛澤東的性格雖然不願聽命於人，但那時還是遵守紀律的，並無明顯僭越之舉。他尊重張聞天的總書記地位，從不自行召開中央會議，也從不自行代表中央發佈政策性指示或談話，不曾任免中央管的幹部，對這類問題有意見也只是向張提出。直羅鎮戰役後的報捷電報開頭就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報。"[51] 在向朱德、張國燾等的通報中也說，"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粉碎了三次'圍剿'。"[52] 有些前方來的電報還標題為："西北軍革委主席毛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張"（例如1935年12月5日的電報就是"西北軍革委主席毛電中共中央領導人張和國際駐中共代表李德"）。毛澤東要求中央開會討論什麼問題，或建議中央辦什麼事情，一般都向張聞天提出。

這裏只談一下被長期誤傳的關於釋放劉志丹的問題，說明毛澤東還沒有越權行事和獨斷專行。因為這可能又是一些搞個人崇拜的人為了突出毛澤東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長征到達陝北後，糾正陝北肅反錯誤、釋放劉志丹等人，是張聞天直接領導和親自處理的。他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中寫道："我們到陝北後，我即看出……肅反是過左的，所以很快就釋放了當時被誣陷的許多同志。"但是長期以來，卻被說成是毛澤東。各種史書和回憶錄都說是毛澤東聽了匯報就"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還有更生動地描述為下令"刀下留人"），釋放了劉志丹等，幾乎從無人提到張聞天。《毛澤東年譜1893—1949》還說成是毛在聽匯報前就已"當即下令"。[53] 在未作調查和未同常委商量就斷定是冤假錯案而貿然"下令"，這既不合乎毛當時的身份，也不像他在肅反問題上的一貫作法。而且這時還在派人尋找陝北紅軍，和陝北黨政軍領導機關還未取得聯繫，又向誰下令呢？如果不是根據原始記錄，而是取自有些人延安整風後的"回憶"，就有可能是以訛傳訛了。直到1985年，郭洪濤才在《張聞天同志初到陝北》一文中提出，"具體處理過去的冤案，釋放劉志丹等同志，這些工作都是張聞天同志領導的。他派王首道同志辦理這件事，還組成了一個五人小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負總責）、張雲逸、羅邁和我參加。他親自過問這個小組的工作，對糾正肅反擴大化錯誤抓得很緊。""一個處理肅反問題，一個改變對富農的策略，我當時深感張聞天同志開頭這兩炮放得挺好，對他十分敬佩。"[54] 應該說郭洪濤的說法是比較可靠的。因為

他是當時陝北黨的負責人，紅軍到達陝北後第一個代表陝北黨向中央常委作有關肅反情況的匯報，然後又參加五人小組，特別是還長期為陝北肅反問題受到冤枉，一直申訴了幾十年(他是反對說劉志丹等為反革命的，但卻被定為搞亂捕亂殺的領導人，並寫進了《毛選》1951年版注釋，直到“文革”後中央專為陝北錯誤肅反的責任問題開了座談會、發了文件，作了平反，新版《毛選》也作了改正[55]) 。後來出的《周恩來傳》上也說，“中共中央在聽取郭洪濤、聶洪鈞匯報時就覺察到有問題，決定成立一個以董必武為首的五人委員會負責處理。他們在洛甫領導下迅速查清了問題，在當月釋放了被錯捕的劉志丹等。”[56]但應指出，多數史書至今仍沿襲舊說。事實上劉志丹等人是被關押在後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灣聽取匯報後即分成兩路，毛澤東和周恩來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處理此事。而是到後方的張聞天在查清後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並親自主持了為劉志丹等平反的大會，還代表中央講了話，徹底解決了問題。[57]毛澤東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來、彭德懷一起從前方致電張聞天、博古，建議詳細考察肅反中的問題，說“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58]這都說明，毛澤東在下寺灣會議和出任西北軍委主席後，還沒有以領導自居，越過張聞天從直羅鎮前線下令放人。

其實，當時的張聞天和毛澤東，一個作為總書記，一個作為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密切合作，相互配合，他們的關係也是合乎原則的。張聞天不居功不爭權，不獨斷專行，不擺領導架子。但他堅持獨立思考，按原則辦事，認為毛澤東錯的東西也照樣批評。除上述西安事變時在會上當面批評“審蔣”的口號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長召開軍事會議時，他還在書面發言中批評毛澤東瓦窑堡會議上關於軍事戰略問題報告（也是決議）中的一個提法，說“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任務的第二項是不適當的”，把“打通蘇聯”作為戰略方針之首要任務也是不對的。[59]在他主持的中央會議上，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毛澤東的意見也不只一次。從毛澤東方面來說，還是尊重張聞天的總書記地位的，而且當時對張聞天的領導也是滿意的，並一再向人談及。如到陝北後常對人說，洛甫這個人講民主，開會讓人暢所欲言，作總結時能把我的意見總結進去，我送他一個雅號，叫做“開明君主”(有時也說成“有道明君”或“明君”) 。[60]因

而劉英就被稱為“娘娘”。他因管軍事，又自封為“毛大帥”。於是“明君”、“娘娘”、“大帥”，就在少數領導同志和熟人的圈子裏稱呼了一陣。直到最近（2000年3月），劉英還對問及的人談到這個問題，以說明當時同志中親密無間和生動愉快的情況。[61]

（六）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

這裏只舉以下幾個例證。

一是同王明的關係問題。由於中國黨和共產國際的隸屬關係，中央領導人須由國際決定和批准，因此國際派王明回國就容易被人誤以為是要他來當領袖(事實上，許多國家黨的第一把手就是流亡莫斯科後被派回國的)。加之王明以欽差大臣、國際代表自居的表現，也確實迷惑了一些人。當時說，王明是斯大林派專機送回國的，行蹤很神秘，停留蘭州時不露面，連對路過此地的蔡樹藩、鍾赤兵、劉英、賀子珍一些高級幹部都保密，同為政治局委員的陳雲反而成了護送人，出面安排飛延安的安全措施。[62] 到延安後又受到熱烈歡迎，被毛澤東喻為昆侖山下來的神仙。在隨之召開的政治局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又作了充分的表演，竟使多數與會者紛紛進行檢討。連毛澤東也表示“同意王明意見”，承認過去黨在實際工作中確有狹隘和不夠策略的地方（不像一些史書上說的那樣，毛成功地“頂住”或“抵制”了王明的右傾主張）。這時的政治局大多數，也許對王明還有點迷惑不解，雖不一定真心支持他當領袖，但沒有支持毛澤東和沒有承認他的領導地位，卻是實在的。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就說，十二月會議上他是孤立的，會後半年還對李維漢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窑洞。”[63] 會議也決定由王明起草決議。在組織上，可能是由於臨行前季米特洛夫的交代，或者是為了拿下張聞天的總書記，王明才提議毛澤東出任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但與會者仍推舉王明為委員會書記。而且政治局委員對通過這一議案還依次簽名，以示鄭重，成為中共黨史上空前絕後之舉。這大概也是王明後來在武漢敢於同中央分庭抗禮的一點誘因。另外，1938年政治局三月會議上，毛澤東曾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的建議，但表決結果卻是多數同意王明去，只是“留一個月即回來”。不但中央內部如此，有時對外也表現出雙峰並峙。如1938年9月底，中央派周恩來去見蔣介石就是帶的毛

澤東和王明兩人的親筆簽名信。直到1938年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關於“在領導機關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的指示後，才迅速在中共領導人中掀起擁護毛澤東當領袖的熱潮。所以毛澤東後來在七大會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雖然王明提出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是出自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但毛澤東還是一直說，“季米特洛夫同志是個好同志，他幫過我們很多忙。抗日戰爭中幫助我們抵抗了右傾機會主義。”[64]

二是黨的其他領導人在延安整風前或起碼在六中全會前，都沒有尊毛澤東為領袖的言論和舉措。一些“擁護毛主席的領導”等說法，基本上都是整風以後才有的。與此有關的是，領導人中幾乎沒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證毛澤東，但卻經常引證馬、恩、列、斯。即以較早宣傳毛澤東的劉少奇而論，他在1939年所寫被列為“整風文獻”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沒有一處引證毛澤東，只是在1962年修訂時才有了大量引證。他在1941年寫的《論黨內鬥爭》，1943年回到延安後又作了校正，也都沒有引證毛澤東。陳雲在1939年寫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有三處引證毛澤東的報告《論新階段》，但卻不提毛澤東的名字，而說成六中全會的決議。[65] 其他如周恩來、朱德等，在延安整風前發表的文章中，都沒有看到有引證毛澤東的地方。整風開始後情況才逐漸發生變化。根本變化是1943年。從這年7月起，差不多所有領導人都在文章中擁護和歌頌毛澤東的領導，開始把引證毛澤東變為寫文章、作報告的常規，反而很少再引證馬、恩、列、斯了。

三是各地黨的組織和領導並沒有注意宣傳毛澤東，毛澤東的文章和言論也沒有引起特別重視。例如長江局就集體決定不在武漢《新華日報》上發表《論持久戰》。有一個更能說明問題的事例，就是鄧小平對待毛澤東和張聞天在文化發展方向上發生的分歧所持的態度。1940年1月陝甘寧邊區文代會上，張聞天先作報告，提出中華民族新文化發展的方向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四天後毛澤東也到會作了報告（後來定名為《新民主主義論》），卻只提“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要不要“民主的”，顯然是個原則性重大分歧。然而在各地學習《新民主主義論》一年多之後，鄧小平在一次報告中卻只引用張聞天，只字不提《新民主主義論》。他說，“什麼

是新民主主義文化呢？洛甫同志說……”，接着引證了一大段原文的解釋。[66]這恐怕不能說是偶然的。

四是當時在群眾心目中，毛澤東也並不突出，是被和黨的其他領導人同等看待的。例如抗戰初期流行的一個歌子中就唱道，“城頭上站立着兩位大將軍，威風凜凜是哪個？朱德、毛澤東。”而且那時對“領袖”的理解也與後來不同，使用很廣泛，沒有嚴格限制，凡是群眾中帶頭的人都可稱領袖。黨的領袖也並不是只指一個人，根據當時通行的稱謂，大概書記處成員都可稱領袖。給人印象特深的是，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對前來作報告的領導人的介紹，如果是毛澤東，就說，“現在，請我們黨的領袖之一毛澤東同志講話。”受到“領袖之一”稱呼的，記得還有張聞天、周恩來、王明等人。這種提法一直延續到1939年。雖然六中全會上已有尊毛澤東為領袖的發言，但在公開場合和群眾中間，還沒有見到單稱毛澤東為領袖的，更沒有聽到喊萬歲。連長期在馬列學院和政治研究室這兩個中央機關工作的鄧力群都說，在 1942 年以前，沒有聽到過“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67]在群眾場合人們第一次聽到尊毛澤東為領袖的說法，反而出自王明之口。記得很清楚的一次是1939年春，王明大約才開完國民參政會從重慶回到延安來抗大總校作報告。當有人遞條子提問，“為什麼參政會我方七位參政員只有毛澤東同志不出席？”王明回答說，“你們下過象棋沒有？兩邊的將帥是不能見面的，一見面不是就要將起軍來了。”不管這一答覆是否妥當，承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卻是無疑的。但這已是六中全會以後，也不是直接稱毛澤東為全黨領袖。可見，在延安整風前，起碼在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的四年間，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是沒有得到公認的。

（七）“五朝領袖”之說與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的領導相互矛盾

1964 年 4 月 16 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提到，我們黨的歷史上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張聞天）。1967 年 7 月 12 日，周恩來也談到我們黨的五任領袖，說“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這可能是個概數，即使算到

1943年中央機構調整也只有八年）。總之，在第四代博古和第六代毛澤東之間有個第五代，這是得到全黨和史學界公認的，還從未見到過否認“五朝領袖”說的意見。既然如此，怎麼能無視第五代的存在而硬說是緊接着博古的下台就立即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呢？這不是明顯的矛盾嗎？為了擺脫這種尷尬，後來的許多黨史著作，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就都加上了“實際上”或“事實上”的副詞，說“遵義會議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或者“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但一般地都不提供根據和事實，似乎是由於說得久說得多，就不成問題了。而上面列舉的大量事實又正好相反，所以矛盾依然存在，說明加個副詞並不解決問題。

有些否認存在“第五朝領袖”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前面已經談過的，說張聞天只是名義領袖，實際領袖還是毛澤東。這是在個人崇拜影響下的說法，並非歷史的真實。事實上無論從組織領導還是從政治決策看，張聞天都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根本不能同向忠發相提並論，也不同於“文革”後鄧小平作為領導核心已經形成並在黨內外得到明確承認的條件下的總書記。二是說張聞天負總責只是從開始確立到正式確定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過渡。這是意在抹煞張聞天主持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偉大戰略轉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既不合乎事實，道理上也說不通。因為在“五朝領袖”換代時都沒有什麼過渡，為什麼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時要有那麼長的一個過渡？而且也不能把張聞天比之於華國鋒。因為鄧小平說，“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談不上一代，就是‘兩個凡是’也是繼承毛澤東晚年的治國方略。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68] 不管這種說法是否完備，都不適用於張聞天。因為從遵義會議到瓦窰堡會議，以前和以後卻是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摒棄錯誤路線和制定正確路線的是黨中央領導集體，當然不能說只是張聞天，但他作為第一把手主持其事總是不能否認的。三是說張聞天負總責的時間比較短，不到四年，因此不能算一代。這更不成其為理由，因為“五朝”中前面有些“朝”時間更短。就是江澤民總書記，也是一接任就被稱為一代領導核心的。

(八)原有論斷既違背黨的章程和制度，也有損於黨及其領導人的形象

最後要指出，說遵義會議確立的不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而是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不僅有悖歷史事實，還違背黨章規定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也有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形象。因為這等於說，黨是老早就不按組織原則辦事的，名義上和實際上是兩套，會上的選舉和作出的決定都是表面文章，內幕則是個人獨斷或幾個人的密謀。也等於說毛澤東一開始就居於黨組織之上，不遵守黨的紀律和民主制度，甚至在施展權術，而張聞天則甘做“阿斗”，其他領導人也成了一群“馴服工具”。如果說，遵義會議推舉張聞天當總書記，並不是出於多數人的志願，而只是出於毛澤東的個人安排，那不等於說遵義會議時已經是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會議的兩大歷史性決定：改變領導是在他幕後操縱下實現的，“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改變路線的決議又是根據他的發言起草的，這不是和“文化大革命”時的作法一樣了嗎？由此可見，不實事求是地對待遵義會議及其後的黨史，影響是並不好的，只能加深個人崇拜，削弱黨內民主，損害黨的形象，看似照顧大局，實則遺患無窮。

根據以上八個方面看來，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是不符合歷史事實和缺乏充分根據的。既然如此，為什麼經過延安整風會形成這樣一個眾口一詞的結論，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看來複雜，其實簡單，就是看能不能擺脫多年來個人崇拜的束縛，真正實事求是地對待黨史，做到去偽存真，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大家都承認，歷史應該真實（如上引王震的話）。因此，黨史中的各種疑難問題，一切不實之詞，必須也完全可能逐步加以解決。但是也要看到，倡導了幾十年的實事求是，真正和完全落實並不容易。

註釋

1　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3 《張聞天在 1935—1938（年譜）》，中央黨史出版社 1997 年版。
4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共六任領袖新視面》，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8，89 頁。
5 李濤：《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 52-55 頁。
6 李濤：《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第 71 頁。
7 《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7 頁。
8 《遵義會議文獻》，第 42 頁。
9 《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頁；《長征大事典》(上卷)：《長征史概述》和《第一方面軍長征史》，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0 《張聞天在 1935—1938（年譜）》，第 9，24 頁。
11 《張聞天在 1935—1938（年譜）》，第 9，24 頁。
12 《周恩來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50 頁。
13 《周恩來傳》(一)，第 354-356，359 頁。
14 《周恩來傳》(一)，第 354-356，359 頁。
15 此係原件標題，日期署為1943年12月16日；1986年《遵義會議文獻》摘錄發表時改稱《延安整風筆記》，此後即被通稱為《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
16 關於總書記問題擬另外討論。這裏先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第一，張聞天遵義會議後任總書記恐無問題，因為包括毛澤東在內許多中央領導人和老同志一直都是這樣稱呼，張自己在《反省筆記》中也多次提到讓出總書記的問題，連劉英1937年去蘇聯治病也是用總書記夫人身份；第二，張任總書記係遵義會議上大家的推舉，因他一再謙辭，才拖延到後來行軍路上交接，這與會後常委分工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助手不同；第三，六屆五中全會設書記處當係事實，因為會後不久就不斷以書記處名義發指示和向國際報告，長征中和到陝北後仍然如此。因此，陳雲多年後說遵義會議以前和以後中央都沒設書記處或常委顯然是記憶的錯誤。
17 轉引自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 92 頁。
18 張聞天 1943 年《反省筆記》。

19 趙蔚：《共產國際與遵義會議》，載《國際共運》，1985年第4期；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頁。

20 《遵義會議文獻》，第68頁。

2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625頁。其中講到“為首”問題時說，“召集會議，需要一個首……即使黨的一個小組，如果不舉出一個小組長，那麼這個小組就開不成會……為首同召集會議差不多是一件事。”

22 王震1985年6月22日在鄧力群紀念張聞天文章上的批語。

23 《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6期。

2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21頁。

25 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郭洪濤：《張聞天同志初到陝北》，均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另，幾次訪問劉英的談話錄音和1999年3月2日訪問郭洪濤的談話。

26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81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38-539頁。

27 《中共黨史資料》第22輯，第10-12頁。

28 《周恩來傳》(一)，第315頁。

29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45，46，50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3-494頁。

3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頁。

31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15頁；《張聞天文集》(一)。

32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15頁，《張聞天文集》(一)。

33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31頁，《張聞天文集》(一)。

3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會議詳情可參閱：《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86-290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3-494，499頁；張兆憲：《張聞天對瓦窑堡會議的貢獻》，程中原：《永不磨滅的歷史功勛》，分別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三，第二集。

35 如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等。

36 以上有關處理西安事變的情況，分別見《毛澤東傳》和《張聞天傳》、《張聞天年譜》和《毛澤東年譜1893—1949》的有關章節，以及《張聞天研究文集》中的《張聞天與西安事變》、《張聞天在我黨解決西安事變中的歷史作用》等。

37 轉引自《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第170頁。

38 李華生：《回憶張聞天同志在陝北的革命業績》，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39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96-97頁。

40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136-138頁。

41 《劉少奇傳》（上），第229頁。

42 幾次訪問劉英的談話記錄，如1999年3月4日，2000年5月16日、18日等。

43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37-50，58，73-74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379，383頁。

44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81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上）（見第383－384頁）的寫法是：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張聞天，“向中共中央提出……決定西渡。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決策。”又說，“毛澤東、彭德懷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前方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張聞天採納了這個建議。”

45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119，125頁。

46 《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頁。

47 張培森1998年3月9日給何方的信。

48 《遵義會議文獻》，第119頁。

49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50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6頁。

51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44頁。

5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94頁。

53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84頁。

54 《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97頁。

55 1999年3月2日訪問郭洪濤的談話。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上（見372頁）也說，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存在爭論。最近在黨中央領導

下，經過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組同原陝北、陝甘邊有代表性的老幹部反覆研究、商討，取得了一致意見，……(詳見1983年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十八號文件）。”

56 《周恩來傳》(一），第370頁。

57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47頁。

58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88頁。

59 《張聞天在1938—1938（年譜)》，第61頁。

60 《毛澤東的人際世界》(上），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頁。

61 1999—2000年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62 1999—2000年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6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頁。

64 以上均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三章。

65 《整風文獻》(訂正本），解放社1950年3月版。

66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1994年第2版，第24頁。

67 鄧力群：《回憶延安整風》，《延安整風以後》，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68 轉引自《黨史博覽》，1999年第2期，第7頁。

(2000年3月完稿)

第二篇

再談與遵義會議有關的三個問題

一，《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的嗎？*

《遵義會議決議》[1]是對第五次反“圍剿”中“左”傾軍事路線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對中國革命戰爭中形成的正確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思想的第一次系統論述。它在黨的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認的。但是長期以來卻沒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誰，甚至曾被誤傳為毛澤東，據說還曾收入1948年有的地方上自行編的《毛澤東選集》。[2]但在建國後正式編《毛澤東選集》時，有人提出將此文收入，遭到毛澤東本人的反對，說那是張聞天起草的。可此說一直沒有向外公佈。第一次公佈《決議》系張聞天起草這一重要史實的，是1979年8月25日在張聞天追悼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的《悼詞》。《悼詞》中同時還指出，這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3]原由曾彥修、徐達深、何方起草的稿子上沒有這些內容。據張聞天夫人劉英提供的材料，有不少重要內容是送審中胡喬木加上的。她說，“胡喬木對悼詞作了修改，增加了這樣一些重要的話：張聞天同志‘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間的重要領導人’，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他是我黨歷史上在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胡喬木的修改得到了鄧小平的批准。”[4]事實上，這些重要的修改，除其中的“被選為總書記”1982年根據陳雲意見改為常委分工“負總責”外，起草決議等各點後來就成為黨史研究中的定論，有

---

*分別發表於《炎黃春秋》2000年第九期，《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均有刪節。

關黨史的著述和許多領導人的回憶錄都一律遵守這些口徑，同時也都將“總書記”改為“負總責”。

關於《決議》為張聞天起草，已被此後發現的陳雲在遵義會議開過不久的被稱為《傳達提綱》[5]所證實，並為史學界公認，已經沒有爭議。但是《決議》的起草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卻由於缺乏證據仍然是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八十年代初編輯《張聞天選集》，在為收入《決議》作題解時我就曾提出不同意見，但未被採納，而得到的解釋是：第一，張聞天不懂軍事，自認外行；第二，《決議》反映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初始表述。所以在1985年出版的《張聞天選集》有關題解中就作了這樣的處理：“受會議委托，在會議討論的基礎上，特別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起草了這個決議。”[6]同悼詞稍為不同的是，這裏加上了“在會議討論的基礎上”這句話。

對悼詞的提法後來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把“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變為“根據毛澤東發言”。例如伍修權1982年在《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一文中的說法就是：“會議後期，委托張聞天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的發言精神，起草了……。”[7]如果說，個人的回憶錄不足為憑，可以不論，但後來出版的權威史書也竟然採用此說。例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傳》就更加以具體化，分別定為：“會議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8]“遵照會議的決定，洛甫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起草了……”。[9]這就是說，決議的起草不但是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而且這樣做還是會議的“決定”。再後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也進一步發揮了原先的觀點，說成是“張聞天同志根據毛主席發言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10]可能是由於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和規矩，其他許多談到這個問題的文章和書籍，大多要加上《決議》是根據毛澤東意見或發言起草的話。這幾乎成了一種公式，而且說法一樣，一般都是只下結論，不講根據，所以很難令人信服。其實，只要細加考究，就會發現這一說法存在很多問題，實在說不大通。

首先，這一說法是前後自相矛盾的。《毛澤東傳》在做出“遵照會議的決定，洛甫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的結論之前，對會前準備就作了這樣

的描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也認真準備發言。經過共同討論，由張聞天執筆寫出一個反對'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報告提綱。"會上"由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11]這一敘述看來可能比較合乎實際，證之以後的陳雲《傳達提綱》，其中提到"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12]按照文意順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綱和毛王的意見。楊尚昆回憶的描述就更具體："我清楚地記得，遵義會議上的反對'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通稱'反報告'）是聞天同志作的。他作報告時手裏有一個提綱，基本上是照着提綱講的。"[13](這也確實是張聞天保持了一輩子的習慣作法：重要發言和報告都有一個詳細的書面提綱)。既然如此，張聞天受委托起草會議決議，為什麼要撇開"經過共同討論"、代表三人"聯合發言"、且為與會者"完全同意"的"報告提綱"，而只"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呢？這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且陳雲的《傳達提綱》也只是說會議"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並沒有說會議"決定"要"根據毛澤東的發言內容起草"。如果會議真有這個意向，那為什麼不指定毛澤東自己起草呢？這在遵義會議後和延安整風前也並不是少見的。總之，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決議之說，顯然有悖常理，不可能合乎事實。還是《張聞天傳》中的說法比較合理，顯得真實："在遵義會議以後，張聞天是以他作'反報告'的提綱為基礎，依據會議討論中毛澤東、王稼祥、周恩來及其他同志的發言形成的意見，在行軍路上，寫成《遵義會議決議》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文獻的。"[14]但是也有些黨史研究者，一方面從張聞天當時的地位、威望、思想和理論水平等的論證得出結論說，會議委托他起草決議並非偶然，他也完全勝任；另一方面卻又要勉強加上根據毛澤東意見或發言的話，自覺不自覺地落進前後自相矛盾的陷阱。

其次，長征一開始，張聞天就同毛澤東接近起來，一路行軍又走在一起，不但經常議論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而且如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所說，還"在政治局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15]周恩來1944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也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16]可見，毛澤東的意見，會前已多次討

論和交換過，張聞天也早已瞭解，無須只等這次會議上的發言。而且根據張聞天的習慣和他們之間的一貫作法，張聞天根據“經過共同討論”寫出的“反報告”提綱，必定給毛王看過，他們有什麼意見也一定會提出，並且作了反覆磋商和一再修改，最後才能成為代表三個人的“聯合發言”。由此可以斷定，毛澤東在張聞天作了“反報告”（也是他們的“聯合發言”）之後的發言，既不會同張相互重複，也不能相互矛盾，而只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然後作些補充，或對某些問題加以強調、發揮和提高。根據這樣一個發言是無法起草出會議決議的，而且會議也不會作出根據一個人的發言起草決議的“決定”。如果現在通行的這種說法屬實，而毛澤東的發言又確像一些人描寫的那樣全面系統，甚至說成“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7]那就只能是：或者和共同商定的《反報告》基本重複；或者毛在事前醞釀中沒有把大部分意見和盤托出而要留作自己發言。二者必居其一。按理這兩種情況都不會發生，因此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決議的說法也難以成立。

還應提到的是，在政治局最後審查通過《遵義會議決議》的同時，還以中央書記處名義發佈了一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據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考證，這個《決議大綱》可能就是張聞天會前起草的那個提綱，經本人略加修改，使之成為傳達和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的中央書記處文件，和《決議》的內容只是詳簡之分，而不是另起爐灶。[18]何況反報告提綱是在會上得到“完全同意”的，從法理和情理講，起草決議都只能以它為藍本，再吸收會上毛王周等人發言中的一些意見。而對於起草者張聞天來說，這樣做不但是順理成章和執行會上的決定，而且也比較容易完成任務。因為從遵義會議結束到決議的寫成和通過，緊打滿算只有二十天左右。這期間，紅軍一直處於行軍作戰的流動狀態，張聞天除必須隨軍行動外，還得經常（幾乎每天）參加和後來主持中央的會議、為書記處起草和簽發一些重要的文件電報，而《決議》的起草工作也要查對有關資料和文件(如國際指示和一些人過去的文章或發言等)。環境動亂和時間緊迫，更要求起草決議儘量省事。而以自己的報告提綱為基礎和框架進行加工，自然比較得心應手一些。根據會上一個發言起草，就要另起爐灶、有更多磋商，在內容和結構沒有根本

不同又沒硬性規定的情況下，大概是不會有人找這個麻煩的。

另外，張聞天終其一生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堅持獨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胡喬木自己在《回憶張聞天同志》一文中就說，“綜觀張聞天同志一生，我覺得，敢於獨立思想，敢於獨立地系統地提出和堅持自己的政治見解和理論見解，這是他的品質高尚之處。”[19]張聞天幾十年的經歷表明，他所寫的文章和發表的意見，總要出於自己認為成熟的考慮（被迫的交代和檢討、反省除外），即使貫徹上面指示或吸取別人意見，也要自己融會貫通，決不生吞活剝。例如他無論在東北做地方工作還是進入外交戰線，在向下面傳達中央會議時，都是要綜合會議精神並結合所在地區或單位的實際進行傳達，如同佈置工作一樣，從不照本宣科地只念幾個領導人的講話記錄。這也是我跟隨他工作十多年的親身體會。為此，下面曾提過不少意見，特別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在外交部，大家都想知道領導同志特別是毛主席具體說了些什麼，要求很強烈，他這才接受大家意見，大約從1958年起開始宣讀毛澤東的一些講話，但往往還要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以前那種傳達方式，也是 1959 年被批判的一項內容，作為反對毛主席的證明）。在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時尚且如此，何況遵義會議期間，毛澤東才被大家推舉為政治局常委，地位還在原有常委張聞天自己和周恩來之後。要張聞天不依大家同意的報告提綱而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決議，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而且，張聞天受委托起草決議，主要還是由於他本身的條件，即不僅因為他當時在中央僅居博古之下的地位和公認的思想理論水平，更重要的還是他作的“反報告”和提出的提綱為會議定下了基調，得到會議“完全同意”，可以作為起草決議的基礎，也表明他已和“左”傾中央及其路線宣告決裂，站到了正確路線方面。據研究張聞天的專家張培森、程中原等同志研究考證，[20]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的轉變、能夠站出來作“反報告”和受委托起草決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自身的思想基礎。張聞天原本就同王明、博古他們的思想觀點有差別，進入蘇區參加實際工作後又逐漸覺悟，越來越多地批評一些極左政策。特別是福建事變和廣昌戰役後，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領導和指揮直接進行鬥爭了。進蘇區兩年，一直處於戰爭環境，整天接觸和談論的都是軍隊和打仗。他又是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委員，要經常參加軍

事問題的討論。形勢也在迫使他對軍事問題進行學習、思考和研究。因此不能說張聞天完全不懂軍事。長征前寫的一些文章就是證明。如《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等，都直接談到軍事問題，批評了“左”傾軍事路線的幾種表現，提出了若干正確思想觀點。《遵義會議決議》不但反映了這些觀點，還採用了很多表達這些觀點的用語。這也證明，張聞天起草決議是以他的“反報告”提綱為基礎的。

再說，會議“決定”讓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或發言起草決議，也和他們兩個人的身份太不相稱。即使按好久以後才形成的作法，根據領導意圖（更不用說一個人的意見或發言了）起草會議決議，那也是秘書（或寫作班子）的事，總不致讓才推舉出來擔任第一把手的張聞天起秘書的作用。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更加不可能的。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關於《遵義會議決議》的起草，至今還沒見到毛澤東、張聞天等直接當事人的說法。如果決議確係根據毛澤東的發言起草，那麼基於決議在黨史和毛澤東思想形成上的重要地位，在建國後編《毛選》時大概是會收進去的，毛澤東也不一定會反對。收入《毛選》中的文章就有一些是別人起草的，例如《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就有其他人參與起草的部分，其中第一章第二節即由張聞天執筆，[21]而且文章的主要內容早已在延安一些學校講授，還油印過講義，至於作為附錄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更不用說了。另外，毛澤東著《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大部分就是李富春寫的。[22]（這種情況其他人也有。例如張聞天1945年11月起草的《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即著名的“陳高洛電報”，當陳雲在世時的1983年就已收入《陳雲文選》，[23]而張聞天親手起草的原稿檔案尚在。）張聞天是從不講他個人的功勞和貢獻的，在延安整風期間還竭力把一切功勞歸於毛澤東。因此決議如果確系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按理他是會在《反省筆記》或其他談到遵義會議的發言中作點說明的，但事實上卻隻字未提。周恩來、陳雲，也都沒講過決議的起草問題，如果會議真有根據毛發言起草的“決定”，他們理應是會提到的。胡喬木雖然是黨史方面的主要權威，被稱為“中共黨史研究和編纂的開拓者”，[24]在黨史問題上往往是“一言九鼎”，但終究不是遵義會議的參加者。而且一大半為後人整理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在談到決議的起

草問題時也是只下結論，並不提供任何出處和根據。所有這些都不能不令人存疑。

撥亂反正和批判“兩個凡是”以後，不是一再強調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嗎？這當然也適用於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總不能說其中不包括朱德、周恩來、彭德懷、王稼祥等人的貢獻。那為什麼在初步總結第二次國內戰爭經驗的時候，已經站到了正確路線方面的張聞天就不能有點貢獻，起草決議竟沒有自己的思想，而只能“根據毛澤東發言”？在這裏，歷史和邏輯不是又分家了？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認為，關於《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的說法，大概是以訛傳訛。既然如此，為什麼會提出這樣一個既非事實又悖邏輯的問題呢？看來，最初提出，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都是為了突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和權威；而人們後來的附和，則是黨史研究中一種一貫立足於個人崇拜的表現。“文化大革命”以後，要撥亂反正、改變方針，就必須批判“兩個凡是”及個人崇拜，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但又要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強調毛澤東的作用和貢獻，特別是建國前的功績，而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當然更是一項重要內容。也許是由於這種歷史背景，一方面公佈了《遵義會議決議》系張聞天起草，另一方面又說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把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和瓦窰堡會議實行戰略轉變的決定，歸功於毛澤東，更是為了突出毛而掠人之美。後來陳雲建議在《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要加寫一節《關於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顯然出於同樣考慮。實質上這都是在繼續堅持個人崇拜的思想。

關於瓦窰堡會議，上篇也已說過，這裏再特別談一下毛澤東的會後傳達報告。[25] 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和胡繩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26] 中仍大講特講的這個報告，其實存在着不少疑問，例如：第一，當時在全黨傳達和貫徹執行的是會議通過的決議還是毛澤東的傳達報告？大約可以肯定的是前者。第二，這個報告發表在什麼地方，是以什麼形式傳播的。根據建國前的一些《毛選》版本，包括晚在 1948 年的東北書店版，都沒有收這篇報告，可見傳佈範圍不廣，因而影響也會很有限。第三，1951 年收進《毛選》時採用的是什

麼版本，手寫的還是油印的或鉛印的(像《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樣重要的著作，直到1941年前還只有少數油印本而無鉛印本[27])，如果不是刊登在某種書刊上，鉛印的可能也不大。第四，收進《毛選》時的修改情況。因為毛著中的幾乎所有文章都經過重大修改，有些還經過多次修改。至於這篇傳達報告的修改以至重寫，是根據會議記錄還是臨時草擬的簡要提綱，都未作說明。總之，用多年後修改甚至重寫的東西印證或評價當時所起作用，顯然是不會確切的。而且無論如何，一個小範圍的報告，作用和影響總是不會超過向全黨傳達的會議決議的。因此，胡喬木等把報告放在決議之上，而且提得那麼高，就只能是為了突出個人，談不上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了。

胡喬木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所載的談話中批評《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主席過分突出。雖然以他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28]但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在刻意突出毛澤東和抹煞其他一些領導人的問題上，恐怕要比《決議》"過分"得多了。例如全文對於遵義會議後三四年中共中央的所有重要會議，一概不提主持人、報告人和決議起草人，重大決策也一律或明或暗地歸之於毛澤東的主張和領導；對這一重要戰略轉變時期擔任總書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張聞天更是完全不提。後來在1985年寫的《回憶張聞天同志》[29]一文中，胡喬木自己也說，"現在回想起來，整風運動中對他的批評也有些過頭的地方……至於他在遵義會議前後在黨的歷史上所作的重要貢獻之受到抹煞，就更加不公正了。"既然如此，《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一些敘述和評論是否應作點實事求是的改變呢？

《遵義會議決議》是否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以及上述處理西安事變和召開瓦窰堡會議兩例，都反映了一個長期存在的情況和風氣，就是黨史研究中貫徹執行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還很不夠，並且形成了一個傳統和規矩，就是黨史上的"人治"，凡事只要權威人士一經提出就成了定論，此後的研究和論述，只要重複結論，可以不談所以然的理由。這恐怕就很難說是科學研究了。

二，遵義會議為什麼沒提政治路線問題？

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中央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改變了中央領

導，但卻沒有提出政治路線的錯誤問題。《遵義會議決議》反而確認“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而且講得有根有據，連路線錯誤的暗示都沒有。[30] 也至今尚未看到有文獻證明，會上和會後很長時間有人提過路線錯誤（延安整風後特別是“文革”後的某些回憶錄不足為憑）。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當時是沒有人認識到，還是故意不提出？

對於遵義會議及其以後很長時間沒有提六屆四中全會後黨中央的路線錯誤問題，延安整風中作的解釋是出於黨內鬥爭中的策略考慮。意思是，因為當時多數人尚未認識到是路線錯誤，如果提出來就無法團結大多數，特別是不會為“左”傾中央分化出來的人所接受，結果不但不能解決當時緊迫的軍事路線和組織領導問題，而且還可能導致黨和紅軍的分裂。這一說法起於毛澤東，然後大家也就都跟着講。毛澤東說，“遵義會議為什麼不能提出路線問題，就是要分化他們這個宗派。這是我打祝家莊實行內部分化的一幕。”“如果當時提政治路線，三人團便會分化。”[31] 張聞天後來在《反省筆記》中也說，“在遵義會議上不提路線錯誤，反而肯定它的正確，毛澤東同志當時作了原則上的讓步，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一個示範來看。”[32] 陸定一 1944 年在《關於遵義會議決議的報告》中講得更直接，對於當時是否認識到是路線錯誤，回答說，“當時毛主席是懂得的，是有意識地不提出來，因為當時主要的問題是戰爭，自己沒有根據地，處在非常危急的情況下，戰爭是大家明白看到性命交關的問題，路線的錯誤還不是大家所瞭解，當時提出會使黨內受到過分的震動，對當時打仗的問題並沒有直接的幫助。路線並非馬上要命的問題，可以慢慢講。”[33]

整風後，這種出於黨內鬥爭策略考慮的解釋就正式固定了下來，幾乎一切黨史著作和領導人的回憶錄在提到這個問題時都完全遵守這一口徑，而且還越講越生動具體。例如伍修權在1982年所寫《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一文中就有這樣的描寫：“在會議上，曾經有人提出批判和糾正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錯誤，毛澤東同志機智地制止了這種做法。正是這樣，才團結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會後曾有同志問毛澤東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錯誤的，也早在反對他，為什麼當時不豎起旗幟同他幹，反

而讓王明的錯誤統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澤東同志説，那時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產國際的旗號，使人不易識破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過早地發動鬥爭，就會造成黨和軍隊的分裂，反而不利於對敵鬥爭。”[34] 這裏顯然存在一些問題，如“有人”和“有同志”都沒有指明是誰，而且既然是在會上提出，為什麼其他與會者就沒有聽到？不是會議主持者的毛澤東又是怎樣制止的？至於會後關於王明錯誤的問答，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因為會上批評的是博古、李德，提王明的“左”傾已是1943年九月會議後期的事。而且在這之前，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對第三次“左”傾還只算三年零四個月，伍修權卻已在十三年前定為“四年之久”。可見，這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以後來的認識編寫當年故事的例證。但是黨史界寫史傳卻最喜歡引證這類《回憶錄》，以使許多事後説法成為人們“所需”的證據甚至定論。

只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提出，黨史研究和史料發掘才有一些突破，其中就有對遵義會議沒有提政治問題的傳統解釋的質疑和否定，認為那種出於策略考慮的提法並不真實，而是主要由於當時還沒有認識到，對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一時難於分清。

談論遵義會議沒提政治問題的文章不少，但比較權威的應當算《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書中説，在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時，毛主席雖然受到“左”傾機會主義的打擊和排擠，“但那時毛主席並沒有認識到臨時中央領導者的錯誤是路線錯誤。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在長征路上，毛主席深入分析了紅軍失敗的原因，得出了臨時中央領導在軍事領導上存在着一條錯誤路線的結論，但對其政治路線還沒有明確提出疑議。”[35] 直到 1940 年 12 月 4 日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才提出“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表明毛主席對這次‘左’傾錯誤的認識又深入了一步”，但“這裏的認識，依然是不完整的”。[36] 所以 1941 年九月會議後，毛主席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中，還認為“四中全會的主要的根本方面”應該肯定，並得出結論説，“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並經過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37] 毛主席在同一時期寫

的“九篇文章”，用的標題也是《關於和博古路線有關的主要文件》，還沒提王明路線。[38] 胡喬木還說，“從遵義會議以來，沒有人提出過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的路線怎麼樣。毛主席寫的《農村調查》的《跋》（1941 年 4 月 19 日）講到，那時執行的許多政策現在看來是錯誤的，當時也是錯誤的。這是第一次提出這個問題。”[39] 即使單從胡喬木的正面解釋看，遵義會議沒有提政治問題，也並不是什麼策略考慮，要等待多數人的覺悟，而是連毛澤東也沒有認識到。那些事後諸葛亮的說法顯然是缺乏根據的。

而且，這也是遵義會議後的許多事實所證明了的。例如直到1936年秋毛澤東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不但沒有提出政治路線問題，而且還把軍事上的錯誤歸之於右傾，說，“喪失根據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喪失了江西中央根據地。這裏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40]（書中上一節說的“1931 年至1934年的‘左’傾機會主義……”則是以前各種版本所沒有而為 1951 年出版《毛選》時加上的）。其實，第一個比較含糊並且只限於白區工作提出四中全會以後有路線錯誤的樣子，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劉少奇。這就是1937年白區工作會議上引起的一場爭論。劉少奇在報告中批判長期存在的“左”的惡劣傳統，認為四中全會以後，黨在實際工作中還部分地保存着立三路線（他隨後也解釋說，“我覺得我們的錯誤……好像是路線的樣子”）。[41] 這就立即遭到多數與會者的不滿和批評，政治局不得不開會討論白區工作路線問題。不但時任總書記和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認為，四中全會後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劉少奇的提法“忽視黨的歷史發展”，“是主觀主義的錯誤”。就是毛澤東，在 6 月 3 日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中也批評劉少奇“擴大化”，是“非辯證法的發展觀”，說黨“只有幾個極短時期犯過總路線的錯誤，在歷史上只有兩個時期（大革命末期與立三時期）”，其他時期只是在若干問題上犯過原則性的錯誤。這就是說，王明博古時期也不是路線錯誤了。最後，劉少奇不得不進行檢討，承認自己認識有片面性，把問題擴大化了，“至於黨的路線的正確，我是不否認的”。[42]

如果說，這個時期仍然需要等待多數人的覺悟，還有策略的考慮，那麼在黨史上被說成是批判王明的六屆六中全會總可以少一點顧忌了吧，但事實是提法仍然相反。六中全會通過的毛澤東所作政治報

告《論新階段》中的提法是，“遵義會議糾正了在第五次反‘圍剿’鬥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其“特點是在戰爭中的錯誤”。就是說，這次錯誤只限於反五次“圍剿”中的軍事方面。接着還直截了當地表明，“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的嚴重的原則錯誤。”[43]

其實，也不僅六中全會，而且如上所述，以清算六屆四中全會以後在黨內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路線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好久，認識仍比較模糊，還一再發生變化。這從上引胡喬木的敘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實際上是，直到1945年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把路線錯誤的性質最後確定下來。建國後，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經多數政治局委員同意，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作了一些修改，加上了王明博古的名字。後來更進一步演變成王明路線，一般不再提博古的名字了。[44]

由此可見，對於王明路線的提出，無論對全黨還是對毛澤東本人來說，都有個過程，是隨着情況的變化和政治的需要，經過不斷變化才逐漸明確起來的，並不是一開始就看得清、提得准。這首先是由於毛澤東在學習斯大林和蘇聯共產黨的歷史與實踐中，進一步認識到並逐漸掌握了路線問題在黨內鬥爭中的重要性，往往可以用路線錯誤置政敵於“死地”，令其“徹底繳械”。所以延安整風一開始就提路線問題（上層），而且越來越強調。但也不是一開始就拿着帽子亂戴，總還有個瞭解情況和演變的過程。這也合乎當年毛澤東特別強調的，一切結論只能產生於調查研究之後。對四中全會後黨的歷史的調查研究，只是1940年下半年收集和編輯《六大以來》才正式開展起來。在這之前，特別是內戰時期，長期處於殘酷的戰爭環境，居無定所，又缺乏資料，也沒有時間和條件來全面研究黨的歷史和政治路線。而且從主觀上講，當時整天想的都是打仗，所以毛澤東對軍事問題瞭解得透，思想比較成熟，對政治路線還瞭解不多，研究不夠，在很長時間都沒有形成獨特的系統的看法。另一方面，當時的地位和處境，也使毛澤東不大容易瞭解中央的整個路線問題。所以胡喬木說，“一編《六大以來》，就發現了過去存在的許多問題。過去沒有時間，沒有機會研究四中全會的決議有什麼問題。在30年代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

發表這些文件的時候，毛主席對這些文件不可能有很多接觸。”[45] 這就是說，毛澤東對四中全會後中央的政治路線也是在延安整風中才加以研究和逐步認識的，並不像一些人事後所猜想的那樣，把毛澤東說成“先知先覺”。例如研究黨史很有見地的書——《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上面也說，在遵義會議上，“依據他（毛澤東）當時的認識水平，肯定知道‘左’傾領導人犯了政治路線錯誤”。這種猜測就太不實事求是了。其實，如果再深一層看，就不應忽視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即整風過程中路線鬥爭的變化。一開始清算的“左”傾錯誤被稱為“博古路線”，還不是“王明路線”，時間也是從博古臨時中央上台的“九一八”前後算起，說王明出頭的四中全會，根本方面還是“正確的”。但由於王明不但不檢討，反而倒打一耙，批評抗戰時期黨的路線了，加上康生、劉少奇、周恩來等對四中全會特別是王明所寫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揭發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才在整風後期冠上了王明的名字（但還只限於上層），時間也從四中全會算起了。

遵義會議上沒有提出四中全會後中央的政治路線問題，還因為那時政治上的分歧不像軍事上的分歧那樣明顯。軍事上，李德、博古的單純防禦路線和瞎指揮成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因素，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特別是同前幾次反“圍剿”勝利一對比，兩條不同的軍事路線就清楚地顯示出來了。所以不但代表正確的軍事路線和軍事思想的毛澤東，一開始就處於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原來犯“左”傾錯誤的張聞天、王稼祥，也早在長征前就已認識到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並起來進行鬥爭了。當時黨內鬥爭也主要表現在軍事方面，對毛澤東的打擊和排擠，首先就是剝奪他的軍事指揮權。至於在政治領域，兩條路線的分界並不十分清晰，不像軍事路線那樣涇渭分明。例如毛澤東雖然曾被批為執行“富農路線”，但整個說來他在富農問題上還是“左”了。對臨時中央提出的“左”的土地政策，沒有見到他的抗拒和抵制，反而在1933年6月1日由他和項英署名發佈的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中，實際上就包含有“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錯誤內容。[46] 特別在肅反問題上，還在四中全會前，毛澤東直接領導的一方面軍和江西蘇區就發生了令人痛心的嚴重擴大化（其實多是無中生有，連擴大化都談不上，因為實際上紅軍

和根據地中並沒有什麼“AB團”），反而是此後產生的“左”傾中央派人去糾偏（特別是後來進入蘇區的周恩來）。據《肖克同志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中說，“僅1930年11月到12月的一個月裏，在不到4萬人的紅一方面軍內，就打了4400個AB團，”“永新縣接連把六屆縣委都打成了AB團”。[47]（1930年12月20日毛澤東寫的《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中也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四萬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分子。）還有因錯誤肅反使矛盾激化的富田事變，也發生在四中全會前，同樣是毛澤東親自領導處理的。[48]這些就都不能歸罪於四中全會後的“左”傾中央了。至於搞過火的階級鬥爭，以鬥爭推動工作，用強迫命令以至肅反的手段進行擴紅等，在中央蘇區甚至毛澤東的眼皮底下，前後都是很盛行的，有些甚至是毛澤東指示那樣做的。

即使從現存文獻看，也很難理出當時一條同第三期“左”傾路線針鋒相對、旗幟鮮明和比較系統完整的正確路線來。甚至在以清算“左”傾路線為主要目的的延安整風中，也是着重以後來的認識揭發和批判“左”傾中央的錯誤，而很少舉出當時在政治路線上與之相對抗的文獻。所以正確路線和錯誤只能豎比（前後），無法橫比（同時）。這就是胡喬木說的編輯《六大以來》所起的作用：“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後中央存在着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怎樣同‘左’傾路線鬥爭，兩種領導前後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49]這“前後一對比”，可能是指毛澤東六屆六中全會後的領導（也就是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檢討的，“我還不瞭解使毛澤東同志負起領導的全責，發揮他的全部的指導力量，如同近兩年來所做的那樣”）和遵義會議前“左”傾中央領導的對比。這也說明那時政治上的正確路線並不是很清楚，可能實際上並沒形成一條路線，因此只能進行前後對比，而無法排列出雙方同一時期在方針路線上針鋒相對的文獻。

也許是由於有些錯誤，特別是肅反問題上的極左錯誤是大家都犯的，不能只歸於第三期“左”傾路線，所以在延安整風中就沒有得到清算，因而不曾認真總結經驗、汲取教訓，遂使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大

量製造冤假錯案的極左政策成了長期不治的頑症，造成了無法估量的嚴重後果。正是在延安整風期間發動的搶救運動，就幾乎完全是打AB團時的認識和做法的翻版。而且事後還是不加清算，反而至今仍然肯定“九條指示”的正確。[50] 這不能不說是同後來在肅反問題上繼續不斷犯類似錯誤有關。反之，如果對肅反問題上的極左思想和作法也能像對“左”傾教條主義那樣批深批透，對歷次運動中有過嚴重過火行為和犯極左錯誤的積極分子，特別是搞投機、充打手的，不一律採取保護政策，也許會避免或減少後來歷次運動中製造那麼多的冤假錯案和傷害那麼多的好人。這方面的教訓太沉痛了，但是至今還沒有徹底清算。

既然遵義會議沒有提政治路線問題是由於“認識方面的原因”，那麼為什麼要說成是出於策略考慮呢？胡喬木是這樣解釋的：“我們常說遵義會議當時有意講軍事問題，避開政治問題，但是實際上當時緊張的戰爭環境不可能談政治問題，而且毛主席也不可能想那麼多。歷史是發展的，人的認識也是發展的。這裏面也可能有某種考慮的因素。毛主席有時也這樣說，但不必一定強調這個。”[51] 這當然沒有直接回答我們的問題，但提出“不必一定強調”毛澤東從前的說法，可能是擔心暴露毛澤東本人的自相矛盾和違背實事求是精神。

其實，像這類在延安整風期間及其以前和以後對歷史問題做出的極不確切的結論，又一直被肯定而需要根據事實進行撥亂反正和重新認識的問題，實在不少。這裏只舉一個被塵封了半個世紀的大冤案西路軍問題。由於這個問題既明顯又典型，所以打算多講幾句，看看黨史上一些事情被顛倒成了什麼樣子，也有助於理解遵義會議上沒提政治問題系策略之說的不可靠。

所謂西路軍問題，就是1936年紅軍會師統一指揮後，由於戰略指導錯誤和統得太死，使原屬四方面軍的兩萬多部隊(按，一方面軍到達陝北時只剩下幾千人)，在河西走廊遭到幾近全軍覆沒的慘敗(全軍21800人，戰死7000多，被俘9000多，俘後被殺害5600多，回家鄉2000多，流落西北各地的2000多，營救回到延安的4000多)，還被說成是張國燾路線造就的惡果，使生者和死者長期受到屈辱。而實際上，西路軍是由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即軍委，主席毛澤東）直接指揮的。1937年3月，當西路軍面臨絕境時，

中央和軍委在電報中已對這次失敗“蓋棺論定”，同張國燾以前的南下和另立中央相提並論，嚴厲譴責西路軍領導人的所謂“機會主義路線”和“一貫反中央及軍委指示”的行為。在嚴厲指責西路軍領導人的同時，延安也正開展對國燾路線的大批判。結果，西路軍失敗是“國燾路線的犧牲品”這一根本違背事實的錯誤結論，一直保持了四十多年，沒有人敢提出質疑，連當年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李先念等也不得不說些違心話。直到毛澤東去世五年後，作為西路軍工作的參與者和當事人陳雲，才敢仗義執言，於1981年11月和1982年2月，兩次同李先念談到這個問題。他說：“西路軍是當年根據中央打通國際路線的決定而組織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西路軍問題是一件和自己有關的事，我今年七十七歲了，要把這件事搞清楚。”1982年，李先念根據陳雲的建議和鄧小平的批示，組織幹部查閱大量歷史檔案，於第二年寫出了《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指出，“西路軍執行的任務是中央決定的。西路軍的軍事行動自始至終都在中央軍委領導之下，重要軍事行動也是中央軍委指示或經中央軍委同意的，因此，……不能說是執行張國燾路線。”1983年8月2日，鄧小平批示，“贊成這個說明，同意全部存檔。”至此，長期被扭曲和誣陷的西路軍問題總算在中央領導層得到了解決和澄清。徐向前才可以根據這個精神寫他的《歷史的回顧》了。[52] 但是此後的官方黨史著作，雖然已改而肯定西路軍系中央決定組成，進行了英勇悲壯的戰鬥，但卻對失敗責任和長期蒙冤或隻字不提，或繼續貫徹“為尊者諱”等延安整風創建的黨史編纂學原則。[53]

西路軍的冤案在毛澤東本人的文獻中可以看得更清楚。還在西路軍浴血奮戰時，他已把西路軍和“國燾路線”聯繫起來，說：“為敵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54]（按，西路軍是1937年3月失敗的，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演，毛澤東在1941年2月23日為軍政雜誌社第一次鉛印出版寫的“著者識”中注明為“1936年秋”。1951年出《毛選》一卷時才改為“1936年12月”。但不管是哪個日期，都在西路軍失敗之前，按理是不可能得出這一結論的。這句話顯然是事後增加或改寫的。而據胡喬木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的談話說，“收入《毛選》的文章，幾乎都

修改過”。見該書第58頁。）但是正如徐向前所說，實際上，“西路軍自始至終是奉中央軍委的命令、指示行事的。”[55] 而且文電俱在，說明與張國燾關係不大。因此《毛選》的有關注釋，新舊版本就完全不同了。1951年的版本說是：“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56] 1991年版的《毛選》注釋已改寫為：“十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失敗。”[57] 只是由於這時毛澤東已去世，對《毛選》所載《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原文不便再改，就只好讓這個“硬傷”繼續存在着。

為什麼會有諸如此類不切實際的論斷呢？過去有一種解釋，說是為了革命需要。一些人明知不合乎事實卻加以附和甚至還要發揮一下，也說是為了顧全大局。在西路軍問題上，四方面軍許多同志就一直不服，但長期以來都沒有人敢講。

遵義會議不提政治路線問題是出於策略考慮。這類事後諸葛亮的話，在黨史上實在太多。原因就是為了突出個人、證明一貫正確，為此可以不顧事實、偽造歷史。

三，張聞天是遵義會議上當選為總書記還是會後分工負總責？*

（一）從《遵義會議文獻》談起

遵義會議雖在事過不久的延安整風中就進行過清算，並留有大量文獻和檔案，但有關這次會議存在的疑難問題和矛盾說法卻實在不少。四十年後把會上當選總書記的張聞天改成會後常委分工負總的責

*原文發表在《隨筆》2001年第一期，《炎黃春秋》同年第一期和《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發表時均有刪節。

任，就是其中之一。對此，還得從中央有關單位的專門調查談起。

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立的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鑒於“對這次會議的一些重要情況長期未弄清楚，以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因而本着“把黨史資料立好，立準確”的原則和目的，專門進行了一次“調查研究”，於1984年9月提出“調查報告”，並會同中央檔案館編輯出版了《遵義會議文獻》。[58] 這時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陳雲、鄧小平、楊尚昆、聶榮臻、伍修權、李卓然等都還健在（只有劉伯承已喪失思維），聽過會後傳達的人就更多了，而且可供使用的還有大量檔案和各種資料。按理，這次調查研究應取得重大突破和收穫，弄清一些重要情況，解決幾個重大問題。可惜結果並非如此，實在令人感到失望。

由於先就有了不可更動的結論（如肯定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又帶着只准證實其是的檔案資料（即陳雲的所謂《傳達提綱》），而沒能完全遵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按照“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原則，所以不但沒能弄清和解決一些重要情況和問題（如會議是怎樣把會後才分工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助手的毛澤東確立為全黨全軍領袖的等等），反而還把一些問題弄得更亂了，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根據《調查報告》和幾個人幾十年後的個人回憶，在正副報告之後第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重要發言”，而且“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如果這屬實，那張聞天的“反報告”以及為會議“完全同意”的“提綱”就都沒有了。陳雲對《調查報告》的《答覆》上說，六屆五中全會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就更是自相矛盾，因為他的所謂《傳達提綱》上說的遵義會議“最後作出”的四條決定中竟有三條提到常委，第一條就是“毛澤東同志被選為常委”。再說，黨的最高領導人（無論稱負總責、書記還是總書記）的更換，恐怕不會只是個常委分工問題。對於當時有無書記處，在1943年3月16日政治局會議上，任弼時報告中央機構調整方案時已說得很清楚：“在中央蘇區時，書記處在政治局之上，實際上等於政治局常委，不合適。”[59] 另外，《調查報告》還斷言“當時中央並無總書記職稱，洛甫和博古也未用總書記名義”，那張聞天多次讓出總書記又怎麼解釋？陳雲和康生在遵義會議後三年半的六中全會上提議選毛澤東為總書記又有何根據？類似問題還有許多，不再一一列舉。

不過，這裏又牽出來了兩個不小的問題。

一是陳雲的《傳達提綱》手稿形成的時間和地點以及內容的詮釋，都還值得作進一步考察和研究。如像《文獻》的考證所注，是在“遵義會議後不久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那為什麼沒有保存在中國？聽傳達的人自應不少，怎麼一直沒人憶及？使陳雲的“傳達”除自己認定外，得不到其他旁證。行軍途中寫的手稿經過什麼途徑（陳雲在長征途中奉派化裝去上海，既無必要，更無可能帶在身上）帶到莫斯科成為共產國際的檔案（中辦於1956年接收來，直到1982年才得到確認[60]）？而且原標題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並無“傳達提綱”字樣，為什麼又不公佈（或沒有）原件（甲）甚至（丙）的部分？因此這是否是陳雲去莫斯科在那裏向國際寫的匯報提綱？（這個問題早已有人提出並作過論證，但陳雲堅持他在蘇聯沒寫過這個東西，肯定是他長征途中所寫。[61] 於是，在“只唯上”的潛規下，這方面的研究論證只好作罷。）若果真如此，由於時間已過去大半年（陳雲是1935年8月同陳潭秋、楊之華等八人到莫斯科的），且無多少旁證資料可供查考，單憑記憶能寫得如此詳盡已屬大不易，在某些問題上出現遺漏、不確甚至矛盾的地方反而是完全正常的。對此問題，個人既無材料，也無研究，所以不敢妄加論列。但希望有關機構和專家能夠堅持“不唯上，只唯實”的原則繼續深入考查，提出實事求是和令人信服的說明。不回答上面以及有關的許多問題，這個材料恐怕是很難稱為《傳達提綱》、現在史學界也很難以此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做出定論的。

二是個人的回憶能否作為歷史“文獻”看待。對此擬另文論述。這裏只以《遵義會議文獻》中採用的幾篇四五十年以後回憶中的問題為例提點疑問。根據現在的分析估計，一些回憶錄的有關提法是當時不大可能發生的。如周恩來全力推舉毛澤東為我黨我軍領袖並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伍修權）；“我和王稼祥……堅決主張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聶榮臻）；“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周恩來），等等。另外，有些說法已證明不合乎事實，如：關於正副報告後的發言順序，先是毛澤東，接着是王稼祥，再接着是

張聞天和朱德明確表態；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伍修權)；六屆五中全會“改選了政治局，毛澤東、朱德、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等被增選（注：顯然不是增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陳雲）；等等。

這裏並無意討論這本《文獻》的內容或對它作評價，只是想說明，遵義會議的研究並未因此畫上句號，甚至可以說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都沒弄清。這裏專就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職務對《文獻》的說法作點辨析。

要瞭解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後的職務，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這次會議前後中央有沒有書記處。否則，博古和張聞天不但不能稱為總書記，而且說他們是書記都不可以。

1982年12月28日陳雲寫的《對遵義會議調查報告幾個問題的答覆》[62] 中，有不少說法是不確切甚至互相矛盾的。這可能是由於不但事過五十年，而且陳雲年事已高，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也許並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此後黨史界關於遵義會議的研究和著述，就都把這次《調查報告》和《答覆》以及陳雲1935年那份現在才定名為《傳達提綱》的文件奉為圭臬。這本身就違背陳雲提倡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精神。

例如《答覆》中說，六屆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都“沒有設書記處，也沒有設常委”，這同歷史事實就大有出入。幾乎一切有關的黨史資料和論著都提到，自五大以後，中央就一直設有政治局常委(五大前我沒有去查)。五大後的常委為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八七會議選出的常委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六大後的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徵、項英、蔡和森，向忠發任政治局和常委主席。六屆四中全會選出的常委是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說會後不久又補上王明，[63] 並無根據），還決定改常委會主席為總書記，仍由向忠發擔任(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和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都一直稱向忠發至死的職務為主席，大概不是事實，而是為了圓“沒有總書記，只有負總責”之說。但卻既未提供證據，也解釋不了常委們鑒於盧福坦覬覦總書記，故決定臨時中央暫不設總書記的事件。而對此，王明、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陳雲等都有正式說明)。臨時中央遷入蘇區後的聯席會議上，博古被推舉為總

書記。六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並選出書記處，博古繼續任總書記(書記處稱作常委時，博古只稱書記)。這都是報經共產國際批准過的。

對《調查報告》和陳雲的《答覆》以及《文獻》其他內容，還可提出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遵義會議後不到八年就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是專門清算十年內戰時期黨的領導，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的。當時主要當事人都健在，而且年富力強，又時隔不久，記憶猶新，留下了大量書面材料，怎麼可能連有無書記處和常委都弄不清？

第二，如上列舉，起碼從五大算起就一直設有常委，怎麼到六屆五中全會竟無緣無故地給取消了？既然沒有常委，毛澤東又怎麼會"進入了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核心"？是會後一個多月寫的《傳達提綱》(即使寫於到莫斯科後，也只半年多)可靠，還是事隔四十八年後寫的《答覆》可靠？

第三，既然沒有書記處或常委會，怎麼能長期以書記處的名義號令全黨並和頂頭上司的共產國際聯繫？六屆五中全會後不到一年做出的《遵義會議決議》又怎麼會多處提到並不存在的書記處？有案可查的常委會及其擴大會的召開和做出的決定不是都成了不合法的？1937年"十二月會議"改組書記處和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書記又從何說起？一個走向成熟的黨，連領導核心的名稱還"不那麼固定，不那麼嚴格"，反倒不如以前有章法，這可能嗎？

第四，"為了把黨史資料立好，立準確"，是黨中央的正式文件和原始檔案（如各種會議記錄）重要呢？還是個人多年後的回憶重要？而《遵義會議文獻》的編排順序，是看資料的準確程度和參考價值，還是看後來的官職大小？難道會議主持人秦邦憲會後不到十年提供的材料，還不如被"擴大"進來參加會的聶榮臻四五十年後的回憶重要？無論什麼時間和場合，毛澤東都名列第一，這種規矩是怎麼立下來的，合乎歷史主義嗎？

第五，《文獻》選材的標準又是什麼？是為了"把黨史資料立準確"，還是只為證實陳雲的《傳達提綱》和《答覆》以及1984年9月《調查報告》的結論？在張聞天任總書記問題上，為什麼一概不用許多不同於陳雲的說法，如中央關於"六十一人案"的批示、鄧小平對張聞天的《悼詞》、《彭德懷自述》等？對挑選的人又為什麼有斷章

取義，只摘一方面的說法而不用或刪去另方面的說法？如為什麼對周恩來多次談到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話不用（包括“文革”期間說的“第五任是張聞天，他當了十年總書記”[64]），偏要用“聽毛主席的話”這類屬於“文革”時的語言？為什麼伍修權兩次提到的遵義會議“選舉張聞天同志為總書記”的話被刪去，[65] 卻選用大可懷疑的《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和根本不可能提“王明那一套”的談論？根據這樣鮮明的傾向性選材能“準確”嗎？

類似的問題還可再提許多，要在說明1984年的《調查報告》和陳雲的《答覆》，並沒有解決遵義會議的一些主要問題，對“歷史情況”的敘述也並不“準確”。它們本身和被《文獻》採用的某些材料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而不能“以此為准”和“到此為止”。

（二）張聞天出任總書記史實確鑿無庸置疑

在討論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任職問題前，還得先弄清向忠發和博古是否當過總書記。

由於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將中央政治局主席改為總書記”，向忠發也就從六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主席變成了總書記，[66] 因而才發生了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不要再設總書記的問題。這是所有當事人周恩來、博古、張聞天、陳雲等都一再說過的。 所以胡繩主編和黨史研究室所著黨史中關於向忠發被捕前為主席的說法，[67] 顯然與史實不符。有的書更是自相矛盾，如2000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書叫做《延安整風實錄》第5頁上說，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委主席雖仍由向忠發擔任”，但第10頁卻說，“1931年6月，黨的總書記被捕。”很明顯，兩者只能有一個是對的，而沒有根據的說法又只能是第一個。

再看博古。根據上述，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不設總書記，有如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七大的發言中所說，“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注意，沒有像現在黨史書上沒有根據地說王明“指定”），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蘇區後，兩個中央局合併的會上要推舉一位中央領導人，竟然只稱為負總責，就有點於理不通了。特別是六屆五中全會，選出了書記處，卻仍然設一個負總責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實際上，在中央蘇區大家都一直稱呼博古為總書

記，這是延安整風期間也無人否認過的。至今一些老同志還是這樣說。時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長、列席過黨的六屆五中全會的劉英，最近就多次談到。當時位居第二的張聞天，在事後不到九年書寫下來的回憶，應該是比較權威的了吧。他在1943年12月所寫的《反省筆記》中是這樣說的："博古到後（指到中央蘇區）曾召集了一個會議，到會的有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陳雲、洛甫、劉少奇）及中央蘇區原有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鄧發）。博古做了簡短傳達，……於是多數即推舉他為總書記。對總書記一職，博古不但未推辭，而且很高興。"（此說如非事實，當事人的毛、劉、任、陳雲等怎麼能不糾正，反而會認為"寫得很好"？）"我當時想，我們原來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時，曾經申明中央無總書記，一到中央蘇區，他卻弄起總書記來了。這當然使我不滿意。"此外，他談到博古當總書記的地方還有數處，茲不一一列舉。張聞天的這份《反省筆記》，整風中曾得到大家稱贊。劉英說，"毛主席看後立即到我們窑洞裏來，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68] 總之，總書記從來沒人加以否認，怎麼事過四十年後這總書記就一下和一律變成"負總責"了？難道那時對博古不是稱總書記同志，而是稱負總責同志？這能叫上口嗎？

在大體弄清向忠發死前和博古進蘇區後的任職後，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務及其稱謂也就不言自明了。而且這方面文獻資料又極多，為節省篇幅，下面只摘要列舉數件。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任總書記是有黨的正式文件可徵的。遠的不說，只說平反後的就有：1979年8月27日鄧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詞中說，"就在這次會議上他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69] 主持這次追悼會的就是陳雲，並且由於他的堅持，會期推遲了一個多月，當時他答應讓主持會或致悼詞都行，悼詞也事先送他審閱過。另一件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中說，"1936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他的批覆應該看作是代表中央的。"[70]

毛澤東、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在多次談話中提到張聞天遵義會議後的任職，一再說過他是總書記。例如毛澤東，正面的說法是張當總書記講民主，能聽取大家的意見，所以封他一個"明君"的雅號，這是人所共知的；反面的說法有如李銳所述，"談到王明路線和洛甫任

總書記時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李銳評曰：“這當然是對的。”卻值得考慮）[71]

其他領導同志提到張聞天是總書記的就更多了。如上述伍修權兩次提到總書記的話：“會後解除了博古同志的總書記職務…… 選舉張聞天同志為總書記。”（《偉大的長征》）；“爾後他又被推選為中央總書記，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領導工作”（《追求真理　鍥而不捨——懷念張聞天同志》）。[72] 楊尚昆：“大家習慣稱他總書記”；[73]“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74]。彭德懷：“會議結束後，聽了傳達，大概意思是：改變了軍委領導；……撤換了博古的總書記，中央總書記由洛甫（張聞天）擔任……”[75] 黃克誠：“遵義會議的情況，我是在三軍團聽毛主席親自傳達的……但擔任總書記的是張聞天（洛甫）同志”。[76] 其他就不再引證了。

不但黨內，就是知情的黨外甚至外國人，也都知道張聞天是總書記。例如那位在遵義會議上受批判的李德就承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黨的總書記。”[77] 斯諾在《紅色中華散記》中，寫到他1936年2月16日同張聞天的談話，一開頭就說，“洛甫當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78] 不過也應承認，無論是在國內外還是在蘇區和紅軍中，朱德、毛澤東要比王明、博古、洛甫出名得多。所以連羅瑞卿在中央蘇區任一軍團政治保衛局長時還不知道王明。[79] 可見，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線後才出名的；博古、張聞天出任過總書記一事能夠被長期埋沒和不被承認，也就都是不難理解的了。

至於張聞天本人，平時閉口不談過去歷史，但在整風中的多次發言和書面材料中，卻一再提到總書記。在《反省筆記》中除上引談博古的地方外，也多次談到書記處和自己的職務。如談到六屆五中全會時說，“政治局與書記處名單，曾經得到過國際的批准。”關於書記處名單，“國際回電，曾經不贊成洛甫、陳雲參加，而建議補上張國燾、王明（似乎還有康生？）。但後來博古又去電解釋了一下，說是為了工作方便，算又把我和陳雲補上了。”談到遵義會議，說，“我不但未受處罰，還被抬出來代替了博古工作。”“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後邊又講到，還在六屆六中全會前，就已“多次提出解放總書記”，並檢討六中全會時“沒有堅持推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總書記，是我的一個錯誤”。不過，“我確曾向毛澤東同志提

過，當時他不主張提這個問題。”“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不用再多引證，就已可看出，張聞天確實當過總書記。不然他一再讓的是什麼“位”呢？他始終說的是讓出總書記，沒有說讓的是“負總責”。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除在自我批評和頌揚毛澤東的問題上頗多過頭之處（但多為空洞的上綱上線的話）外，而對黨史事實的敘述，在延安整風中就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例如關於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的合法與否就是據它確定的。毛澤東1944年3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這是對幾個重大歷史問題所定的基調）中就說，“過去有同志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現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筆記中說到，對臨時中央共產國際來電批准過，五中全會也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根據這一點，應當說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80]

還應說明的是，張聞天《反省筆記》中敘述的一些史實之所以可靠，不只因為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贊揚和引證，還因為他的敘述不像一些人那樣只憑多年後的記憶和根據新觀點的聯想寫《回憶錄》之類，而是擁有充分的原始材料為根據。張聞天是個勤於動筆的人，在整風時還保存有進入中央蘇區的全部日記、工作筆記等資料。此外又據胡喬木說，“他曾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擔任中央領導工作時期的耳聞目睹，寫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國革命紀事。其中記述了不少外界很少瞭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從這裏得知的。那時聞天同志才四十出頭，距所記事件的時間也不遠，所以記憶清楚，寫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認為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時的喪失“是一個極可痛惜而無法彌補的損失”。[81] 可見，張聞天在這時和在這種基礎上寫出的《反省筆記》史料，大概總比陳雲等人四十多年後的一些“回憶”和論證要更可靠得多。

對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期間情況最瞭解現在仍健在的要算張聞天夫人劉英。她雖已96歲，但仍頭腦清楚，記憶力極強（她說是由於受過收發報密碼訓練和多年做組織幹部工作的緣故）。她不但在中央蘇區任少共中央宣傳部長，同中央領導多有接觸，而且遵義會議後接替了鄧小平中央隊秘書長的職務，專為政治局和書記處（常委）服務，如照顧中央領導行軍中的生活、安排開會、擔任記錄、進行聯絡等。中央到達陝北後又和張聞天結了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會幾乎每次都在

他們家開，她多在場。派出或回來的負責幹部向中央請示匯報也基本都在她家。她同毛澤東的關係又特別好，至今保持着對毛主席的親切感情和崇敬心理。因此，直到她1937年11月去蘇聯，在這以前三年的中央內部情況，她是瞭解較多的一位，而且可以說，在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後則是唯一的一位了。為了瞭解張聞天這個時期以及後來的情況，從1999年起我已拜訪了她數十次。對於博古特別是張聞天擔任總書記，她不但一再肯定，而且講了許多生動細節以資證明，這裏無須複述了。她在張聞天平反後寫的懷念文章，還是講"聞天同志在擔任總書記期間，遵循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制度"。[82] 但1982年以後，由於陳雲提出沒有總書記只有負總責，她為了尊重陳雲、並在有關領導同志竭力勸說下，此後寫的回憶錄中才把總書記改為負總責，只加一句"習慣上稱為總書記"的話。但在多次談話中，她仍堅持張聞天那幾年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掌握全局；毛主席則主要管軍事，自封"大帥"，稱張聞天為"明君"。她還幾次談到，1937年11月去蘇聯治病，共產國際和蘇方都是以總書記夫人身份接待的，住王明原用的別墅。王稼祥領她去見季米特洛夫時就介紹說，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洛甫同志的夫人。1938年一天，王稼祥單獨密告她，中央書記處進行了改組，實行集體領導，洛甫還是書記之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會議等。等她1939年3月回到延安時，中央的會議已不在他們家而改到毛主席處去開了。[83]

綜上所述，張聞天當過中共中央總書記是既有正式文件又有大量旁證材料可資證明的，而"負總責"之說似乎只有陳雲1982年證實的所謂《傳達提綱》和一篇書面《答覆》了。（因為《文獻》摘錄周恩來"文革"期中的一次講話，只是提到"撤消博古那個聲明也沒有用'總書記'，"沒說什麼"聲明"；還說"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也都沒提到"負總責"。）

據個人學習這段黨史的心得，張聞天出任總書記的情況可能有如下述。

六屆四中全會確有改"主席"為"總書記"的決定。這是否有降低向忠發掛名的含義（中國更重視"主席"。毛澤東就不願當"總書記"），沒有研究，不敢妄斷。向忠發叛變後，中央主要負責人周恩來、王明已無法繼續留在上海，決定分別去江西和蘇聯，經共產國際

遠東局提議並同周、王等研究，為避免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糾纏，決定先不設總書記，但指定博古負責，“多管一點事”，並舉薦博古、洛甫、陳雲、康生、盧福坦、李竹聲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報經共產國際批准。批准電報是博古在大多數委員參加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宣佈的。再後又成立了包括盧福坦（不久又被排出）、博古、洛甫、康生、陳雲組成的常委。1933年臨時中央根據國際指示遷往中央蘇區，如上所述，在雙方包括毛澤東、劉少奇、陳雲等八人的聯席會上，大家推舉博古為總書記。一年後舉行的六屆五中全會，自然“率由舊章”，博古繼續擔任總書記。同時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毛澤東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會上還選出書記處。以上均經共產國際批准。所以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劉少奇等雖對四、五兩次中央全會和臨時中央極其不滿，但還是不能不承認其合法。

至於張聞天任總書記的問題，除本人和其他當事人的敘述外，楊尚昆晚年談得更具體可信。他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聞天同志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時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84] 說是由於毛澤東謙虛，讓洛甫做一做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根據當時情況，這是不大可能的，也與毛的性格不合。他說過：“什麼偉大謙虛，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85] 可見，一位黨的總書記（就算負總責吧），不是政治局會議推舉（當時常開會，照毛澤東的說法，“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會議”），而由常委分工決定（實際上只是兩個常委的商定），如此缺乏章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張聞天的總書記實際任職只到1937年底，多說也是1938年六中全會。在王明、陳雲、康生回國後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按照共產國際可能還有斯大林的臨行交代（根據有關資料，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更重視毛澤東，一直在宣傳毛澤東，卻從未宣傳過博古、洛甫、甚至王明[86]），改組書記處，增補上述三人為書記，實行集體領導，仍由張聞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於張聞天不爭權和不願多出頭的品

德，他並不計較，還按王明等人的意見，於1938年4月12日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聲明說，“中共中央有幾個書記，向無所謂總書記”。1938年的六屆六中全會雖然決定政治局常委會議改為書記處會議，但張聞天早已決心移交工作，所以只是“形式上當當主席”，以後乾脆連這個召集和主持會議的工作也交給了任弼時，自己離開中央去進行農村調查了。

（三）為什麼要將總書記改成“負總責”

由此可見，張聞天擔任總書記的前後情況和線條本來是十分清楚的，但在黨史上卻一直被攪得異常混亂，最後竟被完全否認，變成了以前並未聽說過的負總責的。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於要使黨史跟着政治走，為當前現實服務。因此形勢變了，黨史的一些提法就得跟着改。張聞天的總書記只是一個例子。

從遵義會議到1938年六中全會，中國革命尚未形成權威的領袖，因此客觀上需要一個作風民主，善於集中大家意見，堅持集體領導，不獨斷專行，能把大家團結起來的為首的人（即核心）。張聞天多方面的條件都適合此任。而且事實證明他也確實幹得不錯，因此獲得“明君”之稱。總書記是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既擁有實權又具象徵意義。所以在同張國燾作鬥爭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寧可讓出全軍的最高領導，也不同意張聞天讓出這個可以代表中央號令全黨、召集和主持中央會議的總書記。在這三年中，中央多數領導同志擁護以張聞天為首，人們也都稱他為總書記。“十二月會議”決定實行集體領導，使總書記稱號已失去實際意義，且張聞天排名也失去首位，排在毛澤東、王明之後，所以從此大家只稱他洛甫同志（這時除毛主席、朱總司令外，其他中央領導多以同志稱之），他在群眾場合被介紹時還是使用“我們黨的領袖之一”的名義。整風期間，上下界限分得極嚴，中央情況下面幹部很少瞭解，只知張聞天和周恩來檢討最深刻，過頭之處很多，當時就令人無法理解。但整風中並無人否認過他和博古當過總書記，陳雲也沒提出他的“負總責”之說，卻是事實。

整風後期和七大後，張聞天實際上已被排出中央領導核心，只能做一點調研以及後來的小範圍地方工作和“授權有限”的部分外交工作。至於過去的地位、名義和貢獻，更一直受到全面的埋沒和封殺。

例如被喻為中共黨史奠基之作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就只是通篇歌頌毛澤東，對於所謂“第五朝領袖”、在實現從內戰向抗戰的戰略轉變中掌舵的張聞天隻字未提，甚至把張聞天的某些重大貢獻也輕輕歸於毛澤東名下（如上述的瓦窰堡會議和處理西安事變）。延安整風後，知道張聞天的人已經很少，更沒幾個人知道他當過總書記。1959年廬山會議，他一度被以反面教員的身份亮了一下相(在對他進行大規模的錯誤批判時，無論上下，還都說他當過總書記，也沒聽說過“負總責”這個詞）。此後，他就完全在備受無情打擊和殘酷折磨中銷聲匿跡了。

在張聞天被迫害致死後，沒想到很快就否極泰來，粉碎了“四人幫”，中央提出撥亂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而1959年廬山會議之完全錯誤及其嚴重惡果，幾乎是人人皆知無須多查的。於是張聞天得到隆重的平反昭雪。陳雲主持追悼會，鄧小平代表黨中央致悼詞，正式宣佈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被選為黨中央總書記”。而且在這之前的中央在“六十一人案”的批文中也說，“一九三六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央的總書記。”總之，在強調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這一時期，張聞天在黨史中的總書記地位也得到了恢復，報刊上還發表了不少研究文章對此加以論證。 連1980年出版的《辭海》《歷史分冊》(中國現代史)《張聞天》條中也說，“1935年遵義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八十年代初開始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並且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上出現了一些分歧和爭論。為了維護這兩者的歷史地位，陳雲提出加寫建國前“歷史的回顧”。因為正如鄧小平所說，這樣一來，“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87] 這是不言自明的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說幹得好，但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取得了勝利，“以長補短”，就可以站得住了。而且維護毛澤東，說到底同時也是為了維護自己。“陳雲同志講，一定要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主席的功過敲定，……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將來就可能出赫魯曉夫，不但會把毛主席否定，而且會把我們這些作含糊籠統決議的人加以否定。”[88] 在這種號召下，一些老同志寫建國前如長征、抗戰、解放戰爭等的回憶錄，以及理論界和史學界有

關的研究，就空前繁榮起來（回憶建國後的卻很少）。正是在這個時候，發現了陳雲的所謂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他也寫出對有關調查的《答覆》。從此就出現：張聞天的總書記變成了負總責，《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發言起草，毛澤東會上的發言“就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等等。雖然沒看到有關總書記變成負總責的正式文件，但遵照黨史研究中的“人治”、“只唯上”的不成文規定和“與中央保持一致”的紀律，史學界照例聞風而動，迅速跟了上來。連一些學者才發表文章論證張聞天被推舉為總書記的原因和經過，再寫文章時已是論證負總責了。一些史書和領導同志的回憶錄，已出版的只好算了，此後的基本上都照改。包括一些並不同意的人，或者只好改，或者被審查和出版機關給改了，否則也許出不來。

現在書報上稱張聞天為一代總書記的雖多了起來，但卻顯得不夠理直氣壯，還要一再提“負總責“以表白。例如那本書，名叫《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內容卻一再說是“負總責”，只是“實際上相當於擔任黨的總書記”。不過我相信，隨着時間的推移、形勢的變化和研究的深入，歷史的真相總會逐漸顯露出來。在紀念張聞天誕辰100周年以後，大概就會有更多的人稱他為一代總書記了。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以後擔任什麼職務，這是客觀存在，終究掩蓋不了，更抹煞不了。但為什麼會時隱時現和變來變去，這一現象說明了什麼，從中又可以得到一些什麼教訓？這倒是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問題。這裏只舉一個小例子，看一看說的和做的是怎樣對不上號。

日前有位朋友來信談到黨史研究說，“雖然都在講要實事求是，但實踐起來卻真難，談所謂‘過於敏感’的問題，總是心有餘悸。”其實，許多違背事實的論斷和作法反而都是在實事求是的口號下進行的。張聞天從總書記變為負總責，恐怕就是不“唯實”、只“唯上”的結果。而且為了圓此一說，在正式黨史上竟然否認向忠發和博古當過總書記，還製造了其他不少矛盾。 甚至在拍一部張聞天文獻片上也體現出“權大於史”、和黨史中“人治”的例子。張聞天百年誕辰，中央批准拍攝他的文獻片。製成後，經中央黨史研究室、重大題材審查小組、劉英本人等有關各方審查通過。不期在放映的頭一天，審查小組副組長張振東卻強令剪下郭洪濤談西安事變後政治局第一次擴大

會上意見還不一致的幾句話，否則就得去掉郭的整段談話畫面，再不然這部片子的上映就成了問題。攝製組無奈，只好刪掉幾句話。結果放出來，不但畫面上郭洪濤語言不連，而且改變了史學界早已達成共識的事實，變成了政治局在事變後的第一次會上就已認識一致，決定和平解決和派周恩來去西安等等，使好幾次會議和會下的磋商在一次會上完成了。這不是又一次說明，有權就可以改寫歷史，黨史比胡適說的“小姑娘”更可以隨便打扮了嗎？

註釋

1 即《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見《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2 孫彥釗：《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前後》，載《〈炎黃春秋〉精品書系》。海南出版公司 1998 年版，第 30 頁。

3 載《人民日報》，1979 年 8 月 26 日。

4 錢江：《張聞天冤案是怎樣平反的》，《縱橫》2001 年第 2 期。本文作者同劉英就此曾有多次談話。

5 收入《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此一文件是否為陳雲向紅軍的“傳達提綱”，疑點很多，還很值得討論。

6 《張聞天選集》，第 37 頁。

7 《遵義會議文獻》，第 119 頁。

8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3 頁。

9 《毛澤東傳 1893—1949》(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43 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5 頁。

11 《毛澤東傳 1893—1949》(上)，第 341 頁。

12 《遵義會議文獻》第 43 頁。

13 《堅持真理 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志》，載《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 頁。

14 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09 頁。

15 《遵義會議文獻》，第 79 頁。

16 《遵義會議文獻》，第 64 頁。

17 陳雲 1977 年 8 月 23 日的談話，見《遵義會議文獻》，第 130 頁。

18 例如《長征大事典》的綜述，見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99 頁。

19 《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 頁。

20 張培森：《張聞天與遵義會議》，《文獻和研究》1985 年第 1 期；程中原：《張聞天傳》，第 213 頁。

21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所載本文的題解，1991 年版第 621 頁。本文注明寫作時間為 1939 年 12 月，而 1938 和 1939 年（以前情況不瞭解）在抗大學習時聽講的課程如《中國問題》或《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中就已包括了本文的大部分內容。另見《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624 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6 頁。

23 《陳雲文選（1926—1949 年）》，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21-224 頁。在編《陳雲文選》時，我們（張聞天文集編輯組）曾依據檔案提過意見，結果仍決定收入，只是加了個"陳雲同志主持起草"的注。

24 見 2000 年 5 月 22 日《光明日報》刊登李鐵映在《喬木文叢》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

25 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142-169 頁。

26 載《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 6 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 136 頁。

27 1941 年 2 月 23 日為該文的鉛印出版寫的著者識，見《毛澤東選集》1948 年東北書店版，第 585 頁。

28 見該書第 67-68 頁。

29 載《胡喬木文集》第三卷，382-388 頁。

30 《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後稱《遵義會議決議》），見《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1 年版；《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31 1943 年 11 月 13 日在政治局整風會上的發言。轉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4 頁。

32 1943年12月16日《反省筆記》。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33 《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1期。

34 《遵義會議文獻》，第120頁。

3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5頁。

3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6頁。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4頁。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13頁。

3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8頁。

40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198頁。

41 《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頁。

42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中央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頁；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頁。

4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4頁。

44 詳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初擬稿"(十一)，《黨的歷史決議》。

45 詳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初擬稿"(十一)，《黨的歷史決議》，第47-48頁。

46 《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313-31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86年版。

47 《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5期。

48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頁。按：富田事變係一方面軍總前委派李韶九、古柏去紅20軍用逼供信的手段逼出的事變。毛澤東和總前委將其定為反革命暴動，採取"堅決進攻的策略"，並由毛親擬討逆通告；項英和中央局認為"是由黨內無原則糾紛演進而成"，因此採取開會解決的辦法。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中央及其派赴中央蘇區以任弼時為首的三人團卻支持總前委，責備中央局，並以毛澤東取代了項英的中央局書記職務。富田事變的處理結果是，20軍副排以上幹部和江西省行委、贛西南特委負責幹部幾乎全被處決，其中沒有一個是反革命AB團，20軍也不再存在。

4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8頁。

50 《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文

件選集》(14)，第89-96頁。

5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4頁。

52 以上材料見：陳鐵健：《塵封了半個世紀的禁區——紅軍西路軍歷史真相澄清》，《北京日報》2002年12月2日（2003年1月6日《報刊文摘》）；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四章《血戰河西走廊》，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版；《徐向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293頁；《陳雲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13頁；李樵：《徐以新傳》，世界知識出版社版1990年版第222-240頁。

53 如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和2002年的修訂本；《毛澤東傳》等。

54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198頁。

55 《歷史的回顧》，第372頁。

56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51年版，第240頁。

57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91年版，第241頁。

58 《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這裏的引證，以及此後簡稱的《文獻》均指此書。

5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頁。

60 程中原：《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頁。

61 見《胡喬木書信集》，第495頁“注4”。

62 《遵義會議文獻》，第73-75頁。

63 見《中國共產黨六十年》(上)，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2頁。

64 周恩來1967年7月12日接見外交系統幹部和造反派代表時的講話。

65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60頁。

66 《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第129，162頁。

67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頁；《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解放軍出版社重印1991年版，第295頁。

68 《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央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頁。

69 《人民日報》，1979年8月26日。

70 《劉少奇傳》(上)，第229頁。

71 《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頁，討論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的一次發言。

72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560頁。

73 楊尚昆：《紀念張聞天同志》《人民日報》，1990年8月30日。

74 《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6期。

75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頁。

76 《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解放軍報》，1981年4月10日。

77 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東方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129頁；另見《長征大事典》(下冊)，第2577頁。

78 斯諾1957年出版的《紅色中華散記》中，專辟有《洛甫論黨的問題》一節。

79 羅點點：《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頁。

80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頁。

81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頁。

82 《深切悼念張聞天同志》，《人民日報》，1979年8月26日。

83 訪問劉英時多次談到這個問題，如1999年1月18日，3月4日，6月10日，9月7日，12月30日，2000年2月7日，5月16日，18日，6月27日，8月16日等，大多有錄音。

84 《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6期。

85 如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頁：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頁等。

86 參閱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章，特別是5、6兩節。

87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頁。

8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75頁。

(2000年8月完稿)

第三篇

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以及兩人的差異與比較

一，張聞天與毛澤東關係的演變*

為了進一步瞭解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有必要先簡單談一下張聞天同毛澤東關係的發展變化。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大約可以分為三大階段，每段又可細分成兩個時期，這就是：張聞天在上海中央工作和進入中央蘇區後，是他犯“左”傾錯誤和毛澤東受壓的三年多；長征開始到延安整風的六年，是兩人相互配合和合作較好的時期，只是頭三年中央領導以張聞天為首，後三年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整風後是張聞天離開中央領導做點局部工作和受迫害到死大約各為一半的三十年。

（一）紅軍長征前的張毛關係

張聞天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是在1933年初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但兩人的相知卻要早得多。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他們就都已參加了中國少年學會。[1] 1920年《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同時發表了兩人的入會消息，此後他們的行蹤在《少年中國》上又時有披露。因此，作為會友，他們不但互相知道，還會讀到對方有關的材料。不過由於毛澤東只是“少年中國”的一員，沒有擔任什麼領導職務和有什麼出色表現，所以毛澤東本人和官方黨史編纂學多不大提毛

*原文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

和“少年中國”的關係，而喜歡大講毛創辦的“新民學會”和《湘江評論》。當然，在張毛關係上，真正有點影響還是1931年張聞天回國參加中央工作後(先任宣傳部長列席常委會，從臨時中央成立起即出任常委)。在此期間，兩人並不相識，也無成見，但卻發生了一些相互有關的事情，主要就是張聞天由於執行“左”傾路線，曾參與對毛澤東的批評和壓制。例如張多次批評中央蘇區領導的“右傾”、“狹隘經驗論”，這當然包括，甚至首先指的就是毛澤東。(不過也有批評得並不錯的，如1932年4月11日在常委會上批評過去中央蘇區“以AB團的問題，而形成黨內恐怖”，“肅反工作是成為最大的罪惡”。[2] 這也都直接與毛澤東有關。)同年10月6日的常委會上，他不但同意博古批評毛的“保守、退卻”和“分散工作的觀點”，還提出“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工作”。[3] 不過由於沒有成見，所以張聞天另一方面的意見又起了有利於毛澤東的作用，如反對向忠發兼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而促成了毛澤東出任此職。[4] 直到進入中央蘇區，張聞天才同毛澤東見面並一起工作。而他下車伊始又參與了博古提出的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寫文章、作報告，一時表現得異常積極。不過後來他在整風中反省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覺得毛澤東同志已經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寫的文章中也可看出。”[5] 反“羅明路線”特別是反“鄧、毛、謝、古”，他也主要是上綱上線寫文章，照他在《反省筆記》中所說，追查“江西小組織系統”、“直接針對毛澤東同志的”是羅邁。雖然如此，這次積極參加，終究是他的一個嚴重錯誤，並在毛澤東心中記下一筆帳，幾乎講了一輩子。

不過平心而論，張聞天除參與反“羅明路線”外，總的看來，在蘇區近兩年，他同毛的關係還算不錯，接觸也較多，並促成了他們在某些政策思想上的接近和相互關係的靠攏。張聞天先是分管政府工作，後來乾脆被調去做政府工作(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毛仍為蘇維埃主席)，不但工作關係密切，還比鄰而居，來往頻繁，不時見面。張聞天接觸實際後，政策思想逐漸擺脫“左”的一套，同博古、李德的矛盾趨於激化，其中受毛澤東的影響也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在軍事問題上。對於兩人合著的《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他就對人說，“我這是效法毛澤東同志的辦法呵。”(指開調

查會等。)對兩人在蘇區的關係，包括張對毛生病的關心、支持共產國際不同意讓毛到蘇聯養病等，時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的吳亮平曾有較詳細的回憶。如說，他們“通過相互接觸，達到相互瞭解，逐漸走向接近。可以說，張聞天同志後來在遵義會議的轉變，也是與他這一段時間受到毛澤東同志的影響有關的”。[6]

可是有些黨史著作卻喜歡強調張聞天來到瑞金以後，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對毛澤東毫不瞭解。[7] 其實這是對張聞天《反省筆記》中幾句話的誤解，屬於望文生義。因為就全文的精神看，張聞天檢討的對毛不瞭解也沒想瞭解，是指自己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和應當成為黨的領袖人物。被誤解的原話是：“同他（指毛）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他在鬥爭報上發表過。但他究竟是個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瞭解，也並沒有想去瞭解過的。”又如另一地方談到自己“從來沒有想搶着當總書記”，然而對博古當總書記，“他爬在我上面，我總覺得他‘不配’！（至於爬在別的同志，如毛澤東同志等的頭上‘配不配’，我當然沒有想）。”這裏又特意提到毛，可見上面談的“瞭解”、“本領”等，都是指毛澤東的路線和領導，並不是真的相處一年半竟“毫不瞭解”。當然，正如張聞天檢討長征出發前他能和毛澤東合作的原因之一時說的，“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同志是事實。但並無特別仇視或有意要打擊他的心理，也是事實。”[8] 因此可以說，張對毛確無成見，進入蘇區後也沒有反對過毛（他認為反對“羅明路線”不是反毛），但卻並不十分尊重，甚至有點看不大起，認為他理論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

從毛澤東這方面來說，在張聞天到來前，任弼時、項英等已通過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剝奪了他的黨權和軍權，早已使他處於半靠邊站狀態。這時直接壓制他的也是博古、李德等，和張聞天則無直接的重大衝突，因此關係“還平常”。並且隨着張聞天思想的轉變，兩人相互瞭解的進一步加深，還使得後來發展到坦誠相見，相互傾訴對博古中央和最高“三人團”的不滿，並準備同他們進行鬥爭。沒有這個基礎，遵義會議是開不成的，當然也談不上此後五六年的合作。

但在看毛澤東同張聞天的關係上，也不可忽略另一方面。正如毛毛在《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中所說，“毛澤東是一個偉人，但同

時又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記怨又記恩，看人和處理人不免帶有很強的感情色彩。”[9] 只有那些受個人崇拜影響較深和不瞭解領導人之間關係的黨史工作者才會說“毛澤東是不記個人恩怨的”。[10] 所以他在蘇區對張聞天的態度還有影響深遠的以下幾點。第一，張聞天是批評和壓制他的“左”派中央的第二把手，曾經參與批評過他，特別是反“鄧毛謝古”。這是他長期耿耿於懷，有適當機會總要算帳的。第二，對於張聞天這種初出茅廬，不憑工作成績和實際經驗，只靠從莫斯科帶回“幾麻袋教條”，就躍居高位，發號施令，他從心底裏就不服，甚至鄙夷。第三，對張聞天被大家看作理論家，三天兩頭寫文章，動輒引證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對他形成很大壓力。這些因素即使在同張聞天合作中也難免時有顯露，在相當程度上還是造成張聞天後半生不幸遭遇的根子。

（二）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的張毛關係

自從長征出發前張聞天把對博古和最高“三人團”不滿完全向毛澤東坦白起，他們的關係就進入了第二階段。這時相互間不但有了較深的瞭解（否則不會談及如此重要和深層的問題），而且有了黨內鬥爭的共同目標（首先是反最高“三人團”的軍事路線和專斷作風）。這就更增進了相互間的瞭解，並終於形成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所謂“中央隊三人團”，用張聞天的話說，就是“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11]

長征後，兩人接近和合作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見的相同。這可從兩方面來說。從大的方面或長遠講，兩人都是獻身革命，志同道合，也就是毛澤東在整風時說的，在反對蔣介石等問題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從當時情況或近期目標說，他們需要攜手進行共同鬥爭，以改變李德、博古的指揮和領導，從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革命。這是關係到黨中央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問題，所以其他一切問題（如毛的個人恩怨和雙方的彼此看不起等）都可暫時拋開或加以擱置，而必須集中力量抓這一當務之急。主客觀條件還使他們在這一革命形勢和戰略大轉變時期必須成為主要的一對合作者。

毛澤東無疑是正確軍事路線的代表和反對“左”傾中央的靈魂，但卻不便和很難直接出面領導這場鬥爭。這是因為：第一，他雖經共

產國際干預在六屆五中全會上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但卻不是常委（或稱書記），而且實際上還處於無權地位；第二，從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被剝奪黨權軍權後，他同軍隊的指揮關係和直接聯繫中斷兩三年，號召力已大為削弱，何況老蘇區的軍政幹部還調換了一部分；第三，有如黃克誠所說，毛在肅反問題上傷害人太多和組織路線上的偏聽偏信等 ，曾使他失掉部分人心；[12] 第四，從共產國際到中共中央幾年來批評他“右傾”、“狹隘經驗論”等，也有損於他的威信。因此，毛澤東知道，要反“左”就必須首先依靠從“左”傾陣營中分化出來並在中央名列第二的張聞天。雖然他對張聞天看不起甚至鄙夷，但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也為了共同事業，所以“他才用很大耐心，隱忍着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因為“張聞天在中央、在相當一部分人中間是頗有影響的人物，不只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還有他個人的為人和修養”。“只要能說服和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通過張聞天再影響、說服別人就容易多了。”[13] 師哲的回憶錄不確切的地方頗多，但這段描述卻比較接近實際，證之以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14] 可見，毛的接近和依靠張，是當時的客觀需要，是具體歷史條件決定的。許多黨史著作和個人回憶錄，把毛澤東描述成眾望所歸，說“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這大半是多年以後的認識，也是延安整風為黨史學定下的統一口徑，有些領導同志這樣寫《回憶錄》則是為了突出自己。其實，會後的許多事實說明，毛澤東的威信當時並未達到眾望所歸的程度，而是逐漸樹立起來的，其中就有張聞天的幫助。如在會理會議上，作為新上任的總書記和會議主持人，他支持毛澤東、批評林彪等人，其作用是無人能代替的。

從張聞天這方面來說，在廣昌戰役後已同博古決裂，再經過反五次“圍剿”失敗和倉皇長征，他對博古、李德的領導和指揮更完全失去信心。由於性格比較孤僻和不善交際，他同蘇區領導人的來往、交談都不多，對最高“三人團”和羅邁更為不滿，所以有意見就比較自然地對向無成見又曾在政府一起工作的毛澤東“坦白”了。而毛也有意和他接近，於是一拍即合。加之長征後兩人都處於半靠邊狀態，所以就經常交談和議論起來。張聞天雖進蘇區近兩年，還參加軍委，經

常討論打仗，但終究是個文人，除戰略等大的方面有一定認識外，對打仗的具體問題並不熟悉。因此這方面就聽信毛澤東講的，對毛也更加佩服。由於長征途中爭論越來越尖銳，張聞天更進而萌發改變領導的念頭，並同毛、王（稼祥）等一起展開了對博古、李德的鬥爭。他的這種變化，主要是出於思想覺悟，為了拯救革命，正像他整風時說的，並不是想爭當總書記。事實上，遵義會議已經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由他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他還是再三推辭，拖了二十來天實在推不掉才接任。[15]

當然，遵義會議能開好，王稼祥也是立了大功的。他比張聞天覺醒得還要早，跟人醞釀交談的也更多，但說他“投了關鍵的一票”卻是言過其實。因為第一，他是在長征前的五中全會上才補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在中央的地位與鄧發、凱豐等相當，其態度不可能起決定作用；第二，他因負傷，所擔任的軍委副主席和總政主任，在長征出發前就已分別由項英、李富春代替，遵義會議前他既無實職也無實權；第三，他從未進過中央領導核心，在軍隊中並無太大影響；第四，遵義會議上除博古、凱豐二人外，絕大多數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已形成共識；並不是贊成和反對的意見只有一票之差，所以根本就談不上“關鍵的一票”。由此可見，許多黨史著作一直重複毛澤東有意抬高王稼祥和貶低張聞天這一論斷，還是受着“兩個凡是”和“句句是真理”的傳統影響。如果一定要講“關鍵的一票”，倒應該指周恩來。從表面上看，似乎張聞天起的作用最大。因為他作了“反報告”，為會議定下基調，又受委托起草決議，最後還當選為總書記。但實則不然。當時是最高“三人團”專政，他雖排名博古之後，卻並無實權。加之一直處於行軍打仗狀態，軍事第一，他在軍中又沒多大影響。周恩來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是中央常委和“三人團”成員，而且實際上是中央紅軍的統帥，威信高，影響大，對於改變“左”傾方針和領導，真正起着關鍵作用。試想，如果周恩來不從“三人團”中分化出來，將會是什麼情況。事實證明，他一站出來，博古、李德就沒轍了。所以，陳雲在所謂《傳達提綱》中要特別標出他，說是“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會議還決定他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而毛澤東只是他“軍事指揮上的幫助

者”。[16] 這都可看出他當時舉足輕重的作用。

遵義會議確立了以張聞天為首的新領導集體，其重要特點之一是毛澤東當選常委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張聞天出任總書記後一開始就着重抓兩件事。一是實行集體領導，發揚民主。他鑒於博古過去領導獨斷專行，所以在他主持下開會較多，特別是開始時。這就是毛澤東後來批評的，“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17] 成立“三人軍事小組”後會已減少，但重要問題仍要集體討論決定，絕不搞一言堂。毛澤東雖然不喜歡開會，但在成為領袖前還是要求適當多開會，[18] 使他的意見有發表機會並被採納。二是重視發揮毛澤東在軍事上的作用，“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19] 因為從長征起他就非常佩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二次回遵義後，我看出周恩來同志領導戰爭無把握，故我提議要毛澤東同志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20] 隨後他又同意了毛澤東提出的成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三人軍事小組”。長征途中，先後經過沙窩會議和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會議，才在他的主持下，先後決定毛澤東分工負責軍事工作和出任紅軍縮編後的陝甘支隊政委。[21] 從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軍事指揮系統中的地位就完全調了個個兒，由毛為周的助手變成了周為毛的助手。還應指出的是，紅軍到達陝北後，在張聞天主持召開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1935年11月3日），又經他提議和會議通過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稱西北軍委），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最後，還是在他主持下召開的洛川會議上（1937年8月），確立了毛澤東在全國紅軍中的最高統帥地位。[22]

單從上列的軍事方面即可看出，《人民日報》記者錢江和范偉國的下述論斷之真實可信：“翔實可靠的資料證明，張聞天在擔任總書記的三年多時間裏逐漸加深了對毛澤東的認識，一步步將毛澤東推向黨的領袖的崗位，並且‘扶上馬，送一程。’”[23]

不但軍事問題，而且在整個黨對各條戰線的領導上，作為總書記的張聞天和作為紅軍統帥的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也是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作到了珠聯璧合的。在他們的領導下，粉碎了張國燾的分裂陰謀，勝利完成長征，把陝北變成領導全國革命的聖地，特別是實現了從內戰向抗戰的偉大戰略轉變。他們合作之密切，從這件事也可看出：從1935年10月抵達陝北，到1938年9月的六中全會，單是兩人

聯名（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有檔案可查的即達286件。[24] 對他們來說，一生中兩年內與人聯署發電可能沒有比這再多的了。毛澤東雖然分工主管軍事（後來加上外交，即統戰），但有關方針政策和其他重大問題，張聞天也總是要和他磋商，注意徵求和尊重他的意見。標誌着黨的政治路線徹底轉變的瓦窑堡會議（1935年12月），就是二人相互尊重、密切合作的典型例證。這是我們前面說過了的。而且會後由毛澤東傳達決議精神報告（後來標題為《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積極分子會議，也是由總書記張聞天親自主持的。

兩人在重大問題上的相互支持、緊密配合，還能做到放棄自己原來的不成熟意見，接受對方的正確建議，體現了領導集體內的平等相待和民主作風。如處理西安事變，毛澤東就很快改變了他審蔣除蔣的一時想法（後來還作了檢討），同意了張聞天“爭取南京政府正統”和爭取“妥協派”的主張，也就是和平解決的方案。[25] 因為正像日本學者安藤正士所說，張聞天一開始就解決了如何對待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兩個難題，為“制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定下了基調”。[26] 而在紅軍東征問題上，則是張聞天放棄了他原先主張“北上寧夏”的方案，轉而支持毛澤東東征山西的建議。當時一些人對渡河東征思想不通，博古、王稼祥反對，彭德懷猶豫，林彪不久前還提出把重點放到陝南。但張聞天堅決支持東征，不計較一些人的閑話（如王稼祥說他沒主見，是跟毛澤東跑的“泥菩薩”），反而表示自己也要“到紅軍中去”，並代表常委宣佈：“中央領導隨主力行動”，後方組成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局，顯示了總書記親自出征的決心。[27]

直到1938年，張聞天同毛澤東的合作都是黨中央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之間的合作，實行集體領導，各按分工行事。張聞天尊重毛澤東對軍隊的指揮領導，但其他重大問題也徵求毛的意見。毛澤東除分工所管外，對其他問題如有意見總是向張聞天提出或建議開會討論解決，而不越俎代庖和隨意插手黨務、組織、宣傳等其他部門的具體事務。這本來是很正常的，也是歷史事實。但是延安整風創建的黨史學，為了突出毛澤東，總要把事情說成是：雖然從組織上講張聞天是總書記（1982年起還按陳雲一個人的意見改成負總責），但出主意的還是毛主席，一切大政方針都是毛主席決定的。有的甚而說，張聞天“作風民主，對毛很尊重，處處以‘配角’自居”，保證了毛澤東的

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其實這些既無事實根據，道理上也講不通，只是人云亦云。這主要還是由於這些黨史學家嚴守延安整風定下的框架，只顧重複已有結論，而不顧歷史事實。其實，張聞天本人在延安整風時那種強大壓力下寫的《反省筆記》，也只是說能開好遵義會議他“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28] 其他更多說的是同毛澤東同志站在一條戰線上。即以我們上面列舉的處理西安事變和召開瓦窑堡會議這兩件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問題而論，張聞天顯然起了政治領導作用，絕對不能視為“配角”。至於遵義會議並未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我在第一篇筆記中就已作過論述，這裏就不再重複了。

但是也必須指出，張聞天同毛澤東這種總書記和紅軍統帥之間的合作，經過1937年《十二月會議》特別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已發生了根本變化，成為主持日常黨務工作的書記同正在形成中的全黨全軍領袖之間的合作。從此，在毛張關係上才可說張聞天做了“配角”，而且從整風起，連“配角”也不再是了。如上所述，《十二月會議》在組織上的變動就是在名次上毛澤東排在了第一位。這當然不會是王明、康生輩的意思。從事前(蘇聯着重宣傳毛澤東)和事後(六中全會上王稼祥的傳達)的情況看，顯然是在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意圖。這大概是與會者都有所理解的。而張聞天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立即付諸實際，加以貫徹。正像許多後人和同代人的評價，[29] 他是個光明磊落、豁達睿智的人，從來不爭權、不圖名，多次表示並不熱中於當領導，而是對理論和研究工作有興趣。三年多名副其實的總書記，在歷史賦予的角色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楊尚昆就說，“自從他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以後，一改過去黨內那種家長制、一言堂的惡劣作風，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團結協調，互相配合，革命事業順利發展。”[30] 現在，這一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從革命實踐中成長起來並得到上（共產國際）下（黨內幹部）認同的領袖已被“扶上馬”。面對這一新的形勢，他不戀棧、不消沉、激流勇退、甘當配角，全力支持毛澤東的領導(這一變化也反映在聯署電報上。1938年毛張聯名發報已大為減少，且署名順序毛在前的為多，不像以前絕大多數為“洛、毛”。六中全會後，他們的聯署電報已基本上沒有了[31]）。除做好按分工擔負的份內工作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還在兩個問題上對毛澤

東起了重大作用。

一是支持毛澤東對王明及其他反對意見進行鬥爭。“十二月會議”後毛澤東雖已排名首位，但處境卻有點孤立。這是因為：一來王明有點鬧獨立性，甚至想把中央移到武漢，不願延安使用中央名義；二來領導上對某些問題的認識還未取得完全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總是同毛澤東站在一起，根據不同對象和不同問題，有時用領導人聯署形式如毛、洛、胡（劉少奇）等，有時用書記處名義，發出指示或答覆問題，保證了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毛澤東方針的貫徹執行。與此同時，他還一再提出要把總書記職位讓給毛，因毛不同意而拖了下來。他在《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我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32] 既然張聞天這時還保留着總書記（起碼是書記處書記）的頭銜，那麼毛澤東要和武漢的王明進行鬥爭，沒有張的同意或簽署，怎麼可以用書記處名義或代表中央意見呢？可見在毛澤東成為實際上黨的領袖後，張聞天的支持仍然是極其重要的。

二是在理論問題上張聞天也對毛澤東有不少幫助。延安時期是作為新民主主義理論與政策的毛澤東思想形成的時期，也是毛澤東本人理論創作的鼎盛時期。在這方面，他得到張聞天一些直接和間接的幫助，也就是說張聞天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做出過不小貢獻。中央到陝北後，張聞天長期主管黨的宣傳教育工作。他重視理論，組織學習，對毛澤東鑽研理論從正反兩方面都起了推動作用，包括書籍供應、研究空氣、無形壓力等。直接貢獻那就更多了，毛澤東思想中不少問題都可找到他的蹤跡，一些名詞也是他在黨內首先使用而為毛澤東所沿用的，如“黨八股”、“文化人”等。這裏只舉兩個理論上的例子，以見一斑。一是關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論述。張聞天留學蘇聯回國不久即參加了三十年代初著名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所起作用，有如參加論戰的一位積極分子薛暮橋所說，“張聞天同志是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勝利的奠基人。”[33] 此後，他先後在江西共大和陝北紅大，親自講授《中國革命基本問題》，內容包括中國革命的性質、任

務、對象、動力、領導、前途等。到1938年我上抗大時已編成講義，連同他編著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合稱《中國問題》，成為一門必修課。後來《毛選》所載《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內容與之大同小異，而且其中有的章節張聞天還分工參與起草。[34] 又如他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實際上是第一次對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戰術的全面系統總結。而關於抗日戰爭戰略的持久戰問題，他從1935年11月起草《瓦窑堡會議決議》起就曾一再提出。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他關於抗日戰爭戰略是持久戰的論述更引起熱烈討論，會上毛澤東也作了精闢的概括。持久戰的戰略方針逐漸形成全黨共識，“由毛澤東充實、發展並構建為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於1938年寫出了《論持久戰》。[35]

舉這幾個例子（實際上要比這多得多）只是要說明，在張聞天和毛澤東合作的過程中是一種互助的關係，而且很難說誰對誰幫助更大些。過去那種毛澤東是教育者和張聞天只是受教育者的說法（包括張的檢討和毛的認可），是不完全合乎事實的，是個人崇拜的一種表現。

但是，最後必須指出，在兩人合作得很好的這幾年中，相互間也還存在有隔閡，雖然不佔主導地位，但對日後卻有重大影響，所以先要簡單一提。從毛澤東方面來說，首先是因為同張聞天的合作多少帶有勉強性質。他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但卻不得不保持某種“君臣”關係（他戲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心中自然不服。所以他對師哲說，“在長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隱忍着種種痛苦，極力接近張聞天”。[36] 同張合作竟感到痛苦，其不得已之情溢於言表。隨着他權力的上升和對張聞天需要的減弱，在同張的關係上就顯得越來越不耐煩了。而且這種厭煩情緒竟保持了一輩子。其次，他同張的作風、性格、愛好等也相差甚遠，造成看不慣和談不來。他把張聞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只瞭解蘇聯一些表面情況，對中國則“一事不懂”。而從張聞天這邊看，他通過長期實踐固然越來越佩服毛澤東的領導與軍事指揮才能，但同時也覺得實在不好相處。一是感到毛這個人容易猜疑和記怨，而且很厲害，在一起共事得處處留神（小心謹慎）。二是可能對毛的不大談馬列和新文化（特別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國“故紙堆”，有點不

以為然。三是正像黃克誠所說，毛喜歡順着來的人（像康生之類），他卻不屑於此，也學不會，同毛合作有點出於相忍為黨，因而被毛批評為清高。總之，由於雙方存在諸如此類的因素，所以相互合作主要是基於政治上的需要，而缺乏私交，感情不深，做不到推誠相見。

張聞天同毛澤東的這種合作關係到1941年就結束了。而且隨着上層整風的開始，張聞天也就永遠退出了中央領導。

（三）延安整風後的張毛關係

從1941年到1945年的整風期間，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完全是一種檢討者和批判者的關係。雖然這時張聞天還保留着政治局委員的名分，但已不起相應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見都沒處提（例如他不同意搶救運動，但直到最後才同任弼時私下談起）。有關這期間的情況，後面將有一章專門談到，這裏暫付闕如。

延安整風以後，張聞天雖然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可是實際分工，只負責一個中央材料室，這是中央各部門中最小的一個單位。一個政治局委員，只管一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單位”。[37] 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決定開闢東北工作，他為了貫徹執行中央決定和自己深入實際，就懇切要求去東北做地方工作，並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澤東的批准。[38] 從此，他就永遠結束了同毛澤東一起工作的歷史，先是變成一種間接的（即中間隔了幾層）領導和被領導關係，1959年後，連這種關係也告中斷，完全被毛澤東打倒了。

我是1945年跟張聞天一起到東北的，1949年起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大意如下的一段話：在我看來，張聞天的革命生涯中有兩段時間顯得最為輝煌。首先是他擔任總書記那幾年，主持中央工作，為實現中國革命的戰略轉變、開展抗日統一戰線新局面，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其次就是在東北先後擔任合江和遼東省委書記期間。這兩個省，地方都不大，但工作比較全面，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容易發揮他的聰明才智。[39]

在東北工作期間，除參加七屆二中全會外，張聞天和毛澤東一直沒有見過面，大概也沒有什麼直接聯繫。因為那時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指揮解放戰爭上，而張卻是完全從事地方工作的，即使對毛澤東有報告和建議一般也要經過東北局。但張聞天的大體情況和重要意

見，毛澤東還是有所瞭解的。例如關於農村供銷合作社的盈利分紅問題張同劉少奇的爭論，後來他就明確表示同意張聞天的意見。[40] 應該說，張聞天在東北的四年地方工作還確實顯示出了他的理論水平和領導才能，在實際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後掀起的土改中“左”的偏向就被他頂住了。還有些重大的理論與政策問題意見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吸收採納，如新中國國民經濟的構成等。當然也有些好的意見沒能引起應有的注意，如解放後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要對發展資本主義持積極態度，農業合作化不能操之過急等。對這後一點，薄一波曾嘆惜其因未受到“充分重視”而造成農村工作的損失。[41] 當然，這些都與張毛關係無直接聯繫，只是說明延安整風後兩人地位的根本變化和張雖仍持積極入世態度但已起不到很大作用了。

正當張聞天興致盎然和得心應手地從事地方工作之際，1950年他被調去做外交工作，派任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先是劉少奇等提議由章漢夫出任此職，並請示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毛同周恩來商議後覆電改派張聞天。[42] 這一調動除表明當時對外交工作還不熟悉和對聯合國工作的重視外，從張毛關係的角度看，也從工作性質、國際慣例、實際情況看，更不排除有“貶官”、“外放”之意，而不是過去人們說的表現了毛對張的器重。這樣考慮的根據是：第一，“外交工作授權有限”、駐外使節只是執行政府指示、承辦些國內委托的事務性工作、參加日常交際活動、反映情況等，且毛澤東在張聞天出使前還特別提醒他：“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43] 第二，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多為大使銜的副部長級，當時蘇聯東歐國家還沒有見到有政治局委員出任此職的；第三，因外交工作授權有限，社會主義國家常對一些“特殊人物”派出國工作，含有“外放”、“貶謫”之意，如蘇聯1933年派反布哈林鬥爭中被撤去教育部長職務的盧那恰爾斯基任駐西班牙公使，1957年派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的莫洛托夫任駐蒙古大使，1953年維辛斯基由外交部長降為副部長、任駐聯合國代表；中國黨建國後派定為“教條宗派”並因對整風有點看法等原因在七大中委選舉中落選的王稼祥為首任駐蘇大使（毛澤東曾一再向斯大林告狀，一次還當面指王十年內戰時整他[44]）等；第四，張聞天從未做過外事工作，而在延安時就從事外交（外國和國民黨）工作的重要領導幹部

並不少，如葉劍英、楊尚昆、李克農等；第五，聯合國去不成，張聞天即被改派為駐蘇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第六，張聞天在駐蘇大使任內曾通過陳雲要求改行做經濟工作。陳雲寫信告訴他，毛主席對他有看法，認為他驕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員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45] 第七，1952年蘇共十九大，中國黨派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委員劉長勝，然而卻沒有時為政治局委員的駐蘇大使張聞天。其政治歧視太過明顯，即不論黨內地位，也不合乎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慣例，當時一些外國人就覺得奇怪。

改行不成，張聞天就決心搞一輩子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了，而且是一心一意，樂此不疲。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風後所受歧視有增無減，政治局委員的虛位和實際職務間的差距繼續拉大。早在東北，非政治局委員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東北局副書記時，他就只任常委兼一個小省的省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出任駐外大使的，在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他也是罕見其匹（據我所知，只有一位保共政治局委員，因係長期流亡蘇聯的一位老太太留下做了保加利亞駐蘇大使，不久即死於任所）。在大使任內，他同毛澤東既無直接工作關係，也無直接個人聯繫。與其他大使不同的，可能就是他經常積極通過外交部向毛澤東並中央反映情況和提建議，但很少聽到有什麼回音。後來周恩來感到工作實在太忙，對他做外交工作也還滿意，遂建議調他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周主持常務。這又開創了共產黨執政國家一個政治局委員當副部長的也許是空前絕後的特例。1956年，時隔十一年(七大黨章規定為三年）召開黨的八大，張聞天作了充分準備，打算以《論和平共處》為題作個發言。[46] 按理，一個政治局委員要求在黨的代表大會上發一次言實屬正常，但卻並未獲准，說是關於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有陳毅一篇發言就行了。[47] 因為在這之前好久就已內定陳毅代周恩來兼外交部長，所以一直不讓張聞天在這方面多出頭（從 1955 年起，許多外事活動，如參加在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陪總理出訪、接見重要外賓的陪見等，已多由陳毅出面）。

張聞天十年外交期間同毛澤東的關係，一般說來也還是正常的。毛澤東絕不會重用張，張自己也明白，並已安心於外交工作和國際問題研究的開拓，做到了盡心盡責，而且建樹不少。關於國際形勢和外

交政策常有分析和建議報送毛、周；對外交業務和內部建設更做了許多開創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但他仍然憂國憂民、一直注視和考慮全局問題，有時也向毛寫信報告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對毛澤東定下的方針路線以及各項政策與作法，他都貫徹執行，照章辦事。他一貫謹言慎行，從未表現出對毛的不滿。但也使人感到，他對毛是有意見的，缺乏某些領導人那種“主席不離口”的崇拜感情。幫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親筆寫，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澤東的語錄。(例如他要我起草的在八大二次會上的發言《關於美國經濟危機》，在《紅旗》創刊號發表時，最後引毛澤東的話作結束，就是陳伯達給加上的。)平時看毛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由於歷史關係，夫人劉英過去同毛較熟，過一段時間總是建議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麼忙，又沒什麼事，打攪人家幹什麼”為詞推托。據我幾次目睹，他見到毛除談正事外(或沒正事，如參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劉英在旁可以搭上話。總之，使人感覺到張聞天同毛澤東之間存在着無形的隔閡。

在毛澤東方面，本來就看不起張聞天，延安整風後就更不在話下了。對張聞天喜歡發議論、提意見，他並不以為然。有些他認為正確的意見而加以採納，也只是視為“從群眾中來”，並不認張的帳，如關於新中國的經濟構成。張的一些報告，他至多是批給大家看。如1959年廬山會議開始時，對張報上來的在外交部務虛會上的總結發言《關於若干國際問題的意見》曾批示：“印發各同志，很可以一看。”[48]也就如此而已。實際上，建國後毛對張已越來越厭煩，有時講到歷史問題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貶張聞天(如說“遵義會議王稼祥投了關鍵的一票”)。在毛看來，延安整風後張聞天內心並未服，思想並未通。因為延安整風樹起的一個正確與錯誤的標準就是以對毛的態度劃線。此後，隨着個人崇拜的不斷升級，這一標準也越來越嚴。個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頌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點與批評。張聞天並不是不瞭解這點，但他從思想上就反對個人崇拜，既不會歌功頌德和順着來，又喜歡揭露缺點和提意見，所以使毛越來越反感。下面的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張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參觀訪問，26日寫信向毛澤東匯報，本想在肯定和贊揚大躍進的同時指出存在的問題和缺點，後經一再考慮，定稿時還是刪去了要提的缺點和意見，只剩下贊揚。

毛看後認為是張的進步，遂於5月8日回信說，“你這個人通了，我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祝賀。我一直不大滿意你。在延安時曾對你有五個字的批評，你記得嗎？進城後，我對陳雲、恩來幾次說過，你有嚴重的書生氣，不大懂實際。記得也對你當面說過。今天看這個報告，引起我對你熱情歡迎。”接着說，上述看法，“可能對你估計過高，即書生氣，大少爺氣，[49] 還沒有完全去掉，還沒有完全實際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緊，你繼續進步就是了。但你過去能寫出現在的報告嗎？能有這樣的無產階級感情嗎？能有這樣感人的氣氛嗎？在我看來，沒有。現在有了，通了，群眾化了，因此向你致賀。”[50] 轉錄這麼多，不但是為了說明毛喜歡報喜不報憂，也為了活靈活現地顯示出毛的“帝王”氣魄，對張聞天這個“臣下”已毫無平等可言，同時還暴露他對搞崇拜自己的人很容易受騙（所以康生“值得信賴”）。因為不久後的事實證明，張聞天並沒有“通”，而且真正脱離群眾、“不大懂實際”的也不是張聞天，恰巧相反，而是批評者自己。否則中國的生產力和生態環境不會遭到那樣嚴重的破懷，不會有三年困難和餓死三四千萬人。從發展軌跡看，進城後兩人的思想就漸行漸遠，距離越來越大，個人關係也日益變得貌合神離。張對毛是敬而遠之，毛對張是厭惡、歧視、以至侮辱。特別是政治路線和思想作風上的分歧，使他們之間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並終於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爆發了。而其結局又說明，延安整風立下的以毛劃線已發展成鐵的紀律，個人完全淩駕於一切黨規國法之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再經歷二十多年的苦難（反右派、大躍進、三年困難、社教四清、“文革”十年），也就沒什麼奇怪了。

張聞天一直忠於馬克思主義。廬山會議後他雖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斷的批判，不斷的檢查，還從1962年9月起被“專案”審查，取消參加中央會議和閱讀中央文件的資格，但仍孜孜不倦地鑽研馬列理論和中國的實際問題，寫出了大量筆記和文稿，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但由於當時的處境，他不得不採取一些特別的做法，即送請毛澤東審閱指正的文稿，都是較虛的理論問題和反修、頌毛的學習筆記，另外一些確有見解、雖儘量含蓄但仍顧慮有犯忌內容的材料，就沒有上報。例如《張聞天文集》收集刊印他在廬山會議後的文稿共三十篇，其中除一篇關於集市貿易問題給毛並中央的報告、一篇談純理論的

《關於生產關係的兩重性問題》外，其餘二十八篇都沒有報送過毛。其實，就是報送毛的許多讀書筆記和報告文稿，毛也基本上不看。據說連那篇談集市貿易的報告都沒看，還是從康生咀裏聽到的。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康生進讒言說，張聞天現在和孫冶方又在搞利別爾曼[51]一套。毛說，好啊，讓他們去上街（指鬧事）。那篇建議開放市場的報告也就成了張聞天的翻案活動和一項新的重大“罪行”。

張聞天雖然對廬山會議以來的批判內心並未服氣，正像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承認的：1962年1月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使我覺得我在廬山會議上發表的一些觀點是沒有多大錯誤的，會上的反右鬥爭是過火的。[52] 但他為了照顧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黨內，還是不斷地檢討，特別是寄希望於毛澤東並經常寫信。據《張聞天年譜》主編張培森統計，從廬山會議後到去世前共給毛澤東寫了三十二封信(先多後少)。[53] 內容主要是順着毛的恭維的話和提點要求，如：附送報告文稿和《讀書筆記》、匯報思想和工作以至被鬥情況、對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態、要求作結論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見等。可惜，毛澤東沒有再見過他，他的信也大多沒有下文。廬山會議後對他的認罪信，毛有“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54] 的批示，並曾送給他看過，此後他再沒得到過任何回信。據《張聞天年譜》記載，僅 1960 到 1962 年，張給毛就寫了十三封信。毛有批示的七封。其中五封只是批給幾位中央領導同志傳閱和存檔。另兩封有些內容。一封是參加八屆九中全會後致函毛，表示擁護毛的講話，並懇切申明“裏通外國”是“實屬莫須有的事情”，但仍決心放下包袱，做好中央分配的調研工作，“無負於一個共產黨員所應盡的責任”。毛 1961 年 1 月 22 日看過批道：“已電話告張聞天同志，信已收到，看過，同意他對問題所取態度。”[55] 另一封是參加 1962 年初“七千人大會”後給毛的信，表示擁護劉少奇的報告和毛的講話，並附送《關於蘇共危機的感想》一文。毛於 2 月 22 日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說，“張聞天同志來信一件，意見一件，請考慮印發常委、書記處各同志，再加陳伯達、康生、定一同志。請他們研究一下。此人是個動搖分子，累犯錯誤。他說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56] 此信也從側面說明，毛對“七千人大會”和劉少奇報告不盡如意。1962 年後，毛對張的來信已很少置理，只有 1965 年對

來信中的兩封批示傳閱存檔。但是毛對張聞天並沒有置諸腦後和不再關注，包括緊張混亂的“文革”時期。和一些有意為毛澤東開脫的說法（如胡喬木所說，在“文革”中毛對彭德懷、劉少奇、賀龍、陶鑄等人在什麼地方、受什麼虐待等情況都不知道[57]）相反，毛對以前的中央領導人，包括早已打倒的張聞天，一直都極為關注。

“文革”中批鬥和游鬥彭德懷和張聞天，在北京大概是無人不曉，何況毛澤東。而且對張聞天的待遇、處理和行止，毛也一直在關注着，無人可擅自作主。例如1968年3月15日“王明、蘇修特務專案組”報告：鑒於張聞天的“罪行”和態度，建議將他和劉英送衛戍區“監護”。康生4月12在報告上批示：“張聞天問題要請示主席林副主席。”[58] 1968年5月17日謝富治手諭：“中央決定叛黨叛國分子張聞天、劉英二人在家實行監護。”1969年10月20日，中央辦公廳負責人宣佈：毛主席批准解除監護，張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為戰備疏散，遣送廣東中小城市。[59] 此後，張一再給毛寫信，要求調回北京，恢復組織生活和分配點工作。1974年1月19日，周恩來批示要汪東興落實毛澤東指示，讓張、劉參加地方黨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廣東省委組織部即通知恢復張、劉組織生活，享受縣（團）級政治待遇。後來張給毛寫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養病”。10月18日毛答覆：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可另換一地方居住。[60] 據此，張要求以上海為養老地點，但被駁回。最後獲准去無錫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於此，他和毛澤東的生前聯繫也就自然中斷。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張毛二人談不上有什麼私交和個人友誼，也沒有多少學術交流和學問磋商，連聊天的共同語言都不多，他們的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念上的政治上的結合。那麼從政治着眼，也就是過去強調的提到路線[61]的高度看，張毛關係的這三大階段大概可歸納如下：第一階段，即長征前，基本上是張聞天錯誤和毛澤東正確。說基本上，是因為張也有正確的地方，如反對文藝界的關門主義和在蘇區同博古的鬥爭等；毛也有錯誤的地方，如肅反中錯殺幾千幹部戰士和逼出“富田事變”又錯誤處理等。這個時期雖然還不能說毛有一條完整的正確路線，但當時是軍事第一，而毛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和戰略戰術等根本問題上

還是正確的。第二階段，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這期間，雖然中間夾了個延安整風，雙方地位有極大變化，但政治路線上一致，基本上都正確。第三階段是建國後的二十多年。在這個長時期裏，毛澤東也有一些建樹，但就全局看，基本路線是錯誤的，其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風。張聞天基本上是跟着毛澤東走的，但在許多問題上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歷史證明，這些看法是正確的。因此總的看來，可以說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基本上是錯的，張聞天基本上是對的（只是就思想而言，行動上還得執行毛澤東的）。這三個階段，還可用張聞天自己檢討的話說，就是：遵義會議前，“當時我在中央工作，我是反對毛澤東同志的”；[62] 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還有點分庭抗禮的味道”，整風後開始信服，只是對審幹有過意見；[63] “對主席過去革命時期的一套方針、政策和辦法是相信的（革命勝利也已證明），但對這一套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辦法，是否行，有懷疑。”[64]

最後就相互態度來說，則可分為這樣三個階段：遵義會議前，張對毛是輕視與忽視；毛對張是內心看不起，表面還得應付。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前，張對毛是尊重與崇敬；毛對張是表面尊重，實際上仍看不起。從整風起直到“文革”，張對毛是既有個人崇拜，又有不滿和意見，而且天平逐漸後傾；毛對張是不平等相待，政治上壓制，人格不尊重，從批評的諷刺挖苦到藉口打倒，使張聞天過了三十年的一半失意和一半屈辱生活。但就張聞天來說，他始終忠於毛澤東，如同在廬山和接着的第三次全國外事會議作檢討時所說，他的動機只是想提醒主席和中央注意，儘早認識與糾正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絕無意要反對毛主席，更談不到打倒了。他說，毛主席那麼高的威信，就是誰想打也打不倒。這確是他至死未變的想法和態度，因而對他後來的遭遇一直就感到委屈。平心而論，遵義會議後，張聞天確實對毛澤東只有合作、擁戴，而沒有一絲一毫對不起的地方。

關於張毛關係就寫到這裏。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張毛的關係悠久而曲折，一本書也說不完，所以只能掛一漏萬地做點簡單回顧；第二，我是有意識地在這些敘述中儘量排除主觀的猜測和設想，甚至連我同張聞天十多年的接觸與談話都不加引用，更不用說

主觀的估計和判斷了。對雙方關係力求做到實事求是，“不虛美，不隱惡”。

二，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差異和比較

談過張聞天和毛澤東的關係，就容易聯想到他們的差異和比較。但這個題目更大，單是其中的某些部分，例如政策思想和理論問題，都是須有專門研究的大工程。可我原先既無研究，現在又來不及研究，所以只能就個人的瞭解作點簡單敘述。需要說明的是，這樣做，正像有的黨史專家所說，“把張聞天和毛澤東放在一起比較，並不是要抬誰貶誰”。[65] 在我，只是想從各人思想、素質等方面的差異來瞭解他們關係發展的前因後果，以及這些差異對延安整風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並不同意“因為歷史早為他們各自做出最為公正的結論”[66] 之說。實際上，即使比較公正的結論，現在還沒有做出，看來今後一個相當時期也很難做出。這正是要對他們兩人做點比較的原因之一。而這個比較之所以着重講差異，並不是由於相同點不重要或者不多，而是因為太多太廣泛，如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基本相同的政治基礎、相當時期的並肩戰鬥、勤奮好學、知識淵博、有文學天賦（如另走條路，毛可成為多產的大詩人，張可成為著名的作家）等等。這些，人們都較為清楚，也容易理解。而差異的對比，則可以從不同側面看出各人的素質、特性、優點缺點、發展變化等。只是對此未能找到什麼參考材料和立論依據，只好按自己的瞭解與判斷，不分輕重和不講邏輯地作點舉一反三的說明。

（一）領導才能

歷史證明張聞天和毛澤東都有高超的領導才能。如上所述，張聞天在做總書記時期就已表現出他善於總結經驗、堅持集體領導、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因而主持中央工作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變。後來的三十多年，他在各方面更加成熟，卻又失掉機會，無以展才。在工作上，機遇是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一方面軍（三個方面軍會合時人數不到四方面軍的三分之一）出了八大元帥。二、四方面軍只各出了一個元帥，不能說與此絲毫無關。因為無論你有多大的才能，不給

你機會，不讓你“錐處囊中”，再大的本領也是無法和無處現露出來的。而張聞天在延安整風後的處境，就大致如此。而且事實證明，在重視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跟上時代潮流、以世界眼光看問題等方面，張聞天要遠勝過毛澤東。這也是建國後兩人思想以至關係漸行漸遠的原因之一。但總的說來，論領導能力，毛澤東終究要比他高出許多。當他還埋頭於文學和只注重書本的時候，毛澤東就已領導過工農兵學運動，有了廣泛的社會經歷和深厚的生活基礎，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人物，參與了黨的締造，擔任過國共兩黨的重要領導職務，能夠做到多謀善斷，隨機應變，運籌帷幄，幹群用命。他還是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精通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在軍隊、地方、黨內外都有廣泛影響。張聞天則沒有指揮過軍隊，在幹群中影響小得多，更不用說在全國了。就是在做人處事上，毛澤東也早已深沈老練，張聞天卻始終帶有書生氣。例如徐向前說到西路軍失敗後他回到延安時的情況：“剛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見了我。”“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這話使我很受感動。張聞天見我則不同，責備了一番，我沒吭氣。”[67] 這可能寫的有些過分，但還是可以多少說明毛張在待人上的差異。又如劉英說，張聞天任總書記時，一次關向應有事找他。他正在寫東西，請關坐下等一會兒。關等了約半小時，看他連頭也不抬，就悄悄走了。劉英告訴他後，他抬頭一看，關已去遠。所以劉英說，他真是個書呆子。此外，張聞天還顯得有點只講原則，不夠靈活，批評人不大講情面，雖然並不整人，但卻得罪人不少。黨的八大選舉，他得的票數竟在劉曉之下，外交部黨組會上就曾議論過。最後應說明的是，建國後毛澤東更進一步登上神壇，張聞天則從不斷下滑直到長期淪為階下囚，兩人的領導才能已無法可比了。

（二）政策思想

毛澤東有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和政策的毛澤東思想，張聞天卻沒有一套顯示於世的完全屬於他自己的體系。在民主革命階段，張聞天確有不少光輝的政策思想，但那都屬於對毛澤東思想的部分貢獻，被納入毛澤東思想的範圍，何況在1935年以前還犯過嚴重的“左”傾錯誤。當然，“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68] 它

的核心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也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想出來的。在他之前，斯大林就已指出，“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和優點之一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通過革命軍隊來影響農民”。[69] 在他提出“上山”和“槍杆子裏出政權”的同時甚至更早，一些黨的領導人和地方幹部也都提出過類似的主張。例如湖南省委領導人郭亮在“八七會議”前就已到各地督促執行武裝暴動計劃，主張上山“當大王”。[70] “八七會議”後，各地的起義、暴動更是遍地開花，而大多數根據地也是在瞿秋白領導時期創建的。但是能夠堅持實踐和總結出一套完整的理論和政策，並取得最後勝利的還是毛澤東。這也是他成為新中國主要締造者和一代偉人的原因所在。在這方面，張聞天是無法與之相比的。只是建國後，毛澤東在思想政策上頻頻失誤，犯了一系列嚴重的“左”傾冒險錯誤。這就是人們說的，要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時間很長）錯誤區別開來。張聞天建國後並無機會提出一整套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但在一些重大的政策思想上同毛澤東卻有原則的分歧。這裏只舉數例以作說明。張聞天主張解放後黨的工作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要搞一個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並在取得政權後即開始實行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張聞天提倡面向世界，抓和平建設，首先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毛澤東則致力於反帝和搞世界革命，並爭着當頭。張聞天一貫強調民主，對集體領導身體力行，反對突出個人（自己也不願意出頭露面）和搞個人崇拜；毛澤東一貫強調高度集中，實行獨斷專行，以對自己的態度劃線，大搞個人崇拜。張聞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提倡獨立思考和兼容並蓄，總是盡其所能幫助和保護知識分子；毛澤東認為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分子屬於資產階級範圍，必須經常敲打，摧殘了大批專家學者和優秀人才，推行文化專制和“輿論一律”，嚴格限制言論自由。張聞天反對經濟建設中搞群眾運動，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對歷次政治運動持消極態度；毛澤東熱中於搞群眾運動，用鬥爭和運動推動各項工作，造成很大的損失和危害，以及其他等等。以上所舉只是開個頭，有些問題下面還將進一步展開討論。其中許多問題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歷史做出結論又是，“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並不是毛澤東說的“是一場階級鬥爭”，[71] 更準確些，應說成

兩條路線的鬥爭。至於誰對誰錯，大約不會再有什麼爭論了。

（三）理論與實際

在這個問題上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張聞天始終熱中於鑽研理論，“在黨內是以理論家聞名的”；[72] 毛澤東更重視實踐，被稱為“實幹家”，[73] 相對說來對鑽研馬列興趣不濃，也沒下過功夫。二是兩人的發展軌跡有點背道而馳：張聞天從開始的教條主義逐漸變為能夠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理論聯繫實際，得出較正確的政策思想；而一直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毛澤東，在進入建設時期，卻變得“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74] 平心而論，單就馬列理論的水平而言，張聞天要比毛澤東高得多，讀的馬列著作也多得多和熟得多。例如被恩格斯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列寧稱為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的《資本論》，據我所知，張聞天就至少精讀過四五遍。[75] 而“毛大概沒有讀過《資本論》”，對政治經濟學“沒有下過大功夫”，“喜歡讀古書，……曾經認為‘馬克思可用的東西不多了’，說經典著作讀起來沒味道”。[76] 至於說到“馬列主義中國化”，張聞天提的不比毛澤東晚。同樣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他的組織工作報告（提綱）中就提到，“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而且整個說來，即使以現在的認識來看，他在1938年六中全會上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提綱）並沒大錯，既非整風中有人說的主觀主義的典型，也不是黨八股的代表作（因系提綱，所以被諷為“甲乙丙丁，開中藥鋪”），水平決不在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之下。在任總書記時期，他開拓和執行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路線，在解放戰爭期間做地方工作，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就更深了一層。但是歷史地看，張聞天對中國實際的瞭解和認識的深度確比毛澤東要差些。這是因為照我的理解，所謂“中國實際”，應包括現實中國和傳統中國兩個方面。這就是從過去到現在，當然還要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毛澤東由於太熟悉傳統，因而多少受其束縛，對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和面向現代化就重視不夠。這大約是他晚年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裏舉個易為人們忽視的例子。號稱以農民運動起家和最瞭解農民的毛澤東，進城後卻用斯大林的辦法剝奪農民搞工業化，實

行城鄉二元結構，把農民變成二等公民（梁漱溟因說“農民在九地之下”而遭到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77] 用戶口制妨礙城市化和消滅城鄉差別，致使至今存在嚴重的“三農問題”。這總不能說合乎中國實際和時代潮流。要說是理論聯繫實際，那理論也是斯大林的，並非馬克思主義。至於迅速完成三大改造，搞窮過渡，製造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發動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掀起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三年困難，沒有根據地強調和人為地製造階級和階級鬥爭，以及最後發動“文化大革命”。這都越來越嚴重地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但卻能夠行得通、站得住，而且毛主席的威信反而更高，當然都與中國的傳統有關，即幾千年的皇權和專制主義影響，再加上延安整風造成的一套體制、規則和不斷加溫的造神運動（個人崇拜），也使毛澤東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詡。毛對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瞭解得既深且透，活學活用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是張聞天無法望其項背的。所以張常說主席對中國歷史熟，會用權術。1962年9月17日張在中央工作會議小組會上被迫檢討交代時就再次承認，“說了主席的壞話，如說主席整人很厲害，主席對人也使用些‘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78] 廬山會議曾使許多人感到痛心：中共中央的全會（還有所擴大），聚集了當代中國的偉人和精英，可竟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堅持實事求是、說句真話！連張聞天、彭德懷、黃克誠等也痛斥自己、擁護《決議》。估計多數人是心口不一，是為了“顧全大局”和“維護領袖威信”而這樣做的，但也不能忽略黨內長期威懾所起的作用。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可見傳統影響之大，還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的封建思想意識在作怪。傳統在“實際”中的地位並不限於此。毛澤東思想之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這“實際”中重要一部分就屬於傳統。如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更多的就不是來源於馬列主義，而主要是中國歷史中農民起義、佔山為王等經驗的繼承和發展。經過廬山會議，張聞天也更悟出了學中國歷史的重要，竟和彭德懷不約而同地讀起了《資治通鑒》。總之，除了1935前十年，就整個一生而言，把張聞天目為“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是不公平也不合乎事實的。把毛澤東稱為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代表，也只適用於民主革命中的一個時期，建國後的主觀主義（唯意志論）、教條主義（自己的

和照搬蘇聯的，還有對馬列的片面和機械理解，以及某些曲解如資產階級法權等），則要比張聞天嚴重得多。

（四）國際與外交 [79]

專門提出討論這一問題是因為：張聞天做了十年外交工作；這個問題比較重要，過去還沒討論過；由於工作關係[80] 這一時期的情況我也有些瞭解。但這方面問題涉及面太廣，我還計劃寫一本有關新中國頭十年外交中若干問題的書，所以這裏不擬詳細討論，只擇以下幾點為例做些簡單說明。

1，關於和戰問題。張聞天認為，“當今世界的主要趨勢是和平而不是戰爭”，新的世界大戰是可以避免的，不能“把戰爭與和平的可能性看作是半斤八兩”，“不僅要爭取持久和平，而且要爭取永久和平”。促進國際形勢趨向緩和有利於我國經濟建設。他也從不把戰爭與革命聯繫在一起，而是強調和平競賽，“因此，和平共處原則就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方針”。[81] 毛澤東同樣主張爭取世界和平，但認為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常強調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問題只在於“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而且“現在是帝國主義怕我們的時代”，即使“第三次世界大戰準備打上十年吧”，人類“可能損失一半”，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完了仗再建設”。他後來提出的口號也是：“備戰、備荒、為人民”；“保衛祖國，準備打仗”，甚至乾脆主張“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觀察和估量國際形勢，也是認為緊張更不利於帝國主義，因此還要主動製造點緊張，使他們不得安寧。[82]

2，對世界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的看法。張聞天認為，二戰後世界出現的是民族民主革命高潮，在相當時期內都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形勢，資本主義還有較強的生命力。民族獨立運動一般是資產階級領導，建立的也是民族主義國家，但都具有歷史進步性。[83] 1955年還明確提出，戰後形勢已改變了《新民主主義論》關於民族民主革命只能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的論斷。他一再強調“革命決不能輸出”，對民族主義國家，“要向它們證明，我們並不想挖它們的牆角”。“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在外援上不能“打腫臉充胖子”。毛澤東則趨向於推進世界革命，要充當世

界反帝的頭（“要頂住美帝國主義的大肚子”）。1958年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正，[84] 只涉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在兩個陣營中可能採取中間立場的問題，仍堅持這些國家要繼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並向社會主義過渡，把當權的資產階級列為“帝、修、反”中的“反”，號召和支援（按情況給予政治、經濟以至軍事援助）各國人民起來推翻它們。進而得出世界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成為一些國家所謂“毛派”游擊隊的理論基礎。

3，在對外關係上，張聞天主張面向世界，爭取早日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交（曾專門寫報告建議同英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發展商貿關係，推進文化交流，引進外國的資金特別是技術。他在建國前所寫東北經濟構成的報告中即提出六種經濟，內包括“秋林經濟”（當時蘇聯在哈爾濱辦了個秋林公司。張以此名詞代表利用外資）一項，[85] 後被毛澤東、劉少奇修改時刪去，剩下五種。毛澤東也提倡面向世界，但多半是面向世界革命，實際上執行的是閉關自守政策。先提出“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後發展為“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86] 認為同美英等西方國家遲點建交好，美國越搞經濟封鎖對我越有利，也不急於參加聯合國（五十年代還曾提出，要參加得滿足先決條件：撤銷宣佈中朝為侵略者的決議，通過美國為侵略者的決議，修改聯合國憲章。行不通，就和印尼的蘇加諾籌組“新興力量國家”的聯合國）。所以鄧小平在談及對外開放時曾說，“總結歷史經驗，中國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經驗證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87]

4，張聞天和毛澤東都提倡勤儉辦外交，但張的要求更高，處處強調節儉，並且身體力行。毛卻喜歡講點排場，特別是總想出頭，以大國和援助者自居。1953和1955年，張曾先後建議對國家慶典和外交禮賓應根據樸素大方原則和國際慣例進行改革或重新規定。如一年兩次（五一和十一）檢閱游行、國際和外交事件動輒百萬人上街（慶賀、聲援、夾道歡迎等）應予精簡。外援要量力而行，適當減少。對外關係中的禮賓工作也須改革和簡化，反對鋪張浪費、弄虛作假、講排場、擺闊氣。但必須照顧國際法、遵守國際慣例，不能為所欲為。他的意見，有些被採納了如五一慶典等，但禮賓改革卻遭到反對，沒

能行得通。因為毛澤東實際上還是喜歡規模聲勢大些，特別是以個人好惡任意行事。如對伏羅希洛夫的接待就故意弄得過分盛大(夾道歡迎等)，對赫魯曉夫則很不禮貌，一次在赫剛到北京下榻處，未及休息就被接到中南海游泳池由毛穿着泳衣接見。對一些國家或政黨，高興時可以鼎力相助(如柬埔寨的紅色高棉)，不高興時不惜斷絕關係(如日共)。毛在外交上不願受約束，認為可以“無法無天”，藐視國際慣例，實行以我劃線。例如對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凡同蘇(“修”)關係好、不接受毛澤東思想的，就一律歸到“帝修反”一邊。結果只是孤立了自己。為了推行世界革命和打倒“帝修反”特別是蘇“修”，對外援助也不斷加碼。除朝、越、阿、柬等友好國家外，對一些當時人均收入已大大高出我許多的國家如馬耳他、敘利亞(還是主動提出)等，也要援助。致使外援達到頂峰的1973年竟佔國家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七以上(二十年後的1993年降為0.36%)。但張聞天在外交禮賓和節儉上也都有很大缺陷。一是對交際活動如接見外賓、送往迎來等有些厭煩，不願多交際，更少同外國人交朋友，原因除個人性格外，也可能是為了珍惜時間和避(裏通外國)嫌。二是過分節儉，影響外交的開展。例如我們在駐蘇使館工作四年，張聞天沒有一次派人或組織去外地參觀訪問，大家幾乎都沒有離開過使館。一次幾個人去列寧格勒訪問，旅程食宿還是自費，實在顯得有點寒碜。

(五)民主與集中

下面特別提出兩個黨內生活問題討論，是因為它們比較重要，而兩人在這上面的差異也顯得突出，表現為各執一端，至死不改。張聞天強調民主，不但理論上提倡，而且身體力行。這也許與他五四運動後接受西方文化較多、而中國傳統觀念較弱有關。毛澤東更強調集中。延安整風為他的集中領導奠定了基礎，建國後更逐漸發展到個人專斷、凌駕於黨之上、破壞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地步。[88] 而且這也是由來者漸，早就可以看出。例如1940年在延安時，張毛兩人在同一會上講中國新文化的方向，張先提為“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毛澤東後提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去掉“民主的”一項，就已顯示了原則的區別。從兩人對民主的論述中更可看出這種差別。毛澤東明確指出，民主是手段。[89] 他在談到民主時，幾

乎不提選舉權和罷免權，多是強調發揚民主以提高下級和群眾的積極性，因此總是講，要讓大家說話，領導者要硬着頭皮聽，頂多是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以在延安同黃炎培的著名談話而言，也是籠統提到民主和人民可以監督政府，而沒有強調群眾當家作主，可以起來罷免和改換政府領導人員。張聞天沒見到講過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的話，但從他一再提“為自由民主奮鬥”看，民主不但是手段更重要的還是目的。講到民主時，他從蘇區起就一直強調選舉權與召回（罷免）權，在東北做地方工作時更是付諸實踐，有時做得還有些超出黨章的規定。如在開闢新區和進行土改時，對發展黨員一時採取過“自報公議黨批准”的作法(因那裏沒黨員，想入黨的找不到介紹人，於是就用經群眾公議認可後報黨組織批准並幫其找介紹人的辦法)。對於實行集體領導，張聞天更是終生不逾，稍為重要一點的問題都要在相關的會議上解決，而避免個人拍板。因此他的領導就顯得會議特多。他也能做到從諫如流。毛澤東批評他遵義會議後主持中央工作“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會”。[90] 他當即接受毛的建議，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三人軍事小組。但他還是堅持重要問題會議解決，因而還是會多。當總書記，中央的會多；當省委書記，省委的會多；當大使，館務會多；主持外交部常務，部領導每天開碰頭會；[91] 直到被打倒後無權再召開任何會議。相反，整風後毛澤東是逐漸取消集體領導，黨章有關各種會期的規定多成具文。不但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隨意拖延不按時召開，就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會也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時間隨便定，出席的人也沒定規，致使身為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在七大過了七八年後還有一次問我，“林老是不是政治局委員？”(因林伯渠給蘇聯《真理報》寫了文章，對方要問身份）。我說，“你們不是常在一起開會，怎麼還不知道？”他說，“政治局不大開會。”既如此，作為一個省委書記或駐外大使，他又怎樣能發揮政治局委員的作用呢？至於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數服從多數，延安整風後，特別是建國後，已逐漸演變成大家服從一人了。例如抗美援朝、向社會主義過渡、農業加速合作化等，都是多數從不同意轉向跟着毛主席走。到1957年的反“反冒進”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就已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

（六）群眾運動與群眾路線

這兩者雖有聯繫，但並不是一回事。而且群眾運動的內涵和外延都不十分清晰，往往大運動中還套多少不一的小運動。以前的情況不很清楚，從延安時期起就已經常大搞群眾運動。我趕上參加的就有生產運動、學習運動、整風運動、搶救運動等等。建國後更是運動不斷。張聞天對建國後的群眾運動，態度大致分兩種。他明確反對用群眾運動搞經濟建設，因為他精通經濟學，主張按經濟規律辦事。這曾是後來受批判的重點之一。對於政治運動，他未敢明確反對，但多持消極態度。運動來了，他不能不應付，照例作動員和總結報告。但在運動中我看他的重點是注意教育和防“左”。以反右派為例。他先是在東南亞視察使館工作遲遲不歸，直到周恩來一再電催才回來，這時已劃了一批右派。他接手主管後，面對“積極分子”的熱情幹勁和對他的壓力，但他還是強調慎重，提出能不劃就不劃。各單位提出要劃的對象後，他總是說“再研究研究”，甚至找點藉口保護著名知識分子。如著名學者老黨員陳翰笙，下面一定要劃，他拖不過去時，就提個理由說，鑒於陳過去的歷史和貢獻，就把他看作“黨內的民主人士”吧，劃成嚴重右傾也可以了。結果，外交部前後只劃了三十多人，不到全體幹部的百分之一（連駐外使館約四千人）。而有的知識分子成堆的機關劃的卻在百分之十以上。最後處理，他也儘量設法做到量才使用，如調去研究所或搞翻譯，而不是送往邊疆省份了事。所以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外事會議上就批判他包庇和保護右派。毛澤東則完全相反。他幾乎可稱為製造群眾運動的專家，延安整風後就更加熱中於群眾運動了。其實過去的許多群眾運動並非群眾自願或自發地起來參加，而是運動群眾，如延安的搶救運動、建國後的反右派、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抓“五一六”等等。這方面情況人們盡知，無須多談。

再看被列為毛澤東思想基本特徵之一的群眾路線問題。這是毛澤東的創造，表面上看，張毛兩人的說法似乎也一致。但仔細考究起來，還是有根本的區別，根源就在對民主的理解上。張聞天做遼東省委書記時我在省青委工作。一次他在幹部大會上作群眾路線的報告，要我記錄整理以便發表。[92] 他的觀點主要為：“人民群眾是主人”。他說，人民是新社會的主人，是最高統治者，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

是人民選舉出來為自己服務的，服務不好，可以隨時撤換。他認為這種民主制度現在有些地方還沒做到，是因為一方面某些領導者往往把主人和勤務員的關係顛倒了過來，一方面群眾也把黨政領導當成官老爺，順着來，不敢得罪他們。張聞天不僅堅持這種民主思想和作風，而且在可能的條件下也照此實踐，如在東北做地方工作的一個時期。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則只是一種好的領導方法。他提出為人民服務和依靠人民，聽取群眾意見，一再講“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特別是強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實質上，所有這些都並不意味着真的要人民當家作主，而是為了使領導不要脫離群眾。所以在毛澤東的言論和實踐中，不但從不強調群眾的選舉權和罷免權，也不重視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這也是為什麼群眾路線講了幾十年，中國不但見不到民主政治，而且越來越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許多事情不讓群眾知道，甚至不准議論。至於“從群眾來，到群眾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即使真的做到，也是把領導（統治者）和被領導分開來的。甚至可以說，連封建專制時代少數開明君主和清官都能做到，如封建社會一些時期的“採風”制度等。總之，張聞天的群眾路線是“由民作主”，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則是“為民做主”，兩者有質的區別。

（七）批評與自我批評

這是馬列主義建黨學說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毛澤東提倡的三大作風之一。可就在這個問題上，張毛二人又是走了相反的極端。如上所述，張聞天對人(主要是比他稍低的大幹部，對小幹部和群眾則不然)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批評顯得非常嚴厲，不大講究方式方法和人情世故。劉英近來還多次談到這點，說他是書呆子，容易得罪人。但他無整人之心，也決不會抓住幹部的辮子不放。對自我批評，他也主動做，但不像周恩來那樣經常和鄭重。只有在強大的壓力下，他才是來者不拒，無限上綱，包括不少違心之論。事後也不再提起，更不翻案，如同完成了一件任務似的。延安整風時的口頭和書面檢討就是這樣。廬山會議和“文革”中也是這樣。對此下面還要專門討論，此處不贅。毛澤東則相反，批評往往因人而異和看機行事。對一些人，有意見平時也不說，一旦認為時機成熟，不但算總帳，還常有許多偏激過頭之處。對另一些人則不時敲打，大小問題（不一定錯）概不放

過。對有些人又是不批則已，一批就要打倒。對多數人，平時很少批評，更多安撫。而且批評還有遠近親疏之別。被歷史上大書特書的對江青及“四人幫”的批評就祥和得多，還顯得頗為親昵。如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難改呢。”又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93] 而且與此同時還着重表揚了江青等人，說他們反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問題要講明。”[94] 對他的許多老戰友，如功勛卓著、誓死保衛他的彭德懷和對他“扶上馬、送一程”的張聞天，就只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諷刺挖苦、無限上綱，更不會有那麼多親昵的“呢”和表揚什麼功。至於對自己，正如本人所說，“我是不作自我批評的。”他還對毛遠新說過：“我們不學胡志明，任何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的”，“歷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沒有不亡國的。”[95] 例如在延安整風中，他規定每個人都要寫反省筆記，“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我們大家都要寫，我也要寫一點”。[96] 實際情況是，別人必須寫，因為這是“鐵的紀律”，他卻並沒寫。至於延安整風以後，被官方黨史學家和個人崇拜者交口稱道和竭力誇張的自我批評主要有兩次。一次是在發動搶救運動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後向被搶救錯了的人賠禮道歉，說，“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97] 一次是在“人禍”造成三年困難、餓死三四千萬人和大量群眾罹患浮腫之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說的，原話是；“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98] 這哪裏像自我批評！對於造成那樣嚴重後果的問題這樣輕描淡寫，既不像他在延安整風時強調的一定要列出具體事實和造成的後果，分析錯誤的原因和深挖思想根源；也不像人們批評有些人的所謂“大帽子底下開小差”，因為他講話中間任何帽子（如主觀主義、唯意志論、不實事求是或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都沒有。像這樣的自我批評，任何領導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做到，換成其他被整的人更是無法通過和過不了關的。所以廖蓋隆認為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原因之一是，“他丟掉了自我批評的武器，犯了錯不但不承認，而且聽不得人家的批評意見”。[99] 田家英也說，毛“聽不得批評”。[100] 這都說明，毛不作自我批評又聽不得批評的一貫作風和表現是盡人皆知的。他提倡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作

風，是要求別人而把自己除外的。

（八）“文化人”與“山大王”

用這兩個稱號毫無貶義。一則他們都曾自稱過。二則一些崇敬他們的人也這樣講。例如馮雪峰1934年在中央蘇區說，“魯迅看了毛澤東的幾首詩詞，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毛聽後不禁開懷大笑。”[101] 關於“文化人”，張聞天自己就說，“我同沈澤民書生氣、文化人氣較濃厚。”[102] 而且，“從現有資料看，在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是張聞天。後來，毛澤東採用了張聞天的提法。”[103] 1940年10月10日張聞天起草下發了《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104] 主要精神是尊重文化人、保障寫作自由、幫助和團結他們等。繼承和發揚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優良傳統，如熱愛祖國、忠於信仰、憂國憂民、獨立思考、喜歡探索、與時俱進、站在時代發展前列、以天下為己任、對敵鬥爭勇敢頑強，等等，張聞天都是當之無愧的。他入黨後不久即斷然和他極其喜愛並已有相當成就的文藝決裂。茅盾談到張寫長篇小說之早時曾“自嘆不如”。還說，“假如聞天同志不是後來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投入了革命鬥爭的烈火，他很可能在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上佔一席之地，充分發揮出他在文學上的才華。”[105] 然而張聞天，不論是為革命出生入死，還是運籌帷幄，甚至被打倒在地，都是無怨無悔，總是心懷黨國，仍然盡可能反映他的看法和意見，希望採納。其責任心之強，真是少見。我看他確實做到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否則也許不會在廬山栽得那麼慘，被打倒後還提開放市場等建議。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的情況下，他沒有寫有關自己的片言隻語，而是偷偷寫了大量總結國家建設經驗的文稿。胡喬木就對劉英說，這是他自己做不到的。張聞天也有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鯁直和某種清高，見不得阿諛奉承和溜鬚拍馬。當然，他也因清高而吃虧不小，首先是得罪了要別人“順着”自己的毛澤東。1941和1958年批他的五個字中就有一個“高”字，不變動他的外交工作也說是由於他驕傲。其實，人們看來他並不驕傲，完全是一個見人還略帶靦腆的謙謙君子。這是許多熟人在紀念和回憶他的文章中都寫到過的。但是，一般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缺點和短處，有些他也並沒有克服掉，最

明顯的是軟弱性。這首先表現為在黨內鬥爭中不夠堅強，往往會在壓力下作無原則和無限上綱的反省和檢討，給自己戴大帽子、作違心之論。當然也有一定的界限，如決不承認“裏通外國”和“推翻毛主席”。對別人的揭發交代則堅持實事求是，更不落井下石。他的過頭檢討，實有難言之隱。他的軟弱性還表現在說話謹小慎微、與人很少來往。他本來不長於交際，再加上過去運動的教訓，就儘量減少同人來往，甚至過去的熟人也逐漸變成了“生人”，如黨的許多領導人，以及郭沫若、茅盾、田漢等當年文化界的朋友，解放後都很少見面，見了也是多聽少說。他同一些領導人如聶榮臻、王震等散步或游覽，給我的印象大多是別人滔滔不絕，他卻很少插話。從相互來往看，我一直覺得他同人只有工作關係，好像缺乏知心朋友，和人也少有推心置腹的交談。這種除工作外，多閉戶讀書，少交際聊天，在他可說已習以為常。所以延安整風以後，他不但不大和同級以上幹部交往，更怕見毛澤東、劉少奇，也就是他後來檢討說的是由於怕毛主席批評。毛澤東批評他的五個字中有一“怯”字，如果指此而言，即怕抓辮子搞無限上綱的批鬥，也許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指在對敵鬥爭和堅持真理中有“怕”，那就根本不合乎事實了。還有一點，就是建國後，他對毛澤東、黨中央一些重要方針和許多政策都有不同意見，但一直不敢提，也很少暴露。這是在他身邊工作的人能夠察覺得出來的。後來大概是憂國憂民的情操和堅持真理的精神使他實在忍耐不住了，於是才有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的爆發。

毛澤東卻大不一樣。他雖然也出身知識分子，學問很深，見識極廣，但卻很少知識分子文化人的習氣。這除天賦外，也與他的經歷有關。他從小扎根中國社會，種過地，求過學，當過兵，教過書，參加政治活動，領導工農運動。他不像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等書生入黨，而是入黨前就已經歷大量社會活動，所以學馬列雖少，卻善於聯繫實際。再加上他們家族有從軍打仗的傳統，尚武精神十分突出。他也從小就尚武好鬥，敢於進擊冒險。傳統哲學對他影響最大的又是“內聖外王”，即梁漱溟說的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毛年輕時就說過，“余於近人，獨服曾文正。”1921 年 1 月 28 日他給彭璜的信中還承認自己“論理喜極端，論人喜苛評”，“略有傲氣”。頭一年的 6 月 7 日給黎錦熙的信中也說，“我因易被感情驅使，總難厲行規

則的生活。”[106] 上面這些，特別是尚武精神和反叛意識，可說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八七會議”後謝絕瞿秋白勸他去中央工作，而甘心去當“山大王”，即屬情理中事。1927年秋收起義失利，不足千人的隊伍退到瀏陽文家市，進行了一場涉及中國命運的辯論。師長余灑度等仍主張休整後再進攻長沙。毛澤東堅決反對，認為打長沙必敗，主張退到山區去。他說，哪個朝代消滅過山大王？何況我們當“山大王”已和過去根本不同，有共產黨的領導，有黨的政策，將來必會取得勝利。他說服了大家，隊伍沿着羅霄山脈南撤。[107] 這一星星之火，象徵着毛澤東開始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毛澤東的“紅色山大王”路線勝利了，而毛澤東本人在長期的游擊戰和同農民相處中也確實養成了某些“山大王”的作風。他在革命的武裝鬥爭中，還進一步發揚了尚武好鬥、進擊冒險的精神，認定目標就堅韌不拔，奮鬥到底。例如他要留在陝北堅持以寡敵眾的戰爭，有不少人勸他離開，他硬是不聽，還為此和任弼時大吵了一頓，最後以撤掉任的支隊司令了事。至於在中央蘇區和長征中冒的風險那就更多了，都證明了他的大無畏精神。再就是決心大，有氣魄，能進能退，能屈能伸，既堅持革命原則，又能靈活運用策略，在政治上掌握革命的來潮與退潮，在戰爭中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真不失為大丈夫。很明顯，革命如只守條條框框，不講靈活，毫無權變，那只有死路一條。這也是民主革命中教條主義者失敗，毛澤東最後能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也有些不大好的東西被繼承了下來。如“無法無天”，不受約束。這方面的例證太多，無須列舉。這裏只要指出，把馬克思主義歸之為“造反有理”，[108] 實在是過分簡單化，在革命期間也許還有一定意義，但在取得政權後就更多地起反作用了。特別是在需要法制的情況下，號召“無法無天”，使黨章、憲法以及自己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成廢紙，只能引起天下大亂，嚴重損害人民利益。如果“文革”真的像毛澤東說的七八年來一次，那中國就可能從世界政治地圖上消失了。又如性格倔強，罔顧他人，事例也是舉不勝舉。毛總是以個人為中心。對於反對他的人，不是當場發脾氣訓斥，就是長期記怨，尋機報復。所以領導幹部都有點怕他。即以生活習慣而言，他也很少顧及別人，想起什麼就叫人幹什麼。例如他在戰爭中養成晚上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在延安和全國解放後生活已安定，但他並未想改，還是

要許多人跟着他轉。如作為中央第二把手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不但是跟着他夜間辦公，而且有許多次是吃了安眠藥後還得隨叫隨到。為了不至於因吃安眠藥容易從床上掉下來，曾長期打地鋪睡覺。[109]

（九）性格、愛好和作風

用這麼大個標題，其實只擬着重寫三個問題。因為有些內容前面已經講過了，有些也許不值得多寫。

1，談起張聞天和毛澤東兩人的性格，差別實在太大。張聞天在1931年前，除小孩時外就一直是和書本打交道，養成一種較為典型的書生氣，性格、品德都和瞿秋白極為相似。他說話算數，從不否認。對過去的功過一概不提（甚至包括過去運動中的過火批判和過頭檢討，他事後既不再多講，也不乘機翻案），既不吹噓“出五關”，也不掩飾“走麥城”，更不像一些人為自己歷史造假。他的工作和生活習慣也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一切活動都按原則、守規矩，開會、上班從不遲到。無論在什麼場合，都是那樣溫文爾雅、溫良謙恭，看不出有什麼威嚴。我跟他工作十餘年，從沒見過他和人吵架或發脾氣。例如一次使館翻譯記錯了南斯拉夫國慶節，害得他跑進人家使館就趕快回頭，一路沒說話，只是回到使館臨下車時說了一句“你要很好檢討！”又如一次我幫他起草的稿子，有一句話他要改我不同意，他拿去狠狠說了一句“我自己來改”。他從不罵人，從不說一句髒話。作起報告或講話來，總是文質彬彬，擺事實講道理，只宜宣傳，不善鼓動。有些黨史著作上說他在“左”傾時期，對意見不同者如何“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如果說的是寫文章有時用語凶狠，倒有其事；如果說進行實際鬥爭或整人，那就不大像了。至於說他在中央蘇區肅反中錯殺了多少好同志，更屬於張冠李戴。相反，他不僅反對肅反中的極左，還盡其所能救了一些同志的命，如傅連璋。

毛澤東則有鮮明的個性，嬉笑怒罵，一般不加掩飾。但出於策略考慮，他也可長期埋在心頭，時機不到，不表而出之。照鄧小平說，毛在建國後就有去掉劉少奇之意，連一“少小離家老大回”[110]的比喻都不放過，但還是忍耐了好多年。他談話看對象，同有的人可以談得很雅致，但在氣頭上也不管那一套。所以一般說來，他的性格還是比較粗曠豪放的。但對人也用權術，說話不時出爾反爾，經常改變以前

說法（修改發表過的文章或重寫沒發表過的文章也許稱得上空前）。如以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極為恭敬，還去訴苦告洋狀，後來卻說成一直同他們進行鬥爭（黨史學和某些人的回憶還添油加醋）。斯大林逝世時，我正隨張聞天回國，得知他那幾天情緒極為沉痛，長時獨自坐在沙發上，見人也不說話。他還親自寫了篇《最偉大的友誼》，感情之深，溢於言表，但他後來竟說此系“違心之作”。說過的，事後加以否認；沒說或沒做的，事後又說得有鼻子有眼。這類例子在實際中甚多。此外，或許是由於過去的經歷和從小養成的性格，他容易發脾氣、喜歡講粗話。對於後者，我就曾在 1939 年的群眾大會上聽到過，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下半期他給赫魯曉夫的信中看到過。

2，這裏談兩人的愛好，主要指讀書。因為張聞天幾乎沒什麼嗜好，不吸煙、不喝酒，連戲曲也沒多大興趣，主要的愛好可能就是看書和研究問題。參加革命前喜歡讀文學書和研究文藝問題，寫作和翻譯的東西也真不少。中國的古典小說也看，但主要看外國的和新文學，其次兼及一些社會問題。參加革命後即集中閱讀馬列理論，並按工作和研究需要，也涉獵有關人文社會科學以至科學技術等某些專業書籍。例如在駐蘇大使任內，就幾乎每個禮拜日約我上書店，購買一批有關蘇聯情況或國際、外交問題的書。他的工資，除一些捐贈外，恐怕有相當部分是用於買書。他買書不是擺樣子，而是真看，作筆記，寫心得，更有不少批注。但他似乎不大喜歡讀中國古籍。我幫他起草文稿，凡引用句把古文或詩詞，他必定刪掉。這方面他也不太熟。如一次傳達毛主席的講話，裏頭引用李清照《聲聲慢》開頭一句，他竟說成了冷冷清清凄凄戚戚，為大家所笑。

和張聞天一樣，毛澤東也酷愛讀書，只是兩人所好不同。毛對中國古籍百讀不厭，但對通行於世界的經濟學、社會學、國際關係理論一類書卻讀的不多，對外國文學更沒多大興趣，很少讀什麼世界名著，據說只讀了《毀滅》、《簡·愛》兩本外國小說，《紅與黑》還是只看電影沒看原著。但他對中國古籍讀得多，記憶力又好，許多古文、詩詞，可以倒背如流。所以有人說，“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111] 他在講話中經常以古喻今，可以長篇引證原文，順手拈來，毫不費力，但從未見他引證過馬克思、恩格斯的大本原著上的話。有人統計，《毛澤東選集》中引用中

國古籍比馬列（又以斯大林為最多）要多出四倍。他不但自己愛好古籍，還經常挑選一些古文叫印發給中央領導或某個會議參加者看，如《後漢書》的《張魯傳》、枚乘的《七發》等。有時還要考問一些領導人，《資治通鑒》看了幾遍？直到臨死前還要人給他念庾信的《枯樹賦》、賈誼的《鵩鳥賦》，以及岳飛、張元幹等人的詞。[112] 在讀書上的這種“厚古薄今”，恐怕對他有不小的影響，多少會妨礙他在考慮問題和制定政策上的現代觀念和世界眼光。建國後喪失一次大發展的良好時機，導致中國的落後，不能說與此無關。

3，關於生活作風特別是節儉問題。張聞天真可謂“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模範地實踐了他在《論青年的修養》一文中對青年所提的要求。他作風嚴謹、正派，奉公守法，公私分明。他不但強調幹部是人民的勤務員，而且主張用法制規範幹部待遇，堅決反對特權和特殊化。他非常討厭那些用公款請客送禮（那時還沒聽到行賄受賄的事），拍馬溜鬚，巴結領導，拉關係，謀私利的人。他的儉樸、廉潔，在黨內歷來是出了名的。自然看不慣有的領導幹部住闊綽寬大的住宅，更反對一些人保有幾處“公館”。他的嚴於律己、以身作則，從以下例證中即可見一斑。在使館，夫婦只佔兩間房子，還兼辦公室用。進北京時有幾處院子讓他挑，他都嫌大，最後住進了一座臨街的小樓，連個放書的房間都沒有，他又愛買書，只好在走廊上擺了一排書架，人走過要側身而行。他回國後看到給他換的新沙發、地毯，也堅決退掉。後來外交部幾位副部長提出搬到東交民巷一個原外國駐華使館大院，正樓讓他住，其餘的樓大家各住一座。可他堅決不搬，別人也只好作罷。直到1959年他被罷官，大家才搬了進去。我在別處曾說過，他對三個親生子女要求之嚴，在高級幹部中可能屬於空前絕後。大女兒始終是普通農婦。二女兒原在外交部當打字員，他回國不久中央提出精簡編制，他就動員女兒回上海自己去找工作，最後當了工人。他送獨生子去新疆建設兵團勞動，一去十五年，直到他病逝時也沒回到身邊。他從不以權謀私，在他那裏更無“後門”可走。他生活樸素，吃穿簡單，衣服好像總是那幾套。生活上以清貧為樂，連發表文章也不要稿費，不是交了黨費，就是分給了起草人和抄寫者。直到生命的最後，還將補發的工資悉數交了黨費。但現在看來，他的節儉有些地方也顯得過分，例如一到外交部就提出降低駐外人員工資，

致使最近還有反右傾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著文不點名地批評他。另外，他對子女親屬要求也太嚴，使一些晚輩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響。[113]

毛澤東提倡艱苦奮鬥，號召勤儉建國和勤儉辦一切事業。他能吃苦耐勞，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表現突出。但他不大注意小節，更隨着革命取得勝利和個人威信迅速提高，作風也有很大變化。這裏只提以下三點作一簡單說明。一是造成越來越嚴格的等級和特權制。這既是繼承中國的封建帝王傳統，又是從蘇聯搬來的社會官僚體制。早在延安時期，任弼時任中央秘書長和彭真代中組部長後就已逐漸制度化，經過整風大批絕對平均主義就更屬合法，建國後已發展到超過了蘇聯。有時也聽到他的口頭批評如對警衛制度，但實際並未制止，執行者總是得到好處而不會吃虧。不但等級制森嚴，他也常自比秦始皇。無怪乎丁玲1985年4月參觀延安革命紀念館時，在毛澤東與其他革命前輩的照片前駐足良久，並深有感慨地說，“當年他們是弟兄，可後來卻成了君臣。”[114] 二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頭一年的1959年，各省市為毛澤東（許多地方還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別墅。除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可能古今中外少有。據外交部當時的總務司長等人從各地觀摩回來後說，有些地方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台賓館之上。對此，辯護者總歸之為地方上“抬轎子”。但上面為什麼不制止？毛還常去一些地方住，如杭州的劉莊和汪莊、上海的西郊、武漢的東湖等。事實證明，“抬轎子”還真有用。而且有些別墅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除廬山“美廬”旁的一處外，1959年6月回韶山時，還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點房子，說以後可以來此辦公、休息。這座別墅，連修公路、美化環境在內，1962年才竣工，正是三年困難時期，毛只於1966年6月去住了12天。[115] 三是關於稿費的處理。蘇聯十月革命後，列寧曾規定除工資外，“黨的高級幹部嚴禁有包括稿費在內的其他任何收入”。後來雖有改變，但為數不多。直到勃列日涅夫，才以稿酬為主要收入。[116] 可是毛澤東建國後頭十多年僅稿費收入就已成“百萬富翁”、當年中國的首富，並單獨立項，只能由他本人決定和批准支出。臨終前江青要去三萬元還曾使他落淚，這是當時全黨傳達過的。這裏值得考慮的是，第一，毛著有許多係別人起草和修改，有許多是黨的文件，多為集體創作，例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

議》；多數講話還是胡喬木等人五次三番整理成文的。因此，稿酬完全歸他支配似不盡合理。第二，毛著印數多、稿酬高，且多系黨組織買來發給大家。例如我們夫婦二人，前後已領到不同版本《毛選》七八套，還不算各種單行本和《語錄》。所以毛澤東的稿費實際上主要出自公款。第三，按制度，公家支出的毛澤東費用(包括衣食住行保健保衛等)已是他工資的萬千倍，稿費只是用於買書、生活補貼和資助親友（如每年給章士釗兩千元）等，另為修中南海的室內游泳池補償五萬元，實際上用處有限，因而稿費的積累（利息）和增加（新出和再版書文）就特別快。像這樣的稿費只能完全由個人支配是否合適、算不算按勞分配，確是個問題。[117] 提出以上三點，並不是要批評毛澤東的生活作風，主要是想說明另一方面的真相，也同那些造神者和造假者們唱點反調。因為他們說的和寫的毛澤東如何艱苦樸素，多半是片面的和偽造的。例如關於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有幾個月不吃肉，就被宣傳得神乎其神。事實是，醫生鑒於豬肉膽固醇含量高，建議他改吃牛羊肉。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也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制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118] 另如毛去世後全國普遍放映了一個毛主席故居的影片，有他的臥室、書房、衣服、用具和游泳池等，顯得甚為豪華，從住房到游泳池長長的走廊都是耀眼的紅地毯。但是很快這部記錄片不放映了。等故居開放讓大家參觀時，已作了全面的重新佈置，一切都顯得非常樸素，紅地毯撤去了，衣架上掛了件帶補丁的睡衣，書案上放了本不像翻過的《資本論》第一卷……和影片兩相對照，弄虛作假的現象甚為突出。質言之，毛澤東進城後就逐漸違背了他自己在西柏坡講的兩個“務必”。關於“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已經替他作了結論。至於“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上面提到的幾點，也許可以作為討論的參考。但應該說，這兩個“務必”張聞天是完全做到了。

（十）毛澤東成為領袖的原因

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已經很多，特別是國外、港台和當年的國統區，老早就已展開。這裏不擬多談，只是想在同張聞天比較中簡單歸

納一下毛澤東成為黨國領袖的幾個主要原因。

第一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因為他的道路合乎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離開農民就寸步難行。中國黨先期的精英陳獨秀、瞿秋白、張聞天等，一開始都對此認識不足或不深。周恩來領導南昌起義時也沒有準備扎根農村，倒是後來才由朱德、陳毅率領部分起義部隊去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只有毛澤東逐漸認識到並始終堅持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正確的道路。

第二，毛澤東也具備了當領袖的主觀條件。由於他有馬列一些基本原則的指導，就使他的領導同歷史上所有農民起義領袖和當代的草莽英雄有了本質的區別。而他的領導能力和水平又超過同時代黨內其他領導人。他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掌握了中國基本國情，在長期的實踐中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還熟讀中國歷史，博古通今，從中汲取了大量有關領導的方法和技術，包括張聞天說的某些“權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在二十世紀上半期這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毛澤東成了使中國走上統一強盛道路的“王者”。

第三，毛澤東是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也從未離開過軍隊和根據地。由於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槍杆子裏面出一切東西”[119]，這就使他不但名播中外，而且有了廣泛的幹部和群眾基礎。例如安排出席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五十三人中，就有一大半是來自原中央蘇區和一方面軍的幹部。由此就可看出毛澤東的影響。相形之下，張聞天幾乎是光杆司令。

第四，毛澤東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如前所述，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它的領袖主要不取決於中共本身，而是取決於國際。所以毛澤東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120] 這裏所說的“指示”，就是指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談話。共產國際作此決定，不只是因為事實證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還因為他的影響大，掌握了黨和軍隊的實力。正是由於毛是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締造者，所以國際過去雖然對他的政策和作風有所不滿，但還是設法保護他，而且在中共領導人中對他的宣傳也最多，1938年乾脆指定以他“為首”。

第五，中國封建社會傳統和蘇聯模式的結合，對中國黨的建設和領袖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這主要指個人崇拜和領導體制的高度集中。延安整風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對領袖呼萬歲和以健在的人命名思想體系，起始於延安整風，大概只是中國的特色，在外國是沒有的。完全以對領袖的態度劃線和根本不按黨章辦事(如定期的會議制度)，也是延安整風立下的先例，並產生了長期影響。如果說民主革命時期這樣做還因為毛澤東代表了正確路線，那麼建國後全黨跟着毛澤東的錯誤跑，就只能用個人崇拜和專制體制來解釋了。而且正是延安整風確立了毛澤東終身領袖的地位。

張聞天應屬個人崇拜受害者之列，但在毛澤東成為領袖的過程中，他也起了“扶上馬，送一程”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延安整風期間還有意無意地參與了製造個人崇拜的工作。這從他參加和修改《歷史決議》，特別是從他的《反省筆記》和各次檢討發言中，就可明顯地看出來。

註釋

1 張聞天1919年12月在南京參加該會，此後又常在該會辦的《少年中國》和《少年世界》上發表文章。毛澤東於1920年入會。

2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61頁。

3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81頁。

4 參閱《任弼時傳》第201頁；淩步機：《六十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載《中華兒女》2000年第4期。

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6 吳亮平：《為真理而鬥爭的一生》，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頁。

7 如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見該書第40頁和封底等數處)。書中與此類似的一些誤解還有一些，如第118-119頁提到，康生講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就是如果不搞整風，“毛澤東幾乎不敢來黨校做報告”。這倒真使我等當時的“一般黨員幹部”感到有點“匪夷所思”，因為這是“千真萬確”不可能的。即使毛澤

東喜歡講極而言之的話，也是“不敢去作整風報告”(就是“不敢”發動整風)，而不是什麼報告都“不敢做”。這類誤解常被一些人抄來抄去，所以特為在此一提。

8 以上均見張聞天：《反省筆記》。

9 《中華兒女》1999年第9期。

10 如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469頁。

11 《遵義會議文獻》1985年版，第78頁。

12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5，100，101頁。

13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6頁。

14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1995年版，第231頁。

15 1997年3月22日楊尚昆會見劉英（陪見的有程中原、張培森等）時的談話，見《百年潮》1998年第6期；另見該刊2001年第10期張培森：《毛澤東為何看重張聞天》。這是楊尚昆在世時審改過發表的。《楊尚昆回憶錄》係他去世三年多後別人整理，故說法不同。按理當以他的原話（而非別人所編）為准。

16 《遵義會議文獻》，第42頁。

17 《遵義會議文獻》，第134頁。

18 例如1935年8月19日的沙窩會議上，就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做出決定：“常委會每周至少一次，各部有臨時發生事件，由各部與書記商量，（必要時）召集臨時常委（會）。”引自《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60頁。

19 楊尚昆：為劉英著《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所寫的《序》，見該書1997年版，第3頁。

20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1 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1993年版，第467，473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上) 第360，364頁；《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60，266頁。

2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5頁；《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90頁。

23 錢江、范偉國：《是非功過張聞天》，載《中華兒女》(國內版) 2000

年第8期。

24 程中原：《張聞天傳》2000年版，第318頁。

25 《張聞天在1935—1938（年譜）》，第159，162-163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1，646頁；另見《張聞天與西安事變》、《張聞天在我黨解決西安事變中的歷史作用》，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二集。

26 程慎元：《日本學者評價張聞天對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貢獻》，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三集，第595-598頁。

27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程中原：《張聞天傳》，第330-332頁；徐則浩：《王稼祥傳》，第252頁；《彭德懷自述》，第211頁；《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90頁，296-297頁，《毛澤東年譜》上卷，第493頁。

28 《遵義會議文獻》，第80頁。

29 如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回憶張聞天》、《張聞天研究文集》等書。

30 楊尚昆：《紀念張聞天同志》，載《紀念張聞天》，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

31 據《張聞天年譜》。

32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555頁。

33 薛暮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張聞天》，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二集。

34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24頁。

35 參閱程中原：《張聞天傳》第十三章《洛川會議前後》第一節。

36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175頁。

37 《鄧力群談張聞天與劉英同志》，載《世紀風采》2000年第8期。

38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5)，第279頁。

39 見《張聞天在遼東》，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頁。

40 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202頁，但某些情節和時間有誤。張給毛由東北局轉的三份電報是1949年5月寫的（見《張聞天選集》第447-454頁；程中原：《張聞天傳》增訂版第635-640頁）。1950年2月他已調來北京。至於張劉爭論和毛當面表態的時間，則不知其詳。

41 薄一波：《關於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 208 頁。

4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 第242頁；《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00-901 頁。

43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907 頁。

44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 451 頁。

45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940 頁。

46 見《張聞天文集》(四），第 216-242 頁。

47 因稿件係我起草，所以他要我跟他一起送呈總理，以便有指示時回來修改。總理未看就說不用了。可見是早已商定的。另見蔣洪斌：《陳毅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1頁；《陳毅年譜》下卷，第 712 頁。

48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1147 頁。

49 說張聞天有“大少爺氣”，可謂毫無根據地信手拈來。

5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第 212 頁；《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1090 頁。

51 葉·格·利別爾曼（1897—1983），烏克蘭人，經濟學家，1962年9月著文提倡在蘇聯搞點經濟改革，如擴大企業權限，重視利潤指標和物質刺激等，被我國當時輿論視為經濟學界現代修正主義代表人物。

52 張聞天 1968 年 8 月 28 日所寫材料。

53 2001 年 10 月 28 日張培森查告何方。

5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8），第 461 頁。

55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1167-1168 頁。

56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1182-1183 頁。

5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 215 頁，《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 181 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66 頁。

58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1268 頁。

59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1287，1290 頁。

60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1312，1316 頁。

61 在起草《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一般不再提路線鬥爭，只是對以前的路線錯誤還用機會主義、冒險主義之類的稱呼。建國後的黨史已沒有這些帽子了，但像“大

躍進”、“反右傾”、“文革”等不算路線錯誤算什麼？也可以“宜粗”掉了？

62 1959年8月9日在廬山會議小組會上的檢討發言。

63 1959年8月13日在八中全會上的發言。

64 1962年8月17日在十中全會西南小組會上的發言。

65 《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101頁。

66 《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101頁。

67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1998年版，第372頁。

68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69 斯大林：《論中國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選集》，1979年版，第487，492頁。

70 潘心源；《湘東各縣綜合性的工作報告》(1927年7月2日)，見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117頁。

7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8)，第451頁。

72 楊尚昆：《紀念張聞天同志》，1990年8月30日《人民日報》。

73 如《毛澤東傳1893—1949》(上)第四節標題及其他有關資料。

74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75 張聞天在留蘇學習和教學期間就讀過幾遍。在延安主持《資本論》學習小組，逐章逐段討論，我還旁聽過。被打倒後在經濟所又一再精讀，還留下大量批注和讀書筆記，如《關於生產關係的兩重性問題》(見《張聞天文集》四)就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76 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123頁。有關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的說法，長期以來流傳就較為廣泛。不久前(2002年11月22日)的一次會上，曾彥修還提到，田家英告訴他毛主席沒讀過《資本論》。于光遠在旁加以證實說，他可算“權威”，因為他在延安時是圖書館主任。除人們傳說外，毛在文章中也確未直接引證過《資本論》。《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一書中提到“1954年，毛澤東又一次閱讀《資本論》”，似乎不足信。因為插圖的《資本論》只是寫了個出版年代，難以證明讀過。毛讀書有作批注的習慣，更何況讀《資本論》，但人們沒見到過批注。和插圖中的版本極相似的一本(可能就是這本)曾在毛中南海故居展覽過，我參觀時翻了翻，未找到批注。現在公開出售的

毛澤東讀書批注極多，大部係古籍，但也有《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和內部出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如果《資本論》讀了幾遍（1954年是“又一次閱讀”），那一定會有大量批注可供整理出版。而且像《資本論》這樣大部頭的書（加上《剩餘價值理論》共六大本），毛恐怕不但沒興趣（“沒味道”），而且也沒時間讀。在延安整風前學理論高潮期間，他鑽研的是哲學，沒參加《資本論》學習小組。此後大概更不容易抽出閱讀的時間了。另據莫洛托夫回憶，毛向他承認，自己沒讀過《資本論》。見（蘇）丘耶夫：《莫洛托夫訪談錄》中譯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頁。

77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08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還有“在這個問題上要為毛主席說幾句公道話”這樣不講理的言論！

78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215頁。

79 有關張毛兩人的觀點和主張，這裏的論述只涉及上世紀五十年代張從事外交工作時期。材料來源可參閱《張聞天文集》(四）和《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一、二、三、四集）、《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5—9）中的有關文章或段落。除較為重要者，不一一加注。

80 1950年我跟張聞天進外交部，先後任駐蘇使館研究室主任和部辦公廳副主任兼研究室（或綜合組）主任，主要從事調研和文件起草工作，實際上(沒名義)還是張聞天的兼職政治秘書，直到1959年。

81 《張聞天文集》(四）中的《論和平共處》、《戰爭是可能避免的》；倪立羽等：《張聞天與新中國的外交事業》，載《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二集。

82 見《毛澤東外交文選》的有關章節。

83 見《對亞洲形勢中若干問題的看法》等，載《張聞天文集》(四）。

84 《新民主主義論》注（17），《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10頁。

85 “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基本建設方針的提綱”《張聞天文集》(四），第27頁。

86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1098頁。

87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78頁，另參閱第90頁。

88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32頁。

89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68頁。

90 《遵義會議文獻》，第134頁。

91 參閱《張聞天年譜》，下卷。因部黨組書記是周恩來，他以副書記身份不便召開黨組會，故名之曰部領導碰頭會。

92 此件整理好經他審改，以省委宣傳部名義在《遼東大眾》日報上連載，後來還出了單行本，《張聞天文集》(四)選用了一部分，見第123-128頁。

9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第394頁。

94 見《百年潮》2001年第8期，第76頁。

95 轉引自沙葉新《"檢討"文化》，《隨筆》，2001年第6期。

96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61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8頁。

9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0-281頁。

98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822頁。

99 廖蓋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7頁。

100 轉引自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125頁。

101 見《百年潮》，2001年第9期。

102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03 李濤：《在總書記崗位上的張聞天》，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頁。

10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第496-499頁。

105 茅盾：《我所知道的張聞天同志早年的學習和活動》，《回憶張聞天》，第72頁。

106 以上所引資料均見胡長明：《關於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斷想》，《書屋》，2001年7-8期。

107 參閱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114-115頁。

108 原話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12月21日)，載《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0日。

109 見王光美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10 1958年，劉少奇曾以此詩為例，說唐時高官上任也不帶家眷。毛專為此查書，說明作者賀知章出外做官是帶了家眷的，不但寫了材料，在中央會議上講還在黨內作了傳達。

111 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第307頁。

112 陳晉：《毛澤東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5頁。

113 以上情況除多年跟他工作時的體察外，還從1999年起同劉英有過幾十次談話。另可參閱《張聞天年譜》有關條目，如下卷第914、965、980、1218等頁；以及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憶張聞天》和中共黨史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四卷《張聞天研究文集》中的有關篇章。

114 見《炎黃春秋》，1999年第3期，第56頁。

115 參閱《毛澤東大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99頁。

116 俄國《真理報》2003年3月9日載文：《克里姆林宮主人收入揭密》。

117 關於毛澤東的稿費，《毛澤東大觀》（第1030頁）上說，“除工資外，毛澤東擁有大筆稿費，在五十年代，稿費就達人民幣100萬元。”“毛澤東的稿費，他自己動用的每年不到一萬元。”
另據韶山紀念館所編《毛澤東遺物事典》（紅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1960年前後，毛澤東稿費收入每年為二十幾萬，利息月1.5萬元。該書第511頁也提到，毛澤東稿費存款“50年代即達100萬元”。

118 見《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1-702頁。

119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47頁。

120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425頁。

（2001年7月完稿）

第四篇

延安整風中的張聞天

一，整風開始，張聞天首當其衝

毛澤東常說“不破不立”。那麼延安整風要立和破的是什麼呢？毛澤東是要“以其道易天下者”，[1] 這個“道”就是毛澤東思想，所以整風也就是為了立毛澤東及其政策思想在全黨的領導和統治地位；為此就得破對他有妨礙的人和事，主要是蘇維埃後期的“左”傾路線及其代表人物。由於這條路線被後來黨史上定名為“王明路線”，經過長期的宣傳教育，人們自然會認為批判的第一個目標必定是王明了。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整風的醞釀和開始階段，首當其衝的卻是張聞天。[2] 這是當時延安人大都心裏明白，並在下面有所議論的。

毛澤東的幾篇整風報告，聲討教條主義、挖苦“理論家”，人們一看，就知道主要矛頭是對着張聞天。特別是《改造我們的學習》和《反對黨八股》中的“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甲乙丙丁，開中藥鋪”等，更是明顯地指張聞天而言。因為張在六中全會的報告《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與黨的組織問題》(提綱)，[3] 就前後用了四種符號分段，大家議論中一對比，很容易聯想到的就是這篇。（其實，1939年6月毛澤東的《反投降提綱》，[4] 所用數字符號比張還多，但因當時多數人看不到，即使聽到看到也不會聯想到，所以沒有相關議論。）

批判矛頭首先指向張聞天，這也是張本人完全察覺到了的。他在1943年12月寫的《反省筆記》中就有比較詳細的敘述和檢查。他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後來）實際上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而正是宣傳教育工作常遭到毛澤東同志的批評，有時“還引起了我的反感”。“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覺得當時王明活動的方針是：一方

面組織自己的宗派勢力，……另一方面捧毛澤東同志以抬高自己，對我則暗中加以打擊。”“聯繫到毛澤東同志對於我的宣教工作的責備與批評很嚴，對長江局的嚴重錯誤則置之不問，這使我得到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毛澤東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圍，因而要打我一下，表示他對我沒有偏心，以便團結其他同志。”由於總是受到批評和責備，所以“我的工作情緒不高，我一方面提出，要求把我的名義上的書記職務完全解放，……另一方面，我儘量推掉自己的工作，……做到少負責任。”“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找陳雲、康生談談，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中央決議通過的，照着做了又來駁斥(如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確經中央看過，而且均用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因此事情不好辦。”[5] 感到有點動輒得咎，很難正常工作下去。1941年六七月，張聞天終於按康生、陳雲建議，主動找毛澤東談了一次話。這次“他談的很溫和，似乎還不願批評我。第二次，他約了康生、陳雲、弼時同去談，他嚴厲地批評了我一陣，說我有狹、高、空、怯、私的毛病，說我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我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說我在會理會議以前政治動搖等等。我聽了雖然不舒服，但我仍然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九月政治局會議開始時，我覺得會議的主要打擊方向是我。王明當時興高采烈，想乘機向我進攻。”[6]

這裏引張聞天的話多一些，是為了以他自己的親身感受，證明延安上層的整風，從醞釀準備起直到1941年九月會議，批判矛頭一直是衝着張聞天的。而且不僅是毛澤東帶頭責備與批評，更如上引胡喬木的話，批張還成為“當時的一種潮流”，[7] 文章很多。如李維漢1942年3月16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要清算幹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一文，就直接批評“領導幹部教育的負責人”；3月24日陳雲《到什麼地方學習》一文，也批評把“幹部長期放在學校裏‘學習理論’”，等等。甚至為了批判還可以不顧事實，像胡喬木指出的，“說文藝座談會是為了糾正文委工作（張聞天領導）中的問題，這話不符合實際。這是後來的一種解釋，是做文章”。[8] 李維漢在八十年代也改口說，“1939—40年第一階段參加在職幹部學習的共4068人。教條主義也影響輕微。”[9]

就是上述毛澤東的批評，不但偏激過火，而且大部分也是不符合

事實的，同他歷來對張聞天的評價：開明，講民主，不爭權等，就顯得自相矛盾；[10] 有些更是無中生有，如說張聞天在會理會議上煽動林彪、彭德懷反對他，以及“政治動搖等等”。對於諸如此類的批評，特別是毛澤東所談，張聞天聽後甚感委屈。但他沒有多加辯解，而是從大處着想，嚴格要求自己，爽快地承認了錯誤。因為從遵義會議以後，張聞天就一直認為他在臨時中央和中央蘇區犯過嚴重錯誤，為此在六中全會上不僅作了檢討，還鄭重提出請求處分。所以對毛澤東這類過火批評，除個別事實表示保留外，他並不進行解釋和爭論，只是“反求諸己而已矣”。但在毛澤東看來，張聞天的態度不僅表明了他個人已完全服輸“繳械”，而且也標誌着發動主要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的時機已經成熟，是很有把握的了。因而在兩個月後就召開了政治局的九月會議，發動了清算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鬥爭，宣告了上層整風的正式開始。而且正是張聞天在會上第一個站出來擁護毛澤東的報告和深刻檢討自己的錯誤，並表示決心補裸。會後不久，他就為了不干擾毛澤東整風方針的貫徹和使自己接觸實際，也為了擺脫難以正常工作的困境（用他的話，就是“因為對毛主席的思想瞭解還不深刻，所以有些事情還做不來，做不好”[11]），遂主動要求去農村調查。經中央批准同意，張聞天即於1942年1月率領由原馬列學院一批同學組成的“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去晉西北作調查。從此，他實際上也就永遠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

從遵義會議起，張聞天就對毛澤東實行很好的合作。在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後同長江局的關係上毛澤東一度處於孤立時，他也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而且六中全會前後還一再主動讓權。有如以前一些蘇聯漢學家所說，從遵義會議到六中全會，張聞天對毛澤東是“扶上馬，送一程”。既然如此，為什麼毛澤東對他還成見那麼深，以至於把他作為中央整風的第一個批判對象呢（而且挖苦諷刺和打擊了大半輩子）？分析起來，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是由於張聞天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影響。

後來被定為“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是王明、博古、張聞天。實際上，不但在九月會議前，看不出毛澤東有把矛頭指向王明的意思，就是整個1942年，鬥爭矛頭也不是對着王明。[12] 王明自己1944年3

月7日給季米特洛夫的密電，也說是“最近一年就黨內生活問題針對我開展的重大運動”，就是指1943年才對着他。[13] 而且當年在延安的感受，也實在沒有覺得王明的影響比張聞天大(最近同一些老同志談起，大家都有同感，認為王明多半是後來炒出名的)。詳細情況下節還要談到。至於博古，遵義會議被趕下台後，在黨內已沒有多大威信，這時也未擔任什麼重要職務，顯然不值得對他大動干戈。而張聞天則不然，遵義會議後當了名副其實的三四年總書記，任期內實現了中國革命的重大戰略轉變，在黨內是有相當影響的。這點連毛澤東本人都極為重視。[14] 而且從形式講，直到這時他的總書記還未被正式和明確免掉，還被稱為“黨的領袖之一”(當時出席一些會議或作報告時介紹的稱呼。又如1939年11月14日山東省委主辦的《大眾日報》轉載張文的編者按說，“中共領袖之一洛甫同志在《新中華報》上論著……”)。連王明這時還要捧毛澤東、 攻擊他，並且回國後就“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15] 說明他的地位並非完全虛設。直到上層整風開始的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李維漢在發言中還“談了自己對博古、洛甫兩人的‘觀感’：對博古是‘敬而畏’，對洛甫是‘敬而愛’。這的確說出了張聞天在黨內同志心目中的印象。”[16] 因此，無論從歷史講還是從現實講，反對教條主義就只能以他為主要對象了。而且開始發動整風時毛澤東的權威也還有限。完全支持他的劉少奇1937年都曾說過，“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劃（畫）虎不成。”[17] 就是專門傳達共產國際立毛澤東為領袖的王稼祥，在六中全會的閉幕詞中也沒再提到毛澤東。在第一篇筆記中已經提到，毛澤東來抗大只被介紹為“我們黨的領袖之一毛澤東同志”，鄧力群說他在1942年以前從未聽到過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而1943年前，領導人寫文章也幾乎沒有人引證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要立毛澤東的權威，就必須進一步破曾是中央第一把手的張聞天的影響。

第二，張聞天主管宣教工作期間沒有重視宣傳毛澤東。

六中全會發動了一個全黨幹部的學習運動，中央很快成立了幹部教育部，由張聞天兼任部長，規定每天兩小時學習制，自動與強制結合，要求長期堅持下去。各單位也都紛紛制訂計劃(總政後來就定為半天學習），成立學習組織。中央和宣傳、幹教兩部還不斷督促檢

查。據不完全統計，單1940年，中央下發的有關幹部教育的指示、決定就有七件之多。組織理論學習本是張聞天所長，他興趣大，情緒高，組織領導，認真負責，還帶頭寫文章，上大課(好多機關的幹部在一起上課)，很快就在延安掀起了一個學理論的高潮。這時，機靈的王明已經提出了“學習毛澤東”的號召。但張聞天還是提倡學馬列，而且真幹，單是策劃和組織翻譯出版馬恩列斯著作，其數量之多和規模之大，就屬空前，先後有《馬恩叢書》十二種，《列寧選集》二十卷，《斯大林選集》十幾卷，[18] 及其他一些中外哲學社會科學書籍。雖然沒有提倡學習毛澤東著作，但實際上毛澤東還是從中獲益不小。首先是包括他在內的領導人和各級幹部有可能看到比以前多得多的馬列著作（當時延安懂外文的人很少）。所以大家學習的積極性普遍很高，讀書和討論之風甚盛(因缺燈油，我們往往是每天晚上討論)。平時閑聊，內容也多是學習。人們在那兩年着實讀了些書，以致有些人至今還念念不忘，認為收穫不小，為學習理論和建立革命世界觀打下了基礎。對這場學習運動，頭兩年毛澤東不僅積極參加(如參加“延安新哲學會”，請何思敬講黑格爾哲學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還一再倡導和贊揚（如1938年12月13日在檢查工作的幹部晚會上的講話、1939年5月20日在幹部教育大會上的講話、1939年6月10日的反投降報告等等）。但1940年後，他就逐漸感到這種只學馬列不讀毛著的學習運動不大對勁，甚至是完全錯誤的，於是就出現了張聞天上面所說的對他不斷地責備和批評。到1941年5月19日高幹會上的報告，更是一鳴驚人，提出必須對我們的學習來一個根本改造，在職幹部教育和學校幹部教育，都“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不久，馬列學院改組，也基本上停止了馬列著作的翻譯和編輯工作。大概他認為照以前那樣學下去，只能繼續立“洋教條”(整風中普遍把馬恩列斯的言論稱為“教條”），被他稱為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的思想（即毛澤東思想）不但立不起來，而且還會被沖淡甚至貶低。事實上，毛澤東思想的代表性重要著作，毛本人都一再提起的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並沒有被黨的其他領導人看重。連劉少奇直到1941年在《答宋亮同志》的信中還說，中共黨內“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19] 這年5月鄧小平在129師一個會上講文化方針時竟然也不提《新民主主

義論》，反而大段地引證張聞天。[20] 而張聞天同年8月27日竟在政治局會議上當着毛澤東的面説，“同意毛主席的意見。中國革命的理論，趕不上實際的發展。……現在中國同志還沒有人能寫一本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書。”[21] 連王明在1940年已經稱毛澤東不但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是“偉大的理論家”。[22] 而主管宣教的張聞天直到1941年還對此認識不足。很明顯，這在毛澤東看來，無論是張聞天本人的思想還是他主管的全黨學習運動，都是典型的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的最大障礙。要進行全黨整風，他又怎能不首當其衝呢？這是連張聞天自己後來也覺悟到了的。例如他在整風後期就曾檢討説，“我在宣傳部工作的時候，我只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列入臨時的策略教育和時事教育內，只當做中央的一般政治文件看待，而沒有當做同馬恩列斯一樣的，甚至對中共黨員更為重要的理論著作，使之成為每一個中共黨員必須好好研究的馬列主義的讀物。”“我對於我們黨內應該有一個單一的壟斷的思想的重要性，當時是瞭解的很不深刻的。”[23]

第三，是要“取消他的‘理論家’的資格”，也改變對理論家知識分子的傳統觀念。

整風前，雖然張聞天自己表現謙虛謹慎，從不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居，但人們的心目中他在這方面的名聲卻超過毛澤東。這大概是由於他馬列讀得熟，文章寫得快，知識廣，水平高，因而受到廣大幹部特別是宣教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敬佩。例如僅據《年譜》和《文集》所載，1939年和1940年，他每年發表的署名文章都在十篇以上。即使在毛澤東明確立為全黨領袖後，人們在談到理論問題時也還是毛張並提。例如徐特立在馬列學院作報告時就説過，“在我們黨內，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學通了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潤之，一個是洛甫。”[24] 對於毛澤東和張聞天1940年1月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何思敬在6月21日新哲學會年會開幕詞中也是相提並論，説毛的《新民主主義論》為“中華民族再生的旗幟”，張的《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是給予我們的鬥爭綱領”。[25] 茅盾當時讀後也將兩者並列為“運用馬列主義理論，對過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對今後提供了警辟的透視與指針”，“是中國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26] 總之，

在人們的心目中，毛張在理論上似乎不分伯仲。甚至一些知識界人士還認為張的理論水平高於毛澤東，稱張為“理論家”，稱毛為“實幹家”。更為嚴重的是，1940年3月周恩來從莫斯科治傷回來，傳共產國際第二把手曼努伊斯基的話，也說張聞天是中國黨的理論家。毛澤東聽了發火說，什麼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27] 這確實是個大問題。因為從馬恩列斯起，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個重要傳統就是黨的領袖必須是理論家。列寧逝世後，聯共黨內群雄並起，首先也是爭當理論上的權威。斯大林一篇《論列寧主義基礎》即初戰告捷，也為他後來掃除一切反對派在理論上打下了基礎。雖然沒有任何根據說明張聞天一定要保個理論家的頭銜，更不用說同毛澤東去爭了。事實上，人們都承認張聞天是個不爭權、不圖名、不愛拋頭露面的人。但問題在於毛澤東既然是黨的領袖，卻不是理論家，只落個實幹家之名，這當然是絕對不行的。毛澤東以前在這方面就吃虧不小，由於馬列書讀得少，受“左”傾中央及其代表的壓制，還長期背了“狹隘經驗論”的包袱。對此他一直耿耿於懷，曾多次說，“我因此，到延安就發憤讀書。”[28] 例如《毛澤東哲學批注集》[29] 收集的批注讀本共十一種，抗戰初期閱讀的就佔九種。另一方面，為了在理論上有所表現，那幾年毛澤東在講話和發言中也儘量使用一些理論名詞或術語。例如1941年10月13日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談到黨的二十年歷史時說，“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時期，是唯物辯證主義運用比較好的時期，是我黨生動活潑時期。1927年下半年，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其思想是機械唯物論的。……遵義會議後，又恢復了按辯證法行事，即按實際辦事。”[30] 在所寫文章中評論劉少奇的用語也說他是“唯物的辯證的革命觀的代表。”[31] 不過在毛澤東看來，光靠多讀書是不行的，一則時間有限，緊追慢趕也不會比張聞天等人讀得多；二則讀理論書也並非個人所好，不如讀中國古籍那麼有興趣。所以他說，“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32] 因為少了，在黨內沒地位，被人瞧不起；多了呢，用處不大，反而會壞事(相當於後來說的“書讀的愈多愈蠢”)，實際上自己也做不到。因此只能從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出發來解決問題，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使馬列主義的一些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做到馬列主義中國化，並徹底改變對理論家和知識分子的傳統看法。於是，被看作理論家和知識

分子代表的張聞天，自然就首當其衝了。

第四，張聞天是清算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一個重要障礙。

本來，遵義會議不但糾正了“左”的軍事路線，實際上也從此改變了錯誤的政治路線，特別是張聞天主持的瓦窑堡會議已制定出了一套徹底轉變戰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至此，路線問題應該説已經解決了。而且在這期間，包括毛澤東在內，還都沒有認識到遵義會議前的路線錯誤問題。不但《遵義會議決議》肯定四中全會以後的政治路線“無疑正確”，就是確立了毛澤東為全黨領袖的六中全會上，毛本人在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還特別強調，“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原則錯誤。”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也説，“完全同意政治局五中全會至六中全會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33] 但是另一方面，長期受“左”傾路線壓制和打擊的毛澤東、劉少奇等人，隨着形勢的變化，思想也在跟着變化，而且對當年受壓一直耿耿於懷，有機會就非出那口氣不可。更重要的是，要“改造黨”、“改造中央”，即確立新的指導思想和改組中央以至各級領導，就必須推倒《遵義會議決議》關於政治路線正確這一橫在面前的主要障礙，因而就要清算歷史和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而張聞天正是到這時還維護《遵義會議》決議的主要人物。有些黨史著作把“突出兩條路線”説成是“延安整風樹立的黨內鬥爭模式”。[34] 這當然與實際相去甚遠。因為搞路線鬥爭本來就是從斯大林和聯共那裏搬來的，是用於黨內鬥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只要提到路線錯誤的高度，就意味着一批領導人必須下台，特別是一些所謂為首的，因為毛澤東認為，“為首的，改也難”。斯大林和聯共的做法更往往是清除出黨以至按反革命論處。即以中共自己抓路線問題而論，無論陳獨秀、瞿秋白，還是李立三，基本上都沒有好下場。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談路線“色變”，張聞天等人不願承認路線錯誤的原因之一（主要原因還是認識問題）。所以直到 1940 年 12 月 4 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遵義會議決議只説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説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修改。”[35] 張聞天卻表示，在蘇維埃後期雖然因反對立三路線不徹底又犯了“左”的錯誤，但當時還是進行了艱苦的鬥爭的，還是為馬

列主義而奮鬥的，路線上並沒有錯。[36] 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上又有激烈爭論，致使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時，只好妥協，沒有講這一時期為路線錯誤"。[37] 張聞天並非是不作自我批評，頑固對抗批評的人，這次第一個站在了毛澤東的對立面，也是形勢使然。當時情況可能是，王明自認一貫正確，似乎第三次"左"傾與他無關，別人這時確實也沒有提到王明；博古自遵義會議下台後雖然也不同意提到路線高度，但他的意見已沒多大份量，而且在毛澤東提出路線問題後他還表示願意對錯誤承擔責任；周恩來當時並不在延安，沒參加會，而且歷來在這類問題上表態慎重；這樣，不承認路線錯誤的就首推張聞天了。所以直到1941年九月會議前，他都堅持，四中全會以後的中央，儘管犯了許多"左"的錯誤，給革命帶來重大損失，但總還是在幹革命的，執行的是國際路線，在大方向上全黨也是一致的，並無兩條路線之分。鑒於張聞天的地位和影響，特別是他在路線問題上的這種態度，毛澤東要發動整風、清算歷史、批判"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矛頭就不能不首先對着他了。

第五，張聞天又是犯路線錯誤者中的"薄弱環節"。

在上層整風要"打碎"的"兩個宗派"中，雖然"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38] 但實際上，所謂的經驗宗派的力量和影響要比所謂的教條宗派大得多，打碎"教條宗派"也比較容易得多。所以胡喬木在解釋《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提宗派的原因時說，"其實關於教條宗派問題早就講了，整風一開始毛主席就講了。政治局檢討歷史時，教條宗派的人頭比較清楚，經驗宗派問題，則集中在另一些同志身上。有的同志當時擔負着很重要的工作，說他是經驗宗派就不好工作了。而且一說宗派就把問題說死了，……又牽涉到很多的人。"[39] 關於整風中整的兩個宗派，在本書的一篇筆記中要作專門討論，說明它們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似乎可有可無，人數也可多可少，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如果一直追查下去，那麼除毛澤東、劉少奇等幾位領袖人物外，多數高級幹部就會"不歸楊則歸墨"，不屬這派就屬那派了。當時對兩個宗派並未全體排隊點名，但人們心目中總有點想法。被認為或被疑為經驗宗派的不但人數多，而且涉及許多領導幹部，他們又統率着千軍萬馬，如果追下去，勢必影響大局。相形之

下，教條宗派則顯得勢孤力單，人數有限，上層“人頭比較清楚”的那幾個，基本上都是“光杆司令”，且早已爭相向毛澤東靠攏，還互相揭發。所以整風批判從教條宗派着手，並非因為它是“頭”，而是從黨內鬥爭策略看，這樣做既容易開展又見效快。至於他們中間先從誰批起，則除了考慮到上面講過的地位和影響等因素外，還要估計到他接受的可能和程度。如果頭一個就碰了釘子，那就不利於運動的開展。權衡結果，選定了張聞天。這是因為在教條宗派中，毛澤東與之合作的時間最長也最瞭解的正是張聞天。經驗證明，他在強大的壓力下首先接受批判和進行檢討的可能性最大，性格中軟弱的一面也較明顯，最適宜於作為突破口。例如遵義會議後的長征途中，他因感到同毛澤東、王稼祥不好處，覺得在中央工作實在不痛快，所以在一次討論派一個負責同志去白區工作的會上曾要求自己去。結果被抓住，說是“政治上的動搖”。“在北盤江一個什麼地方同我鬥爭了一晚。我當時似乎承認了錯誤，說要求出去是不對的，是政治上的動搖。”[40] 其實，除諸如此類的事例外，發動整風前還作了一次偵察和試探，這就是1941年六七月間的那次談話。無論從事情的前後情況和批判內容看，這都是一次精心的安排，而且完全是突然襲擊。因為，如果是領導同志間進行批評和交換意見，那張聞天第一次主動求見和徵求意見為什麼不談；第二次談話為什麼要約上陳雲（時任組織部長）、康生（已完全順着毛澤東）、任弼時（張聞天曾支持將其從中央蘇區排擠到湘鄂西），而且是那樣有準備地算總帳和無限上綱（後來還一再提起，包括1958年5月8日給張聞天的回信和1959年廬山會議後的多次批判），都說明這次談話的不同尋常，可看作中央整風的一次前哨接觸。結果也不出所料，張聞天不但未加抗拒，還當場作了檢討。這就增加了毛澤東很快（一兩個月後）召開九月政治局會議開展中央整風的信心和決心（果然會上又是張聞天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毛澤東報告和帶頭進行上綱上線的檢討）。[41] 如果不是張聞天而換成別人，也許不會那麼順利。例如王明，長期來把他定為教條主義的頭子，實際上那卻是整風後期的事，開始時沒有也不可能從他批判起。如上所述，1943年前一直沒有把批判第三次“左”傾路線的矛頭指向王明，毛澤東要求王明的，只是檢查1938年武漢時期，還說明是不屬於路線的一些右傾的原則錯誤。[42] 假定不是這樣，而是按黨史上後來說的“王明

路線”，那麼先批評的就應該是王明了。那結果會怎樣呢？必定是開局不利，一開始就陷於僵局。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如按毛澤東頭一階段說法，蘇維埃後期錯誤的主要負責者是博古，其次是羅邁（李維漢），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錯誤，那就應當以博古為批判的首要對象了。但第一，也如前面所說，對他已不值得大動干戈；第二，毛澤東知道博古覺悟遲，以他為突破口沒有把握。（例如1943年12月28日《中央關於學習〈反對統一戰線的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中還說，“現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領導同志都是團結一致的。”）[43] 至於羅邁，一則，論地位和影響他都站不到前邊來；二則，教條宗派他沾不上邊；三則，當時普遍認為他的態度不好，而且直到晚年也不承認他是王明宗派的人。在教條主義代表人物中，王稼祥是毛澤東印象最好的一個（曾多次強調他在遵義會議和六中全會上的功勞，甚至不合事實地說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胡喬木談到整風時也說，“開始毛主席是很器重王稼祥的，特意讓他住到楊家嶺。”還說，“開始他是主要指導者之一（按，中央成立學習組，毛澤東為組長，他為副組長），慢慢地很多人攻他，他處於受批判的地位”。[44] 可見，在批“教條宗派”時不會先把王稼祥拿出來。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王稼祥也不會作過頭的上綱上線的檢討，何況他還“對整風有些看法，曾一度影響工作的積極性”，[45] 自然不能成為整風中檢查和認罪的榜樣，他也始終沒有承認是王明教條宗派的重要成員。這也是後來七大選舉時，張聞天順利當選中央委員並繼續留在政治局，而王稼祥不但先是落選，後經專門說服動員才當選為候補委員第二名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整風中（後來一切政治運動也都學這點），態度的“好壞”，“揭發交代”和“檢討”的是否“深刻”，是受到極大重視的。從事後看，張聞天確實起了表率作用。毛澤東批判教條主義先把矛頭指向他，也確實是選准了對象，可謂“知人”。

最後，還應一提的是張聞天沒有國際的支持。

整風開始時共產國際尚未解散，所以只能啟動於蘇德戰爭之後，說明毛澤東還是很注意國際態度的。因此在選擇第一名教條主義批判對象時，不能不考慮其同國際的關係。王明同國際的關係，毛澤東一直沒摸透。所以在國際解散前，他雖然對王明拒不檢討還進行反撲

（批評黨在抗戰時期的路線和《新民主主義論》等，還揚言要上國際打官司）極為惱火，但1943年前卻並未將整風的矛頭指向王明。而張聞天不受國際的重視和支持卻幾乎是眾所周知的。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的，國際從來沒有宣傳過張聞天，五中全會還不同意他進書記處。遵義會議後，共產國際為了保持對中共的領導關係，只能承認會議推選出來代替博古的總書記是張聞天這一既成事實，以及中共中央報來的常委排名順序："洛甫、恩來、博古、澤東"，[46] 卻沒見到對張聞天有什麼肯定和贊賞的表示。相反，國際派王明等回國後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上，還傳達要加強集體領導、實際上取消總書記的意見；排名順序，張聞天也被排到了毛澤東、王明之後。這些，毛澤東當然完全明白，因此上層整風以張聞天開刀，對蘇聯和共產國際也是不會有什麼顧慮的。

當然，除以上各點外，在整風中張聞天首當其衝，還由於毛澤東對他一直看不慣、看不起、不滿意，兩個人的思想、作風、性格、愛好等都有很大差異。這是我們前面已經談過了的。

二，關於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各種整風檢討

在黨史學習筆記中，我曾多次提到和引證過張聞天延安整風時寫的並受到毛澤東肯定的《反省筆記》。現在該是輪到對這部《反省筆記》連帶其他檢討說些話了。因為應該如何看待這部筆記和整風中的其他檢討，還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而這又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下面提到的一些看法當然談不上研究，只是純屬個人的點滴感想。

（一）張聞天《反省筆記》的來龍去脈和寫作背景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全國上下在大力進行撥亂反正，黨史研究也出現了一個稱得上空前的高潮。在此期間，成立了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公佈了一批檔案和史料，發表了許多研究成果和爭鳴文章。這不僅有助於澄清一些事實，恢復歷史本來面目，而且還掀起了一陣學習黨史的熱潮，使人們得以大開眼界。正是在這時，迎來了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紀念。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出版了《遵義會議文獻》。為此，就不能不查找遵義會議一個重要人物張聞天的有關言

論。出自張聞天手筆的有關遵義會議的言論，大概只有他長征途中的日記、1944年寫的“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國革命紀事”[47]和1943年的《反省筆記》。由於前兩種材料在1947年延安撤退時已經燒掉，[48]剩下可用的就只有這部《反省筆記》了。這件事也就交由1979年底中央批准成立的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我也名列其中）去處理。當時有的領導同志，如胡喬木、鄧力群，曾提議趁此機會將《反省筆記》全文發表。但編輯組多數同志不同意這麼做，原因是上層整風中的檔案和其他領導人的檢討都未公佈，單公佈張的手稿顯然不妥，於是就只摘用了與遵義會議有關的一小部分。這就是後來載入《遵義會議文獻》中的《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一節。（現在看來，發表這點摘錄也是不妥當和不公平的，只是滿足了《遵義會議文獻》編輯的明顯傾向，卻弄混了一些重要史實。）書中注明，“這是張聞天同志延安整風筆記的摘錄，標題為編者所加。”文後還指出，“據中央檔案館所存手稿。”此後，這份筆記人們在引用時就一律改稱《延安整風筆記》，有些人為明確起見還寫成《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其實對筆記名稱的這種改變，看來不一定合適。因為第一，既然據手稿，就應保持原貌，按理，後人是無權改變的。而且延安整風時期要寫的筆記很多，“四三決定”[49]就明確規定對《整風文獻》，“各同志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用改後的標題反而容易混淆。第二，寫“反省筆記”係毛澤東的統一規定。他原先的提法和中宣部一致，說“學習整風文件一定要寫筆記，不寫筆記經驗就總結不起來。”[50]而且這種寫筆記是鐵的紀律，“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還硬”。[51]但在1943年6月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又具體提出，“在黨風學習中，自我批評應更發展，應發動各人寫一次反省筆記。”[52]當然，這也是鐵的紀律。可見，張聞天同年12月所寫，是執行毛澤東當年的這一規定，已不是頭一年要寫的學文件的筆記。而且事後不久的1944年3月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使用其中的材料時也稱“反省筆記”，沒說是“整風筆記”。[53]因此，這個標題是不可也不應隨便改動的。根據這些，我在提到和引用《反省筆記》時都一律使用原名。這是需要附帶說明的。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以及整風中的其他檢討，包括在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除了總的精神是虛心檢查和認真反省外，還

有兩個特點。一是過頭檢討和無限上綱。二是大力頌揚毛澤東，有些地方已屬明顯的個人崇拜。但這在當時已並非個別的，而是普遍的現象。因此在討論張聞天的反省和檢討前，需要先談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他個人的處境。

1941年六七月，張聞天雖然感到委屈但還是接受了毛澤東不夠實事求是也不是與人為善的過火批評。同年政治局九月會議上，他又第一個站出來擁護毛澤東對蘇維埃後期“左”傾路線的估計和批判，進行了深刻的檢討和承擔了主要領導之一的責任，並在實際行動中注意改正，要求和獲准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毛澤東和中央領導層對他的表現曾表示滿意。[54] 從事後情況可以看出，他自己也感到輕鬆，以為放下了包袱，或許可算已經過了檢討的關，所以很愉快地率領農村調查團去了晉西北。一開始也確實進展順利，但很快就出了麻煩，碰了釘子。雖然他並未因此灰心，但這大概會對他瞭解自己的處境，以及後來的檢討，包括寫《反省筆記》，都有重要的影響，所以值得作一簡要介紹。

張聞天去晉西北，受到晉綏區黨委代理書記林楓和當地幹部的熱烈歡迎。他在《反省筆記》中檢討說，這次去既未擔負任何責任，也打算調查幾個村子就回來。但區黨委同志說，“他們也想派一些負責同志到下面去調查”，要張“幫助他們指導”，張“不好推卻，就答應了”。等“大批材料收集起來後”，他們要張負責總結。張就和大家“座談了許多次”，並對“土地問題和村政權工作提了些意見”，還在林楓去延安未回來前的“一次在區黨委召集的會議上作了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 當時晉綏地區一起參加工作的人“對這次調查都很滿意，很興奮”。“但林楓同志一回來，他沒有看過我們一個村的材料、同我們談過一次話，就表示這一套東西完全要不得，說調查也可以是主觀主義的。”張聞天發現“事情不妙”，立即準備結束調查。最後他為滿足當地參加調查工作的同志們的要求，提議把大家召集起來作一次總結，但也被林楓拒絕，“並把這些同志都遣散了”。張聞天一行只好離開晉西北回到陝北的米脂。對這次事件，他說，“我現在反省我在晉西北工作的缺點，是我在幫助總結調查材料時，很老實的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批評了我所看到的各種三風不正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晉西北是很嚴重的)，沒有很好的估計到區黨委及其領導同志的威信。”[55] 其實，事情並非完全如此，主要還是林楓在延安摸清了

張聞天是整風重要對象這一氣候。所以當時參加調查團的曾彥修等同志最近還說，他們實際上是被當做不受歡迎的人而被趕走的，臨走時當地竟無一人送行。人們可以看到，一位中央領導同志(當時張聞天還是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而林楓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只是以前的北方局秘書長兼劉少奇的秘書），到一個地區去作點農村調查，竟遭到如此對待，可見張聞天當時的處境和在一些領導同志心目中的地位。這是他自己開始時沒有完全料到的，無疑對他後來的檢討會有一定作用。

1943年3月，張聞天奉命回到延安。這時延安的氣氛已和他離開時有很大不同。整風已不再是和氣細雨，而變成暴風驟雨。特別是各機關已經掀起搶救運動，出現了一種極為緊張和人人自危的恐怖狀態。七大代表集中的和作為肅反重點的中央黨校，很快就成了薄一波說的重災區。[56] 中央機關自不例外，不但許多幹部，包括一些中央領導人的妻子、秘書和醫生也被打成“特務”。而且還有一些高級幹部遭到“搶救”和懷疑，如柯慶施遭“搶救”，葉劍英等從白區回來的人受懷疑。[57] 由於國民黨統治區十多個省的地下黨被打成“紅旗黨”，周恩來的處境也一時變得相當困難。張聞天雖然對“搶救”運動有意見，但不能不受到這種緊張、恐怖氣氛的影響，連意見都沒處提，也不敢在會上提。而且這時中央領導層的整風也更加緊鑼密鼓。毛澤東早就下定最大決心，說：“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觀主義也要搞，作戰也要搞。總之，一定要搞，搞得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爛也要搞。”[58] 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同時在打退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後延安也取得了比較平靜的環境，上層整風的勁頭也隨之更大了。毛澤東在7月13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機會主義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有走向敵人的危險。[59] 8月8日他在黨校二部開學典禮大會的講話中更公開點出“王明、博古、洛甫教條宗派”。[60] 政治局整風的九月會議開始後，康生提出王明和四中全會的問題，毛澤東就大講兩個宗派，並號召對王明、博古、洛甫“這些同志要‘將軍’，要全黨揭露”。對這次講話，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也認為，“另外還有一些過激之詞，有些批評也很不恰當。但當時不可能表示異議”。這個講話定下了基調，“犯錯誤的同志都按照這個思路進行檢討，其他同志也按照這個思路展開批評”。[61] 10月4日毛在西北局高

幹會上的報告中進一步威脅說，“我們要對付黨可能發生破裂的準備”。[62] 他還“要求犯錯誤的同志寧可把問題看得嚴重些，不要光是解釋，這樣才能認識錯誤，前途才光明。”[63] 所有這些，就使批判、鬥爭的烈火越燒越旺，以至多數人認為王明、博古等已屬黨外問題，周恩來等經驗宗派的人更危險更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批判還是檢查，上綱上線就越來越高，而犯錯誤的人多次檢討還是過不了關。

除了這些客觀環境的巨大壓力外，張聞天的自身處境也很尷尬。在晉西北碰釘子後，回到延安已無多少事可做。他雖然還是政治局委員，但已不起相應的作用，實際地位遠在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之下，更不用說並非中央委員的彭真、高崗等人了。這時的總學委（九月會議後主任毛澤東，副主任劉少奇、康生，秘書喬木）已在相當程度上代替了政治局（有點類似“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組”）。在大家忙於“搶救”時，張聞天還有時間可以搞點工廠調查，從九月起就停止一切實際工作，集中進行整風學習和自我檢查了。所以他當時給自己提的要求是，“甘於寂寞”（說這是毛澤東給他的指示），不怕“門前冷落車馬稀”，“不怕孤立，不怕丟面子”；更重要的還是“徹底反省自己、揭發（坦白）自己過去的錯誤。”[64]

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其他檢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的，其上綱上線、過頭過火、不夠實事求是，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在所難免。這主要表現在：只有大帽子，沒有具體內容，或者帽子和敘述的內容相矛盾，還有些明明是正確的東西也當錯誤來檢討，弄得是非不分，等等。這類過頭之處很多，這裏只擇其要者按個人現在的認識舉例作點說明。

（二）《反省筆記》中過頭檢討舉例

1，關於去蘇聯留學。

對此恐怕應該有一個客觀和正確的估計。這不只是張聞天和一批被認為是教條主義者的問題，而且涉及更多的人，是一個帶有相當普遍性的問題。因為中國黨是在共產國際（實為蘇共）幫助下建立起來並長期接受其領導的。中國黨的許多人都去蘇聯或長或短地留過學，包括除毛澤東外的多數中央領導人，如劉少奇、任弼時等其他留蘇同志。回國後也有不少人成了領導幹部和高級將領。可是張聞天在檢討

中卻把留學蘇聯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成了一種罪惡，什麼“去莫斯科，從此開始了我的不幸的新的生活”；幾年留學，只是“在思想上學得教條主義”，“養成了宗派主義”，“發展了個人主義”，等等。[65] 而且不光張個人這樣檢討，延安整風時普遍把留蘇當作一件不好或不光彩的事。我那時遇到的一些人，提到留蘇就先檢討，好像見不得人的樣子。直到1958年錯誤地批判劉伯承的所謂教條主義時，此風猶存。其實無論是張的檢討還是當時的普遍看法，都是不合乎歷史事實因而也是不正確的，起碼顯得過分。因為除了少數叛徒和壞人外，多數留蘇同志都在那裏學到了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確立和堅定了革命的人生觀，用到了中國的革命實際。即以張聞天而論，他回國後不久就能夠為我們黨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取得勝利奠定基礎，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能夠提出一套基本上正確的意見，並以此觀察和指導革命行動（如主持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先後提出蘇區和解放後東北的經濟構成等），[66] 不能說不是得益於在蘇聯的學習。至於“在黨內以理論家聞名”和“成為我黨在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主要領導人之一”，[67] 原因就更不言自明了。

2，關於宗派。

我在另一篇筆記[68] 中將詳細論證，整風中的所謂“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這裏先不詳說。而張聞天在《反省筆記》及其它整風檢討中，不斷地承認和檢討自己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和“王明教條宗派”的重要成員，但卻沒有講出任何事實足以證明它們的存在，也沒有講他是怎樣參加和進行宗派活動的，如同1959年他檢討參加了以彭德懷為首的“軍事俱樂部”一樣。例如“二十八個半”是怎樣產生和活動的，都有些什麼人，自己是怎樣參加的，根本就說不清，完全是一筆糊塗帳。他在《反省筆記》中講的一些情況，還是延安整風中聽楊尚昆說的。現在各方面的材料和許多當事人（包括楊尚昆）都已證明，“二十八個半”是一些人一時的譏諷話，實際上並沒有這個宗派，所以張聞天也就談不上是它的重要成員了。至於“教條宗派”，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講的也是自相矛盾。他只管上綱上線，戴大帽子，但內容卻是空的。如說他同王明、博古、王稼祥不接近，還有矛盾。還一再說，進中山大學學習，“黨內生活很嚴肅緊張，沒有什麼宗派鬥爭”；他只“埋頭於教條的學

習”，“並無任何宗派活動”等。至於怎樣成為宗派的，他說，由於“擁護米夫的教育方針，……（就）實際上做了米夫、王明宗派中的人物”，“雖則我們（他和沈澤民）還是不自覺的”。[69] 至於回國後不存在宗派和宗派活動，下篇筆記將有詳細論述，這裏只舉兩個他稱進行宗派活動或表現的例子，就可見一斑。一是說“我曾經想在馬列學院創造一種新的學風、新的黨風、新的文風，結果卻發展了教條主義、自由主義與黨八股，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歡迎，…… 以致造成了馬列學院畢業出去的同學，對馬列學院都有一種留戀、一種好感、一種懷念。以不正的學風、黨風、文風培養幹部、團結幹部——在實際上，這應該說是我在馬列學院的宗派主義的表現。”二是說，他在主管宣傳教育工作中對毛澤東的著作和指示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沒有“無條件地為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服務”，“還鬧點獨立性”，“這也是我在宣傳教育部門的宗派主義。”[70] 可見，張聞天檢討的宗派主義，也從側面證明，實際上並不存在什麼“教條宗派”。

3，關於學校教育和幹部學習。

過去由於戰爭環境，沒有多少時間學習。幹部又多是工農出身，缺少文化，而馬列主義書籍更是奇缺。不少中下級幹部甚至不知馬恩為何等樣人，更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很多人把共產主義看作只是打土豪分田地。同時抗戰後參加革命的大批知識青年，多出於抗日熱情和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滿，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並無多少瞭解和認識。對所有這些人，進行一定的基礎教育，佔時不多，作用很大。延安整風前就曾以此辦法先後訓練了幾萬人。主管這一工作的張聞天應該說是立了大功的，所以鄧小平說他“成績卓著”。缺點自然有，但任何工作也都難免。即以毛澤東要根本改造的六中全會後的幹部學習和學校教育而言，其實也是基本上正確的。協助張聞天主管此事的李維漢，經過四五十年的思考後也認為，“1939—40年第一階段參加在職幹部學習的4068人，教條主義也影響輕微”。還說，“延安幹部學校和在職幹部教育，為抗日、解放戰爭，也為後來的建設培養了大批幹部。”[71] 就是當時的學校教育，如我所在的抗大（後改為軍事學院），學期只有幾個月至多不到一年，而且大家的主要情緒並不是熱中於在校學習，而是要求“畢業上前線”。留校人員多不安心，致使毛澤東要親自動員，甚至對留下工作的人員說過，大家要安心工作，

“死了埋在清涼山”。但是到整風時，無論學校教育還是在職幹部學習都被說成是完全錯誤了，根本要不得，學的都是教條，在實際中不能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據我所知，延安大概沒有這樣的“教授”），“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按，列寧是十五歲就讀《資本論》等馬恩著作的。所以這句話後來在編入《毛選》時刪掉了）。[72] 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自然成了眾矢之的，他也一直檢討了四五年，其實大多是無限上綱、不夠實事求是的。例如說，“六中全會決定加強全黨理論學習，……然而由於我的教條主義根源沒有鏟除，所以一開始學習就轉到教條主義方面去了。”被毛澤東多次表揚的學習運動，竟被他完全否定了！還說，“有時毛澤東同志對於宣傳工作的批評還引起我的反感。這種反感，實是假馬列對真馬列的抵抗！”[73] 這種過頭檢討，誰也會一眼看出。

4，關於知識分子政策。

這更是一個值得澄清和檢討的大問題。西安事變特別是抗日戰爭以後，大批知識分子不滿國民黨的對外不抵抗（後為消極抗戰）和對內的專制統治，紛紛奔赴延安，經過幾個月的學習，學到了一點革命理論，初步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然後分配去抗日前線或到後方機關工作，再經過實踐中繼續學習和鍛煉後，多成為抗戰特別是解放戰爭和建國後各條戰線上的骨幹，以整個一代“三八式”著稱。但是正是這些人成了整風中的主要鋒芒所指，[74]要他們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使其帶上小資產階級的“原罪感”，成為革命隊伍中的馴服工具。所以普遍整風一開始，就以原馬列學院改組的中央研究院為試點單位。而且一下就整出了個王實味和以他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後來更“清查”出了大批“特務”。張聞天既主管宣傳教育工作，又是馬列學院的院長，自然在劫難逃了。

其實，在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上，我們黨過去長時期裏都是存在偏差的，即對知識分子不夠重視甚至懷有偏見。十年內戰時期不用說，就是到了抗戰後，黨的政策對知識分子還是不大信任，無論是建國前還是建國後，“三八式”一代只起了中下層的骨幹作用，上層領導還是用經過長征的工農老幹部。奇怪的是，毛澤東和一些中央領導，雖然本人也係知識分子出身，但卻不大信任知識分子，認為他們屬於小資產階級，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和影響，因而容易動搖，靠不住。而

且越往後越不信任。所以胡喬木說，反右派後，“毛主席對知識分子有很大的敵對心理”。[75] 其實這種態度和心理在延安整風時就已顯露出來，只是那時稱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像建國後那樣去掉“小”字歸入資產階級範疇。相形之下，張聞天倒是尊重和信任知識分子的。所以在他當總書記和管宣傳教育時期，例如1938年前後，知識青年真把延安當作理想的聖地，到處歡聲笑語、歌聲不斷，人們享受着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工作、學習、生活在團結緊張和生動活潑的氣氛中。到1941年後，這一切即逐漸褪色，批判和檢討日益佔居主導地位，很快又開始整風和搶救，知識分子也更倒霉了。所以張聞天就為一般青年知識分子所稱道和眷戀，他自然也成了整風中主要批判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也檢討說，他的錯誤在於“過分估計外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用，強調了他們光明的革命的一面，忽視了他們的陰暗面如個人主義、平均主義、散漫性、無紀律性等”。這些倒還沒有什麼，可是後面就越提越高了。說“沒有估計到他們在國民黨十年統治下所受的反動教育與反動訓練，而提出徹底改造他們的思想與對他們提高警惕性的必要”。說他對“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就發展起來了。1938年8月我寫的《論待人接物問題》即為這種態度的思想表現”。對這篇文章，康生之流的批評是錯誤的，他的檢討當然也不妥。[76] 至於分析現代知識分子因受國民黨十年反動教育，所以不如“五四”時代的老一輩知識分子，恐怕也是站不住的。總之，張聞天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和政策本來還是比較正確的，整風時對這個問題的檢討卻顯然錯誤了。

5，關於馬列學院的方針問題

1942年5月14日，毛澤東致電作農村調查的張聞天，內稱：“關於過去馬列學院方針是否錯誤的問題，中央研究院已有人提出，凱豐、弼時意見待你回來時討論，我覺不必等你，即指出是錯了，你的意見如何，或者仍然等你回來，或者你來一電提出意見。盼覆。”毛的否定意思是清楚的。張即於5月20日覆電：“澤東同志：（一）來電悉。關於馬列學院過去方針請中央根據實際材料作出結論，不必等我回來。（二）根據我最近一個時期的考慮，我認為應該公開說，他是錯誤的，其錯誤即在理論與實際的脫節，即你所說的矢與的的脫離。這種脫離在馬列學院中即表現為教條主義”。[77] 後來，張聞天在

《反省筆記》中還作了長篇大論的檢討，例如說，“我在馬列學院內，特別提倡發揚黨內民主，培養敢作敢為、敢獨立思想的幹部，而結果卻是放鬆了對各種各樣錯誤思想的鬥爭，以致如王實味一類的反動思想在整風開始後得以取得絕大多數人的同情。”“比較長期培養出來的新知識分子，大多數均為教條主義者，而不是理論人才。”[78] 歷史證明，同毛澤東和張聞天的說法相反，馬列學院在三年的短時間內，招生五期，培養了八九百人，“在後來的各條戰線上都起了應有的骨幹作用”。 1988年5月，馬列學院許多學生如李先念、宋平、鄧力群、馬洪、劉曉、段蘇權等幾十人寫了大量紀念和回憶文章，都用歷史事實否定了毛澤東的估計和張聞天的檢討。例如李先念說，它(指馬列學院)“對提高黨的理論水平做了很大貢獻；它培養了一批具有馬列主義基礎知識的幹部……。”宋平說，“馬列學院的教育方針，就是注重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的訓練，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能說青年學生學習理論就一定是教條主義”。鄧力群說，“院長張聞天對毛澤東著作很重視”，“每有報告都派人去聽，每篇文章都組織認真學習”，“學校的政治方向同毛澤東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的對立和抵抗”。段蘇權說，“我一生當中，真正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是在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其他文章寫得更生動具體，是真正的有口皆碑。[79] 這些由親身經歷和通過四五十年實踐的檢驗得出的感想和結論，不是證明了毛澤東的估計和張聞天的檢討都是錯誤的嗎？

（三）關於張聞天的七大發言和參與製造個人崇拜問題

1，七大發言的過頭檢討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通篇是對自己的責備和對領袖的頌揚，過頭之處甚多，整個精神狀態很不健康，現在讀起來都因其不真實而使人感到有點壓抑。例如他說，“我從未想到中國革命有什麼‘殘酷性、複雜性與長期性’。”這當然是對自己缺點的過分誇張。人們知道，還在三十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張聞天就已站在正確的方面，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複雜性和不平衡性。進入蘇區後寫的一些文章中，還一再強調“長期戰爭的持久性”，如說“這種國內戰爭是整個時期的長期的死戰”[80]；“必須明白中國國內戰爭不是一

個短時期的戰爭，而是長期的持久戰爭”，“要進行長期國內戰爭的持久戰”，[81] 等等。至於張聞天較早論證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說一個在白區出生入死、到蘇區艱苦奮鬥、又參加過長征的人，竟沒想到中國革命的“殘酷性”，恐怕在平時也是沒人肯信的。發言中談到“我和一些‘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的同志發生宗派的結合”，我在另篇筆記中將論證這是無中生有，張聞天本人也說不清楚，只不過是亂戴帽子而已。

張聞天延安整風中的《反省筆記》和其他檢討，無限上綱和不實之處實在太多，無法一一提出分辨。而且這也是各次運動中比較普遍的現象，人們盡知，沒什麼奇怪。如果說奇怪的話，就是有些人卻將其中顯然不真實的敘述當史實加以引證。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通篇不提自己對革命作過什麼貢獻，似乎參加革命後沒有做過什麼好事，甚至有些標題都是《我在這個時期所做的罪惡》，還把有的黨內問題寫成黨外問題等。所有這些，難道可能是真實的嗎？

2，參與製造個人崇拜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不僅個人反省不夠實事求是，而且對毛澤東（個別地方還有劉少奇）的頌揚也有不少太過頭之處，實際上參與了個人崇拜的製造。例如在被以《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為題公佈的幾段《反省筆記》中說，“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82] 關於遵義會議上為什麼沒有提政治路線問題，我們上面已有專門筆記論證，而且《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也多處提及。一言以蔽之，就是連毛澤東在內當時都沒有認識到。直到在六屆六中全會作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毛還特意強調，“要指出：當時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83] 如果早已認識到了，這時是完全可以不“指出”的。既然大家都沒有認識到，張聞天根據什麼這樣稱頌毛澤東呢？什麼“原則上的讓步”，什麼“黨內鬥爭一個示範”！這當然不是他的發明，而是按照毛澤東一個月前才定下的基調，即：“遵義會議為什麼不能提出路線問題，就是要分化他們這個宗派。這是我打祝家莊實行內部分化的一幕。”[84] 毛的這一說法，連胡喬木也是不信的，只是他提出不

要深究就是了。張聞天是否真的相信，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接受過去經驗教訓，“順着來”而已。又如他說，“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85] 但卻沒有列舉毛成為領導的事實，也沒有敘述到“建立”的過程。其實這正是黨史上一樁最大的疑案，是經不起辯論的。我寫的黨史筆記第一篇，就是論證遵義會議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央集體領導。[86] 他明知遵義會議只決定毛澤東參與中央領導，做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助手，而接替博古總書記職務的是他自己，也是“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87] 但是他在整風運動擁護毛澤東的熱潮中還是那樣說了。本來他就有一個終其一生的特點，即從來不談個人過去的功績、貢獻、以至擔任過的職務，何況這是在整風運動中。因此把功勞讓給毛澤東，自己承擔各種過錯，就更是自然而然的了。但他在講遵義會議確立的領導問題時終究還是設了幾個限詞，如“實際上”、“開始了……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等。如果按兩個《歷史決議》的寫法和一些黨史教科書說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那還談什麼“實際上”，“開始了....建立”，甚至提以毛為“領導中心的中央”都顯得多餘。例如六屆七中全會特別是黨的七大以後，提到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肯定就不能再用這些限制詞了。這也說明，對這個問題以前的有關論斷還是有問題的。除此以外，張聞天的各種檢討中對毛澤東的恭維奉承之詞也實在不少，為節省篇幅，只簡單舉幾個例子。如說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是服從組織紀律的最好模範。其實，整風期間，違背集體領導、違反黨章黨規，特別是在“儘早召開七大”的問題上不執行中央自己的十多次決定（包括六中全會）和共產國際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其他重大事件就特別多。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為黨內第二把手的劉少奇提出書記處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就是直接違反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而一貫堅持集體領導和強調發揚民主的張聞天，已深受這種不按黨章黨規辦事之累，怎麼還能說出這種話來呢？又如在七大發言中說，毛澤東是謙虛和戒驕的模範，所以“無愧為人民的領袖。領袖而驕傲就不成其為領袖了。在共產黨內一切因一時成功而驕傲的‘領袖’，是已經都被歷史淘汰了的。”[88] 這恐怕也不是真心話了。因為張聞天從長征以來受毛澤東驕橫作風之氣不知有多

少，以至於想離開中央去外面工作。而且連毛澤東自己年青時就承認“略有傲氣”，後來又很少作自我批評，怎麼稱得上謙虛的模範？如果是為了表達自己的願望，那也是事與願違，事實是全國勝利後毛澤東更驕傲了，也更“成其為領袖”。

張聞天還講過不少太過分的奉承話，如談到“群眾觀點”和“群眾關係”時說，“這方面的模範，也是毛澤東同志。……他的痛苦、歡喜與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歡喜與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89] 張聞天講的奉承話中有些是直到七屆二中全會時連毛還不好意思贊成，如把馬恩列斯毛並列。[90] 而在這之前，就已由於以他的歷史地位和理論水平，特別是對“左”傾錯誤的檢討特別深刻，對毛澤東一再進行全面贊揚和高度推崇，所以被指定參加修改《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他“基本上是在重新構想”，他的“修改稿對後來的歷史決議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基礎”，“他加寫了一段評論毛澤東同志的有份量的話”和“一段重要的結語”。毛澤東的七次修改就是在“張稿”的基礎上進行的。[91] 而胡喬木事後卻批評說，這個《決議》的第一個“缺陷”就是“對毛主席過分突出”。[92] 一生都反對突出個人的張聞天，延安整風時卻參加了“過分突出”毛澤東也就是製造個人崇拜的活動，這是什麼原因？

3，張聞天作過頭檢討和參與個人崇拜的原因

張聞天在整風中作上綱上線的過頭檢討和對毛澤東作不夠實事求是的歌頌，看來是出於這樣幾個原因。

第一，是思想認識問題。這又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確實由於認識到毛澤東在總的路線上正確，因而從內心表示崇敬。所以他的檢討和歌頌在相當程度上是真誠的，而不是故意搞兩面派。因為從1938年六中全會後，他就真心尊毛為領袖，常有自發的流露。1941年初寫《自傳》時即已承認遵義會議後就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央工作。1942年在農村調查組紀念“七一”的座談會上，他“那天晚上講話的全部內容是歌頌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無可比擬的偉大作用”。他的講話“完全出自心聲”。[93] 人們知道，中央領導層群起歌頌毛澤東是1943年“七一”前後，而張聞天早一年就自覺地發自內心地歌頌了。因為正像他後來說的，他對毛澤東整風後已開始信服。[94]

另一方面，思想認識上可能是由於受斯大林搞個人崇拜的影響（《聯共黨史》就是標本），認為維護領袖的威信和黨的團結（每次重大的黨內鬥爭，毛澤東都以有分裂危險相警告），給自己的檢討上綱上線，是為了革命的需要，是“顧全大局”。如同許多人1959年承認“右傾機會主義”，“文革”中承認“反革命修正主義”，甚至“黑幫”、“三反分子”等，就都有這一因素，而不完全是軟弱的表現。其中不少是久經沙場、視死如歸的人物。張聞天也應算其中的一個。

第二，是強大的壓力。這點，前面已講過了。1943年下半年延安的情況，上層是緊張的清算路線和歷史，以至有些領導同志很快就變得消瘦憔悴(張聞天、劉英就多次談到，楊尚昆眼看着幾個月就變了個樣）；中下層普遍進行肅反和搶救，許多知識分子被搶救成“特務”。這樣上下交相影響，就使延安出現一種肅殺和恐怖氣氛。試想，人們連一時強加的“特務”都可以承認，還在乎戴其他帽子？因為他們大多相信黨最終總是會把問題弄清的。同時也有如張聞天在廬山會議的發言中所說，“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95] 也許只有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對當時那種強大壓力感覺不到或感受不深。

第三，大概就是個人考慮了，上綱上線是為了過關。每次政治運動中被整的人都有個過關問題，往往是因為所謂檢討不深刻和揭發交代不徹底而過不了關，很少聽說有因檢查交代過頭而受批挨整的。所以為了過關，不使矛盾轉化，能保住黨籍，不如自己主動上綱上線，還可能落一個好印象。這裏恐怕不能說沒有一點私心雜念。但不管怎麼說，張聞天在整風中這樣做的結果是，“高級幹部對於他的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整風以來對過去的歷史錯誤認識深刻”。[96] 後來在七大選舉中他順利當選中央委員，還被留在政治局內。一切正式文件提到“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教條宗派”時只剩下王明、博古，而沒了他的名字。這當然與他的錯誤較輕有關。但也可以設想，如果他堅持實事求是，不承認有個“教條宗派”，不承認四中全會是“篡黨奪權”，不承認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反而談起自己在遵義會議、西安事變、瓦窑堡會議等“過關斬將”中的作用，甚至再對毛澤東實事求是地提點批評意見(如在江西無中生有地打“AB團”、西安事變後通電提出審蔣以及在黨內使用權術等），

那結果可就會根本不同了。

（四）如何看待過頭檢討

過頭檢討不能當作真實史料。

照此看來，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及整風中的其他檢討有些亂戴帽子和不夠實事求是，應該說是肯定無疑的。但是，“一切決定於時間、地點、條件”。在當時的條件下，無論是張聞天自己還是上層領導，都認為他的檢討是真誠的和實事求是的。而且不僅是他，當時上綱上線、亂戴帽子應當說是普遍現象。因此，張聞天的《反省筆記》除了一些空帽子和夾敘夾議中的過分自責等以外，對個人履歷和一些歷史事件的敘述還是基本真實的。正如胡喬木所說，“那時聞天同志才四十出頭，距所記事件的時間也不遠，所以記憶清楚，寫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價值。”[97] 雖然他指的不是《反省筆記》，但《反省筆記》同樣“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可以看出張聞天有驚人的記憶力，連十幾年來有關的中外人名都如數家珍，更不用說重大事件了。所以在運動高潮期間，參加高層整風的多數人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不合法，這時張聞天寫出了他的《反省筆記》，一下就解決了問題，毛澤東也據此作出了最後結論，[98] 成了六屆七中全會的一項正式決定，使黨史上這個重大問題得到澄清。[99]

但是，檢討、反省終究是檢討、反省，在延安整風以來的一切政治運動中，任何人能獲得通過的檢討、反省都不可能是完全實事求是的，即使不過分上綱上線，起碼也只能講缺點和錯誤，而不談功績與貢獻，所以對一個人來說仍然不夠全面。對於被當作批判或鬥爭重點的人就更是如此。如果把他們的檢討、反省不加分析地用作重要史料和立論根據，那只能使有關歷史面目全非。例如用張聞天、彭德懷廬山會議上及其後的檢討來為那段歷史定性，那就只能是製造冤假錯案。延安整風當然不可同廬山會議相提並論，但用當時的批判重點如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人的檢討來為黨史立論，為某些事件定性和判明是非，這樣的歷史也一定不會真實。因為每次政治運動的規律和規矩，就是先對某個問題定個基調，然後被批判者就按這個思路進行檢討。廬山會議出現了一個“向黨猖狂進攻”的“軍事俱樂部”，於是“文化人”張聞天就檢討他是怎樣“陷入軍事俱樂部”的，黃克誠

也檢討他是怎樣成為周小舟、李鋭參加“軍事俱樂部”的“橋樑”。延安整風時定的基調是有個“篡黨奪權”的“教條宗派”(是為“頭”)和“經驗宗派”(是為“腳”)，1938年這個合二而一的宗派又在武漢進行活動，於是周恩來等就依此基調檢討。不同的是，“軍事俱樂部”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中被徹底否定了，而“教條宗派”則依舊保留在黨史中，只是“經驗宗派”因涉及面廣，特別是牽連到周恩來等一批重要領導人，因而被含糊了起來(黨史界無人敢説無，也沒人敢説指哪些人)。由於延安整風運動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不斷地上綱上線，於是就製造了一堆“史從論出”。前幾篇黨史筆記中所談到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遵義會議不提政治路線問題是毛澤東的黨內鬥爭策略、《遵義會議決議》是根據毛澤東會上發言起草的、毛澤東傳達瓦窑堡會議的報告是從內戰到抗日戰略轉變的標誌、張聞天支持毛澤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等等，就是這樣在延安整風期間一下從“論”中“出”來的。在這之前，上述這些在一切黨史檔案以至個人論述（包括回憶錄）中，似乎還都沒有提到過。由於中共黨史學是在延安整風中創建的，此後又一直只准有一個官方學派，這些從“論”中出的“史”也就越來越變成歷史的真實和如山的鐵案，不容許有不同的意見了。而張聞天的一些亂戴帽子、過頭檢討和過分頌揚也就被派上了用場。其實，這也是一種變相的冤假錯案。

總之，張聞天的《反省筆記》，既有珍貴史料，又受當年歷史條件特別是所定基調的支配，在一些重大原則問題上提法顯然有誤，因此必須仔細分析。不是用他的這些論斷去印證史實，而是從分析史實印證論斷的準確性，起碼是互相印證。在不公佈重要檔案或只公佈有利於原定基調的檔案的情況下，這點尤其重要。擴大一點講，一般是不可把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判或鬥爭的人所寫的檢討和交代材料定為可靠史料和文獻的。正因為如此，胡耀邦曾作出過兩項深得人心的有關措施。一是在以前提的“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之外，再加一條“不裝袋子”(不把一些黑材料、假材料，包括本人被迫所作違心的交代和檢討，裝進幹部的檔案袋。因為過去有些幹部就常因檔案中有這類材料，如把延安搶救運動中定性錯誤、以至別人亂咬和自己被迫交代的假材料裝進檔案袋，於是每逢政治運動就被揪出來折騰一番，所以從前幹部對自己的檔案袋很重視)。二是“文革”

中有關幹部的揭發和交代的各種材料一律銷毀（特殊的例外）。

（五）附帶談一個如何看待《回憶錄》的問題

不但是運動中批判或鬥爭對象所寫材料，而且許多人的回憶錄也都只可作為研究歷史的參考資料，而不能看作正式歷史文獻。（現在許多黨史著作都是把這些當作權威史料引來引去。）因為正如董必武老人所說，“回憶那時的事，難於擺脱現在的思想意識，如果加上現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何況還有“各人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獲得印象的時間又有相當間隔”。[100] 列寧也從來不相信人們的回憶錄。事實上，延安整風以後所寫的各種回憶錄（尤以“文革”後為盛），就都是按延安整風時所定基調寫的，再後來就是一定要和兩個《歷史決議》完全保持一致。於是有些回憶錄所寫就遠離當時的真實情況，甚至不惜削足適履。這裏僅舉兩個例子。

一是《遵義會議文獻》選用的一篇回憶錄，給人的印象是，似乎在遵義會議的召開和要毛澤東出來領導軍隊的問題上作者本人起了重要作用，整個會議期間卻根本不見作“反報告”、受委托起草決議和被選為總書記的張聞天，而是毛澤東第一個發言批判當時尚無此名稱的所謂“王明路線”。這種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的“回憶”，能作為研究和佐證遵義會議的“文獻”嗎？

另一個例子是最近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因係後人編輯整理，有些地方就與楊本人生前的說法完全不同。我們只以《遵義會議回顧》這一節作一前後比較，就可看出差別之大。1997年3月22日，楊尚昆在和劉英的談話（在場的有程中原和張培森）中說，“遵義會議以後，不知你們注意沒有，有一段時間沒有總書記。這是什麼原因呢？這是因為聞天同志謙虛。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但聞天同志非常謙虛，再三推辭。毛澤東同志也說自己參加軍事指揮較好。於是這個問題就擱置起來。拖了二十來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決定，聞天同志這才挑起這副擔子。張聞天當總書記，是得到大家擁護的。”這篇談話由程中原整理，送請楊尚昆本人審閱修改後，以《楊尚昆晚年談黨史》為題刊登在1998年《百年潮》第6期上。但在楊1998年9月逝世後整三年的2001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卻編寫成：“會

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所以決議上寫了(引者按，至今尚未見到這樣的“決議”，後面帶引號的話只是陳雲憑記憶寫的可能是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原件標題為《(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後被改為《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01]‘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意思就是說領導班子的分工暫時還沒有定。以後……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時間大約在1935年2月5日。因為當時沒有設總書記，所以稱‘負總責’。”[102] 前後兩段，哪個為楊尚昆本人所談，不是很清楚的嗎？再加上書中所說，“它（指遵義會議）的最大功勞是在實際上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聞天同志是個書生，……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經過毛主席”。[103] 而在楊生前自己寫的文章中卻說過，“自從他(指張聞天)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以後，一改過去黨內那種家長制、一言堂的惡劣作風，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團結協調，互相配合，革命事業順利發展。”[104] “他決定由毛澤東同志負責軍事工作。”[105] 據此，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即以楊尚昆之名在他死後三年整理出的“回憶錄”，就是要使楊的意見同黨史學的正統說法保持一致，否則不會有這樣大的差異：生前的說法是，“在遵義會議上，形成比較一致的意見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擔任總書記。”後來的說法卻是，“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以及“當時沒有設總書記，所以稱‘負總責’，”等等。楊尚昆生前曾長期擔任中共中央黨史領導小組的組長，對黨史界的情況可說是相當清楚的。所以他在同劉英的那次談話中曾感慨地說，“現在還沒有一本好的黨史。不少歷史上的問題沒有講清楚。”對於曲解、輕視和因“受過去宣傳的影響”而不瞭解張聞天在遵義會議上所起作用的現象，他提出，“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106] 不料他辭世後剛過三年，由權威機關編寫的他的《回憶錄》，也需要“撥亂反正”了。

註釋

1 見梁漱溟：《再憶初訪延安》，載《梁漱溟自述》，灕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頁。

2 還可參閱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版，第123-124頁。
3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
4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
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6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3頁。
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4頁。
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1986年版，第439-440頁。
10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版)，第539頁。
11 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2 參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9-137頁。
13 《〈季米特洛夫日記〉中有關中國革命重大事件的記述》，載《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83頁。
14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頁。
1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頁。
16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本)， 543頁。
1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817頁。
18 宋金壽：《糾正反教條主義中不譯不讀馬列的偏向》，《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9 此信原登在1942年華中局一個內部刊物《真理》第2期上，六十年代初劉修改此文時刪去了這句話。
20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24頁。
21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57頁。
22 王明：《學習毛澤東》，1940年5月7日延安《新中華報》。
2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24 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1991年版，第103頁。
25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34頁。
26 茅盾：《論如何學習文學的民族形式》，轉引自《張聞天傳》，第527頁。
27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

125 頁。

28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頁。

29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8 年版。

30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中卷，第 332 頁。

3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74 頁。

32 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43 頁。

33 《中共中央文獻選集》(11)，第 654，746 頁。

34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 442 頁。

35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中卷，第 235 頁。

36 高新民 張樹軍著《延安整風實錄》，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2 頁。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191 頁。

38 見《毛澤東傳 1893—1949》(下)，第 661 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89 頁。

3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65 頁。

40 張聞天：1943 年《反省筆記》。

41 以上均可參閱《張聞天年譜》上卷，第658頁；下卷，第1090頁等。

4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199-202 頁。

4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 143 頁。

4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65，203 頁。

45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 466 頁。

4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332-333 頁。

47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載《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 頁。

48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這兩件珍貴史料是否真的燒掉值得懷疑。我曾聽說過此事的前後情況。在跟張聞天工作的十多年中，以及張聞天逝世後和劉英的二十多年接觸中，都多次談到這批材料。抗日戰爭勝利後，張聞天和劉英是搭乘美國軍用飛機離開延安的，因此不能帶什麼行李。他們就將生平保存下來的照片、多本日記和其他各種珍貴資料，也包括那本《中國革命紀事》，裝在一個小箱裏，交中央檔案室代為保存。他們走後兩三年延安才失守，但

這個小箱並未經機要交通送給他們。延安撤退前，幾乎所有檔案，包括一般幹部檔案(其中還有整風搶救時的假材料，我的檔案袋中就有)都已轉移，保存了下來。但張聞天的小資料箱卻不知去向。解放後，張聞天也曾一再查問。當時被告知，撤退時因攜帶不便，就將這個小箱以及別的東西分散掩埋，準備回來後掘出。但後來忘記具體掩埋地點，一時找不到，還在繼續尋找中。“文革”後，劉英本人和我們“張聞天選集編輯組”又多次追查這箱資料，主管人員斷然告知“已經燒掉”。這就再無尋找之餘地了。同樣令我感到遺憾和奇怪的，就是遵義會議的檔案也丟失得一乾二淨。

49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一九四一年四月三日)，《整風文獻》第一篇。

50 毛澤東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學習組關於整頓三風的報告，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編，黨建讀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頁。

51 《關於整頓三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16頁。

5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8頁。

53 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2頁。

54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頁。

55 引語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關於晉西北調查不受歡迎的情況，還可參閱《張聞天年譜》，第687-690頁；《張聞天傳》，第549-550頁。另聽到當時參加調查的曾彥修(也是《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成員)等幾位同志的多次談話。

56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364頁。

57 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頁；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468頁。

58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16頁。

5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60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702頁。

6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288頁。

62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71頁。按，毛在每次反對重要的黨內對

手的鬥爭中，往往會提出黨可能分裂、甚至準備上山打游擊的話，如反對高饒、廬山會議、“文革”中反對劉鄧和後來批林彪等。

63 毛澤東1943年10月13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5頁。

6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參閱《張聞天年譜》下卷，第696-704頁。

65 見張聞天的1943年《反省筆記》。

66 見前面幾篇《黨史筆記》敘述的事實和引證。

67 見上引楊尚昆語和鄧小平1979年在張聞天追悼會上的《悼詞》。

68 見《張聞天與所謂“教條宗派”》。

69 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0 均見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9-440，449頁。

72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風文獻》1949年版，第51-52頁。《列寧傳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頁。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7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4 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75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1頁。

76 參閱《胡喬木文集》第三卷，第384頁。

7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678頁。

7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9 李先念等人的引語，均見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

80 張聞天：《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1934年)，《張聞天文集》(一)，第522頁。

81 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張聞天文集》(一)，第533，534頁。

82 《遵義會議文獻》，第80頁。

8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54頁。

84 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整風會上的發言，見《胡喬木回憶毛澤

東》，第 294 頁。

85 《遵義會議文獻》第 79-80 頁。

86 見本書第一篇。

87 楊尚昆：《回憶和懷念》，載《追憶領袖戰友同志》，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6 頁。按這是楊尚昆親筆所寫。

88 《張聞天文集》(三)，第 254 頁。

89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見《張聞天文集》(三)，第 259 頁。

90 《張聞天文集》(三)，第 262 頁。

91 參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10-312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 565-568 頁。

9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67 頁。

93 馬洪等《回憶張聞天同志的一次重要講話》，《人民日報》1979 年 8 月 28 日。

94 1959 年 8 月 13 日在八中全會上的發言。

95 《張聞天文集》(四)，第 337 頁。

9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310 頁。

97 《胡喬木文集》第三卷，第 385 頁。

98 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 92 頁。

9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302 頁。

100 轉引自《關鍵會議親歷實錄》(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

101 《遵義會議文獻》收錄此件時未作說明。

102 見該書，第 120 頁。

103 見該書，第 121 頁。

104 《紀念張聞天同志》(1990 年 8 月 29 日)，原載 1990 年 8 月 30 日《人民日報》。

105 楊尚昆為劉英回憶錄所寫的《序》，見劉英：《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頁。

106 《百年潮》1998 年第 6 期。

(2002 年 1 月)

第五篇

張聞天與所謂教條宗派

一，如何理解反黨宗派

（一）從張聞天被批判三次參加反黨宗派説起

在紀念張聞天百年誕辰的時候，一些同志曾經談起，過去人們對張聞天的印象似乎只是一個老犯錯誤的人。這大概是因為，在黨史上他曾受批判並被定性為參加了三次反黨宗派集團，而且被串連在一起，幾乎貫穿了他入黨五十餘年的整個革命歷程。一是延安整風時定性的以王明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教條宗派的主要成員。二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説成“軍事俱樂部”的副帥或“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一員。三是廬山會議上追加的“高饒陰謀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和“漏網殘餘”。也是在這次會上還把三者連在了一起，説他“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是由於“老而又老的瘧疾病原蟲（指教條宗派）遠未去掉”又“舊病復發”；[1] 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又“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2] 對於這些定性和指責，張聞天本人每次受批判時都是承認了的，並按當時定的調子和要求作了交代和檢查。長期以來，輿論一律，就是嚴格按照這些批判內容和定性結論進行宣傳教育的。在給張聞天平反後，有關的撥亂反正又做得很不夠，不少問題都沒有説清楚。所以一些人還殘存有他老犯錯誤的印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1981年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3] 這就意味着一下子給張聞天減去了兩次反黨宗派活動。一是説明所謂“軍事俱樂部”純屬杜撰，實際上並不存在。無論是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還是張聞天在小組會上發言，以及同志之

間會下的接觸與交談，都是正常的，並不是什麼宗派活動，更不是反黨。而且在那場鬥爭中，錯誤的反倒是毛澤東和通過決議的中央全會，並不是彭德懷和張聞天的“舊病復發”。二是既然那個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那它所提“高饒反黨聯盟的繼續和發展”也自然站不住了，無論彭德懷還是張聞天，都不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和“漏網殘餘”，更沒有“在黨內組織派別”。[4] 不管怎樣解釋，強加給他們的這兩頂帽子總算是摘掉了。

但是對張聞天來說，卻還留有一頂“教條宗派”的帽子（至於彭德懷是否還有“經驗宗派”的帽子，在此不論）。而這又是延安整風時定的性，被看成“板上釘釘子”，有些黨史著作特別是一些所謂“民間研究成果”，至今還在不斷進行炒作、渲染、誇張以至編造，繼續着造神和造假運動（單是一個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就有不少人抄來抄去，“著書立說”。），加深着人們的印象。其實，這一定性和帽子，對張聞天以及其他某些人是否完全準確與合適，現在看來並不確切，還有進一步加以討論的必要。這不僅關係到對張聞天等人的歷史評價，而且有助於弄清黨史上不少問題。因為延安整風期間及此後的多次政治運動，無論是對人還是對事都有許多偏激的提法，黨史研究又將這些當作第一手資料並據以編寫黨史。因此，不只張聞天個人，某些時期的黨史也還存在着需要撥亂反正和去偽存真的問題。

但要談張聞天和教條宗派的問題，首先得弄清什麼是宗派。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完全不同，就無法進行討論，只能各說各的。所以孔子和荀子都提倡“正名”。

（二）對中共黨史中“宗派”概念的理解

關於宗派，看來大約有廣義和狹義的兩種理解。《辭源》、《辭海》等工具書上所說的宗派，被定義為“學術、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派別”，顯然是廣義的，可以用得很寬，但卻很難套到中共黨內鬥爭中所說的宗派上來。因此對廣義的宗派，這裏就不多引證和討論了。只是需要說明一點，就是在黨當權的情況下，黨內外也是很難分開的。例如延安整風運動，至今的黨史書上還說是全黨整風，其實當時根據地的非黨幹部也都一律參加了。建國後的一些反宗派（集團）鬥

爭，也是大多不分黨內外的。

說到反宗派，即使專談黨內鬥爭，也不能把宗派和宗派主義相混淆。兩者固然看似相通，但具體使用起來還是有區別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只提宗派主義而有意回避宗派。毛澤東還對不提宗派特別做了說明。[5] 可見兩者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不能混為一談的。如對“八七會議”後的盲動主義的提法就是，“同這種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同時，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但沒有說瞿秋白等人組成了什麼宗派。後來說到六屆三中全會，也說“組織上還繼續着宗派主義錯誤”，同樣沒有提到中央有什麼宗派，也沒提瞿秋白、周恩來等人的名字。談到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對宗派主義的批評更嚴厲，但卻並沒有提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只是在延安整風後期，毛澤東的講話和許多人的發言或檢討，曾多次提到兩大宗派。而且從此這兩大宗派就成了歷史定論，許多黨史著作講到四中全會後那段歷史時都要提到它們。胡喬木直到臨終前在關於回憶毛澤東的談話中還講“王明小組織”，講“四中全會是奪權”[6] 等。這都說明，《歷史決議》有意不提的宗派問題，但卻至今竟還一直是定論！

宗派和宗派主義顯然是不可完全混同的。根據延安整風中的體會，可以說，宗派主義一般指一種錯誤的思想傾向和政策，而宗派則着重指組織形態。一個人可以有宗派主義思想和政治傾向，執行宗派主義政策，但卻並不一定組織宗派或參加派別活動。宗派不能只是一個人，宗派必須是多數，成為小組織、小團體、集團或聯盟。整風初期階段，對於作為一種錯誤的思想作風和政治傾向的宗派主義，曾有過詳盡的解釋。毛澤東的說法是，“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他舉的例子也是個人主義、鬧獨立性等，較突出的則是山頭主義。[7] 這樣的宗派主義應當說是很普遍的，連同當時批判的主觀主義和黨八股，一直到建國後都是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可說是愈演愈烈，至今不衰。但是談及黨內鬥爭中的宗派，情況就大為不同，對宗派主義的解釋已經用不上了，重點不再是思想和政治傾向，而是組織形態和組織活動了。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瞭解我們這裏要討論的宗派呢？至今許多黨史

著作和人物傳記上的說法，仍然保持着整風末期提出的解釋，就是："所謂宗派，不是說有什麼秘密小組織，而是說以錯誤思想、綱領為基礎形成的同志間氣味相投的結合，對不相投即反對的關係。"[8] 由於思想、綱領，當時不容易判斷誰對誰錯，所以有些書稿還改為"事後被證明是錯誤的"。這種解釋，界定比較寬泛並且靈活，看來主要是為了對批判和追查兩大宗派表示擁護並給予"圓說"，也使大家在思想上比較容易接受，還可讓受批判和作檢討的同志便於對號入座，既維護了批判宗派的權威，又有助於避開或緩解當時在這個問題上的一些矛盾。但這種解釋實際上並不解決問題，當時還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後來在黨史科研上的照搬就顯得論據不足，甚至有些自相矛盾。因為一則，這種說法界定含糊，經不起仔細的科學推敲，理論上站不住；二則，它不符合中共黨史（以至國際共運）上的實際和正式文獻上的說明。例如早已定性的托陳取消派，羅章龍的分裂活動（《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明確指出前者"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後者"成立並堅持第二黨的組織"），以及後來張國燾的第二中央，就都不能說他們沒有組織。就是對教條宗派，胡喬木不是至今還叫"王明小組織"嗎？周恩來關於六大的報告中談到各地代表有很強的"山頭"傾向時，也立即補充一句："但必須說明，當時各地代表團中並沒有宗派小組織的活動。"[9] 這都說明，凡稱宗派，必得有組織，有組織活動，否則，談不上宗派。至於思想和綱領是錯誤的才能算宗派，就更難把握了。因為在黨內鬥爭的當時甚至事後，各派都會自認為正確，因而無法確定誰搞宗派。即使歷史證明錯誤，也不一定能稱為宗派。例如在一些政治運動中錯整了胡風、丁玲、馮雪峰等人的林默涵、周揚、夏衍一批人是不是一個宗派？建國後公安工作的領導人在潘漢年、胡風兩個小集團及其他一些鎮反工作中，參與製造過不少冤案又應如何定性？"反冒進"和大躍進中的一批積極分子和急先鋒能不能說是反黨宗派？歷史證明，廬山會議中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在政治上是正確的，那麼搞反右傾的人們不就成了一個龐大的宗派了？

而且這種解釋和延安整風第二階段的解釋也不盡相同。因為從1943年"九月會議"起，強調和追查的已不再是宗派主義作風和傾向，而是宗派主義的組織形態和派別活動了。毛澤東明確提出，"過

去反對宗派主義是抽象的，現在要把原則變成實際”，並“着重講了‘兩個宗派’問題”，說“黨從四中全會後，就有兩大宗派，一個是教條宗派，一個是經驗宗派”。還談到這些宗派“有計劃地”進行的派別活動，並指出了一些具體的人。特別強調要“整”教條宗派，說“王明、博古、洛甫，對這些同志要‘將軍’，要全黨揭露”。還說，“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還有五個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們反對的，其他是擁護王明、博古路線的”[10](按：其餘三人在當時大概只能是指周恩來、任弼時、關向應了。但劉少奇並不在六大選出的23個中央委員和13個候補委員之內，只是被選為審查委員）。[11] 而以王明為首的這個教條宗派，四中全會前，就“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12] 四中全會後，“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並且“控制了中央碼頭”，“欺騙了黨十多年，現在要揭破這個大欺騙”。[13] 這樣的“宗派”，哪裏像沒有組織，只有以思想、綱領為基礎的同志間氣味相投的結合？雖然毛澤東也說過，“這些宗派也可以說無組織系統（引者按，不是無組織），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線的綱領。”[14] 不過他強調的已經不再是宗派主義的思想觀點和政治傾向，而是它的組織形態和派別活動了。此後的整風實踐，追查、批判以至檢查交代，也就更多轉向“小組織”、“小集團”、“反黨集團”、“反黨聯盟”（如“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的聯盟）的組織和活動了。由此可見，上述那種用於整風中的解釋，實際上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對於毛澤東反對兩個宗派的講話，《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有個相當包容的評論，說：“毛主席關於‘兩個宗派’的發言，另外還有一些過激之詞，有些批評也很不恰當。但當時不可能表示異議。這個發言實際上為1943年9月政治局會議的整風定下了基調。這以後，犯錯誤的同志都按照這個思路進行檢討，其他同志也按照這個思路展開批評。這成了1943年‘九月會議’與1941年‘九月會議’相比較，不僅在整風內容，而且在整風方式上的又一顯著特點。”[15] 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第一，不只“當時”，而且此後長期以來一直到現在都“不可能表示異議”。第二，犯錯誤的人並不是“都按照這個思路檢討的”，例如王明就沒有；即使“按照這個思路檢討的”，程度上由於“深淺”相差甚遠，得到的結果也大不相同。這是後話。

該書還評論會議情況說，“在會上，一些同志對洛甫、恩來等同志的整風檢查提意見，有一些偏激之詞。……第二階段會議有黨內鬥爭過火的偏向。……過高的‘上綱’，給檢查者以較大的精神壓力，這對後來的黨內鬥爭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是一個應總結的教訓。”[16] 可惜的是，這個教訓不但一直沒有總結和汲取，後來還有了不斷的和更大的發展。建國後從中央到地方出現了不知有多少所謂的反黨以至反革命集團或聯盟，追根溯源，恐怕就與延安整風時對反黨宗派和集團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無限上綱和隨便套用有關。後來的每個宗派或集團都被說成“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有目的地向黨進攻”，而被批判者也大多都作了相應的檢查交代，問題也就落實定案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過撥亂反正和平反冤假錯案，這類反黨宗派集團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得到平反，所謂他們有計劃、有組織之類的說法也自然被當作不實之詞推倒了。過去總把常說的“黨外有黨，黨內有派”中的派看成宗派，而宗派又被看成陰謀反黨集團，結果就使反宗派鬥爭或者屬於無中生有，或者導致嚴重的擴大化。回想起來，如果延安整風時能把黨內鬥爭中的宗派集團說得清楚點，界定得明確具體些，也許會避免或減少任意劃定反黨集團和牽連大量無辜。在這個問題上也應接受蘇聯的教訓。他們肅錯的也實在不少。直到1988年，蘇聯最高法院還決定對三十年代的四起重大錯案平反，即：1932—33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聯盟”案、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認定“四個組織都不存在，對他們的指控毫無根據”。[17] 蘇聯後來的改正和平反也顯得比我們要徹底一些。例如我們對事關上千萬人的“五一六反革命”案就不了了之，更不用說1930年的“富田事件”和抓“AB團”以及後來的某些至今未平反的冤假錯案了。

其實，黨內鬥爭中的宗派和宗派活動總還是有它的特點和質的規定性的，不能用“中國特色”使之成為不負責任的“帽子工廠”。根據習慣用法，派和宗派的性質不盡相同，派一般不含褒貶，而宗派則往往用作貶詞。例如毛澤東就多次稱中央蘇區的“鄧毛謝古”為毛派，對當時的“左”傾中央，則抨擊他們搞宗派活動，並一再追查“小組織”及其後台。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和少

數派（孟什維克）還變成了專有名詞。由於政見不同而形成的派，自然會進行宣傳自己、批評對方、爭奪領導權的工作，只要不違反黨章黨紀，都應當視為正常，不能算派別活動，更不能算反黨。他們的活動也是光明磊落和正派的，不同於那些為謀私利而拉幫結派，搞陰謀詭計。促成遵義會議得以召開的“中央隊三人團”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就都是光明正大，彪炳史冊的。因此，必須把持不同意見和宗派活動區別開來。

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政黨學說的理論和實踐，所謂反黨宗派和宗派活動至少應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有某種組織。可以沒有固定的組織和組織系統，但必須是通過各種形式（無論是公開集會結社還是秘密串聯）進行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

二是黨紀不容。宗派組織和宗派活動必定是違反黨章黨紀的，因而往往會採取非法手段，以至施展權術，搞陰謀詭計。

三是具有反黨性質。不管是出於政見不同還是為了謀取私利，宗派活動都嚴重危害黨的利益，甚至造成黨的分裂。

上列三條，或許不完全不準確，而且也不一定三條都要齊備，但起碼得有一定的組織形態和違反黨規黨紀，否則不能算宗派和宗派活動。以前所說的那種“不謀而合”的聯盟或集團，其實是靠不住的。像“文革”初期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相互之間就不大沾得上邊，只是欲加之罪而已。鄧小平說，過去的“十次路線鬥爭”“有一大半就算不上”。那麼，以前定性的許多反黨宗派以及聯盟，自然也應根據上述標準從新加以考察。已經平反的當然可以不論，但也還有似乎已經蓋棺論定的，如延安整風時批判的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恐怕也還值得在新發掘史料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再做探索，把問題弄得更清楚些。否則講到經驗宗派都有誰，也許連教黨史的教授都會要躊躇一番的。

二，所謂“教條宗派”和共產國際的關係

談中共黨內的教條宗派問題，絕不可忽視直接有關的共產國際這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因為中國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對共產國際

必須絕對服從。而共產國際又是強調集中，什麼都要管的。胡喬木就批評說，“列寧建立了一個集中制的共產國際，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錯誤。這種組織永遠不能搞。從這裏就可以產生社會帝國主義。”[18] 這當然只能是事後總結歷史教訓的話了，當年是沒有人敢說，其實也是並沒有認識到的。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和幫助下建立起來的，並且一開始就把服從國際定為一條鐵的紀律。直到六大通過的黨章，開宗明義第一條還是“中國共產黨為共產國際之一部分，……為共產國際支部。”第二條的“入黨資格”也規定，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和本黨黨綱和黨章，……服從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19] 行文上都把國際放在本黨的前面，說明國際是中國黨的頂頭上司，是上下級關係，全黨都要首先服從國際。國際也就是它的領導人，不但如胡喬木在上引談話中所說，要判斷“每個黨採取的任何一個策略步驟是正確還是錯誤”，而且可以對各國黨，從中央到地方以至具體黨員，發號施令、指揮一切，有權處分各國黨直到將其解散（原波蘭和朝鮮兩國共產黨就被解散，二戰後才另組成工人黨和勞動黨）、撤換黨的領導人直到將其開除(參加南昌起義時的著名共產黨員譚平山就是國際代表一句話給開除的。有些黨的領導人甚至還被召到蘇聯加以監禁甚至肉體消滅)。黨的各級組織和所有黨員，不但對黨中央而且對共產國際都絕不允許鬧獨立性，否則就是違反紀律、沒有好下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批判宗派主義鬧獨立性就舉例警告說，“張國燾向中央鬧獨立性，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李立三也對共產國際鬧過獨立性，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20]

毛澤東和胡喬木曾多次提到中國黨和共產國際的鬥爭，[21] 其實這都只能是根據事後認識說出來的話，在延安整風和共產國際解散前大概是沒有談到過的。相反，在黨內鬥爭中都還需要表白自己擁護國際路線並引證國際文獻。標誌着中國黨開始走向獨立自主的遵義會議，在決議中就多處引用有利於批判極左軍事路線的國際有關文獻。後來同張國燾分裂主義作鬥爭，也曾一度以張浩的“國際代表”身份把他壓了下去。直到延安整風，批判教條宗派時還提出真假國際路線的區別，說王明他們標榜的國際路線其實是假的，遵義會議後中央執行的才是真正的國際路線。[22] 即使在共產國際正式解散後，也仍然要利用

它的權威。例如第一次在黨內正式點名批判王明博古路線的中央政治局指示中，用的就是前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爾斯基、愛爾科里（即陶里亞蒂）的一些言論，證明王明路線違背國際方針，而中央的布爾什維克路線才完全符合國際領導者們的指導原則。[23] 到了1944年初，國際已解散，但對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發來的電報，還顯得誠惶誠恐，不但一再解釋，而且在實際上對有關問題也真的提起注意，作了調整。[24] 這些都說明，共產國際對中國黨是多麼地權威，並不像胡喬木後來說的"同共產國際進行了那麼長期的堅決的尖銳的鬥爭"。更不是毛澤東多年後直截了當解釋的：整風實際上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25] 當年的《整風文獻》除中國領導人的文章外，主要都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材料。而且毛澤東自己就提出，"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的材料"。[26] 可見，歷史上的真實情況同事後一些說法是有相當距離甚至完全相反的。

長征前，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領導，除從莫斯科進行遙控外，還經常派代表來召開會議、發出指示，並且在上海設有常駐機構，保持着直接聯繫和直接指導。這種領導不僅體現在方針政策的制定和策略的變換上，而且也表現在組織路線的執行和重要的人事安排上。即以毛澤東本人而論，他在黨內地位多半取決於共產國際而不是中共中央。未參加二大和這時在黨中央無任何職務的毛澤東，卻能一下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就是由於得到指導召開中共三大的國際代表馬林的器重，因而當選為九個中央執行委員之一，任中央局秘書並兼組織部長。後來由於馬林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主張遭到批判，國際代表換成了維經斯基，遂使以前支持馬林的毛澤東連黨的四大也沒參加，在中央的一切職務全被免掉了。再後又由於領導農民運動，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重新受到國際及其代表的信任，才在黨的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在國際代表直接主持下召開的"八七會議"上更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成功地建立了紅軍和根據地之後，毛澤東就一直得到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支持與保護，因而這期間雖有某些波折，但他的黨內職務卻不斷上升，六大從中央候補委員升為正式委員，三中和四中全會均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由於國際的干預，"左"傾中央沒能達到把他排擠出政治局和派赴蘇聯學習或"休

養”的目的，他反而被推舉為中華蘇維埃主席，在“左”傾達到頂點的五中全會上還上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直到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一再說這是一次關鍵性的會議)，在共產國際的明確支持下，最後確立了作為黨的領袖的地位。[27]

綜上所述，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沒有共產國際就沒有中國共產黨，也就產生不了黨的領袖毛澤東。事實證明，黨的事業及其領導人的起伏進退都與共產國際息息相關。

共產國際對中共既是上下級關係，又管得很嚴格，所以中共路線的正確與否都和國際有直接關係。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國際代表馬林、羅易和鮑羅廷要比陳獨秀右得多，因為陳獨秀就認為莫斯科不應無條件地支持國民黨，後來在給中央的辭職信（1927年7月15日）中還抱怨國際“不許退出國民黨”。但是從1927年下半年起，國際路線又開始不斷向“左”轉，中國黨也就陸續犯越來越“左”的錯誤。所以李維漢認為，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錯誤，主要責任在國際代表。[28] 連立三路線也是在共產國際的所謂“第三時期”理論的影響下產生的。1930年6月國際還明確指示，“中國革命運動的新高漲，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近期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席捲全中國，無論如何也會波及到許多關鍵性的省份”。直到立三路線鬧得太不像話特別是表現有點不聽國際的話，被目為“反國際”了，這才被下令加以糾正。[29] 至於後來的王明，更是毛澤東說的，莫斯科刮東風他是東風派，莫斯科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就連著名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口號，發明權也不屬他，而是季米特洛夫參考西班牙人民陣線的經驗通過他向中國黨提出的。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黨每次犯錯誤都和共產國際有關。但國際又往往不承擔責任，出了問題只是批評和懲罰中國黨的領導人。而且政策有時還變得非常快，使人很難跟上。例如瞿秋白、周恩來完全按照國際指示回國召開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但會後不久國際的調子就變了，又指責他們為調和主義，致使極有才華和威望的瞿秋白也就從此離開了黨的領導崗位最後實際上被拋棄了。由於國際的經常干涉和直接過問，往往弄得一些中共領導人無所適從，只有緊跟，遇到指責就作儘量上綱上線的檢討，卻使一些心懷叵測和搞投機的人如王明、康生之流有機可乘。

當然，中國黨犯錯誤首先應該由中國人自己負責。而且事實上，

對於每次錯誤，受到批評和指責的有關領導人，除陳獨秀等一直不服，認為他是國際錯誤的“替罪羊”，終被開除黨籍外，其他如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開始還頂了一下），以至後來被中國黨自己定為教條宗派的博古、張聞天等，無不進行真誠或違心的檢討，但都沒有向國際推卸責任。連個性倔強的毛澤東也不曾公開頂撞過國際的指示和決定，遇到國際批評時也不得不作點檢討，如西安事變後承認提出“將蔣交人民裁判，是不對的”，[30] 1937年十二月會議上表示“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甚至還說出“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31] 這種超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話。大家之所以持這種態度，一方面出自對列寧創立和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的崇拜，另一方面服從國際領導也是一條鐵的紀律。設想毛澤東當年如果公開反對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和“左”傾政策，一直對着幹，那他能得到國際長期的支持和保護，最後成為黨的領袖嗎？

其實，共產國際在對中國黨的領導和指揮上也不是千篇一律、始終一貫，而是因人而異和隨時變化的。毛澤東說的共產國際是“兩頭好，中間差”，其實也不儘然。例如兩頭的前頭，就包括整個大革命時期。因為他說過，“五四運動到大革命時期，是唯物辯證法運用比較好的時期，是我黨生動活潑時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32] 正如我們前面所說，不只 1927 年下半年，1922年以後國際代表馬林就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陳獨秀關於中共三大決議給國際的報告中也提出“只有國民黨才能領導國民革命運動”，而毛澤東則是三大決議的積極執行者，曾被斷定“是馬林的人”。[33] 所以這頭幾年，正是由於斯大林一直到 1927 年下半年對國民黨和蔣介石抱有幻想，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又不瞭解中國情況跟着犯右的錯誤，才成了促使陳獨秀走上右傾機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中間差”，倒無庸置疑。隨着斯大林在蘇共黨內鬥爭中勝利，共產國際進一步推行極左路線，更多地干涉中國黨內事務。這時斯大林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竟然提出，“因中共中央太軟弱，能力太低，目前階段‘保姆是需要的’，現在應當對中國共產黨實行‘顧問制度’，讓共產國際代表直接指揮中共活動。”[34] 這就使中國黨十年連犯三次“左”傾錯誤，如果把責任完全或主要推給在國內的中國黨領導人，都不大合乎歷史事實，也有欠公允。

至於後邊這“一頭”，即1935年以後，共產國際之所以比較好了一些，則是許多因素造成的。第一是，面對法西斯的崛起，蘇聯和國際的戰略策略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已不再是急於搞奪取政權的世界革命，而是組織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後來蘇德戰起，更是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無暇他顧。中國黨的任務則是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抗日第一。服務於蘇聯政策的國際這時和中國黨目標完全一致，因此也就容易配合與合作。第二，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前同國際失去聯繫後的一年，反而證明政治上漸趨成熟，能夠獨立自主地正確解決問題，因而不願接受過分束縛，國際對中共也不能不稍為放心和放手。第三，雙方都更多地瞭解了情況，積累和汲取了經驗，大大提高了處理相互關係的水平。國際的新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等，比較尊重各國黨，處事比較民主。中共也學會了更好地和國際打交道。第四，國際選定並堅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這在雙方後期關係上具有決定性意義，也是毛澤東對後期國際及其領導人季米特洛夫一直保持好印象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見，在共產國際解散前，談中國黨的十年“左”傾，談黨內鬥爭，談宗派集團，離開國際都是無從談起的。而所謂教條宗派，後來也常被稱作國際派、莫斯科派、甚至斯大林派，原因就在此。但是以往在談到教條宗派時又總是忽視國際這個重要因素，似乎弄出兩大宗派都是中國人自己搞的，反而是沒有緊跟國際路線的結果。這也是自相矛盾和造成教條宗派說不清的一個極大障礙。

現在讓我們就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來考察一下流傳了六十年、一些黨史書上至今仍在談的所謂教條宗派（也勢必聯繫到孿生的經驗宗派）。而談到教條宗派的形成，人們往往又追溯到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有些人還熱衷於後期一種謔稱“二十八個半”。為了正本清源，這裏也就從中山大學”談起，特別是談點對“二十八個半”的看法。

三，張聞天與所謂“二十八個半”

（一）如何看待“二十八個半”

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名稱，大約產生於1929年6月

中山大學總結工作的全校黨員大會以後。當時中國學生在政治和工作態度上分為兩派，一派擁護得到共產國際支持而與中共代表團有不同意見的聯共基層組織支部局(按，中共六大後不久，中共旅莫支部被解散，黨員一律編入聯共基層組織做預備黨員，包括黨的創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一些人的擁護支部局，除思想認識外，還有一個自以為是遵守組織原則和黨章的問題)，另一派則支持代表團反對支部局。會開了十天，對立更加尖銳，最後進行表決。據曾任支部局委員並在會上當過翻譯的楊尚昆說，表決結果是：擁護支部局的中國同志九十餘人（還有俄國的三十餘人），反對的二十餘人，其餘二三百人表示懷疑。張聞天說這是“兩頭小，中間大”。由於支部局派以“國際路線”相標榜，所以擁護的比反對的一派多些，約百餘人，其中還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等。[35] 持支部局立場和觀點的一些人，由於在兩派之爭中處於“多數”，又有國際支持（自然意味“正確”），於是就飄飄然起來，以“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俄文正好是多數並代表正確)自命。但反對派並不服，不承認對方為多數和正確，還加以挖苦和譏諷，估算他們中的積極分子不到三十人，就戲謔地取名“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由於布爾什維克在國際共運中是個光榮稱號，不但這兩派要爭相使用，就是中國黨也一直定為奮鬥和爭取的目標。例如毛澤東提出的口號就是要“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36] 延安整風期間的1942年11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連續兩天的長篇報告，也是以《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為題的。何況在二三十年代的莫斯科，誰不願當布爾什維克？所以反對者就要給他們的“布爾什維克”加上引號。但這“二十八個半”究竟具體指哪些人，也許初叫的人還心中有數，但叫開後就變成一個政治綽號或帽子，可以給自己認定的人去戴了。所以人們把不同的名單加在一起，“二十八個半”竟變成了五十多個人。這說明，“二十八個半”並非一個確定的群體，人數更不符合實際，也不是產生於“十天大會”中的表決。

不管這些人是一百多還是二十八個半，總是在那場鬥爭中採取了共同立場和共同行動，因而形成了一個存在時間不長的支部局派(或國際路線派)。但既然連具體成員都弄不清，可見它並無固定組織和

經常聯繫，這次鬥爭過後大概也就各奔東西了。除參與鬥爭的人還可能憶及外，歷史上也不曾有多少人提及它。“二十八個半”的出名和受到追查，已經是十多年後的延安整風了。

延安整風時定性的教條宗派，主要成員都是在蘇聯留過學的人，根子自然會挖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去，於是在那場鬥爭中一時戲稱的“二十八個半”就浮出水面了。根據毛澤東“脱褲子、割尾巴”的號召和寫反省筆記的規定，一些當年留過學或瞭解中山大學那場鬥爭情況的人也紛紛就此進行檢查交代或揭發，一時鬧得很熱鬧，對被稱為“二十八個半”中的人形成巨大壓力。參加過整風的人都知道，當時鬧得最凶的是康生。他不但多次在會上提，還就此問題作過一次報告。事後想來，他的意圖很明顯，既為迎合上面窮追教條宗派的需要，又可轉移視線以淡化他追隨王明多年的事跡。但“二十八個半”終究是青年學生一時打派仗的戲稱，而且人員複雜、變化極大，並不就是後來批判的教條宗派，因而無須也無法深追和定案，也就沒有提上中央總結黨史問題的日程。所以毛澤東在1944年3月5日的講話中也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派別是否還有？這是書記處會議上沒有提到過的。經過幾次分化，‘現在沒有這個團體了’。去掉這個包袱，才符合事實。”[37] 這就是說，中央沒提到這個問題，以前有沒有以及情況如何，未作評論，反正現在沒有了。如果確有“二十八個半”，並進行過宗派活動，延安整風能這樣輕易放過、馬虎了之嗎？

正是由於上述情況，延安整風後有關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比較正式的黨史著作，都沒有提過“二十八個半”的問題。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又是這個康生在1966年提出“二十八個半沒有一個好人”。結果凡被列入其中還活在國內的人，都遭到殘酷迫害，有的被關押，有的被整死。一些造反派也跟着亂嚷，把這個本來就說不清的問題弄得更加混亂。很明顯，“文化大革命”後這也是一個需要撥亂反正的問題。有鑒於此，1981年8月，胡喬木根據孫冶方的意見建議召開“二十八個半”問題調查會，並決定由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召集和主持。與會的有熟悉當年情況的老同志如楊尚昆、伍修權、孔原、徐以新、孫冶方等19人。經過座談，在分析了王明教條宗派後認為，所謂“二十八個半”，究竟是哪些人很難弄清，而且很快就發生了重大變化，這批人中除七八個變成

叛徒外，多數同志都擔負過領導工作，為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還有十數位同志已成為革命烈士。鑒於“二十八個半”不能準確反映實際情況，還被康生給弄成壞人的代名詞和打人的棍子，因此“與會同志建議黨內今後不再使用‘二十八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專有名詞”。[38]

此後，不僅正式的黨史著作仍然不提，就是嚴肅的黨史研究也沒有去討論“二十八個半”的問題。有些傳記因涉及傳主而要提時，或稍作澄清如《張聞天傳》和《徐以新傳》，或一筆帶過如《博古傳》，也有根本不提的如《王稼祥傳》。但是兩次大政治運動（延安整風和“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波瀾和康生的遺毒並不是一下就能完全消失的，所以以“二十八個半”為題進行炒作的還是不少。這裏僅舉《二十九個人的歷史》[39] 一書為例，為的是說明在這個問題上的炒作情況，倒不是要專門評論這本書。因為現在黨史出版物上似乎有一種風氣，就是互相抄來抄去，並添枝加葉，編造故事，缺乏胡喬木說的，“黨史應該有新的材料，新的觀點，新的態度。”[40]

這本書的內容提要上說，要對這二十九個人的人生歷程歸宿“給您一個滿足的回答”。作者在書中也說，他要“把那些關於‘二十八個半’的說不清的地方儘量說清楚”。但是等看完書你就會發現，情況並非如此。首先是書名就不確，因為書裏並未講全二十九個人的歷史，作者確定的名單中大多數人就沒有寫一點他們的“歷史”；着重描寫的那些人也多是從別處抄來的（包括朱仲麗的《黎明與晚霞》這種文學書中的材料）若干片斷故事，談不到他們的“人生歷程”。其次是用“文革”中的語言和不實之詞談論一些黨的領導人。如說四中全會後就是王明“與一幫追隨他的小兄弟們在中共黨內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說“很多人都想借助王明的勢力撈取個人資本”；說“這種互相需要導致了他們共同大搞宗派活動”；說他們“結黨營私”、“損人利己”等等。書中還具體地談到，派往中央蘇區的三人中“有一個則是王明的‘心腹’——王稼祥”；說去中央蘇區的博古、王稼祥、張聞天、凱豐和楊尚昆是王明宗派的“骨幹分子”和“得力助手”。還有一些編造（或抄來）的不實之詞及虛假事件和故事，如“共產國際指定的中央總書記王明”；說什麼五次“圍剿”後張聞天“以連續兩天的時間趕往雩都”找毛澤東商談，“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分手時毛還讓劉英與張聞天同行；說遵義會議前毛澤東“決定讓張聞

天以（毛）自己的觀點寫一個報告”準備到會上去念；[41] 說瓦窑堡會議經過“充分討論之後，張聞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會議決議”。[42] 類似這些完全違背史實的問題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

借“二十八個半”之題炒作的，當然不只這本書。例如還有一部名為《黨史風雲實錄》的書，在第二章裏也大談“二十八個半”。[43]《中華兒女》2001年第7期也登了一篇從這類書中抄來的文章：《“二十八個半”的人生結局》。既然這樣抄來抄去，證明還有市場。那麼到底應當怎樣看“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個問題呢？這裏提出以下幾點看法供討論。

第一，“二十八個半”是反對派挖苦諷刺當時擁護國際路線和支部局一批積極分子的戲謔稱呼和政治帽子，並不是一個具有組織形態和秘密聯繫的宗派團體。他們中一些人在聯共黨支部局任職，完全可以用支部局名義，無須搞秘密的宗派活動。他們的追隨者前後有百餘人，積極分子也在四五十，叫做“二十八個半”並不符合實際。也不是人們說的1929年原中山大學“十天大會”表決時投支部局票的人，因為被列為主要成員的幾個人就並沒投票：王明回國了（並不像《炎黃春秋》總第93期所載柳百琪的文章中說的那樣，似乎王明在現場指揮。其他有些敘述也很不可靠），張聞天、王稼祥、沈澤民在紅色教授學院而未與會。

第二，“二十八個半”究竟是哪些人，沒有也不可能搞清楚。就連不少書如《二十九個人的歷史》和《徐以新傳》等認為是無爭議的那“半個”——徐以新，就大成問題。徐以新當時還是團員。按楊尚昆所說，“參加十天總結大會的是黨員，團員不參加，更沒有表決權”。[44] 張聞天對那“半個”卻提出“有的說是傅維鈺”；（他提供的名單中也沒有孟慶澍，以為她和朱自純等“是無所謂的”）。[45] 而且這批人擁護支部局也是一時之事，很快就發生分化，有些繼續支持所謂的“王明路線”，有些就一直反對。例如被列入“二十八個半”的宋盤銘（潘民）就在湘鄂西蘇區被“二十八個半”的夏曦在“肅反”中給錯殺了（兩人又都先後成了烈士）。

第三，被列為“二十八個半”的，絕大多數都是忠誠的革命者。據張聞天《反省筆記》中的名單，當時還健在且擔負一定領導工作的尚有12人，為革命犧牲的10人，消極脫黨和叛變的8人。更不用說

其中有許多同志是為中國革命做出過重要貢獻的。脱離革命的只是極少數。活着的和犧牲的也都先後改正了錯誤，沒有一個人跟王明到底（按張聞天的説法，孟慶澍不算）。因此對所謂“二十八個半”就絕不可籠統使用輕蔑和不恭的稱謂，如“王明的小兄弟”、“親信”、“幹將”之類。

第四，支部局本來就是聯共的基層組織，一切服從聯共安排本不成問題。在指揮和控制中國黨上，共產國際和聯共其實也是一回事。因此這批人不是什麼“打着國際的旗號”，而是始終得到國際和聯共的支持。在支部局同中國黨代表團關於富農等問題的爭論中，共產國際是明確支持支部局的，並隨着聯共的清黨，共產國際監委也把中國代表團給解散了。

第五，根據以上所述，一時在中山大學嘲諷叫的“二十八個半”，不是一個固定的群體和成為組織形態的反黨宗派；作為聯共一個基層組織的支部局，也不能説進行的是非法的宗派活動。因此在黨史研究和著作中就應按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召開的調查會上達成的共識，不再使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這一專有名詞，更不應為了別的目的而借題炒作。

第六，不提“二十八個半”，並不是否認王明和在延安整風中受批判的一些人有教條主義，也不能否認聯共支部局在清黨中有冤案和一些中國學生起過壞作用，這都是不應加以混淆的。上述調查會就強調區別對待。王明等人的“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造成很大的損害，這是不可否認的。但被列為“二十八個半”中的人卻並不就是王明宗派，例如孔原、徐以新、陳原道、甚至王稼祥就都不承認。

（二）張聞天和“二十八個半”的關係

從以上的敘述和分析中，也就容易大體弄清張聞天同“二十八個半”的關係了。概括起來，也可歸納為以下幾條。

第一，張聞天在蘇聯學習期間，對共產國際、聯共和斯大林養成盲目崇拜，屬於當時的洋“凡是”派。由於他堅決擁護國際、聯共及其基層組織支部局，被一些人目為“二十八個半”是很自然的。他在《反省筆記》中也完全承認。但由於“二十八個半”並非實體，他又沒有在中山大學“十天大會”上投票，所以算成“二十八個半”只是

被掛上虛名，實際上並沒什麼關係。因此在寫張聞天時把他同被稱為反黨宗派的“二十八個半”連在一起也是不妥當的。

第二，張聞天參加支部局的某些工作不能算宗派活動。他在離校後即和中大疏遠，只是擔任教課和一個工人班黨的小組指導員。其活動均按支部局方針，主觀上認為這就是擁護國際路線，“我當時滿以為參加這種鬥爭是每個布爾什維克的責任，絲毫沒有懷疑這中間有什麼‘鬼’”，[46] 既無私心，也無派性。吳亮平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也說，“使我親身體驗到聞天同志為人的正直和作風的正派”。[47]

第三，在學校同中共代表團的政治爭論中，張聞天是站在國際和聯共方面的，曾在富農問題上以聯共和國際當時的極左觀點（即消滅富農）寫文章批評過瞿秋白，反對代表團的“右傾”。這不但說明他當時就是錯誤的，而且也可說明他犯教條主義錯誤的淵源。

第四，張聞天參加中大的鬥爭，基本上出於他的教條主義和“左”傾觀點，而不是為了“撈取個人資本”、“結黨營私”，不是無原則地投靠米夫、王明。他自己說，同米夫很少接觸，對王明並不賞識，也很少來往（他說王同何子述、李竹聲等人常在一起，“自成一個小集團”）[48]，甚至頗為厭惡，說陳紹禹比周達文（這場鬥爭中張的對立面）更危險。[49] 這哪像一個宗派。他還說，他“同博古根本不接近”，而同沈澤民比較接近，有些“書生氣，文化人氣較濃厚”。在中山大學的許多人回國後，張聞天同他們也無書信聯繫。[50]

從以上這些看來，張聞天並不像一個被描述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有目的的反黨宗派——“二十八個半”的成員。延安整風時，他自己的承認和檢討，是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其實並不妥當（對此已有另文討論）。現在如果還是老揪住不放，一定要把他定為“二十八個半”反黨宗派之一，那就是違反歷史真實了。

四，六屆四中全會的歷史地位及張聞天同它的關係

（一）應該客觀地歷史地看待四中全會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和後來成立臨時中央，都是按上述斯大林給莫洛托夫信中說的“保姆制”或“顧問制”實踐的，也是延安整風中批

判得最厲害的黨史上的兩件大事，被認為是教條宗派的篡黨，並一直成為歷史定論。如上引1990年胡喬木在回憶毛澤東的談話中還說，“四中全會是奪權。”[51]

延安整風對臨時中央自始就持完全否定態度，但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前後卻有天淵之別。1941年“九月會議”後，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後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簡稱《歷史草案》)上，開宗明義就說，“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詳細材料經過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四中全會及其以後一個時期，中央領導路線雖有缺點、錯誤，但在基本上是正確的。九一八事變至遵義會議這一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是錯誤的。”[52] 為什麼這時認為四中全會“基本上是正確的”呢？雖然胡喬木的書上列舉了“四中全會的成功方面”有四五條，但實際上最重要的一條恐怕還是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在抓“AB團”、處理“富田事件”等極左錯誤問題上支持了毛澤東而批評和撤換了持比較正確意見和取代了毛澤東書記職務的項英。被稱為“欽差大臣滿天飛”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飛向中央蘇區的三人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還在一些軍事問題上支持了毛澤東。所以直到十多年後的七大上，長期批“欽差大臣滿天飛”的毛澤東卻贊揚起三人團來了，說“四中全會以後中央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在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王稼祥同志，贊助我們、信任我們——我和總司令，那是相當困難的。”[53] 被毛澤東當時認為代表“四中全會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54]的這四五條作為歷史事實當然沒有也不會改變，但過了兩年，到1943年的“九月會議”以後，四中全會卻沒有任何“成功方面”了，變為“這次會議的召開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55] 並成為至今一切官方黨史著作，包括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等的標準評價。

為什麼在延安整風那兩年之間對四中全會的評價會發生如此180度的變化呢？大概主要是由於對王明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博古路線也就變成了王明路線（對此將另文討論）。胡喬木的解釋是，毛澤東《歷史草案》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反映了當時認識上的局限性”，後來的改變則是由於認識的進一步提高和深入。[56] 這恐怕是說不大過去的。那麼現在已是事過六十年，又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

撥亂反正，黨史研究得到空前發展，照道理，對六屆四中全會的評價也可以重新進行一些討論了。

准上所述，對四中全會可否提出以下幾個問題，並談些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直接操縱下，制定並在後來貫徹執行了一條極左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損害。這是評估四中全會的前提。對這一基本看法是不能動搖更不能改變的。

其次，四中全會的合法性在正式文件和嚴肅的黨史著作中從來沒有人否定。這是因為，一則它是國際專門派代表來主持召開的，無論是路線的制定還是中央的改組都是依照國際的事先指示，事後又得到國際的批准以至贊揚（1931年8月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的決議案》中，不但批准了四中全會的路線，還指出四中全會"使中共在繼續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上向前進了一大步"[57]）。二則從參加的人選看，四中全會也基本上合乎組織原則。出席會議的37人中，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22人，佔百分之六十，列席的為15人。政治決議案為米夫起草。候選人名單則為中央政治局和國際遠東局商定，由周恩來親筆寫出並在會上宣讀，最後以20票贊成兩票反對通過。[58] 根據這兩條，恐怕就很難說四中全會是"篡黨"或"奪權"。否則，1927年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羅明那茲主持下召開的在關鍵時刻挽救了中國革命和中國黨的"八七"會議，從組織原則講，不更是"篡黨"和"奪權"了嗎？？但是直到最後，毛澤東和一些黨的領導人以及黨史權威胡喬木等仍堅持"四中全會是奪權"，而至今許多所謂屬於研究黨史的書籍中也對四中全會的合法性表示懷疑以至實際上加以否認。例如《黨史風雲實錄》（上冊）中就提出問題說，"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出席會議的37人中，竟然有15個不是中央委員，近百分之四十。這也稱是'中央全會'。"[59]《二十九個人的歷史》上也說，"為了確保王明上台，米夫強迫中共中央同意讓15名非中央委員參加會議"。這都可能算是少見多怪了。先不論參加的是些什麼人（37人中被列入"二十八個半"的只有6人），[60] 單以非中央委員的人數論，這實在不算特別。此前的三中全會就是中央委員14人，地方和單位代表22人。人們更知道在延安開的中外黨史

上都算得上最長的六屆七中全會（11個月），出席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7人，列席12人，都有發言權和表決權。難道這就不能叫‘中央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可以不算？須知這還是在解放區，又是在全黨反對不正之風的延安整風期間；而四中全會則是處於白色恐怖和共產國際派代表直接操縱之下的。在黨史研究中持雙重標準，仍然是在繼續搞個人崇拜。

第三，從四中全會後中央領導機關的組成和實際工作情況看，還不能說教條宗派在中央取得了統治地位或領導權，發生了“篡黨”、“奪權”問題，也不能說“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碼頭”。因為全會選進政治局有九個正式委員(向忠發、項英、徐錫根、張國燾、陳郁、周恩來、盧福坦、任弼時、王明）和七個候補委員（羅登賢、關向應、王克全、劉少奇、溫裕成、毛澤東、顧順章)，只有一個王明屬於所謂教條宗派。而且在隨後的政治局分工和確定常委人選中，據說國際遠東局有意讓王明當個候補常委，結果也沒弄成，而是根據周恩來提議，仍然讓他去做江蘇省委書記；常委則是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候補常委為陳郁、盧福坦、徐錫根。屬於教條宗派的其他人，不但沒有能進政治局，而且在補選和遞補的五個正式中央委員中也沒有一個，會前極為活躍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連中央候補委員也沒有當上。[61] 而且四中全會後米夫還在中國呆了半年左右，對中央進行着直接的操縱和指揮。有他的撐腰，王明也許發揮的作用大一些，但其他人大約也只能執行米夫制定的方針政策而不敢對着幹。所以說一個未進入政治局常委的王明，竟有如此本領，單槍匹馬一下佔領了“中央碼頭”，這是很難令人想像的。其實，只要稍為翻閱一下《周恩來傳》和《周恩來年譜1898—1949》等書的有關章節，就可以看出，從四中全會到臨時中央成立，主持中央日常實際工作的是周恩來。當時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一些老同志也如是說。

第四，所謂“欽差大臣滿天飛”，看來也是誇大其詞。首先，毛澤東自己就多次要求中央派幹部來加強領導。如1928年11月25日給中央的報告中就具體提出，“希望中央和兩省委派可充當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來。”[62] 他對四中全會後派來的真正具有“欽差大臣”性質的中央代表團也是一直歡迎和贊賞的。其次，中央向蘇區派幹部既是實際工作的需要，又是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四中全會後的2月22

日，周恩來起草的致國際電就說，“現在正依照國際指示，要從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幹部力量去加強與鞏固蘇區的領導”，“軍事幹部不論是在莫學過軍事的或在國內做過軍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蘇區”。恐怕談不上是派“欽差”，也看不出有什麼派性。幾天後的3月4日，中央常委還“決定凡去蘇區的人，統由周恩來、康生（時任中央組織部長）安排”，卻並不是王明或教條宗派別的什麼人。[63] 而且後來陸續派往各地的也不是刻意要派留蘇學生。例如派夏曦出任湘鄂西分局書記，就是因為李維漢不去。[64] 而且1931年中央派往洪湖蘇區的還有錚錚鐵骨的錢瑛。派往中央蘇區的任弼時和派往鄂豫皖的張國燾等這些重要領導人當然不能說是屬於教條宗派。至於先後派往東北組織抗日聯軍的楊靖宇、趙尚志、周保中、趙一曼等人[65] 就更不用說了。其實，當時派往各地的人並不算多，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由延安向各地派領導人簡直不能同日而語。建國後由中央派去各地的領導幹部也不少。難道這都是“欽差大臣滿天飛”？派出的幹部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屬於常規。那時的中央執行共產國際的極左政策，派出的無論是留蘇學生還是土生土長的幹部（如後來去中央蘇區的李維漢），都會照此辦理。至於犯肅反擴大化錯誤和濫殺無辜，更不能看是否“教條”，如果在湘鄂西曾亂殺人的夏曦算“教條”，但先在鄂豫皖後到四川的張國燾卻不能算了。一方面軍中大抓“AB團”還發生在四中全會前，反倒是中央先後派來的項英和周恩來作了糾正。因此，把“欽差大臣滿天飛”看成都是“教條宗派”，說“教條主義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會後是博古，這個宗派是相當有計劃地派出幹部到各蘇區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組，只有幾十個人”，是和事實有相當距離的。至於胡喬木說的，“把原中央蘇區的領導人統統拿下來”，[66] 更是無限的誇大。

第五，談到“毛主席對四中全會時國內領導人的批評，主要是講為什麼拱手把中央的領導權交給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領導權交給博古。他最不滿意的是在這裏。”[67] 這既不完全合乎事實，也只能是事後諸葛亮。因為如上所述，說王明控制了“中央碼頭”實際上是誇張。在中央真正管事的是周恩來，在中央蘇區起主導作用的則是任弼時，都不屬於教條宗派和“王明小組織”。而且根據國際指示辦事，也不能說是拱手讓權。否則，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三代，單

從組織上說（暫不論路線正確與否）也都是“拱手讓權”了。如同黃克誠所說，毛澤東自己也曾“拱手讓權”，因為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主要是毛澤東創建的，他在軍民中也有很高威望，怎麼能發生“臨時中央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後，輕而易舉地奪了毛澤東的權”這樣的事。[68] 這恐怕除了他說的毛澤東喜歡偏聽偏信的組織路線和錯誤肅反使其失掉部分人心外，還有個全黨服從中央和國際的紀律問題。實際上在這之前的贛南會議和寧都會議上，他已把黨權和軍權“拱手”讓給了並非教條宗派的任弼時、項英等人，只有一個被算作教條宗派的王稼祥反而是支持他的。

第六，四中全會基本上是錯誤的，但說它“沒有任何積極的建設的作用”和“教條宗派只有罪惡無功勞”，[69] 恐怕也有些太過分。例如在人選上，新進入政治局的除王明外，還有任弼時、劉少奇、陳郁、王克全；保留了一批黨的重要領導人如周恩來、項英、毛澤東等在政治局的地位(如果他們像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一樣被撤消職務，那以後就有些難辦了）。而且毛澤東原先在《歷史草案》中肯定的那幾條“成功方面”，除“解決富田事件的爭論”是混淆了敵我（現在黨史界已經在為之平反，但毛澤東在世時還是一直肯定的)外，其他如對待立三路線錯誤和打擊羅章龍右派、取消全國總行委、放棄城市暴動和攻打大城市、在粉碎第二次和第三次“圍剿”中的工作等，還是應當肯定的。特別是在敵人的日夜搜捕、顧順章等叛徒出賣的險惡情況下，能夠保住中央機關和一批重要幹部以及黨的文件檔案等，這種忠於黨的事業和英明機智的精神，尤值得永留青史。

僅從以上幾點就可看出，過去對四中全會的評價顯然有點絕對化，有些說法也不合乎實際情況，而在黨史研究中那種抱定歷史定論而不顧歷史事實的現象也長期得不到克服。因此對四中全會重新作點考察還是需要的，並不是什麼“要翻歷史的案”。

（二）張聞天與四中全會的關係

至於張聞天和四中全會的關係，也可以談到以下幾點。

第一，張聞天從蘇聯回到上海已是四中全會開後一個多月，他既無可能與會，事前對會議也一無所知。因此可以說四中全會和張聞天毫無關係。《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的，那些“違反組織紀

律，拒絕黨所分配的工作，錯誤地結合一部分同志進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動”[70] 的人，主要指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張聞天不在國內，當然也不會參加這些宗派活動。現在有些黨史著作，把張聞天列入參與四中全會奪權的教條宗派之中，顯然是毫無根據的。

第二，張聞天是四中全會路線的堅定支持者。他本着對共產國際的迷信，進而認定四中全會的路線就是國際路線，因此不用多加考慮和研究，就盲目地投入到捍衛這一路線的鬥爭中去了。例如他1931年2月17日才輾轉回到上海，兩三天後同黨中央接上關係，但2月21日已寫出《怎樣完成黨報的領導作用？》的文章，竟點名批評“秋白同志立三同志一直到四中全會以前”如何如何。這時不要說瞭解國內實際，而且四中全會本身的情況都還沒搞清楚，表現了典型的毛澤東所說“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的作風。2月23日作時評《南京政府的財政恐慌與大借款》，24日寫《加緊我們日常鬥爭的領導》。到3月17日，抵滬一個月內就已寫出和發表了八篇文章，期間還有參加會議、發表意見、作報告、起草文件及其他具體工作。[71] 這固然顯示出他的勤奮和才華，但也說明不作調查研究和教條主義作風的嚴重。

第三，張聞天不但忠實執行四中全會的路線，而且還有所發展。毛澤東把他定為蘇維埃後期錯誤路線的“繼承者與發展者”，有一定道理。由於他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迷信，所以特別強調在社會上揭露和打擊中間派，在黨內開展反右傾鬥爭，大力宣傳共產國際的“第三時期”理論和“進攻”路線，而且往往點名批判，不講策略。例如把中間派別對蔣介石的不滿和要求民主說成是“維護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一種欺騙”，甚至公開批評不久即為中共秘密黨員的胡愈之是“國民黨宣傳員”。又如後來寫的長篇社論《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就點名批評了十多二十個省委、一批群眾組織和中央機關，以及不少領導同志。[72] 無論黨內黨外，打擊面都太寬了，表現了“打倒一切”的“左”傾機會主義老公式。

第四，四中全會後張聞天的錯誤主要表現在宣傳方面。他主管宣傳，日常工作就是“編報紙、寫文章”。在周恩來、王明離開中央前，決策上他的發言權有限，也很少管其他實際工作。臨時中央時期，他和博古的分工也是“他主要寫決議，我則主要的寫文章”，而

且還總是怕博古批評右，不敢理直氣壯地談反“左”。[73]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也說，“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錯誤，主要在宣傳方面有許多錯誤。”[74]

第五，四中全會後張聞天在工作中犯過教條主義錯誤，但絕不能像延安整風時對他的批評和他據以反省的“只有罪惡無功勞”。[75] 這都是些片面的偏激之詞。事實上，他不但在革命的大方向上同全黨完全一致（毛澤東自己就提出“不要否定一切”，說“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76]），而且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惡劣環境下，置個人安危於不顧，辛勤地為黨操勞，在各個戰線上都做了大量工作。四中全會後的黨中央，在周恩來的日常具體主持下，進行了對敵鬥爭，粉碎了幾次叛徒的破壞，維護了黨的領導，在這中間也都有張聞天的一份功績。所有這些是不應也不能否定和抹煞的。

五，如何看待臨時中央和張聞天的作用

（一）對臨時中央也要一分為二

其實上面所談內容，多已涉及到臨時中央時期的工作和一些問題。這裏想着重談的是如何看待臨時中央和張聞天在臨時中央的地位與作用。先從張聞天回國後工作談起。

1931 年 2 月 17 日張聞天回到上海。2 月 19 日向忠發、周恩來和國際遠東局談話中即已提到“張聞天任命為中央宣傳部長”，前任沈澤民（也是回國不久的留蘇學生）已決定去鄂豫皖蘇區，需要有人替補。[77] 張聞天當上中宣部長後，為了宣傳和闡釋中央的方針政策，他從 3 月 2 日起開始列席政治局及其常委的會議（這也是正常現象。例如“文革”前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並非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卻一直列席政治局及其常委的各種會議，所以才能寫出《十年論戰》）。這次回國，張聞天已從“五四”後一個頗有名氣的青年文學家變成完全從事政治活動的職業革命家。而且是長期留學蘇聯，忠於國際路線，馬列書念得多，知識面廣，文章寫得快，工作又極為積極認真，因而得到大家（中央領導人和國際遠東局）的器重。加之由於他的主要任務是編報紙、寫文章，而且往往三兩天就是一篇，雖然

用了許多化名，但還是很快出了名，被黨內外都看成留在上海黨的一位領導人。例如半年後（9月份）國民黨懸賞通緝上海的七個共黨要人中就有他（和陳紹禹、沈澤民、羅登賢、秦邦憲各為一萬元賞金，瞿秋白、周恩來為兩萬）。[78] 可見他後來進入臨時中央並不是完全偶然的。

1931年9月成立臨時中央，既是形勢所迫，也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在這之前，黨的工作重點就已轉向蘇區。共產國際也不再堅持城市中心論，指示把從政治局起的大批幹部派往蘇區。在國民黨瘋狂鎮壓和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黨組織不斷遭到破壞。特別是在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叛變之後，原來幾位中央領導幹部已很難在上海存身而不得不撤離。既然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實際上不可能再存在，那麼為了革命的需要和保持中央工作的連續性，就只能成立臨時中央了，何況這還是遠東局的決定並得到國際的批准。所以延安整風期間，受到臨時中央打擊和排擠的毛澤東、劉少奇等人，雖然對臨時中央極為不滿並加以嚴厲批判，但卻不能否定它的合法性。關於臨時中央的合法性沒有爭議了，但還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提出一談。

一是關於臨時中央的產生和手續問題。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主持中央日常實際工作的周恩來已無法留在上海，只能隱蔽起來，停止同中央其他成員的聯繫，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蘇區。中央另一主要領導人王明，則要求並獲准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他二人一走，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就只剩下工人出身的盧福坦一人了。[79] 遠東局同周恩來、王明商談後決定成立“新中央”（這是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的提法。他還特別提到，當時“並未說是‘臨時中央’”，只是國際批覆的電報上稱為“臨時中央政治局”），並提出名單報國際批准。這說明，臨時中央是在特殊條件下產生的，合乎列寧關於秘密黨無法講公開性也無法實行民主的原則，因而不但是合法的，也是正常的和合理的，不存在“選舉手續不完備”的問題。在我黨當政的根據地，以及建國後直到現在，許多重要領導幹部也沒按黨章規定選舉，而由中央甚至領袖個人任命，何況那時是處於嚴重的白色恐怖環境中，根本不允許搞正常選舉。

二是臨時中央的人選問題。據張聞天《反省筆記》，名單是由周恩來、王明提出，商遠東局後報共產國際的。確定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六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張聞天記得

國際批覆時還增加了黃平、劉少奇、王雲程，成為九人），並以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至於說“陳紹禹提出秦邦憲進入中央負總責”，[80] 則連張聞天也不知道，他只知相互間的分工。他說，“我當時還不知是王明、恩來要博古多負中央工作的責任。”但他記得國際的批覆電報是在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由博古宣佈的。[81] 大約從此博古就召集開會和通知工作，大家也就分頭去幹了。這足見那時中央機構和章法極不正規，但博古、張聞天等人起草的決議和文件卻可以成為中央指示（雖然未用中央名義），並對各地發號施令。許多黨史著作，為了肯定教條宗派及其篡黨奪權，把當時的交接說成似乎是王明等幾個人的密謀，甚至採用文學虛構的手法（如一些正式史論和傳記也採用《黎明與晚霞》上的對話），描述王明行前對博古如何具體交代。這種近乎寫小說的風氣至今猶盛，實際上大多靠不住。有些情況是當事人都在的延安整風中也沒完全弄清楚的。例如在交接時對成立臨時中央是否有“規定，今後在多數中央委員聚集在一起時，須將此事提請中央委員討論”[82]（王明整風時的說法則是，“將來到政治局委員多的地方要將權力交出來”）。[83] 對此，張聞天開會時和在《反省筆記》中曾質問道，“當時上海就有正式中委，如瞿秋白、劉少奇、陳雲、盧福坦、黃平等，當時為什麼不把中央大權交給他們，而另外交給我們這批非中委？”“而且以後王明到了國際，恩來到了中央蘇區，為何根本不提此事？”[84] 看來這些問題大約沒有也不可能完全弄清。

關於指定負總責的人，可否作這樣的估計和分析。周王走後盧福坦是唯一的政治局委員，本人也很想當總書記，但米夫和大家都不同意。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此人是在國際強調工人成分的情況下提上來的，水平有限，負不起責任來；二是鑒於向忠發（也是工人出身）的教訓，對他不大放心，而且他後來也確實很快成了叛徒。因此大家商定不設總書記，只進行分工，並得到批准。這倒是所有當事人都承認的，延安整風時已弄清了。

盧福坦之外，按理應當輪到劉少奇。他是留下的第二個政治局的人。但他在1930年6月就作為中國工會代表團團長去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五次代表大會，會後又留下（因當選執行局委員）工作了一年多才回國。由於他不同意共產國際的一些極左政策，無論是出席大會還是參加執行局工作期間，總是同職工國際甚至共產國際領導（如

曼努伊爾斯基、庫西寧等人）發生意見分歧和爭論，以致被扣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四中全會能把他從中央候補委員選進政治局就不錯了，很難想像能把要執行國際路線的新中央的權交給他。即使有人有此意見，遠東局和國際也決不會批准。而且不久之後，善於投機的康生就已帶頭批起他的右傾機會主義來了，還很快形成圍攻之勢，博古、張聞天等也都點名批評。在國際代表明確說他“不能擔任領導工作”後，臨時中央常委還撤銷了他的中央職工部部長之職，於1932年初派往中央蘇區。他雖然曾被迫作過檢討，但實際上仍堅持自己的觀點和作法，因此就長期背上了“老右”之名，被排斥在中央領導圈外。[85] 直到 1935 年張聞天提議和選派他出任華北局中央代表和書記，情況才發生根本變化。

至於瞿秋白，無論德才資都是堪受重任的。但他由於同共產國際有意見分歧（如上述富農問題和對中山大學兩派爭鬥的態度），被撤掉了駐國際代表的職務。由於他的地位和威信，後來又與周恩來一起被派回國糾正立三錯誤。但國際很快又把立三錯誤提高為反馬列、反國際的路線錯誤，他們也被指責為調和主義，尤其對瞿秋白主持會議和繼任政治局委員不滿，派米夫來華就是要糾正他們的“錯誤”和把秋白拉下馬。周恩來因多數反對，以18 ：6票否決了要他退出政治局的提案，米夫、王明也認為由於實際工作離不開而讓他戴“罪”立功。[86] 但瞿秋只能跟李立三、李維漢一起退出政治局。另一方面，當時的情況也不允許像他這樣著名的共產黨領導人進行活動，加之他的病情日重，因此只能像他在《多餘的話》中所說，“告了長假休養醫病”，等到在上海連養病也不可能了，就又“跑到瑞金”。

當然，這還不能完全回答張聞天的上述提問，為什麼要把權交給他們這些非中央委員（主要指博古和他）。至今也還沒有看到有什麼史書能對此說清楚。許多書上說是由於四中全會後，已由並非政治局常委只是取代劉少奇任江蘇省委書記的王明掌了實權(不少正史上還寫成“王明一派人”或“王明等”，卻又不能具體指出是哪些人），因此臨走時定要將中央權力交給屬於他一派並忠於他的人，還描寫得具體生動，有鼻子有眼。但都沒有提出具體根據，看來都是按教條宗派“篡黨”“奪權”的模子套的。也沒有談及周恩來（臨時中央的名單是他親筆所寫和親自宣讀的)、劉少奇、陳雲等中央大多數人的態

度，是反對呢還是只聽王明擺佈？而且這也無法說明後來為什麼臨時政治局和蘇區中央局聯席會議上多數人推選博古為總書記，當時並未說這是遠東局或國際的意見，博古本人還“在形式上推了推，‘請別的同志擔負吧！’”[87] 可見，至今流行的一些說法，不但是人云亦云，而且還在不斷加油添醋，這就只能離史實越來越遠。實際情況大概要比這些描述複雜得多。看來可能是由於工作重點和主要幹部都已轉移到蘇區，留守中央一則是臨時的，二則重要性和任務也大為減輕(白區形勢險惡，蘇區鞭長莫及。當時明確說的也是同上海的遠東局聯絡和協調各地組織)，因而帶有某種維持會性質，既找不到適當的人抓總，就找幾個被認為所謂理論水平高(這在當時是個重要條件，實際經驗則不受重視)、名氣還不太大、尚未引起敵人特別注意、叛徒又不大認識、又得到遠東局信任和年輕能幹的人了（常委中加上盧福坦大概只是作樣子，作用不大）。

還應一提的是，不能用執政黨的條件衡量秘密黨時的人和事。那時是提着腦袋幹革命，隱姓埋名（不大計較名利地位），四處奔波，職務變化和工作調動是常事，人們也多習以為常，沒有多少等級觀念，也不講究論資排輩。所以張聞天事後還說，“我當時對這種‘提補’（指被提補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毫不覺得奇怪，因為在秘密黨內，這是常有的事。”[88] 鄧小平就是在24歲時做了中央秘書長，在六大前後半年多和李維漢、任弼時組成“三駕馬車”的留守中央領導全國工作的。即使在蘇區和抗戰後的解放區，也不一定按“台階論”、“等級制”。例如楊尚昆 1932 年秋後任上海臨時中央宣傳部長，1933年初到蘇區卻做了蘇區中央局宣傳部的宣傳幹事，不久又出任三軍團政委，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劉少奇反在他領導下任政治部主任。連延安整風期間都是“有經有權”，不完全“循規蹈矩”的。例如一直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劉少奇，1943年中央機構改組時卻一下成為三個書記之一，黨中央的第二把手。又如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的彭真，回延安後就當了多數七大代表參加整風學習的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校長為毛澤東。參加黨校工作的彭真和林彪當時被傳為一政一軍兩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1944年又替代了政治局委員陳雲連任過七年的中央組織部長(時值審查幹部、特別是七大代表資格和準備七大。陳雲是當着劉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的。[89] 他則轉任西北財經辦事

處副主任。這時邊區已做到“豐衣足食”，很難說是後一工作更重要）。同樣連中央候補委員也不是的薄一波卻可建議開華北工作座談會（從毛澤東起幾乎所中央領導都是或多或少參加了的），並被推舉為主席，使任政治局委員的彭德懷挨了四十多天不公正的批鬥（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說法還是“鬥了我”）。這類例子還有許多，如高崗的迅速上升和陳伯達、胡喬木等得到重用等，茲不多舉。而另一方面，作為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連在晉西北作農村調查，後來也因不受代理區黨委書記林楓的歡迎而不得不提前離開，1944年只當了個中央政治材料室主任，領導四五個人編寫《參考資料》。[90] 周恩來此時也幾乎無“事”可做，說話也不大管用。如他曾致信晉西北的廖井丹證明穆欣無問題，但主持搶救的林楓不予置理。[91] 談論這些並不是要討論這些事本身的是非，只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即成立臨時中央及其人選難免有點不周，只強調幾個非中央委員是“一步登天”、移交的純宗派性質和手續不全等，不但過分，且不公正。同六七十年代“四人幫”的上台和單憑偉大領袖一聲號令就任免黨國領導人，就更不能同日而語。

總之，要全面地評價歷史上的（而不是在安全和優越條件下想像的）臨時中央，恐怕也還用得着一分為二的方法。即一方面，它執行的是共產國際通過四中全會強加給中國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接權的博古、張聞天既忠實執行又缺乏經驗，還要發號施令。其餘如陳雲、康生等人也都是順着來，跟着走。這是他們在延安整風期間正式作了檢討的。國際的錯誤（後來都稱王明路線）又遇到博古這樣的盲目而剛愎的執行者，遂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很大損失，主要是九一八後沒有及時適應民族革命高潮而轉變策略。但另一方面，說臨時中央“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在敵人統治區把黨鬧個精光，一點群眾力量也鬧個精光”，[92] 白區黨和群眾工作損失百分之百，則是不顧事實的故意誇大（毛澤東後來也稍有點更正，“過去說損失百分之百，現在看沒有到那樣的程度，還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損失了。”[93] 但沒有看到劉少奇的更正，特別是至今許多書和文章還在繼續重複以前的誇大之詞）。因為一則黨還在白區發揮着領導作用，特別是以上海為主的文化界反“圍剿”的第二條戰線和各種愛國組織的建立，從北平開始的“一二九”運動和東北興起義勇軍等。這哪能說“精光”？恰巧證明

不僅有政策，而且還有組織有人。所以，“一二九”時任北方局書記的高文華以及許多白區工作者如王世英等，在幾十年後也一直對完全否定白區工作不服。二則臨時中央時期各地黨組織的重大破壞及其造成的損失也遠沒有以前（1927—1930年）大，把白區損失的帳完全算到臨時中央的頭上是違背事實和有欠公允的。三則遭受損失也不能只說成是黨本身“斷送”的，而不提敵人的破壞。這就使人忽略了當時的那種殘酷環境，即使路線正確也會遭受損失(隱蔽的好，損失會減輕，但仍不可避免)。這裏舉個相反的例子。黨史上有一不可動搖的結論，即中央到陝北後路線早已是正確的了，但此後卻發生西路軍兩萬多人的全軍覆沒（只李先念帶了四百餘人撤到新疆）。黨史書上對造成損失七千人的皖南事變總要大書特書還不準確地批判項英為右傾機會主義，但對西路軍的失敗卻輕輕帶過(以前還推到張國燾的頭上）。這種作法，是有悖於中國史學“求真實錄”的光榮傳統的。

臨時中央雖然犯了嚴重錯誤，但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也不能完全抹煞。說它“只有罪惡無功勞”，“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無處不被其毒”等，[94] 不只顯得用辭過火，而且也離事實太遠。至於諷刺挖苦和近乎謾罵，動輒“老爺們”，“我們老爺是一條最可憐的小蟲，任何世事一竅不通，……對於許多聰明勇敢的同志……則加以流氓式的武斷和威脅，……這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事。”[95] 就已經不像黨內鬥爭，更談不上“與人為善”了。這大概是毛澤東極為珍愛的文章卻不能發表的原因所在。其實，臨時中央在有些地方也還是功不可沒的。首先，它的大方向正確，這是上述毛澤東也承認的。為數不多的這批人，不畏艱險，戰鬥在敵人的心臟，高舉革命和救國旗幟，主張和宣揚土地革命，號召和組織抗日反蔣鬥爭，協調全國黨和群眾組織，在白區保存了(不少城鄉還有所發展，如1932年在敵心臟上海紀念九一八的一個月裏，就吸收新黨員千餘名，新建支部94個[96]) 一些革命種子和組織，做了許多實際工作，始終保持着黨是全國人民希望所在、特別是抗日救亡旗手的形象。這個時期的許多進步人士和進步運動，也多和黨有關係。這些都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俱在，無須多講。這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臨時中央還根據四中全會後的決定組織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決定以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兼人民委員會主席。這時，毛澤東雖然黨內地位不

高，又在剛才開過的贛南會議上挨了批和被取消了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但卻因當選中央蘇區主席而從此名揚四海，在國內外成了中國黨、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象徵。這為日後毛澤東被確立為領袖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主席”的稱號也從此一直保持了一輩子。

（二）張聞天在臨時中央的地位和作用

張聞天同臨時中央的關係和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這是經過一再清算，他也交代清楚了的。他是臨時中央的第二把手，忠實執行共產國際和四中全會的極左路線，在宣傳方面犯有許多錯誤。他也一直承認和檢討是“左”傾錯誤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這都是沒有問題的。但對他在臨時中央的工作採取一筆抹煞和全盤否定（“只有罪惡無功勞”）的說法也是完全錯誤的。他臨危受命，在一些同志根據決定撤離或隱蔽起來的情況下，仍不計個人安危，堅守崗位，積極工作（在國際批准的臨時政治局成員中就有盧福坦、李竹聲、黃平、王雲程四人先後叛變）。臨時中央高舉革命紅旗，戰鬥在敵人心臟，也有他的一份功勞。此外他還有些特殊的貢獻，尤其是在他較為熟悉的文化領域。由於張聞天的為人正如胡喬木後來所說，“敢於獨立思考，敢於獨立地系統地提出和堅持自己正確的政治見解和理論見解”，具有“不迷信、不迎合、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唯物主義精神”，所以“在實踐中碰了釘子以後，他能夠思考而逐步在某些具體政策問題上突破‘左’傾的桎梏”。[97] 例如，他被稱為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取得勝利的奠基人；[98] 他首先站出來批判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黨八股，對黨領導左翼文藝和成立文藝界統一戰線起過重要作用（胡喬木在上述回憶文章中說，發表在《鬥爭》上的“這篇論文當時實際上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顯然是不合乎實際的。這從當時馮雪峰及其他一些左翼作家的文章中就可看出來）；在《鬥爭報》上著文反對河北高陽蠡縣暴動的“左”傾冒險；在會上批判中央蘇區抓“AB 團”和“肅反工作成為最大的罪惡”；以及反對王明對工運估計過高等。[99]

組織路線是服從和服務於政治路線的。張聞天既然在政治上犯“左”的錯誤，組織路線上也不能不犯錯誤。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他有宗派主義的思想和情緒。例如他同意任弼時、項英批評毛澤東的

“狹隘經驗論”和認為“山溝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先後同意周恩來取代毛澤東的職務和讓毛回後方專搞政府工作；公開批評劉少奇並同意撤換其在全總的領導；瞿秋白在他領導的宣傳部工作，他承認尊重和照顧不夠；對鄧中夏，他也有排斥之意，等等。[100] 所有這些，當然他都是不能辭其咎的，但卻並不能成為證明他屬於有組織的教條宗派和進行有組織的宗派活動的依據。

如果說在政治路線上他和王明、博古、王稼祥都擁護和執行四中全會制定的極左路線，因此應算作一派(從派的廣義講也說得過去。但當時的政治局，包括周恩來、張國燾、項英、任弼時等都在內，沒有一個是反對國際路線的。他們不也都可算作一派了？這恐怕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中共黨內鬥爭的“宗派”）。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看，因擁護同一路線成為一個有組織形態的宗派，在歷史和現實中都是不能成立的。如前所述，搞宗派必得是有組織、違反黨紀的陰謀活動。而眾所周知，張聞天無論是政治上還是作風上，一生為人都是光明磊落、奉公守法，從不結黨營私、搞見不得人的事。而他又恰巧同王明、博古、王稼祥一直不和，更談不上拉幫結派進行宗派活動了。他回國後沒有見過米夫。他說，有一次“周恩來同志通知我，說米夫要找我談談宣傳問題，但屆時沒有來。顧順章被捕後，米夫即走了”。[101] 至於王明，他的印象一直就不好，在中山大學時就看不起。[102] 回國後因王明任江蘇省委書記，“無直接工作關係，故來往很少”。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還因罷工問題（他反對王明對革命形勢估計過高）“頂了一陣”。事後又給國際遠東局代表雷利斯基寫了一封信告王明的狀。王明走時既未向他作任何交代，走後也從無聯繫。[103] 這哪裏談得上宗派關係和宗派活動！

四中全會後，博古因任團中央書記，張聞天同他的接觸就更少。臨時中央成立後，接觸多了，但卻使他對博古增加了不滿，經常發生點矛盾。他特別怕博古批他右，所以處處設防，寫文章時要講反“左”，也得先強調一下反右。後來他“稍微感覺到，博古想把他排擠出中央”。由於叛徒告密，他的住地團中央機關被抄，只得離開中央去做實際工作。博古意欲派他去北方工作，他則要求去蘇區。經請示國際，覆電決定臨時中央政治局全部遷入中央蘇區。[104] 於是，作為臨時中央“三駕馬車”[105] 的張聞天先走，博古和陳雲隨後同行，從

此結束了上海臨時中央的存在。從這中間也實在看不出張、博之間的宗派活動。至於王稼祥，則早在四中全會後就已和任弼時去了蘇區，沒有同張聞天在臨時中央共過事。

註釋

1 毛澤東：1959年8月20日《給張聞天的信》、《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問題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8)，第399頁，432頁。

2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人民日報》1967年8月16日。

3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頁。

4 毛澤東：1959年8月20日《給張聞天的信》、《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問題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8)，第399頁，432頁；《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人民日報》1967年8月16日。

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315頁。

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49頁。

7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821-827頁。

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2頁。

9 《周恩來選集》上卷，1980年版，第185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9，294頁。

11 《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大事簡介》，國防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頁；《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頁。

12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63頁。

1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9頁。

1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9頁。

1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9頁。

1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6-289頁。

17 塔斯社 1988 年 8 月 14 日報道。

18 《共產國際犯了兩個大錯誤》，載《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1 頁。

19 《六大以來》（下），第 1 頁。

20 《整頓黨風學風文風》，載《整風文獻》1949年解放社版。1953年編入《毛選》時改了標題，也刪去李立三對共產國際鬧獨立性一句。

21 例如胡喬木在《毛主席打破了共產國際的教條化傾向》的談話中就說，中國黨同共產國際進行了長期的堅決的尖銳的鬥爭。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 77 頁。

22 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58頁所引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

23 見1943年12月28日《中央關於學習〈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 142-143 頁。

24 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59-162 頁。

25 1956年9月同南共代表團的談話，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54 頁。

26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02-803頁。

27 參見《毛澤東年譜》有關部分和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三章。

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7 頁。

29 參閱唐純良：《李立三全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下174 頁。

30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第 646 頁。

31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71 頁。

32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中卷，第 332 頁。

33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8，9 頁。

34 《布爾什維克與中國革命》，見《百年潮》2000 年第十二期李玉貞的評介。

35 《張聞天傳》，程中原著，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第 146-147 頁，另見張聞天 1943 年《反省筆記》。

36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602頁。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1頁。

38 見《徐以新傳》，李樵着，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5頁。另見柳百琪：《〈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稱號的由來》，《炎黃春秋》，1999年第12期。

39 汪雲生：《二十九個人的歷史》，昆侖出版社1999年出版。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318頁。

41 可參閱《遵義會議決議到底是怎樣起草的》，《炎黃春秋》，2000年第九期。

42 事實是，會議12月17日開幕，25日 結束，而張聞天起草的決議已於15日油印散發，後來通過的決議文本與此完全一致。見《張聞天對瓦窑堡會議的貢獻》，《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三集。

43 郝景泉：《黨史風雲實錄》，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

44 《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頁；李樵：《徐以新傳》，第89，91頁。

45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46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47 吳亮平：《為真理而鬥爭的一生》，《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49 蕭揚等1996年在莫斯科查檔，全總530(原中山大學檔案)，目錄，卷宗5，第29頁。

50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5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9頁。

52 轉引自《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4頁。

53 《毛澤東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頁。

5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5頁。

55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63頁。

5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5頁。

57 《周恩來年譜1898—1949》1989年版，第211頁。

58 李志英着：《博古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版，第91-92頁；葉永

烈着：《陳雲之路》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頁。

59 《黨史風雲實錄》(上)，第161頁。

60 見該書第155頁。

6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21-323頁；《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大事簡介》，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頁；《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01頁。

62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64頁。

63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05，206頁。

64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331頁)中說，四中全會後不久，“恩來同我談話時，首先要我到湘鄂西中央局任負責人。我表示不想去。又提出要我到贛東北方志敏、邵式平同志那裏任特委書記。我表示也不想去。”

65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14頁。

66 分別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47頁。

6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75頁。

68 《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頁。

6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70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63頁。

71 以上均見《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118頁。

72 《六大以來》(上)，第211-224頁。

7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7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3頁。

7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76 《學習和時局》，《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38頁。

77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13頁。

78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38頁。

79 《周恩來年譜1898月1949》，第211-212頁；《劉少奇傳》(上卷)，第164頁。

80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12頁。

81 均見張聞天1943年第反省筆記》。

82 《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212-213頁。

83 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28頁。
8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85 以上均參見《劉少奇傳》(上)，第159-183頁。
86 《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三篇第二章第五節。
87 博古在七大的發言，《遵義會議文獻》，第108頁。
8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89 《陳雲之路》，第75頁。
90 《鄧力群談張聞天與劉英》，見《張聞天文集》(第四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頁。
91 穆欣：《劫後長憶》，第132頁。
92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41頁。
93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67頁。
9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7頁。
95 轉引自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恩恩怨怨》，第150頁。動輒"老爺們"，參閱《毛澤東文集》第二卷《駁第三次"左傾"路線(節錄)》。
9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86頁。
97 《回憶張聞天同志》，《回憶張聞天》，第21頁；另參閱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17-118頁。
98 薛暮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張聞天》，《張聞天研究文集》第二集，第25頁。
99 以上均據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和《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12-189頁。
100 以上均據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和《張聞天年譜》上卷，第112-189頁。
101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02 西門宗華也有此印象，見《憶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政治風雲》，《中共黨史資料》，第68輯。
103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04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
105 葉永烈：《陳雲之路》，第30頁。

第六篇

三十年代中共黨內真有兩大宗派嗎？

一，從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談起

（一）說在中央蘇區有兩大宗派，說不清也說不通

在延安整風期間及其以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中央蘇區存在兩大宗派集團，特別是教條宗派。有時他也把兩個混到一起，例如說："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遵義會議後這個集團分化了。"[1] "六，黨內宗派現在是否還有？我認為經過幾次分化是沒有了。經過遵義會議的分化，抗戰初期的分化，又經過這次分化，現在是沒有這個宗派了。"[2] "在黨的歷史上曾經存在過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但自遵義會議以來，經過各種變化，作為政治綱領與組織形態的這兩個宗派，現在已經不存在了。"[3] 但是直到 1943 年 12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所發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中還說，"但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進行其反黨活動。"似乎兩個宗派又變成了一個宗派，等等。這就是說，起碼在遵義會議前，中央蘇區和全國都還存在兩個宗派（又經常合二為一）並進行着活動。至於兩個宗派如何界定，怎樣活動，它們間的相互關係如何，卻不但當時，而且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說清。原因大概是沒有的事說起來一定漏洞百出，不如含糊了之。

實際上，還在被看作教條宗派控制下的臨時中央進蘇區前，毛澤東就已受到排擠，黨權和軍權也陸續被剝奪了（倒是臨時中央開頭撤換了項英，把代中央局書記交還給了毛澤東）。"開始排擠毛澤東在

中央蘇區對紅軍的領導”[4] 是1931年11月任弼時、項英主持召開的贛南會議。他除受到未指名的嚴厲批判外，隨後還被取消了一方面軍總政委和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改由周恩來正式擔任。(周恩來臨終都在檢討，認為這是他奪了毛澤東的權，造成一生中最大一次錯誤。毛對此也始終不放，認為需要時就拿出來敲打，直到去世。)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更被完全剝奪，並為後來的臨時中央直接指揮紅軍開闢了道路。[5] 與會的是後方四名委員任弼時(代書記)、項英、顧作霖、鄧發和前方四名委員周恩來(本為書記，因去前方由副書記代)、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前後方委員人數相等，在對毛的處理上卻意見對立(前方主張毛留前方指揮，後方要毛回後方專做政府工作) 。但後方委員的作用大，既有臨時中央的後台，周前期會議又未參加，加上得到參謀長劉伯承的支持，[6] 遂使毛從此失去軍權。可見，剝奪毛澤東黨權軍權的並不是臨時中央，反而是在毛自己創立和領導的蘇區內部。

從會議組成看，只有一個王稼祥被算作教條宗派，但正是他說“大敵當前，不可換將” ，明確支持毛。後來任弼時等後方四位委員向中央報告，除歷數毛的右傾錯誤和決定讓他回後方外，還批評周恩來搞調和，替毛澤東打掩護。[7] 從這兩次會議的實際情況看，直接剝奪毛澤東黨權和軍權的也不是教條宗派，倒是或明或暗算作經驗宗派的人，即周恩來、任弼時（延安整風時和以後均未公開指明過，但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卻把他同教條宗派並列在了一起，一再說“我的‘狹隘經驗主義’稱號，是任弼時加的” ，“洛甫、任弼時解除武裝，靠《六大以來》、《兩條路線》” 。林彪也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8]） 。此外，可算入經驗宗派的，大概還有朱德、項英、鄧發、彭德懷、李維漢等人。這樣看來，奪毛澤東權的主要是經驗宗派了。當然，他們如果沒有得到控制臨時中央的教條宗派的支持也是辦不到的。

但這兩個風馬牛宗派是個什麼關係，又怎麼會搞到一起的呢？這個問題在延安整風開始時也確實難倒了大家，連毛澤東自己也說不清。還是借助這兩大宗派的主要成員才得到理論上的解釋，而且至今仍保持着它的權威效用。這就是《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的，“在(1941年) 9月29日會議上，洛甫同志在檢討主觀主義錯誤時對狹隘

經驗主義的問題從理論上作了些分析，第一次明確指出：教條主義常與經驗主義結合而互相為用，教條主義無經驗主義者不能統治全黨，經驗主義者常作教條主義者的俘虜。……後來毛主席在《整頓黨的作風》中講主觀主義的兩種形態吸收了聞天同志的觀點。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關係的思想也寫進了後來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9] 其次是周恩來1943年9月寫的第四篇學習筆記所說，“第三次“左”傾錯誤中教條主義者所以能在中央取得統治地位，同犯有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受其披着‘馬列主義理論’外衣迷惑有關。”[10] 他還把宗派問題分為三類：一類是有宗派觀念的；一類是有宗派行動的；一類是有小組織活動的。[11] 這前後的解釋，確實解決了整風碰到的一個大難題。因為那時除了毛澤東和劉少奇兩邊不沾和那些明顯的甚至被點名的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外，其他領導人不是這邊就是那邊，總沾點邊，沒有這一理論說明，連自己都不好檢討。

但是現在仔細看來，這種解釋實際上是空話，並沒解決問題。因為中國黨的領導問題並不是幾個中國人在那裏鬥法，關鍵是上面還有共產國際的嚴格約束。試想，如果沒有中國黨是共產國際的支部和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這些鐵的紀律，博古就靠那點“馬列主義外衣”竟能把中央蘇區的朱毛周任項以及廣大幹部迷惑住，輕易地奪了權？而且在推選博古當總書記的聯席會上，毛澤東、劉少奇等都在，並未見到他們提反對意見的記載。至於周恩來關於宗派的分類，也許是為了解決經驗宗派這個難題，因為既然定了性，承認了它的存在，卻又很難捏在一起。例如周恩來、彭德懷、項英、陳毅等怎麼湊成一個宗派。還不說有些人更不沾邊，無法拉到一個宗派中來。這樣一分類，就可各就各位，不論主觀還是客觀、有意或是無意、動機與效果，都可找頂自己同意又得到大家認可的帽子戴。（實際上也有難處，毛澤東後來一再強調宗派的“組織形態”，你只講觀念哪兒行？）至於對教條宗派來說，雖然對後來的解釋（不一定有什麼組織，主要是觀念和路線相同等等）有所啟示，但前面已經講過的，並不解決問題。因為從1943年到現在一直肯定教條宗派是個小組織（如胡喬木）、小集團。而且按毛澤東的說法，兩者也很難分開。你看：“過去錯誤路線有一個大宗派在實行篡黨，至遵義會議受到打擊”。[12] 這又是指的那個宗派？誰能說清楚？

但不管怎樣，臨時中央到蘇區後博古反而當上了總書記，集黨政

軍大權於一身，這單有雙方與會的佔極少數的張聞天、王稼祥等幾個“教條宗派”的支持是辦不到的。中央的絕大多數還是“經驗宗派”(即使不算毛澤東、劉少奇）。而且這時博古不但權大了（在上海還只是遙控，現在則是直接指揮），而且更加剛愎，家長制作風大為抬頭。下車伊始就掀起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鬥爭，還沒看到有哪位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出面反對和制止的材料。這自然也不能只靠張聞天一個人的支持和寫文章鼓吹。例如反江西的“鄧毛謝古”、追查其“反黨小組織系統”和綱領，就主要是羅邁組織和指揮的，這也是他多年後仍檢討說，“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13] 後來博古又搬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就連周恩來、朱德臨陣的軍事指揮權大半被剝奪了，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長征。

（二）張聞天在中央蘇區的活動同教條宗派掛不上鈎

張聞天到蘇區後，開頭在政治上仍堅決貫徹執行四中全會後的極左路線，下車伊始就著文竭力反右，特別是跟着博古大反江西的“羅明路線”，還打擊了一批老幹部，如反對中央政府何叔衡的“右傾觀點”和福建省張鼎丞的“錯誤”等。[14] 但正如前面引證胡喬木等人的評價，他為人正直，實事求是，在實踐中碰了釘子後能逐步突破“左”的桎梏。到蘇區接觸實際後，果然就發生轉變，開始了同博古在政治上的分歧與爭論。例如關於對“三條件”（紅軍“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的瞭解，博古說只是針對下層的宣傳號召，他說是既對下層也對上層，既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對十九路軍的態度，他批評博古“完全採取開玩笑的態度”，而主張“在軍事上積極配合”。此外，他還在一些具體政策上反“左”，如反對蘇維埃經濟政策中的“左”、勞動政策上的“左”、黨內鬥爭和肅反問題中的“左”（毛澤東在打“AB團”、富田事件中錯殺的好同志以萬計，還沒有材料證明張聞天胡亂殺過人，有材料的，反而證明是救了劉曉、傅連璋和到陝北後的劉志丹）等等。當然，總的說來，張聞天在蘇區的整個期間執行的仍是“左”傾路線，和博古在大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其實，除軍事上有明顯分歧外，也沒見到其他領導人包括毛澤東，站出來反對大方向即總路線）。但在相互關係上兩個人就一直不和。張聞天看不起博古，說“他當總書記，爬在我上面，我總覺

得他‘不配’……何況他耀武揚威起來，又要在我頭上屙尿呢！”[15] 矛盾的發展，促使博古開始排擠他。五中全會後，張被派去做政府工作（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他認為這是博古、羅邁的一箭雙雕，把他排擠出黨中央，又把毛澤東排擠出中央政府，只當蘇維埃主席。到廣昌戰鬥後的一次討論會上，他更和博古直接吵了起來。此後即派他去閩贛巡視(實沒必要，因項英才巡視回來)，政府領導交給羅邁，直到長征出發前他才回來。這時一切均由“最高三人團”(李德、博古、周恩來）決定，關於長征時政府系統幹部的去留，他也只按羅邁 （作為中央組織局主任也參加三人團一些工作)關於三人團的通知行事。[16]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也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博古負主要責任，其次是羅邁。張聞天算犯第二等錯誤，主要在宣傳方面有許多錯誤。[17] 羅邁的回憶卻不盡相同。[18] 這裏只舉不許瞿秋白跟隨長征為例。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說，秋白向他提要求，他表示同情，反映給三人團，博古不同意。劉英後來在訪問中講得更具體些。她說，洛甫提出後，博古反對，羅邁說是累贅——因秋白有病，周恩來沒說話，於是秋白就被留下了。羅邁的說法則是一切人的去留他只是執行三人團的決定。張聞天由於深感處於無權境地，因而極為不滿，並在同毛澤東閑談中傾訴了這些不滿。[19] 雖然這裏用的主要是張聞天提供的材料，但卻說明了一點，就是到蘇區後他和博古既無宗派關係，更無宗派活動。至於同王稼祥，由於沒有工作關係，王又長期養傷，平時幾無來往，只是長征後才接近起來，同毛澤東一起形成“中央隊的三人團”，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除非把長征中這種結合說成宗派活動，否則張聞天和王稼祥之間根本談不上宗派關係，即使用一些黨史研究者發明的上述解釋，在這裏也無法自圓其說。

從以上情況看來，並沒有中央蘇區存在一個教條宗派的真憑實據，更談不上“王明小組織”的活動了。被稱為教條宗派主要成員的博古、張聞天、王稼祥之間的關係尚且如此，還有哪些人能組成這一宗派集團？何況博古這時任總書記，名正言順代表中央。他得到的支持又主要不是張聞天、王稼祥，而是羅邁（羅本人又一再聲明“我不是王明小宗派裏面的人”[20]）、項英、周恩來等被算作經驗宗派的人。我們黨一條最重要的紀律是“全黨服從中央”，既然中央是被一個“反黨宗派”（主要是博古或王明碼頭）所把持，全黨（包括每個

黨員)該怎麼辦？服從，就是跟着“反黨”；不服從，則是嚴重違紀，可能被清除出黨。這恐怕是研究中共黨史以至黨建學說的人，碰到的很難也許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樣看來，在蘇區比較活躍的反而是經驗宗派了。但這並非從延安整風到現在的經典說法，因而沒人敢這樣說；而且也實在說不清。最著名的當算周恩來和項英，但他倆能算一個宗派嗎？又怎麼個宗派法？作為第一批“欽差大臣”的任弼時和顧作霖在兩大宗派中算在哪邊都不合適。至於彭德懷以及其他被別人定為或自己在整風中戴上經驗主義帽子的，算不算經驗宗派？又是何時參加的？有些什麼宗派活動？看來也是一堆糊塗帳，那些至今仍在寫兩大宗派的黨史專家大約也是肯定說不清的。

二，說三十年代存在兩大宗派缺乏根據

根據以上的敘述和分析，大概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初步看法，並附帶作點說明。這就是：第一，中共黨史上一直存在教條主義，但並不存在一個從二十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到抗戰初長江局時期的教條宗派，“篡黨奪權”之說更站不住。這種說法是完全違背黨章黨規的。同樣，經驗主義也很普遍，但在蘇維埃運動後期和抗戰初期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經驗宗派。 第二，被定為兩大宗派的重要成員，也是延安整風中被認為檢討最好的周恩來和張聞天，我因在他們領導下長期工作過，所以根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可以斷定他們不是拉幫結派搞派性和進行宗派活動的人。他們的檢討和反省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不可看作定論的。第三，黨內鬥爭中使用的“宗派”（或“集團”、“聯盟”）和“路線”，多是用來對付不同意見或反對派的兩頂帽子和整人的兩根棍子，源自蘇聯(也是教條主義)，並有發展，如上綱越來越高，從不同的派別和主張、到反黨再到反革命，而且適用範圍也越來越廣。第四，有必要探討這一現象的產生和能夠長盛不衰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危害，從中汲取應有的教訓。下面就稍加展開作點說明。

（一）從上層關係看，兩大宗派之說不能成立

沒有一個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這是很明顯的。不但張聞天、

王稼祥同王明、博古沒有什麼宗派關係，進行的不是什麼宗派活動，就是王明同博古之間也並無充分證據說明他們是宗派關係和進行了宗派活動。一些黨史書上的說法，包括《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的最終解釋，看來仍然是根據延安整風時的基調和後來中央關於王明問題的決定進行的推測，並沒有提出任何有根有據的原始資料。《歷史決議》中提到的四中全會前王明等的宗派活動也顯得勉強。這些人中除博古外還有王稼祥和何子述烈士。(四中全會後羅章龍聯合何孟雄等十幾人，召開“反對四中全會代表團會議”，成立“臨時中央幹事會”，十多天後何孟雄等同志英勇犧牲。但無論如何這算宗派活動。陳郁因作了檢討才免於開除，送蘇聯學習。但《歷史決議》卻贊揚何孟雄，沒點名地批何子述等。這就太不公平了。)而且國際批評三中全會的來信，他們也只比中央早知道十多天。另一明顯反證就是四中全會上博古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撈到，只當上一個團中央宣傳部長。按理，會議由米夫操縱，候選名單米夫又以國際的名義加以肯定(據李維漢說是“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了一個名單，”[21] 由於會上有人反對，米夫才說這是國際的意見)，選博古以及王稼祥做個中央候補委員應該說是很容易的，何況連劉少奇都從中央候補委員進入了政治局。至於毛澤東在《歷史草案》中批評的“僅以兩個政治局委員指派臨時中央的領導人”，[22] 不少黨史著作又進一步說是王明一個人(那一個人呢？) 提出博古負總責，卻也未提供哪怕一點證據，大約純屬主觀臆測或順水推舟。王明到莫斯科後同博古的聯繫，已經是駐國際代表團和臨時中央的關係了，而且1933年7月康生去莫任副團長後，就多以王康聯合署名。特別應該提到的是，1932年以後，由於法西斯威脅日益嚴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政策也開始進行調整，王明很快就跟了上去。而博古不知是由於消息閉塞、感覺遲鈍，還是個性剛愎或自恃有遠東局和李德的支持，反倒越來越“左”，因而在一些具體政策和作法上還受到王明的批評。王明 1945 年 4 月 20 日寫給六屆七中全會的信中列舉的有些事例，如通過國際致電中央提議修改在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某些過左之處；不同意亂用“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和亂打黨團的許多地方組織與幹部；批評反羅明路線擴大化和反對鬥爭毛澤東等，都不完全是自吹或捏造。[23] 例如王明康生 1934 年給政治局的信中就批評了臨時中央的某些過左行

為，提到："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分的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舉了反羅明路線擴大化為例）"[24]。在博古進入蘇區後排擠和打擊毛澤東的時候，王明卻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大力宣傳毛澤東，並一再制止對毛澤東的排擠。如博古擅自作主以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後，王明當即來信提出批評，說莫斯科對此"很不滿意"。[25] 直到1937年"十二月會議"，王明還嚴厲批評博古極左頂峰的六屆五中全會。[26] 至於他們有無私下秘密聯繫，並沒提出什麼有關材料。單從上面這些情況看來，這哪裏像宗派關係和宗派活動？當然，他們在總的路線上還是一致的，或說成博古是王明路線的繼承者，但這終究不能說是宗派。而且在總的路線上提出不同意見的又有什麼人？有何文獻證明（事後諸葛亮的某些《回憶錄》不足為憑）？

說三十年代黨內不存在一個篡黨奪權的以王明為首的教條宗派，並不是說王明不搞宗派。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對後一個問題，由於毫無研究，因此無法來談。這裏只能提一點個人看法和推論：如果王明三十年代搞宗派，那它的重要成員首先應推康生。他們兩人從上海到莫斯科一直合作得很緊密，這方面的情況《王明評傳》和《康生評傳》以及其他一些黨史資料已講得很多。直到四十年代季米特洛夫來信還專門提到康生不可靠。但毛澤東卻始終堅持"康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並使他扮演了反對王明宗派的英雄，地位得到不斷提升。所以以往在談兩大宗派時從來都是把康生排除在外的，直到康生和毛澤東先後去世。

至於上引中央通知上說的，1938年"這個宗派又利用長江局活動"，或如毛澤東所說，"抗戰以後，原來教條宗派有的同志還有宗派活動。……在武漢時期形成兩個中央，造成黨內危機。"[27] 這當然有點聳人聽聞，實際上就是李維漢所說的，1938年約有半年時間只是毛澤東個人又處於少數以至孤立地位，一次對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窑洞。"[28] 這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武漢時期是否有教條宗派的活動，看來恐怕不能這樣說。因為除了王明鬧獨立性的言行外，當時長江局同中央在一些問題上確有不同看法（那時還沒有六屆六中全會那些關於統一紀律的規定），而長江局的不同意見，除王明、博古外，重要成員周恩來及其他人也是同意的。例如致電書記處批評晉察

冀邊區政府成立未經備案，就是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共同署名的；1938年2月7日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電報，也是他們聯署。[29]其他情況，大多如此。實際上，當時在長江局起主要作用的不只王明，還有周恩來。他在延安整風後也一直在為此作檢討。這不但不能算到教條宗派的帳上，而且也不能看作宗派活動。因為有不同意見，光明正大地提出以至爭論，在黨內生活中應當看作正常，否則只服從一個人才算無“黨內危機”，那就根本無黨內民主可言。第二，命令不出窑洞並非史實，只是一種憤激和誇張的說法（在毛澤東的語言中，這類詼諧、誇張以至極端的說法甚多，可惜有些黨史研究者只從表面瞭解還真用作憑證，例如說不敢到黨校作報告；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投了決定性的一票等，都並非事實）。單從《毛澤東年譜》中就可看出，在這半年多，他一直在以軍委主席的身份或同張聞天等人聯署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不斷向各地發出命令或指示，數量並不比以前少。至於處於少數和感到孤立，只是領導層意見一時未能取得一致的表現。這在黨內生活中特別是戰略轉折時期和尚未樹立起絕對權威的情況下並不奇怪，而且應該看作是正常的，那種以人劃線和個人說了算反倒不正常。其實，一些意見分歧也不完全是從1937年十二月會議始，在這之前的洛川會議上就已存在。主要是在對國民黨態度和軍事戰略方針上一時沒能達成共識。以後一問題為例，毛澤東一直強調“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一般稱“山地游擊戰”），在中央領導中完全同意的大約只有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彭德懷等則主張“運動游擊戰”（或“游擊運動戰”）。現在看來，他們也不一定就完全錯誤，不但由於後來有了廣泛的平原游擊戰，而且平型關戰役一直受到贊揚，百團大戰也恢復了名譽。

列舉這些都在於說明，談了多年的武漢時期的教條宗派活動，實際上是並不存在的。不能說只要和毛澤東有不同意見就是宗派和宗派活動。何況被列為教條宗派的成員在長江局只佔少數，其中1938年4月才去的凱豐反而因反對王明鬧獨立性而立了功，後來得以成為代張聞天的中宣部長。

由此看來，教條宗派的提法實在站不住。經驗宗派也是子虛烏有。特別是像周恩來、張聞天這樣光明磊落、鞠躬盡瘁的人，哪裏會去拉幫結派、搞宗派活動？

（二）周恩來、張聞天不是搞宗派活動的人

三十年代並不存在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還可從這樣一個側面加以證明，就是被分別列為兩個宗派的重要成員的周恩來和張聞天在當時中央領導中，包括批評他們的人在內，比較起來恰巧是最不搞宗派的人。周恩來的情況，人們都比較瞭解。這裏主要談一下張聞天，而且只能列舉幾條，以窺全豹。

1，張聞天被列為教條宗派成員是同人們平時的說法和印象相矛盾的

延安整風中批判兩大宗派是在上層很小範圍進行的，從未向下傳達或公開過。直到1959年廬山會議前，人們的印象和說法都恰巧相反，認為張聞天為人正直、不拉幫結派。五十年代我就親自聽到過一些領導同志類似的評價。連周恩來、陳毅在外交部黨組會上介紹到張聞天或談到內部工作時也都提到過。在中下層幹部中更是如此。例如張聞天任外交部副部長後，原駐蘇使館幾個幹部陸續輪換回部，於是有人反映，張聞天用他熟悉的人，是搞宗派。記得當時的新聞司司長就在一次會上說，哪有一個政治局委員只拉上幾個秘書搞宗派的，真是笑話。事有湊巧，在1959年外交部浩大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和聲勢都大於1957年的反右派）後，定案的“張聞天反黨宗派”主要成員也正是他以前的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只有三個，牽連不大。只是這時張聞天已不是政治局委員而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了。

2，從張聞天對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上看，他並無派性

前面我們從張聞天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關係上論證了他不曾參加實際上也並不存在的教條宗派，現在再從同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關係中看一下他是不是搞宗派的人，也可說是提點反證。這方面也只能順便舉幾個例子，要全面論述，恐怕就不是幾篇文章所能解決得了的，何況這裏只能寫一小段。

從臨時中央時期，張聞天不但有點看不起毛澤東，而且對之持批評態度，參與了對毛的壓制和排擠。這是人所盡知無須多講的。但這主要是出於當時的教條主義思想認識，而不是由於對毛有成見、有派性。例如在促使毛澤東成為蘇維埃主席這一重大問題上，張聞天就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蘇維埃共和國臨時

政府主席人選時，有人提出自然是特生（向忠發），被張聞天反對掉了。大家認為，蘇維埃主席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全國威望，二是在蘇區工作。經過商議，最後向忠發(可能他正好不想去蘇區，怕吃苦）說，“我同意聞天意見，……我覺得澤東可做主席。”後經報遠東局轉莫斯科得到批准。[30] 又如毛澤東對張聞天最惱火的一件事是他追隨博古反“羅明路線”，說他批“鄧毛謝古”是“指雞罵狗”。其實並非如此。張聞天在得到毛稱許的《反省筆記》中說，“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並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覺得毛澤東已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麼意義。這從我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但羅邁反江西小組的鬥爭則是直接針對着毛澤東同志的。”[31] 李維漢的回憶也許可得到點佐證：“福建反羅明路線、江西反鄧毛謝古與毛澤東有關係，……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32]

五中全會後，張聞天同博古的矛盾不斷上升，但卻逐漸同毛澤東接近與靠攏。至今還有不少黨史著作用《遵義會議文獻》上公佈的片斷材料，說明張聞天到蘇區後一年多竟不瞭解也沒想去瞭解毛澤東。其實這是只看表面文章，並沒弄清張聞天寫這幾句話的真實含義(這在分析張聞天的反省時已涉及)。正是由於在蘇區，特別是一同做政府工作後這段接觸和瞭解，才奠定了他們聯合反“左”的基礎。以後長時期，它們也有些衝突和誤會：毛對張有不少或明或暗的指責與懷疑，如認為長征中張曾支持彭德懷、林彪反過他，批評張政治動搖(指對他的態度），以及常發脾氣等，對這些，張都儘量忍讓，不予計較。

張對毛有時也有點“教條式”地按原則辦事，顯得照顧不周，如堅持少數服從多數，在鴨溪會議上撤了毛的職，1938年3月否決了毛不讓王明去武漢的意見等。但他們關係的主流還是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同張國燾鬥爭是如此，後來同武漢長江局的爭論中更為明顯。在毛澤東自認處於孤立的半年中，政治局和書記處中大約只有張聞天堅定地和他站在一起。經過長期合作和延安整風，張聞天對毛澤東已基本折服，雖然此後一直遭到不合理的對待和多次的過頭批評，以至挖苦諷刺，最後徹底打倒，還不准住在北京。但張聞天對這些都能儘量加以容忍，他始終認為維護毛的領袖地位和威信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需要。所以他雖然在路線和政策上有不同意見，對個人崇拜和獨

斷專行一直不滿，但總是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不僅不隨便講，而且仍真誠擁護毛澤東，忠誠執行他的決定。例如他調入外交戰線後仍一直想做經濟工作，曾先後托高崗、陳雲向毛澤東反映。後來接陳雲來信，說主席對你有看法，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33] 對此，他不但堅決服從，而且看不出有什麼情緒波動，使人明顯感到他已下定決心在“授權有限”的外交領域幹下去了，把研究重點轉到了國際問題，買的書也以這方面為主。但他仍關心國內建設，還經常向毛澤東反映點情況和意見。即使在廬山會議上栽了跟頭，無限期地受到批鬥。但他始終好像無怨無悔，仍然向毛澤東反映意見（如關於開放市場問題），連讀書筆記和研究心得都送呈毛審閱，直到迫害致死也不曾翻案。總之，從他同毛澤東的關係看，張聞天完全不像有派性的人，更不會搞宗派活動。

再如對劉少奇的關係。張聞天在臨時中央時期是積極參與批評和排斥劉的，他後來對此也一再檢討。但到蘇區接觸實際後，兩人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逐漸有所接近，如勞動政策等，他也開始改變對劉少奇的看法。及至到了陝北，張聞天已認識到劉特長白區工作和臨時中央的某些錯誤（但不承認路線錯誤），並對劉表示了極大信任，主動提出劉代表中央去領導北方局。此後，張劉之間的信件來往頻繁，劉在重大問題上都及時向張請示匯報。有的黨史著作談到劉少奇1937年3月4日給洛甫的信，就過去十年白區工作的錯誤進行討論，認為這是劉少奇向張聞天的挑戰，甚至說是毛澤東要劉放出的準備清算十年“左“傾路線的氣球，後因在白區工作會議上遭多數反對而暫時退卻。這也多半是猜測。劉少奇的意見，過去曾多次提過。他在信中也這樣說。此時給張聞天寫信，可能有三個因素：一是為了求得中央支持，排斥原北方局領導人高文華、柯慶施等的干擾；二是張任總書記後作風民主，對過去的白區工作已承認有錯；三是張派他去北方局說明了對他的信任，他以為能夠發泄鬱積在胸中之怨（例如他過去四年就沒給博古寫過類似的信）。可見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說是表明了張劉關係的接近和改善。但是後來白區工作會議上的路線之爭又拉開了兩個人認識上的距離。據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在延安整風中，張聞天對劉少奇以及幾個北方局的同志如彭真、林楓是有些不滿，特別是不同意他們的搶救運動作法（中央反奸鬥爭委員會以劉為首，彭

係成員之一，而他主持的中央黨校被搞成了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但對他們並無成見。抗戰後他就很同意劉少奇代主席時提出的一些戰略部署，特別是全國戰略方針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在東北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張聞天是個有意見就提、認為正確就一定堅持的人，所以在解放戰爭期間同劉少奇也還有些爭論，如土改問題（他認為劉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左”了）、城市工商業問題、供銷社分紅問題等。他也受過劉的嚴厲批評和誤解（如鄒大鵬1949年5月向劉少奇告狀，說他主張“消滅私人資本主義”，劉即以中央名義發出指示加以批評[34]）。張聞天雖然對於劉少奇的嚴厲態度和誤解批評有所不滿，但他對劉少奇還是一直尊重的。而且整個說來兩人關係也始終正常，完全看不出有什麼門戶之見。即使廬山會議也沒揭發出他有什麼反劉言行。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甘願自家受迫害，也絕不在“六十一人案”上作不利於劉少奇等人的證詞。從張劉近五十年的關係中，實在看不到張對劉搞宗派的影子。

上面只是簡單講了一些張聞天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係，單從這些即已看出張聞天完全不是個搞宗派的人。至於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就可以不講了。當然不是說張聞天同各領導人的關係都一樣，那倒不一定。據我所知，他在延安時同任弼時的關係不錯，例如對以搶救運動搞肅反和特務如麻的估計，很有意見，但沒處說話，就只能向任弼時反映。在領導同志中，他和陳雲的關係較好，經過風浪不少，但一直保持到最後。

3，張聞天的人品、作風和性格決定他不會搞宗派

即使不算在延安的接觸，從後來在東北做地方工作起，我在張聞天身邊工作也有十多年。根據當年的觀察體會和長期的研究思考，我總覺得他有點書生氣，始終保持着中國一些知識分子那種正道直行、重經輕權、淡泊名位、“君子不黨”的一面，也有經不起正面壓力和軟弱的一面。近年常和劉英談起，我說聞天同志有點“教條”，照章辦事，過分認真。最近重讀他的《論待人接物問題》，[35] 感到他真是在盡力照辦的。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對於那種“恭維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馬屁的人”，他從來都沒有客氣過。而對於那種因過去“有過爭論”、“有過惡感”、“常常表示懷恨”自己的人，他也倒確能做到不予計較，“實行恕道”。像他這樣的人，能去追隨王明或博

古搞宗派嗎？即使由於志同道合（何況不是）想搞宗派，他也不會搞，而且學不會。這可以從以下舉例中看出來。

張聞天性好讀書和鑽研問題，不但不善於交際，而且不願意多和人來往，嫌浪費時間。即使同中央領導同志也是公事公辦，沒事不見。進北京十年，幾乎沒見過他不因工作去主動看人。有時劉英說，好久沒見到某某同志了，咱們去看看吧！他的回答總是，人家很忙，沒事去打擾人家幹什麼。如果說他對毛有點敬而畏，可對少奇、總理、陳雲、小平等大都如此，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事，除呈送文件等必須晉見外，一般只是打電話請示匯報。即使叫他去或自己要求去，也是談完正事就走人，決不多留一會兒。我陪他多次見總理，都是談完事就告辭了。例如他花了一兩個月的時間準備了一篇八大發言稿《論和平共處》，要我陪他一起送周恩來總理審閱定奪。在西花廳的院子裏見到總理，當即說明來意。總理也沒接稿子就說，國際形勢有陳老總一篇發言就行了，我看你就不必講了。他只是和顏悅色地說了句“那也好”，就拿着稿子回來了，一路上以及此後再未提及此事，也從未表現過任何不滿。為“克什米爾公主”號（萬隆會議時國民黨特務炸我包機事）發表政府聲明，我陪他去見劉少奇，情況也是如此。即使別人來看他，他也是很少說話，不善應對，要不是劉英張羅，定會顯得尷尬。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遇到饒漱石來看他，寒暄後似乎兩個人都沒話了，大部時間處於沉默狀態。還有就是，同領導同志散步，他也是少說多聽。由於和聶榮臻毗鄰而居，經常兩對夫婦晚飯後相約去北海散步，也經常拉我作陪。[36] 幾乎每次都是聶榮臻滔滔不絕，談論時局，議論領導，他卻很少啃氣，倒是劉英還時而插上幾句，我當然不會置喙。一個時期差不多是每天如此。他和別人談話，提到國內外形勢還發表點意見，但絕不議論領導同志，即使別人談起，他也是只聽不說。給人的印象是，實際上他的性格使他早就完全做到了出使蘇聯前毛澤東的臨別贈言，“少講話，多請示。不說話是金，少說話是銀。”[37] 總之，經過長期的磨練和延安整風的洗禮，張聞天早已失去昔日的風采，變得說話謹慎，沒什麼幽默感，似乎已不會和人聊天了。無怪乎他在“少年中國”時的舊友左舜生，1945年7月作為參政員代表團一員訪問延安後，寫到對他的印象時說，“張聞天少年也是英氣勃勃的，這個時候居然變得規規矩矩，不敢放言高

論了”。

不僅同中央領導和外來客人，就是和同級與下級幹部，他也是公事公辦，相交淡如水。和人談話，最有興趣聽的一是工作、二是學習，沒有聽到過他和人扯亂談。給人印象深的另一件事是，十多年沒見過他請人下館子吃飯，他也沒有吃過別人的請。有時留人在家吃飯，但和他們平常的飯菜並無兩樣。和外交部另一些副部長比，顯得頗為特殊。分工管我們辦公廳等幾個單位的副部長，逢年過節總要把他分管的單位負責人請到聽鸝館、萃華樓之類的地方吃頓飯，聯歡一番。張聞天卻是經常在節假日約幾個人上公園散步，談的還是工作或學習，散完步各自回家或到張聞天家吃便飯。從未見他給人送過禮，也沒見到別人給他送禮。外交部有些大使，像後來駐加納、菲律賓那樣小國的大使，都要經常帶點洋貨555煙之類給某些部領導（用的當然是公款，甚至有時冒充文件交信使帶），但絕無人敢給他帶東西。因為人們知道這樣做是會碰釘子的。他最看不慣那種曲意奉承、拍馬溜鬚、拉拉扯扯的人和作風。剛到駐蘇使館，主管總務的參贊用公款給他買東西，遭到他一頓批評。後來還瞭解到此人把以毛澤東名義準備給斯大林七十壽辰的禮品中未用完的東西如水獺大衣之類送人等事，於是堅決要求將其調走。

張聞天還有個特點，就是不但嚴以律己，而且對別人也很嚴，對同級和下級的批評往往不留情面。每次接任新職，對過去工作除成績外缺點講得更深，更細，因此得罪不少人，有些同志覺得他不近人情。劉英多次說，他真是個書呆子，好像就他講批評和自我批評。她還舉例說，在駐蘇使館他批評前任的“孤島論”（意為使館如同地處海外的孤島，要耐得住寂寞），人家得知後當然不高興，還在主席那裏說了他的壞話。日內瓦會議期間他和李克農談得很好，李竭誠歡迎他回來主持外交部工作。及至他回部後對過去工作講了不少缺點，就引起了李的不快。八大選舉時，他的票低於劉曉，一次黨組會上有人談起，他說，“這是民意測驗。”後來在下面聽別人說，這是由於他在東北工作時得罪了一些人，人家一串連就使他少了許多票。但他不以為然，也不在乎。這都說明，從張聞天為人處事、作風性格等各方面看，他都不是一個搞宗派的人，即使有此想法也實在不會搞，而且也學不會。把周恩來打成經驗宗派的頭子，甚至認為更加危險，[38]

（恐怕不只是下面少數人的偏激之詞）同樣冤枉，只是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最後還應提到的是，張聞天不但不搞宗派，而且避之惟恐不及，最怕被懷疑搞宗派。這是因為他在蘇聯留學五年，正是列寧死後蘇共中央群雄爭奪和搞宗派鬥爭最激烈的時期，一會兒托落茨基，一會兒布哈林，一會兒季諾維也夫，而且言詞稍有不慎，就可能萬劫不復。所以他本來就不善辭令，從那時起就更加謹言慎行，但還是糊里糊塗受了個警告處分。再加上後來延安整風挨了整，就越發怕和宗派沾邊，萬一被上面定為宗派，他也依調檢討，這幾乎成了他後半生的一項為人之道。上面提到的他同領導人不大來往、絕口不談過去的和中央的事等習慣，看來可能也都與此有關。他怕和宗派沾邊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他出使蘇聯四年，幾乎每個禮拜都要拉我上一趟書店，但卻從未去參觀過他過去居住和學習過的地方。他不但絕不單獨會見過去的蘇聯熟人，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他也儘量避免出面，而讓別人去見（包括他原來的俄國妻子）。蘇聯有個至今仍講清朝時漢語的少數民族東幹人，一次派代表一定要晉見新任“欽差大臣”，他也是讓我去接待了事。他要去看王明（多係奉命）、林彪或是其他長期在蘇養病的人，除劉英外，每次都一定要帶一兩個參贊或秘書隨行。1953年回國述職（我隨行），適逢中央召開財經會議，毛澤東要他參加。他本想改行搞經濟工作，所以欣然從命，並積極翻閱材料，還應約為高崗起草了一個報告大綱草稿。參加了一段會後，發現會議主要是批判薄一波，且毛澤東早已提到“右傾機會主義”的高度，而高崗又顯得很活躍，因此他就想躲開。加之他又患感冒，且會期拖得很長，所以會開不到一半，他就不再參加，略事休息後即回使館。[39] 然而後來還是出了高饒聯盟問題。他因在東北工作初期，出於政見不同，曾和林彪、陳雲、高崗等一起反對過時任東北局書記的彭真（後來毛澤東認為彭真犯了方針性錯誤，遂將其調離，由林彪接任書記）。1955年開黨代表會議時，陳雲來電話，說中央要他準備發言並作檢討。他可能是接受了延安整風的教訓，怕又要加倍算老帳，還不如主動檢討的好，於是在發言稿上乾脆承認同高崗在東北就有宗派關係。發言稿寫好後徵求陳雲意見。陳雲不同意他對東北問題的提法，說在東北問題上，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二中全會上主席已作了結論，而且那時的

高崗是那時的高崗，不能和現在的高崗相混。後來他在發言中作了修改，只是檢討警惕性不高，沒有及時向中央反映高崗對他講的一些話。可是到廬山會議又遇到舊事重提，說“高饒聯盟”實際上是“彭高聯盟”，他也是“漏網分子”。他一看在劫難逃，又承認是高饒聯盟的重要成員了。也就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張聞天一方面已下定決心批逆鱗，犯顏直諫；但另一方面仍然視宗派如蛇蝎，生怕被誤以為宗派活動。所以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事先請他看，他堅決不看；念給他聽，也是聽了幾句就走，不敢聽下去。他後來交代說，就是怕被人懷疑為宗派活動。所以他自己的發言提綱，事先既沒和任何人商量，寫好後也沒給任何人看過。雖然談“派”色變，避之惟恐不及，結果還是“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命也夫！

上述這一切說明，張聞天是個沒有、不會、也不敢搞宗派的人。在喜歡順着自己而不願聽不同意見，培植親信和重用個人信賴的人，以至經營山頭和攏絡幹部等方面，可以說張聞天和某些批判他搞宗派的人相比要單純得多。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一再被打成反黨宗派，而且戴了大半輩子帽子至死未摘，至今還遭到黨史界一些人的非議？簡單說來，這是中共黨內歷來缺乏民主和長期過火鬥爭的結果，是毛澤東心胸狹隘(甚至兩位最忠於他和至死都在維護他的人也有近似說法。胡喬木含蓄地稱他“缺少寬容的美德”。[40] 黃克誠認為他對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41]）和大搞個人崇拜造成的犧牲品，是中國社會傳統帶來的必然產物，也是某種意義上中國知識分子人格、稟賦、遭遇以至命運的體現，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討論張聞天的教條宗派問題，就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國黨內外鬥爭長期存在和說不清的宗派（集團）問題；關係到黨史研究中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破除個人崇拜傳統與學術壟斷傾向的學風問題；也涉及中國的社會體制和文化傳統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特點問題，等等。個人對這些方面雖然以往都沒研究(我一再聲明，過去是一直研究國際問題的)，但又願意在暮年以外行的身份參加討論，談點不成熟的意見，就教於方家。

4，周恩來也不是搞宗派的人

關於周恩來，由於我也跟他工作過一個時期，所以也有些直接瞭解。從我五十年代跟他工作的個人體會，我認為他也是沒有派性和不

搞宗派的人。瞭解他的人極多，我這裏只舉幾個小例子，以見一斑。他和張聞天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跟他們工作或他們熟悉的人，就越是使用多照顧少，佔不到什麼便宜和得不到較快提拔。所以當年外交部一些老幹部常開玩笑說，在總理領導的部門工作，就得準備“吃虧”，不要說提拔，少挨剋就不錯了。事實也確乎如此。總理對外交部幹部就是要求特別嚴一些。而且建部初期他就在幹部會上不只一次地講過，說這是因為他兼部長，對幹部自然要比別的部嚴些，加之工作特殊，安排上可能降級使用，要求大家要有這個思想準備，不要去和別的單位比。在這種精神下，東北軍區參謀長伍修權調來只當了個蘇聯東歐司司長（徐以新當副司長）；抗戰期間曾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陝西省委書記的潘自力，被調作駐朝鮮大使，如此等等。當然，時間一長，也不免會有人發點牢騷。例如喬冠華就是如此。他和龔澎久隨周恩來工作，周對他們夫婦也頗為欣賞，但卻長期沒得到提升。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我也算得他們家一個常客，關係甚為友好，所以也能聽到一點心聲。有的事不但對我說過，我還遇到他對別人談起。例如他說，當年他和胡喬木並稱南北二喬，可現在(指八大後)人家不但當了中央委員還是候補書記，相形之下自己真是沒出息。意思是連個候補中央委員都沒撈到。龔澎還曾在會上公開提過，說外交部重視解放區來的幹部，不重視國統區的幹部。1955年7月，她乾脆寫了個報告，要求辭去新聞司司長，去國外當記者。時任部長助理兼幹部司司長的劉英，轉呈周總理時批注：建議派龔澎去當大使，做中國的柯倫泰（前蘇聯駐瑞典的女大使）。但總理卻不同意，對劉英解釋說，在現在的形勢下派女大使容易引起西方記者的包圍和炒作。最後還半開玩笑地說，即使要派女大使，第一個也是你，還輪不到她。[42]

周恩來對身邊的人要求嚴格，還可從這樣一個對比中明顯看出。遠的不說，單是建國後二十多年，一些給中央領導同志當過秘書或在身邊工作過的人，不論時間長短，大多都得到提升，一般也是出任副部級幹部（當然也有些例外）。但周恩來卻不然。我認識的一些給他當過多年秘書的或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水平並不低，否則他不要），沒有一個被他安排為副部級幹部的。其中有幾位我熟悉的“三八式”幹部，至今仍如此。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硬是規定：只要他擔任總

理，就不讓自己的妻子鄧穎超出來工作，特別是不得在黨政系統任職（至於他去世後鄧穎超的工作和表現，也並非他事前安排，更與他無關）。將周恩來的做法同江青、葉群之流依靠權勢，一步登天，當上了政治局委員相比看，人們會有何感想！然而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和許多書中為另一種做法辯解和開脫，如說，“毛澤東在很長時間裏（按：從文意看主要包括“文革”前）對江青非常厭惡。他完全瞭解江青不道德的品質。”但還是要“使用”她，所以“是有責任的”。[43] 單從這幾個具體例子就容易看出，如此嚴於律己的周恩來，哪兒像個有派性和搞宗派活動的人？

至於說周恩來和項英、彭德懷、鄧發，甚至朱德、任弼時等結成了一個可大（可能包括向忠發、張國燾等在內，因為在“兩大宗派”中他們只能歸屬一個，並沒說過有更多宗派）可小（朱德、任弼時等除外）的經驗宗派，那實在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恐怕連它的提出者毛澤東和闡發者胡喬木及其黨史界的繼承者都沒有也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三，對反宗派鬥爭的幾點看法

這裏雖只標明反“教條宗派”，但也包括中國黨其他一些反宗派鬥爭。下面就根據近來學習黨史的心得並結合個人所聞所見，提出以下幾點初步認識和建議，作為本文不是結論的結束。

（一）反宗派鬥爭的必然性和作用

由於中共黨史上並不存在“兩大宗派”，延安整風中進行的反宗派鬥爭，最後實在拿不出多少充分根據，可算得一樁歷史冤案，當然也就不能寫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但是那場鬥爭又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還起到了一定的歷史作用。道理很簡單，古今中外一切政治鬥爭無不黨同伐異，也就是毛澤東常引用的，“黨內無派，千奇百怪”。而一盤散沙的政黨是成不了氣候的，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設法做到統一意志，統一力量。延安整風運動就獲得了兩項明顯效果，這就是：通過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後來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通過反兩大宗

派的鬥爭，正式確立和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全民中的領袖地位和絕對權威。這就有利於解放戰爭的迅速取得勝利。那時完全做到了在全國解放軍和所有解放區的令行禁止，各地只要一聽是陝北指示（包括新聞廣播），就會堅信無疑，堅決執行。可見，錯誤的事情也是能夠一分為二的。即如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事後看來是完全錯誤的，所以黨史界的一些人就硬要把它同整風分開，把責任完全推給康生，把有關痕跡儘量去掉（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有關內容全部刪去等）。但是它對嚴格紀律、加強統一也起到很大的威懾作用，有利於培養馴服工具和克服個人主義和山頭主義等。

（二）反宗派鬥爭的由來

在延安整風中掀起那場規模浩大的反宗派鬥爭，來源大概有兩個：一是繼承中國的歷史傳統；一是照搬蘇聯的作法。中國歷史上黨爭幾乎從未間斷。一個政治運動或一支政治力量之失敗，內爭往往是重要原因。因此要做到孟子“定於一”，就必須削弱異己力量、取締朋黨（宗派）。沒有，也要製造幾個，如朱元璋。但更直接的來源恐怕還是學蘇聯。整風被稱為“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但實際上學習內容，例如《整風文獻》，就根本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篇材料，最多的除毛澤東外就是斯大林。而斯大林在反宗派（集團）問題上可算已蓋棺論定，絕大多數都是製造的冤案。跟他學的結果可想而知，冤假錯案只能更多。可見，反教條也用的是教條，而且有些本來就不正確或被我們所誤解。例如對經常引用的列寧關於領袖、政黨和階級的關係，連胡喬木都認為，“這段話確實很不好。”“按《‘左’派幼稚病》的說法，領袖專政是完全合理的。”[44] 可是事實上，以前的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從蘇聯搬來對我有用的一些理論和作法，如“黨內鬥爭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等等。經過我們的發展，於是：思想認識的不同可以上升為階級鬥爭，不承認被安的罪名矛盾就要轉化，為了維護領導就必須不斷挖出上下大小名目繁多的反黨宗派（集團）。所以說，“八億人，不鬥行嗎？”其後果就是，加強了領袖專政，扼殺了民主，抑制了科學，阻礙了社會發展。

（三）路線鬥爭往往也是整人的帽子和棍子

其實，“宗派”和“路線”，也是斯大林常用的兩頂帽子和兩根棍子，經過“中國化”後更發展到極端。因此在討論宗派問題時也應談一下路線問題。據說這是當年“左”傾中央經常用來整人的，但實際上後來用得更加厲害，簡直是談路線色變。延安整風就是起於路線之爭。毛澤東常說，《黨書》一出，他們就繳械了，那是因為受到“不改正思想上的錯誤，有走向當敵人的危險”的警告。[45] 但是路線鬥爭也不能矯枉過正和一筆勾銷。事實上，建國後就長期受極左路線的控制，也一直存在着時隱時現的兩條路線鬥爭。廬山會議只是一次大的爆發，恐怕不是鄧小平說的，“彭德懷同志那次不能算了”。[46] 胡喬木就說過，“毛澤東同志是在革命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他在革命戰爭得到勝利以後，還想要繼續過去所進行鬥爭的方法。這樣就同認為中國現在主要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的頭腦比較冷靜、比較客觀的同志發生越來越尖銳的衝突。”[47] 這實際上說的就是兩條路線鬥爭。改革開放以後也仍然存在贊成和反對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海耽誤了十來年，到90年代才起步就是證明。應當說，建國後的“左”傾路線錯誤是中共黨史上時間最長久（二十多年。第三次“左”傾也才四年）、損失最慘重（下面再談）、影響最深遠（改起來不易，過了二三十年影響仍在，而第三次“左”傾在遵義會議後就徹底翻了過來）的一次。為了辨明是非和汲取教訓，不妨將這兩次“左”傾造成的損失稍作對比。第三次“左”傾的最大損失是失掉幾塊根據地特別是中央蘇區，被迫長征。（失掉蘇區和被迫轉移也不能完全歸之於主觀因素而忽視客觀情況的變化。）但轉戰西北後，也有助於促成西安事變，實現向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所以總的看來，第三次“左”傾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除了造成損失以外，還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可建國後這次“左”傾的損失就嚴重得多了。例如造成經濟發展和科技水平的落後就很明顯。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份額為4.7%，1980年降為 2.5%；從日本的近兩倍變成它的 1/4；人均產值約從日本的1/2變為不到它的1/20 。1960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我國4600億美元，1985年超過 36800億美元。[48] 經過改革開放後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我國佔世界經濟份額只回升到 4 %左右，還沒

有恢復到 1955 年的水平。這就是說，單從發展生產力這點講，由於路線錯誤，就使中國歷史和社會發展落後了二三十年，要彌補起來，恐怕還得更長的時間。其他如政治體制和民主改革的滯後、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摧殘、生態環境的破壞、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不說各種冤假錯案，單是大躍進和反右傾造成以三四千萬人計的非正常死亡，[49] 恐怕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等等。有些如經濟、生態等用加倍的時間恐怕也還不了帳，有些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了。至於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兩個時期一比，輕重也十分明顯。例如第三次“左”傾時，毛澤東雖受打擊排擠，但仍有工作，仍可參加有權參加的各種會議，並發表意見；而建國後“左”的作法，則是可以隨便停止任何黨員以至政治局委員的工作和過組織生活，直到剝奪行動自由，迫害致死；黨章、憲法均成具文。可惜至今一些研究國史和黨史的人，仍不大注意汲取有關教訓，還是沿着老的路子，繼續誇大第三次“左”的路線和損失；對這後一次“左”傾，不但不承認是路線錯誤，還繼續弄虛作假、隱惡揚善，人為地拔高成績、縮小或不提損失。這當然不能說是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態度。

（四）反宗派鬥爭過去長盛不衰的原因

這裏所說的宗派，後來多稱集團；反宗派鬥爭實際上就是各種大小政治運動。鄧小平說絕大多數是搞錯了。但為什麼還久盛不衰呢？有些人當時就知道搞錯了、是假的，但還是衝鋒陷陣充當積極分子(例如具體辦潘漢年一案的領導人當時就不大信潘是內奸；搶救運動中不少搶救者也說他本來就不信搶救對象是特務)，原因大概是：形勢逼迫，上命難違，邀功自保，損人利己等。可見這不單是一些人的個人問題，更深層的還涉及到體制問題。過去這種反宗派政治鬥爭久盛不衰的原因，除常說的對階級鬥爭認識錯誤和過高估計敵情外，還初步想到有以下幾點。

1，在個人崇拜佔統治地位和只唯上、不唯實的政治體制下，往往要壓制不同意見，以反宗派（集團）鬥爭開展工作。胡喬木談到延安整風時就說，“這些歷史在《決議》中敘述得不大周到。 當然，七中全會時要換一個寫法也不可能。”[50] 為什麼不可能？他沒說。其實就是個人崇拜控制着一切，有不同意見也不敢說。至於八屆八中全

會，中央全體一致反右傾、反“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恐怕都是不能不緊跟。胡喬木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時還傳達陳雲的話說，“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答案是，“也許不可能”，並舉了“反冒進”的例子。[51] 而且只唯上，不唯實，鬥爭開路，不僅中央如此，下面各級就更甚，往往對持不同意見者和不順着自己的人，就以什麼集團為名給搞掉，如陶鑄在廣東製造的“以馮白駒、古大存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胡耀邦到陝西任省委書記才一百天，就被西北局劉瀾濤等批鬥得身體都垮了，後被葉劍英帶着逃回了北京等。再往下，對支部書記有意見就可能是反黨，一株連也可湊成一個反黨小集團。廬山那場鬥爭可說是反“宗派”鬥爭的一個典型，從反“左”到反右只在一瞬間。然而總結起經驗教訓來，卻可以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一種說法是由於個人崇拜和專橫獨斷；另一種說法則是怪彭德懷“採取的方式和選擇的時機都是不幸的”，否則，毛澤東“對這些錯誤是能夠承認，能夠改正的”，“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52]

2，為了維護領袖專政和各級領導的一元化，做到“馬克思加秦始皇”，就不能不經常掃蕩一下有不同意見和不大聽話的人，搞反“宗派”鬥爭。這裏說的馬克思（其實讀的很少）換成斯大林才比較合適。而毛澤東思想和有關政策又是一貫正確的，有所懷疑和反對，那就是反黨反革命。自己犯的太明顯的錯誤則儘量設法推了出去，如《歷史草案》上說，臨時中央“實行肅反中的逼供信政策，把許多蘇區中的黨與非黨的好同志誣陷為反革命加以逮捕或殺害”。[53] 實則相反，在四中全會前一方面軍和贛西南就早已大反AB團。在這方面，後人和黨史界也是“青出於藍”，起了重要作用，如把延安搶救說成是康生一手造成；把“文化大革命”的罪責推給林彪、四人幫等。一些領導人和黨史工作者還硬要強調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功勞和作用，並為他解脫。這說明，到現在為止，黨史界仍然是只根據領導意圖編寫歷史和為了維護領袖的威信可以不顧史實。由於不能正確對待以往的反宗派鬥爭，諱言其錯誤和缺點，更不能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於是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一次比一次聲勢大，範圍廣，牽連多，後果嚴重。例如1959年所謂屬於黨內鬥爭的反右傾，就比1957年定為敵我矛盾的反右派厲害得多，這是過來人都清楚的。到“文化

大革命”，反黨和反革命集團之多恐怕已無人能統計出來。

3，反宗派鬥爭和政治運動能夠長盛不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貫實行的保護積極分子的政策，即無論他們在運動中犯多大錯誤（整錯人、搞逼供信、違法亂紀等），都要受到保護，不但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因此認錯和懺悔者至今都極少見，即使有也是完全出自本人良知），一些人還可得到重用。因為他們響應了領導（或曰黨）的號召，容易領會意圖，做到緊跟，保持一致。所以各級領導就自然使用積極分子及與其思想相同者。特別是意識形態部門，領導權以至人員構成，更要正統。存在決定意識。許多積極分子由於顧及安身立命和利益相關，所以他們看問題就容易肯定過去、強調成績、更多看到運動的積極面，有時也難免誇大和不顧事實；對以往的錯誤和缺點，則進行回避、縮小以至抹煞。對於運動中被整者，即使得到平反，大多也要給留點尾巴寫進檔案，影響到信任和使用（當然也有少數例外)。挨整的自然比較容易看到運動的缺點，自己體會到的也多是消極面。因此，多年來的規矩是，由於他們或多或少對過去某次運動有不滿情緒，所以對他們的使用就更加慎重，而儘量多使用積極分子。因而在黨史一些問題上他們雖有異議也就很難反映出來。連彭德懷在整風期間受到過火批鬥尚且長期耿耿於懷，何況被定為特務而遭到嚴酷逼供的人。難道彭大將軍的覺悟竟不如一些把整風和搶救描寫得如沐春風的積極分子和秀才？但是編寫這段歷史的正是這些積極分子秀才及其繼承者，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歷史是一種客觀過程，何況現代史，人證雖在減少，但物證(除少數銷毀者）卻俱在，重要情況總是會遲早弄清楚的。

註釋

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

2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95頁。

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03頁。

4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359頁。

5 1972年6月11日《周總理關於我黨十次路線鬥爭的報告》；《毛澤

東年譜 1893—1949》上卷，第 389-390 頁。

6 劉伯承 1945 年 5 月 10 日在七大的發言。

7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上卷，第 389-390 頁；《周恩來傳》(一) 第 315-316 頁；《周恩來年譜 1898—1949》，第 231 頁。

8 有關廬山會議的先後引證，均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223，227，232 頁。

9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197 頁。

1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92 頁。

1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96 頁。

1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89 頁。

1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 337 頁。

14 張聞天：1943 年《反省筆記》。

15 張聞天：1943 年《反省筆記》。

16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190-334 頁；張聞天 1943 年《反省筆記》。

17 毛澤東 1941 年 10 月 13 日在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 344，346；第 341 頁。

19 《張聞天年譜》上卷，第 190-334 頁；張聞天 1943 年《反省筆記》。

2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 341 頁。

2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 321 頁。

2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29 頁。

23 見《王明評傳》，第 220-227 頁。

24 轉引自《王明評傳》，第 226-227 頁。

25 參閱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一和第二章。

26 見《王明評傳》，第 303 頁。

2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87 頁。

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第 443 頁。

29 《周恩來年譜 1898—1949 年》，第 402，403 頁。

30 參閱《任弼時傳》第 201 頁；淩步機：《六十九年前的一次開國大典》，年版。兒女》(國內版) 2000 年第 4 期。

31 張聞天：1943 年《反省筆記》。

32 李維漢：《在中央蘇區》，《黨史通訊》，1986 年第 1 期。

33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 940 頁。

34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880-881頁；《張聞天傳》(修訂本)，第629-635頁。

35 《張聞天選集》，第202-222頁。

36 由於毛劉周都是晚上辦公，他卻是晚十點睡覺雷打不動。總理又特別關照，除非重大事情不要驚動他。但有些事又要經過外交部這一關，於是他就拉我去頂替，雖不是秘書，平時也得住在他家。

37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14頁。

3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97頁。

39 見《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39-940頁；參閱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34-246頁。

4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3頁。

41 《黃克誠自述》，第101頁。

42 《張聞天年譜》下卷，第989頁；多次訪問劉英的談話。

4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7-218頁。

44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86頁。

45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3頁。

46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93月。

4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2頁。

48 見《人民日報》。1988年4月6日；另見王柄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第173頁；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頁。

49 王柄林：《鄧小平理論與中共黨史學》，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頁。

5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8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8頁。

52 《中國問題》共黨史》，第213-214頁。

5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29頁。

(2001年1月完稿)

第七篇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再思考

一，對延安整風應該重新研究並進行新的總結

（一）從我學習黨史和回顧延安整風説起

從1942年發動全黨整風，到現在已已經六十多年了。我也從開始參加整風時不滿二十歲的青年變成此書完稿時的八十三歲老翁。往事如煙，當年許多情況在記憶中已有些模糊，只是後來看到所發生的各種事情會經常聯想到延安整風，越來越感到那場運動對黨和國家影響之長久和巨大。胡喬木説，“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1] 因為延安整風沒有批判斯大林的教條主義，反而全盤照搬蘇聯，毛澤東又要做“中國的斯大林”。其實，建國後所發生的一切，既包括正面的，如實現國家的獨立統一，頭些年保持嚴明的風紀等；也有負面的，從各種運動的折騰到意識形態的嚴格管理，從政治不民主到喪失經濟科技發展的大好時機，追根溯源，根子又都在延安整風。所以延安整風很值得進行重新研究，以便尋根究底，找到幾十年來導致我們落後和發生一系列嚴重錯誤的根源。 但我個人過去一直從事國際問題研究工作，對黨史一竅不通，雖然不時有點聯想，卻一直無意問津。只是在1999年初辦了離休手續後，想法才發生變化，開始學習黨史並寫點筆記。原因倒不是想研究黨史和延安整風，起初動機只是為了向張聞天和劉英贖罪補過。

“文革”以後，我在回顧以往時，總想到自己過去犯過不少錯誤。其中最大錯誤之一，就是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由於中個人崇拜的毒深和企圖蒙混過關的私心重，所以不但自己承認反“三面紅旗”（也就是反黨反毛主席），還參加了揭發批判張聞天反“三面紅旗”，從而造成了終身遺恨，每次去探望劉英時總有羞愧之感。加之

後來看到對張聞天的平反也很不徹底，所以決定，作為贖罪之一法，想響應楊尚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2]的號召，寫一些有關張聞天的材料，而談論整風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篇。因為，這是張聞天政治生涯和人生歷程中一次重大轉折，從此他就離開了中央領導核心，開始走着下坡路，直到最後被徹底打倒。而且現在看來，整風中對他的批判就已顯然不公。這是連胡喬木也承認的。[3]整風中對他的政治待遇更有悖黨規黨法，一個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1943年3月前），所起作用（如發言權）還不如許多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同志，包括一些領導人的秘書。處境之困難就更不用說了。他是整風中首當其衝受批判的“教條宗派”的主要成員，也可算是或多或少反映革命知識分子氣質以及他們的長處與短處、高尚品格和軟弱性格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整風中以及此後的遭遇和表現，也許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很值得作點調查研究。但是由於上層整風情況一直保密，在我們相處的十多年中，他又守口如瓶，所以這裏所談整風中的張聞天，主要還是根據近年來能夠看到的材料。

在研究整風中的張聞天的過程中，也使我越來越感到對整個延安整風進行重新研究的必要。因為幾十年來，對整風運動都是全盤肯定，不僅官方黨史論著，就是領導人的回憶，大體上都是遵循着一定的規格，重複着固有的結論，而且紀律嚴格，輿論一律。這就使延安整風只有偉大、光榮、正確的一面，而缺點錯誤卻被淡化和掩蓋。經常講的對事物要一分為二，在這裏似乎不適用了。比方毛澤東就說，“今天總結經驗有兩點，一是優點，一是缺點……一萬年都有兩點。”[4]那麼為什麼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就不大講了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應該怎樣評價還是個問題。何況它的一些負面作用和消極影響，由於沒有及時進行科學總結，還被當作優良傳統繼承下來，甚至進一步加以發揚光大。直到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模式、領導體制、宣傳教育，以及上層建築其他方面，包括黨史編纂學在內，都還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不但源遠流長，而且還可能長期持續下去。這就是說，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當以百年計，涉及中國好幾代人的思想、生活、以至命運。這大約是至今一切權威論述和黨史研究都有些估計不足的。例如胡喬木就把延安整風和1947—48年的整黨相提並論。[5]毛澤東在另一個地

方的說法也和胡喬木一樣："共產黨內的整風，在抗日時期進行過一次，以後在解放戰爭時期進行過一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又進行過一次。"[6] 對於中國民主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一次奠基性的思想政治運動，怎能和後來的那幾次整黨同日而語？直到現在的提法，也只是："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七大順利召開奠定了基礎。"[7] 從歷史角度看，這些估價都顯得太低，也並不恰當。這在後面的討論中還會談到。

（二）重新研究延安整風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對延安整風如果能及早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本可收到發揚積極因素和克服消極影響的效果，但可惜卻一直沒有這樣做。其原因不只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對上只可隱惡揚善和為尊者諱的封建皇權主義傳統，更由於延安整風產生的政治格局和歷史結論一直佔統治地位，而此後又只能由整風中崛起和培養的積極分子及其門生們掌管包括黨史在內的意識形態。因此，自然會堅持整風時定下的基調。至於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就成了黨史研究中的禁區。"文革"後，提出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對延安整風的研究曾一度出現某種"鬆綁"，有關文獻也公佈了一批，揭示出了一些真像。但不久後就又收緊了，強調黨史研究必須遵循兩個《歷史決議》，既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也就意味着不許自由討論和百家爭鳴了。而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列寧的建黨學說，對自己過去的歷史，既要提倡發揚優點和成績，也應鼓勵揭發缺點和錯誤，這才是一個政黨或國家鄭重的表現和興旺發達的標誌。因為設禁區、護短，總顯得有點顧忌多端，也是軟弱的表現。因此對於延安整風，應當和可以做到以下兩點：第一，公佈有關整風的文件和資料。胡喬木也說，"黨史上的秘密，經過一定時期，其秘密性和保密的必要性也就逐步減少，這是世界各國檔案工作中的共同規律。"[8] 但我們往往不大管世界上的"共同規律"，或表面承認，實際反對。如果對延安整風，既不允許自由討論，許多文件在六十年後仍要嚴格保密下去，這就不是一個鄭重的黨所應採取的態度了。這自然會使人覺得其中必有問題，總有見不得人的東西。第二，真正實行百家爭鳴，對整風進行重新認識，以便記取經驗，堅持成績，修正錯

誤，而不致發揚不該發揚的傳統如個人崇拜、搶救運動等，反對不該反對的東西如自由討論、獨立思考等。不幸的是，後來的歷史恰巧是向相反的方向發展，致使建國後接二連三發生嚴重錯誤，最後釀成十年“文革”慘禍，教訓不能不說是極其沉痛的。

正是出於上面這些考慮，我認為對延安整風現在也還應當進行認真總結和重新認識。“文革”甫告結束，就可以並經得起撥亂反正，何況延安整風已經過去六十年了，總不致嚴重影響當前政治和社會穩定。但從現在形勢看，做到這點並不容易。還歷史本來面目是肯定的，問題只在時間的遲早，也許還得再過三幾十年。那麼從現在起，適當放寬禁區、允許討論和發表點不同意見總是可以的吧？中外歷史都一再證明，這對黨和國家的興旺只有好處。這就是我想到要對延安整風中一些問題作點探討，包括對那次運動中的張聞天作點分析的原因。

不過必須聲明：第一，我雖然入黨六十多年，但沒有專門研究過黨史，開始學習也是近兩年的事，所以不但觀點和史實，連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也都難免。第二，多數檔案仍未解密，我不但無權查檔，而且由於年老體衰、路途遙遠，連跑圖書館查閱公開材料都不可能了。第三，我雖然參加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但只局限在下面一個單位，這裏要討論的有關全局和上層情況，那時並不清楚。儘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對延安整風作些反思，提出個人重新認識後的看法。如果能夠公之於世，引起討論，起點拋磚引玉的作用，那當然是求之不得。否則，作為個人的黨史學習筆記，就教於同好和生前友好，也未嘗不可。

二，必須分清延安整風的不同層次

（一）現行對延安整風的定性並不準確

過去和現在的各種正式黨史著作，通常都把延安整風稱作“全黨整風”、“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我黨內部的整風運動”等等。[9] 如果作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這些流傳多年的說法並不準確。因為第一，那次整風並不是“全黨性的”，即使就普遍整風而言，基本上也限於幹部層，廣大的基層黨組織和普通工農兵黨員並

沒有參加運動。胡喬木就說，那次整風，“其重點是在高中級領導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其主要鋒芒是對着教條主義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10] 實際上更確切一點地說，重點還在中央領導層進行的清算歷史和路線鬥爭。第二，整風並不限於“黨內”，而是所有黨政軍民學的全體幹部和學員都參加了的。當時延安的許多機關學校中非黨員約佔半數左右，還沒聽說過有什麼單位的非黨員可以不參加和沒有參加整風。作為整風文獻之一的中宣部關於開展整風學習討論的《四三決定》就明確規定：“與非黨人員一道進行討論與檢查”，“學校中包括學生在內”，可見並不限於“我黨內部”。這倒不是摳字眼，而是要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和一種制度化的傳統，即凡我們黨控制的地區和領導的單位，只要發動什麼思想政治運動，一般是不分黨內外，大家都要參加的。建國後仍然如此。例如1959年的反右傾，一再說是黨內鬥爭，但還是有許多非黨幹部被戴上了右傾、嚴重右傾、右傾機會主義等不同名稱的帽子。可見，在黨成為單獨的執政黨後，政治運動和思想戰線上是不分黨內黨外、全黨還是全民的。延安整風的作法，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此後適用於全國的制度或模式。第三，延安整風稱為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否確切，也值得斟酌。（對這個問題還將專門寫篇筆記，這裏只提個頭。）在必讀的從18篇到22篇到最後定為27篇的《整風文獻》中，沒有一篇馬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也只是摘了幾段語錄而無單獨一篇。《整風文獻》中直接選自斯大林的著作就有六篇之多，此外還有季米特洛夫以至卡岡諾維奇的一些論述或語錄。這些，例如《聯共黨史》，能否算得上馬克思主義著作，恐怕得要打問號了。而且有如鄧小平所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11]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夠把延安整風叫做一場“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呢？

（二）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進行

更應強調的是，延安整風不可籠統稱為全黨範圍的一次運動，主要地還因為它是分成不同層次進行的。按《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所說，“整風運動分高級幹部的整風和全黨幹部的普遍整風兩個層次進行。”[12]（引者按，這裏的“全黨”改為包括非黨幹部在內的“全體”

更合乎實際。）其實，如行細分，還可再分幾個層次。例如政治局進行清算歷史的鬥爭，參加中央學習組的絕大多數高級幹部就沒參與，更不用說外地的高幹了。後來對他們的傳達，也是再分層次、有所區別對待的。至於“全黨幹部的普遍整風”，也是分為幾個不同層次的，編組學習又因人而異。有些政治問題的傳達，哪些內容傳達到哪一級，都有嚴格規定，並成為長期以來實行的政治待遇上等級制的一項重要內容。

整風分層次絕不是個形式問題，而是有着目標和內容的區別。長期以來的說法都是，整風的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反對主觀主義。實際上還是上引毛澤東自己說的，是要使領導機關和幹部掌握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這個基本方向，也就是掌握毛澤東思想。因此，發動整風就是為了在全黨確立毛澤東的絕對領導和毛澤東思想的統治地位，這是從來都沒有什麼爭論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排除上下兩方面的障礙。在上層，就是整那些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所以毛澤東直截了當地說，“整風學習的目的是打碎兩個宗派。”[13] 對下層一般幹部（胡喬木說主要矛頭是針對知識分子），是打掉他們的自由主義、平均主義、極端民主化思想，把他們改造成黨的馴服工具或“螺絲釘”。因此在上層特別是中央一級，主要是學習《兩條路線》，清算歷史和進行路線鬥爭。下層主要是學習《整風文獻》，檢查思想和交代歷史。形式上都是“脫褲子、割尾巴”，只是“尾巴”不盡相同。當然，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上層的整風，而這是經過一個長期醞釀過程的。

（三）上層整風的一些來龍去脈和抗戰初期毛澤東同長江局的分歧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左”傾路線，給革命帶來很大損失，也使毛澤東長期受壓。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意見得到尊重和採納，但領導體制確立的卻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集體領導。毛澤東既沒有成為核心，有時還處於孤立境地。這最明顯地表現在1937年的白區工作會議、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上。白區工作會議，毛澤東並未直接出面，只是傾向於支持劉少奇。而劉少奇批評十年白區工作的“左”傾路線造成百分之百的損失之說，竟遭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後來張聞天肯定總路線正確、只承認犯了許多策

略性錯誤的報告，卻得到會議的一致擁護，當然也包括毛澤東、劉少奇。不過事後證明，這個“一致”只是表面的，實際上並未解決問題，毛、劉的同意也是暫時的妥協。八月洛川會議上的分歧直接關係抗戰後的政策，影響自然更大。主要分歧之一是紅軍作戰原則。得到張聞天支持的毛澤東主張，抗日軍事戰略只能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即分散作戰，只打游擊，不同日軍硬拼，不打集中兵力的運動戰和陣地戰，主要任務放在發展壯大自己力量，依托山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所以像後來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就沒有得到毛的批准。)得到朱德、彭德懷、博古、任弼時等多數人支持的周恩來則提出“還是運動游擊戰好”，主張應當運用當年同國民黨打仗時的戰略戰術，平時打游擊戰，必要時也打運動戰，以“集中力量消滅敵人”；發展自身力量固然重要，但抗戰時期還應以抗日為主。[14] 此外還有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估計和對策問題。毛澤東估計，“片面抗戰必敗”，蔣介石必降日。因此必須以壯大人民力量為主，將來打敗日本主要得靠我們。周恩來等人不同意這一估計，認為蔣不會降日，並主張應當配合正面作戰。由於軍隊急於出發，會議對上述兩個問題沒能展開討論和取得共識。只是由於主持會議的總書記張聞天居間調和，暫時掩蓋了雙方分歧，特別是改組了軍委，使毛澤東正式成為全軍統帥（軍委書記，也稱主席）。但後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在幾次請示報告都未得到毛澤東答覆的情況下還是策劃了平型關戰役，造成了運動戰的既成事實。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份文件中更正式提出作戰方針為“運動游擊戰”。[15] 接着又是王明、康生、陳雲奉派回國後舉行的“十二月會議”，連毛澤東也自稱他處於孤立地位。這是因為，第一，王明傳達的確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其中就有“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回國前受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見並面授機宜的，除王明外還有康生、王稼祥、鄧發，因此王明不可能隨意瞎編。事實上康生、陳雲也並未在會上做出更正和反駁。而根據黨章，國際意見是必須服從的。因此不能把傳達共產國際的方針說成是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後來也只能說成，“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裏來的。”[16] 所以，王明的報告不但為會議所一致通過，會上還決定委托王明起草決

議。事後各地也是按王明的口徑傳達的。如1938年4月彭真在晉察冀邊區第一次黨代會上作報告時就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連六中全會的《政治決議案》，提的也是，“一切為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17] 在“十二月會議”上，張聞天和毛澤東雖為維護洛川會議精神進行了辯護，但也不能不表示同意王明意見並作點檢討。例如毛澤東就說，“我同意王明意見，國共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還進一步提出“做的時候要經過國民黨”。對此，他後來在七大會上也說，“我們似曾犯過錯誤”。[18] 第二，周恩來的發言反映了多數與會者的意見，沒指名地以山西為例批評沒有堅持“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19] 與會者的絕大多數倒不是受王明“迷惑”，而是出於當時的認識（反映了全民的抗日熱情）和對國際意見的尊重，所以較容易接受王明傳達的精神。如果說王明的本錢只是“打着國際的旗號”，那麼周恩來的影響可就大不相同了。1938年中央和長江局一個時期發生分歧，根子也在此。把一切分歧都歸之為武漢時期的王明路線問題，也需要重新認識。對此，這裏只談以下兩點。

其實，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長期來雖然對毛澤東的政策思想和作風有所不滿，但基本上還是採取了支持的態度；派王明回國也確實是為了在工作上幫助原有的領導集體，並無讓其“當頭”之意。這在“十二月會議”上也是表現得明確的。王明在會上宣佈的據說是經斯大林和國際批准的名單，毛澤東就名列第一。照張國燾說，當時毛澤東“似感不安”，“力主將王明的名字列為第一名”，王明則“極力表明，他之提出這張名單，決無‘奪帥印’的意思”。[20] 即使張國燾的回憶不足為憑，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於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毛澤東不但名列第一，還是準備委員會主席。[21] 王明也許有個人野心，至於他被推舉為該委員會書記並由政治局委員在決議上一一簽名，也可能是出於多數人當時的認識和對國際的尊重。不管怎麼說，洛川會議和“十二月會議”的檔案至今未能解密，其中必有緣故。不過從前後情況大概可以提出兩點看法，一是毛澤東關於國共關係和作戰方針的意見並未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二是毛澤東的意見不一定完全正確，否則早已經過修改後編入《毛選》了。

至於武漢長江局與中央的分庭抗禮問題，也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王明而言，確有飄飄然不可一世、鬧獨立性和右傾問題，但對周恩來等長江局多數成員來說，主要還是洛川會議、“十二月會議”延續下來的政策思想上的分歧。例如，對參加政府問題，毛澤東、張聞天的態度都極為謹慎，而以王明、周恩來為首的長江局在原則上同中央意見一致，但對個別人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則持靈活態度。1938年初，蔣介石堅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周力辭未果，1月11日和21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兩次聯名致電書記處報告情況，並建議接受邀請。但毛澤東和書記處卻以常用的“留中不下”的辦法，不予答覆（毛澤東對他不大同意又無把握不便拒絕的請示常用此法，如上述的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都是在一再請示而得不到答覆的情況下實施的）。最後長江局決定，周恩來2月6日出任此職，而中央直到3月政治局會議上才加以批准。[22] 又如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時局中發生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在遲遲接不到中央覆電的情況下，王明、周恩來、博古三位政治局委員遂於15日再電書記處並任弼時等外地的政治局委員，重申此建議。[23] 毛澤東對此甚為不滿，但還是不得不同意開會。這次會議不但以5：3的多數否決了毛澤東關於王明留在延安不去武漢的提議，還一致同意王明起草會議總結和代表中央起草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3月21日，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建議書電告延安，因未得到答覆，遂於3月24日徑自送交國民黨。一天後中央來電，批評建議書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中央起草的賀電。4月1日長江局全體成員聯名電告中央，說由於來電太遲，國民黨臨全會已於4月1日結束，因此要求中央不要公佈這份賀電，以免引起不良影響。[24]

武漢不發表《論持久戰》，原因是由於文中不指名地批評了周恩來等主張“游擊運動戰”是輕視游擊戰的戰略地位，是不贊成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所以王明、博古、項英、凱豐一致決定《新華日報》不予轉載。[25] 但長江局領導人的文章，張聞天一般都在他主管的延安《解放》雜誌給予發表或轉載。對此，毛澤東在1943年九月會議上還批評說，“武漢《新華日報》是王明的派報，而我們延安的《解放》

周刊則是黨內各派的統一戰線報。”[26]

其實平心而論，除王明外，周恩來和長江局其他領導同志同毛澤東等有些不同意見，應該說是正常的，而且雙方各有長短，並不是毛澤東一切都正確。周恩來等雖有受王明影響的成份，但整個說來武漢時期工作基本上還是正確的。[27] 延安整風中以及黨史學上一直認定周恩來等在當時犯有第二次王明路線錯誤、進行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活動，是一種無限上綱和過火鬥爭的表現。周恩來後半生一直就此作檢討（我就親自聽過他多次談到犯了三次路線錯誤的問題），則可能是出於所謂顧全大局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是延安整風創立的黨史學堅持以毛澤東劃線的結果，不能說是完全實事求是的。

延安整風並不像一些黨史學家說的那樣，好像毛澤東早已成竹在胸。事實上，整風的發動和後來的發展，無論是主觀認識還是客觀條件都有個發展和成熟的過程。要開展整風，有兩個條件是必須具備的。一個是共產國際的允許或起碼不反對。一個是領導層多數的同意。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共對國際是必須服從的。因此，如果國際不支持毛澤東為中央領袖，那麼旨在確立毛澤東在中央領導中的絕對權威和他的政策思想（當時稱作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結合）在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整風運動，自然無從談起。至於領導層同意的必要，就更不用說了。標誌着這兩個條件發生根本變化的是擴大的六中全會。一方面是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關於以毛澤東為首的明確指示；另一方面，與此有關的是包括王明在內的多數領導人提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後來毛澤東說的“六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等，就是指此而言的。他所說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28] 解決什麼問題呢？就是解決他成為中國黨的領袖問題，不然談不上“雖然有些著作”之類的話。可是延安整風中創立至今仍佔統治地位的黨史學，提法卻相反，認為問題早已解決，因為遵義會議已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這自然是違背史實的。

不過，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並不等於支持整風運動。情況證明恰巧相反。就是在季米特洛夫口信中提及以毛為首解決問題的同時，還特別強調領導層應加強團結，“不應花很長時間去

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對於總結過去經驗“要特別慎重”。[29] 後來還曾一再進行干預和提出不同意見。同樣，領導層中多數人擁護毛澤東為領袖，也並不表明都同意清算歷史。因此，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雖然已確立了比較穩定的領袖地位，但也只能掀起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學習運動，為後來的整風作些醞釀和準備，還不能把批判第三期“左”傾路線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要“改造中央”的條件還不成熟，領導層的認識還有分歧。[30] 例如1940年12月幾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先提出蘇維埃後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但因張聞天等一些人不同意，所以後來為中央起草的《論政策》的指示中就“只好妥協”，沒提路線二字。[31]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雖然被說成是“整風學習的動員”，但實際上整風並未從此開始，而且報告本身也是過了將近一年才公佈。《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說，這是由於“當時負責理論宣傳教育的領導同志沒有理解它的深刻意義，對它沒有予以重視，因此，也沒有在延安報上宣傳報道”。這可能和胡喬木本人談到1943年4月22日一份黨務廣播稿時所說的一樣，“這是認為那一段時期張聞天同志領導中央文委工作，搞得不好。這種說法是當時一種潮流。”[32] 上引《初擬稿》的說法證明，這一“潮流”至今仍在繼續。而實際上這多是出於想當然。因為那時幫助張聞天具體主管編輯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吳亮平就明確說，“當時中央有個規定，重要文章都送請毛澤東同志審閱。”[33] 而且毛的文章一般都放在報刊的頭篇，還不分來稿先後總是先發毛的。例如1940年1月張聞天和毛澤東在邊區文代會上的報告，張作於5日(《抗戰以來中華民族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毛作於9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後改名《新民主主義論》)，但在張主編的《解放》雜誌上發表的時間，卻是毛為2月20日，張為4月10日。說張聞天“沒有予以重視”是想當然，還有兩事為證，即《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張聞天就立即在各方面落實，一是1941年6月，如同張在《反省筆記》中所說，他為中宣部起草《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即已“朝此方向努力”。二是對馬列學院進行改組，先改成馬列研究院，很快又改成中央研究院，毛澤東還應邀參加了成立大會並作了熱情洋溢的

講話。後來毛澤東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恐怕也屬偏激不實之詞。毛澤東這種事後講事前沒有看出或不曾發生的問題，在他的一生中是常有的事。

因此可以大致肯定，《改造我們的學習》過了近一年才發表，是出於毛自己的精心安排。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時，開頭就有一段說，“這是1941年5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個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注意這裏有個“現”字）後來收入《毛選》時這段被刪掉了。不立即發表，恐怕主要是作為試探氣球，先看一下反應，同時也要有點時間進行整理和修改（《論十大關係》就是多次修改，二十年後才發表的）。看反應，主要還是上述兩個條件，即共產國際的態度和領導層多數的傾向。在對這兩點毫無把握的情況下，是不會貿然向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涉及國際）開火的。而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則基本上是1941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在這之前，只能是緊鑼密鼓進行準備，如大抓在職幹部學習，特別是延安120名高級幹部的學習等。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蘇聯和共產國際只能集中力量對付法西斯，幾乎無暇他顧，既不能過多干預中國黨內部事務，還一再懇求中國黨在軍事上支援蘇聯（如派軍隊攻進滿洲以牽制日軍等）。與此同時，國民黨的兩次反共高潮和我黨力量的迅速發展，都說明毛澤東關於開展游擊戰、建立敵後根據地、發展自己力量、不跟着國民黨跑等政策的正確和主張以運動戰積極配合國民黨作戰之類意見的不足。再加上三四年的學習，也逐漸使所謂“兩個宗派”特別是“教條宗派”的主要人物陷於孤立。這都表明，開展整風運動的主客觀條件趨於成熟，於是在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才揭開了中央領導層以清算歷史為重點的整風。但全體幹部的普遍整風還是半年後1942年春的事。一些黨史著作說，《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就開始了整風，那是不夠確切的。

可見，延安整風中的兩個層次，不但內容和方式不同，而且進行的時間也是並不同步的。雖然普遍整風涉及的面廣人多，顯得轟轟烈烈，而上層整風則鮮為人知，所以許多黨史著作提到延安整風，多指普遍整風，什麼“全黨範圍的整風”、“各地整風高潮迭起”等。但實則在歷史上意義深遠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中央領導層小範圍的整風。毛澤東也認為整風運動的重點是高級幹部。[34] 這是必須弄清的，

談延安整風也應着重談這方面的情況。

三，對延安整風也要一分為二

（一）一分為二是對延安整風的客觀評價

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事物都必須一分為二，看任何問題都應採取兩點論。一分為二和兩點論，這是他對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兩點論，在認識事物分析矛盾的時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點，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訓。”但對這兩方面不能同等看待，而應分清“主要和次要，重點和一般，主流和次流”。[35] 根據《矛盾論》，無論是主要矛盾，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互相轉化的。因而此時此地是正確的，彼時彼地不一定正確，甚或可能是錯誤的了。[36] 對於“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哲學界曾有過爭論。不過，我們這裏並不是要討論哲學問題，只是要說明，既然對一切事物都要一分為二，那麼對延安整風運動自然也必須一分為二，而且還既要看到短期的作用，又要估計到長遠的影響。例如有些方針和作法在當時主要起了正面作用，但後來卻主要產生負面影響。還有些方針和作法在當時就不妥當，只是沒有認識到，或者出於一時的偏激而矯枉過正，特別是有些問題表面上說的和實際做的或要達到的目的完全兩樣，表明黨內鬥爭中也講“權術”。

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延安整風，按理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卻沒有，看來也很難做到，其中的原因和奧妙是很值得深思的。有些黨史書上把整風分作幾個階段，最後有個總結階段，但在高層整風，那是指為清算第三次“左”傾和路線鬥爭作結論，並不是指對整風運動本身的成績和錯誤如“搶救”等作總結。而且對這樣一樁重大歷史事件，除非中央領導提倡、允許和親自抓，是沒有哪個機關和哪些人能夠和敢於進行系統研究和認真總結的。因此，長期以來，無論是黨史研究還是黨史的宣傳教育，對延安整風都只能重複已有結論，只講成績和收穫，不提缺點和錯誤，自然也難有什麼發現和創新。由於整風以來形成的傳統和嚴格的紀律約束，使得許多黨史著作、領導人的傳記和回憶錄，涉及延安整風的描述，觀點多少有些千篇一律、互相照抄的味道。直到撥亂反正以後，研究才一度有所鬆動，公開了一些檔

案材料，有的領導人還揭示了部分內幕和提出過某些缺點，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談到整風的“緊張”和過火的批判，薄一波在《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介紹華北工作座談會對彭德懷的錯誤批鬥和中央黨校肅反運動的殘酷[37]等。但是整個說來，除對搶救運動還可說一些有限的話以外，對整個延安整風的錯誤和缺點還是很少有人論及，全面的歷史的研究和系統的總結經驗教訓就更談不到了。特別是很少見到有人注意研究這次運動對後來歷史的消極影響。

由於始終沒有允許並組織深入研究和探討，至今有關延安整風的著述與教學，總顯得有些模糊以至混亂，在不少問題上還存在自相矛盾、真假不分的現象。作為對過去一段歷史的瞭解和認識，弄不大清楚或者分歧很多，也許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可以“宜粗不宜細”。但如果對當前工作和今後發展有重大影響，那就是需要及早研究解決的問題了。正是由於我們沒有認真總結和虛心汲取延安整風的經驗教訓，才使後來發生許多類似的失誤和弊端，有些甚至變成久治不癒的頑疾。這方面的情況，上文已略為提到，下面還要就其中影響較大的幾個問題展開加以討論。

（二）在看待延安整風問題上的偏向

對延安整風既然應該一分為二，那麼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就都是片面的和錯誤的，把當時整風的經驗教條化更是有害的。但是，直到現在，這些偏向都還依然存在。下面先舉例作點簡單說明。

1，全盤肯定論

在看延安整風上，歷來都是全盤肯定或實際上全盤肯定的意見佔主導地位。至今所看到的黨史論著，除歸罪於康生的搶救運動外，幾乎都不談整風存在的問題和缺點，更不談對以後歷史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這類意見的不夠客觀不夠全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人們對整風並不作毛澤東自己提倡的一分為二的分析，把他的兩點論變成了一點論。例如談得最多的是，“整風運動既是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38]但卻總是不提另一方面的事實，就是整風中主要學習的是斯大林及其思想影響下的東西，特別看重《聯共（布）黨史》。整風在號召批判教條主義的同時，卻在強化對另一些問題的教條態度，實際上是以對我有用的

教條反對於我不利的教條。如過分強調階級出身和階級鬥爭；過分強調掌握政權和實行專政；把政黨和領袖的作用推向極端；只注重統一思想、集中領導和鐵的紀律，實際上取消自由討論和民主決策；抑制了活躍思想和獨創精神，還使察言觀色、言不由衷、摸意圖、講假話等歪風流行。因此許多人，包括周揚、胡繩等，把整風和“五四”、“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並列為三次啟蒙運動或思想解放運動，顯然是不確的。其次，關於延安整風的言論中還存在許多帶有誇張和不真實的提法，或者對一些問題只談抽象命題，不講具體事實。如許多黨史書上幾乎千篇一律說的，“整風運動的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是同‘左’傾錯誤領導所實行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相反的。”[39] 其實都是重複現成詞句，卻並未提多少具體例證。至於把整風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描寫得如何和風細雨、心情舒暢，以及堅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原則，更是完全脫離實際。還有不少移花接木、歪曲事實的提法和敘述，如上述毛澤東等三人找王明商談答覆季米特洛夫電報事，被說成“為了幫助王明”。由於所說與實際不符，一個人往往也前後自相矛盾。例如在中辦機關參加整風運動領導的曹瑛，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先說，“這次整風運動很民主，沒有抓辮子、打棍子的現象，真正做到了暢所欲言。”“對待犯有錯誤的同志，堅持了和風細雨、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針。”後面講到具體情況時卻說，“在某些單位出現了對錯誤思想的鬥爭大會。中央黨校也召開了鬥爭大會。”提到搶救運動，更是：“當時氣氛很緊張，搞得特務如麻，草木皆兵，所以亂捕亂殺的現象也產生了。”[40] 胡喬木更是經常自相矛盾。在稱贊整風方針及其在《歷史決議》中的體現時，就說要“多引用一些歷史文獻，證明歷史問題決議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41] 談到“那個決議也有缺點”時，又說“毛主席對決議沒有做很多的修改”。[42] 還應指出的是，對延安整風運動，許多黨史著作不但充滿溢美之詞，而且有的還對它的作用作了過分誇大，如說延安整風“保證黨在短短幾年內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43] “沒有延安整風，……就沒有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44] 這就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特別是抗日戰爭，離開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單靠經過整風的我們，漫說“短短幾年”，恐怕再多幾倍的時間也是勝利不了的。毛澤東就承認，假如沒有一切有利的國際條件的綜合，“我

們能勝利麼？顯然是不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不可能”。[45] 總之，全面肯定，把延安整風看得神聖至極，把整風中的一些提法和作法當成金科玉律的教條，實際上虛構的成分多。因此，對延安整風的收穫與成就，早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做出實事求是和歷史主義的判斷了。

2，持攻擊態度

對延安整風看法上的另一極端是全盤否定和進行攻擊。在這些意見中，不僅有程度的不同，而且還有本質的差別，其中有的就是基於個人原因或完全站在敵對立場上對整風進行攻擊。這方面的代表作是王明在《中共50年》一書中的有關敘述。他不但把整風說成完全是毛澤東為了整人，特別是整他，還編造了一系列謠言。例如說，毛澤東1941年9月曾向他說要建立“毛澤東主義”，“在建立毛澤東主義時，我保留馬克思主義，我拋棄的只是列寧主義”。[46] 凡是參加過延安整風或稍有黨史常識的人，都會看出這絕不可能真實。毛澤東不但不會跟王明談“建立毛澤東主義”、“拋棄列寧主義”的問題，而且與王明的說法相反，整風中毛澤東倒是很少引證馬克思，更多強調列寧關於集中、紀律、政黨、領袖等的論述。王明還捏造中央領導通過金茂岳醫生對他進行毒害，更是荒誕不經。但是由於王明的歷史身份和《中共50年》內容的真真假假，所以還是有一定影響，特別是在海外的中共黨史研究界。另外，在中蘇公開論戰年代蘇聯有關方面編輯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字孫平）著《延安日記》，基本上也屬這一類。而且由於署名作者的身份（蘇聯和共產國際常駐延安的聯絡員）和整理時可以動用蘇方的大量檔案，所以就更容易使人們相信其真實性。其他類似的“研究著作”也還不少。不過完全否定特別是攻擊延安整風的材料，多為海外出版。由於對輿論和出版的管理，還沒見到大陸有關這方面的書籍，只是一些文章中從不同側面流露否定的意思和情緒的事例倒是時有所見。

3，其他傾向

還有一些研究延安整風的著作，敘述有根有據，顯得比較客觀，但傾向有點過分渲染個人間的爭權奪利和恩怨相報。例如前面提到過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就多少表現有這種偏向。書中引用了大量材料、作了仔細分析，也提出了一些

頗有見地的看法，但多少有點紙上談兵，在許多問題的分析和判斷上不夠客觀，而出於不真實的主觀想象。這裏只舉一個例子。書中說，張聞天之所以反對六屆四中全會後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提法，是因為這與他的政治前途有關，因為這一提法直接打擊他和一大批領導幹部的政治威望，嚴重動搖他在黨內的地位。[47] 這就不但把問題過分簡單化，而且也完全看偏了。

張聞天堅持中央政治路線的正確主要還是認識問題。一則，這是共產國際的多次結論，而張聞天當時對國際還是極為尊重和崇拜的。二則由於歷來把路線錯誤看得十分嚴重，幾乎等同於反革命，因此張聞天認為，四中全會後的中央雖有許多錯誤，但總的方面還是正確的，中央和廣大幹部在艱苦的條件下還是做了很多工作的，說路線錯誤豈不是將這一切都一筆勾銷。出生入死工作了幾年還落得個犯路線錯誤的下場，思想上很難轉過來。所以當時黨內幹部普遍不能接受路線錯誤之說。即以該書作者在後面詳述的白區工作會議為例，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討論時，支持劉少奇認為白區工作路線錯誤的也只有一個華北代表團團長彭真。而參加工作會議的絕大多數代表都是反對的，特別是從事白區工作的幹部，單是華北代表團就有高文華(原北方局書記，生前一直堅持不同意見)、柯慶施、王世英、黎玉、李雪峰、烏蘭夫等。張聞天的觀點（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報告）反而得到全體擁護。可見，這顯然不是出於個人權力和地位的考慮。

該書所提張聞天同劉少奇的關係，推論張說的造謠他“煽動林（彪）、彭（德懷）反對三人團”的×××同志指劉少奇，[48]就純屬臆測。 張在《反省筆記》中幾次提到，明白無誤地寫着王稼祥。事實上，張對劉並無個人恩怨，瓦窑堡會議後，正是張提出和決定派劉出任北方局書記，使他受到重用。劉當時也是很感激的。[49] 至於對毛澤東，張聞天在整風中更是發自內心的真誠擁戴和崇敬，絲毫談不上個人恩怨。就是毛澤東，也不能說他完全是搞“權謀政治”，一切都是為了抓權。須知，在那個時候，從黨的領導人到一般黨員，參加革命都是基於一定的信仰，決心不惜犧牲為理想而奮鬥。投機分子和為個人爭權謀私利的是極少數。這就是為什麼延安整風中傷害了那麼多人，許多被打成特務的人還沒有完全平反(沒有做出結論或因結論不合適本人拒絕簽字)就奔赴前線和分配各地工作而不講價錢，更沒有

叛變投敵的。因此不能把延安整風完全看成上層一些人的爭權奪利，加以庸俗化。

2000年12月，王若水寫了一篇《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這是一篇討論延安整風頗具新意的文章，得到一些人的稱許。但我覺得他所設的前提就值得考慮，有些事實和敘述也不夠確切。文中首先提到，“整風運動在起初，可以說是一種啟蒙運動，因為它所反對的是以王明等人為代表的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這是一種頗為普遍的議論，但卻不合乎實際。因為不但“以王明為代表”的提法不準確，而且更重要的是，整風並不是要反對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而是以蘇共為模式實現中共的完全布爾什維克化。連胡喬木都說，“延安反教條主義對斯大林的一套體系沒有批判……”[50] 這些都將有另文說明。

這裏要說的是，整風一開始，目的就是要“整掉兩個宗派”（囊括了以前的多數領導人），確立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斯大林”[51] 毛澤東領導的絕對權威，恐怕談不上解放思想和什麼啟蒙，因而也就不存在誰壓倒誰的問題。而且用西方的啟蒙運動往這時期的中國身上套也不一定合適。依王若水所說，“啟蒙運動是要把一切現成的事物帶到理性法庭前，接受批判的審查。”那麼這時的最高的理性法庭就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批判和審查的最高標準就是抗日救亡。實際上在抗戰前後的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就掀起了一個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五四”的啟蒙運動，左翼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傳佈起了巨大作用。許多知識青年就是由於讀了一些魯迅等人的文章和《大眾哲學》之類的書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年，進步書刊廣泛流行，知識青年爭相閱讀，反對日本侵略、爭取民族獨立以及憎恨舊社會、向往新社會那種慷慨激昂的情緒，現在回想起來仍令人感奮不已。正像最近有人著文所說，“在民族危亡之際，民族主義比任何其他的意識形態都具有更高的、更有效的社會動員力量，可以凝聚民心，利用各種社會資源。”[52] 當時的中國正是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救亡圖存無論是在知識界還是其他階層都高於一切，民族主義成為啟蒙的最重要內容，導致了中華民族的空前覺醒。所以不是什麼“救亡壓倒啟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兩大運動已合二為一，甚至可以說救亡就是啟蒙。任何先進人物都只能把抗日救亡放在首位，不會置抗戰事業於不

顧而關門鑽研自由主義、個性解放等等。這次規模宏大的以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為主要內容的啟蒙運動，對中國社會和中共的發展起了極其重大的推動作用。黨史研究不能只重視紅軍長征，而不重視這一過去被稱為救亡運動的啟蒙運動。實際上，正是那次啟蒙運動，促成了在中國歷史上起轉折作用的西安事變。而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國紅軍的生存都將遇到極大困難，更談不上國共合作抗日。也正是那次啟蒙運動，把中國大批知識分子、工農以至民族資產階級許多人推到主張抗戰和代表進步的共產黨一邊。

王若水說的，“中共中央抓住這個機會（“國民黨暫時停止對共產黨員的迫害”），在 1939 年 12 月作出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這樣，大批知識分子加入了共產黨，其中很多人從國民黨統治區湧入延安。”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國民黨不但從未停止對共產黨員的迫害，而且1938年下半年就已加強了所謂“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針和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我們一行人就是這時在從西安去延安的途中被國民黨扣押囚禁的。1939年冬國民黨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這時做出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已經很難起到多大作用。事實上此後已很少有知識青年能通過封鎖線去延安(而且不說進步知青，中國整個知青也有限。這是搶救運動後期任弼時按周恩來提供的材料推算過的，這一事實並成為停止搶救運動的一個根據），致使我們抗大只能主要從延安和敵後調幹部培訓（我當時已留校任助教，對此有親身體會）。還應指出的是，這次啟蒙運動把大批進步知識分子推向共產黨，他們主要不是來張揚個性解放、自由主義、人道主義、批判的精神、獨立的人格，而主要是胸懷抗日救國和人類解放的獻身精神，甘心接受民主集中制和嚴明紀律、集體主義和艱苦奮鬥等的教育和鍛煉。這是革命的需要、時代的要求，也是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基於自覺自願參與的，所以帶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並不是某個人能用整風把一場啟蒙運動給“壓倒”。至於發動整風的目的和做法有根本性的缺陷，中間又走了很大的彎路，特別是留下了許多影響極為深遠的後遺症，那也是由於當時的諸多因素，如中國社會性質和歷史傳統、世界共運形勢和黨實際上奉行的指導思想、建黨原則、當時和後來的領導集體尤其是領袖的個人素質等，而不能說成是由於上世紀三十年代那場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被整風給“壓倒”

了。相反，正是那場啟蒙運動，終於掀起全民抗日並取得最後勝利，洗雪了中國人民的百年屈辱。

（三）延安整風的主要收穫和成就

延安整風一直被說成不僅是中共黨史上的創舉，也是國際共運有史以來的創舉，對黨的建設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具有重大意義。這些說法雖然帶有一定誇張，但基本上是正確的。確實，延安整風對於中共以及整個中國，在思想、政治、組織等各方面影響的重大、深刻和久遠，是近現代史上至今的任何一次思想政治運動都不能相比的。而且這種影響今後還會持續若干年。所以對延安整風的作用、意義和影響應該有充分的估計，就中自然也包括它的收穫。不過應特別指出的是，對收穫不僅同樣適用一分為二，而且還必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考察。這就是說，第一，許多收穫一開始就有它的負作用。例如整風統一了全黨思想，但同時也限制了獨立思考和創新精神。第二，原來主要起正面作用的收穫，後來負面作用逐漸佔了上風。如“一元化”領導不但成為一黨專政，而且變為黨的第一把手專政。因此，在談延安整風的收穫時，必須注意到這兩方面的問題，這也是毛澤東的“兩點論”。由於對延安整風所造成的損失和負面影響後面還將分別進行討論，所以這裏先談收穫的一面。但是延安整風留下的傳統，本來就是只講成績不講缺點，而且多是互相重複，所以為了不再過多重複，下面只簡要談幾點個人體會。

1，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

正是通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才被歸納為一個較完整的體系和正式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而且實際上成為當時擁有一億人口的解放區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影響範圍還得到不斷擴大。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一件大事。因為自從外國列強的侵略使中國日益淪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以後，中國就面臨實現國家獨立和統一的神聖任務。中國人民也為此奮鬥了近百年，都因為缺少一個既適應時代潮流又符合中國實際的指導思想和在這一思想引導下的革命運動，因而統統失敗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經過中國共產黨人的長期奮鬥和集體努力，才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之交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加上遇到極為有利的國際和國內條件，終於在1949年取得

了全國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雖然新民主主義秩序尚未得到全面建立和鞏固，新民主主義經濟、政治、文化更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但終究民族獨立了，國家統一了，也為有可能實行現代民主和進行經濟建設創造了條件。因此應該說，毛澤東思想勝利地完成了它偉大的歷史使命。不過這裏還有一個如何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問題。

我曾根據劉少奇在延安整風後黨的七大上關於修改黨章報告中的權威論述和歷史的檢驗，對毛澤東思想作過如下的表述："毛澤東思想就是戰爭與革命時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特別是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政策。"[53] 這包含了以下幾層意思。第一，毛澤東思想的時代背景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的戰爭與革命時代，五十年代進入和平與發展時代後就基本過時了。第二，這裏的時代背景也表明，它是在強烈濃厚的中國傳統上吸收融合的列寧斯大林理論，而不是直接從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吸收、繼承的。這就是毛澤東說的，"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54] 第三，它是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不一定適用於整個新民主主義建設，更不適用於社會主義建設。第四，說它特別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和政策，意在強調中國傳統與中國特色在毛澤東思想中的地位和份量，但也包含斯大林解釋的列寧主義一些原理的指導作用，因而有別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並決定了這一理論和政策能夠取得最後勝利。

延安整風正處在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時期。適應這一形勢的毛澤東思想得到全黨的認同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接受是很自然的。因為歷史證明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和方法的正確和行之有效。高級領導層對毛澤東思想的擁護是真誠的，多數人以此為準繩的檢討主要出於自覺自願。這也是使黨的七大成為"檢討的大會"（"多數同志發言是作自我批評"[55]）的原因，不能說完全出於毛澤東的"精心安排"。[56] 整風運動的主要對象是高級幹部，因為毛澤東說，"'犯思想病最嚴重的'，是高級幹部中的人"。[57] 只要高級幹部認同和信服毛澤東思想，全黨的思想也就統一在毛澤東思想之下了。即如我們這些去延安的知識青年，那時就是為了要抗日（求得國家民族的獨立）、要民主（反對國民黨的專制和腐敗），實質上也是要實行新民主主義，並進

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因而信仰毛澤東思想如同信仰馬克思主義，是完全出於至誠，即使遭遇挫折或受到委屈，對毛澤東思想仍然堅信不疑。所以正如胡喬木所說，“這次整風運動的直接結果，是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統一了全黨的思想。”[58]

2，牢固確立毛澤東的最高領袖地位，實現了一元化領導體制

無論是當時黨的有關決議還是領導人的講話，都把這點視為整風的最大成果。例如劉少奇在七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談到當時（整風後）的黨“同它在歷史上任何時期比較”時，提到的最後一點說，“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59] 張聞天在改寫黨的《歷史決議》時也加上了一段話，說“尤其值得我們驕傲的是”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的領導，這領導，無疑的，將保證中國共產黨在以後的完全勝利。”[60] 確實，當時的普遍的看法是，中國黨找到了自己的偉大領袖，這是為中國革命解決的一個最大問題，從此就必將從勝利走向勝利。

毛澤東規定的整風的兩大目標，是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黨八股只是它們的表現形式。實際上從深層次看，反對主觀主義就是為了確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反對宗派主義則是為了確立毛澤東為全黨和全軍的領袖。因此正是在整風中，1943年3月進行了中央機構的調整。對此，有的黨史著作評論就直截了當地說，“它最終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這是整風運動的最大成果”。“黨的組織調整的軌跡是毛澤東、黨中央鋪設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整風從解決思想方法入手，達到組織上出現這樣的結局，恐怕是事先難以預料的。但是，對於毛澤東來說，出現這樣的結局卻是經過多年準備、意料之中的事。”[61]

這個問題的明確解決，就使整個黨政軍民的最高指揮權集中在毛澤東一人之手，而且各級也都實行了嚴格的一元化領導，保證了上面意圖可以一竿子插到底。此後不但不會再出現像未得到答覆就自行發動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以及王明、周恩來等在長江局就某些問題自行做主那樣的事；而且原先各地的山頭主義和分散主義也得到根本削弱。這是連外國人也承認的。例如費正清就說，“國民黨吃了很厲

害的宗派主義的虧。共產黨的組織小些，他們能排除宗派主義而取得成功。”“毛應用他的理論框架，在延安發動了一場整風運動，為後來的群眾運動和思想改造樹立了範例。這是毛已當政後，不僅為了鞏固他的地位並且為了統一全黨和整頓紀律所做的努力。”[62] 抗戰勝利後，解放區已壯大到必須全國一盤棋(抗戰期間各根據地還多是各自為戰，中央軍委一般不直接進行軍事指揮)，無論政治、軍事，都更需要高度集中、統一指揮、令行禁止。毛澤東的最高領導和絕對權威也顯得更加重要。特別是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以其中國曠古少有的軍事天才，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解放了除台灣外的全中國。凡是參加過解放戰爭時期工作的人都會體會到，當時確實做到了全黨一心、全軍一心、全民一心。無論是在哪個解放區，只要聽到延安（陝北）電台的評論和號召，都會堅信不疑和堅決執行，更不用說內部發出的指示電報和文件了。如果沒有延安整風確立起來的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和統一指揮，解放戰爭也可能還要多花一些時間，不會那樣乾脆利索。但一些人說的中國人民將因此要長期在黑暗中摸索，則是受個人崇拜影響的過分誇大。還應該看到，進入近代以後，中國不但對外淪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內部的地方勢力也日益成為嚴重問題。不但清朝，就是辛亥革命後的歷屆中國政府，都沒能做到實質性的統一全國。只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才完成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基本任務，實現了對外的民族獨立和對內的政治統一。而毛澤東正是這個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

3，創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風與工作方法

這裏所指，包括“三大作風”，特別是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等。這些都對建設革命隊伍和取得革命勝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是這次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運動的重大區別。有關三大作風，應該承認從整風起就執行得並不令人滿意。例如說得最多的理論聯繫實際、言行一致，就做得比較差。而且越到後來，說的和做的，宣傳的和實際的，距離更越拉越大。批評與自我批評存在的問題也不小，似乎批評者和被批評者有着一定的“分工”：一些人只批評別人，自己既不接受批評也不作自我批評（不算一般的應付如“我也有缺點，有責任”之類）；一些人則是在不斷地接受批評和作自我批評。至於對整個黨和黨的中樞領導，除對遵義會議前的歷史，此後就都只強調偉

大、光榮、正確的一面，也缺乏鄭重的自我批評。談到群眾路線，即使照正式的說法，後來長期犯錯誤，也是由於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結果。雖然三大作風在整風中就在理論上不夠徹底，後來在實踐中執行得還越來越差，但是整個說來，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和政府，還是在中國歷史上創下了空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當然，這都是從紅軍時代起就逐漸積累起來的，通過延安整風，得到進一步系統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所提高，並為全黨和全軍所接受。在戰爭時期和解放初期，共產黨的政權和解放軍(包括以前的紅軍和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處，為政清廉、紀律嚴明、宣揚正氣、軍民一家等，都是中國老百姓過去從未見到過的，同黑暗腐敗的國民黨統治形成鮮明對比，因而得到各階層人民的普遍擁護，成為國民黨走向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人民歷來受壓迫受欺侮，一旦見到不但不擾民，而且還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和軍隊，自然會心悅誠服。所以在新解放區，群眾很快就發動起來了。例如日本投降後我們初到東北，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群眾不瞭解共產黨，抱着正統觀念，歡迎中央軍去接收。但是經過短短幾個月的工作和群眾自身的體會，情況就完全變了過來。又如解放軍開進一些城市，寧可露宿街頭也不擾民，群眾見到或聽到後的感想至今都是美談。那時幹部作風一般都做到了艱苦樸素、克己奉公，下鄉下廠普遍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多吃多佔和違法亂紀的很少，貪污行賄幾乎沒聽到過。不但在解放區，連國民黨統治區群眾，包括廣大的知識分子、中小工商業者以至民族資產階級，也都對國民黨完全絕望，熱烈歡迎共產黨和解放軍。柳亞子的詩句：“佇看荼火軍容盛，正是東征西怨時”，確實反映了國統區各地人民希望早日得到解放的情緒。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國解放戰爭的勝利成了瓜熟蒂落的事。很明顯，對於保證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延安整風總結出的工作作風與工作方法並使廣大幹部能夠自覺遵守和履行，確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一定成效

正如胡喬木所說，那次整風的“主要鋒芒是對着教條主義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63] “對着教條主義”，也就是“整風主要對象是高中級幹部”（雖然他們大多被劃歸經驗主義，但按整風中的說法，經驗主義是教條主義的俘虜）。至於“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

更是廣大的一群，已經是或即將成為黨政軍各方面的骨幹。鋒芒對着他們，就是要改造他們的思想。用當時和後來黨史上的正式說法，知識分子的思想屬於小資產階級，因此必須用無產階級思想加以改造，也就是把他們改造成革命事業的“螺絲釘”和黨的“馴服工具”。不過應當稍作說明的是，第一，談到知識分子不光指“新參加革命的”，實際上從來都是連早就參加革命的一起算，被胡喬木稱為“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資產階級弱點的作家”丁玲，[64] 就是一位老革命；第二，建國後不久已將知識分子劃入資產階級範疇，一律稱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裏只是依照老的傳統說法。由於整風以來的歷次思想改造對知識分子傷害太大，“文革”後經過撥亂反正，人們不再多提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已經變成了貶義詞。但以前並非如此，參加革命後，人們還是自覺自願接受改造的，希望用無產階級思想感情代替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因而對毛澤東貶低知識和挖苦知識分子的話（如說讀書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等），也聽得進去，並無反感。

其實，毛澤東所講知識分子的缺點，總的來說，都確實存在，如驕傲自大，個人英雄主義，對工農兵有所輕視，不大瞭解中國實際特別是農村情況，極端民主化傾向，組織性紀律性較差，表現軟弱和容易動搖等。陳雲在抗大講《黨的建設》時說過一句一時廣為流傳的話，大意是：工農群眾一般小處小氣(指處理生活和待人接物特別節儉)，大處大方(指捨生忘死)；知識分子多是大處小氣，小處大方。這也有一定道理，後來我在打游擊和對敵鬥爭中就深有體會。無論是整風中還是整風後，知識分子對這些不但真心承認，而且實際上也在切實改正。日本投降後，延安的機關幹部和學校學員，普遍做到了“聽黨的話”，“願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服從分配，不講價錢”。由於時間緊迫和人員眾多，許多單位分配工作，就是集合起來宣佈名單，哪些人去東北，哪些人去華北，如何編隊，何時出發，既不徵求意見，也不進行個別談話，散會後即分頭做準備工作，沒見到還有什麼人提不同意見。1940年一位在抗大和我一起做教育工作的同志，和其他幾個人被分配去平津做地下工作，他們表示希望繼續留延安學習。時任中組部長的陳雲找他們談話，說：“共產黨員在艱苦工作的面前，說一句話都是多餘的，提意見就是錯誤。”於是撤消了對他們

的分配，並給予了很重的黨內處分。應該說，經過整風，在這次大分配中就再沒有聽到這類事了。即使在整風搶救中受到很大委屈的許多人，也能以“馴服工具”和“螺絲釘”要求自己，表示要接受考驗。

思想改造的成效更加明顯地表現在知識分子同工農結合上，文藝界的變化就特別引人注意。1942年下半年先後展開的肅反（搶救）運動，使大批知識分子蒙冤受屈，搞得氣氛極為緊張。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還是決心走同工農結合的道路，掀起下鄉運動，爭取和利用一切機會接觸群眾，如幫助農民勞動，當掃盲教員、做鄉村文書等。毛澤東還竟然提出，“要搞七千知識分子下去”，“甚至可以把整個延大、整個行政學院解散下鄉”。[65] 這雖然在實際上沒執行（像“文化大革命”中停辦大學一樣，真要執行也辦得到），但也足見決心之大和當時的精神、風氣。文藝界顯得尤為突出，各種文藝形式都在搞大眾化、表現工農兵，而且很快做出了成績，產生了許多為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1943年春節前後，《兄妹開荒》（著名表演藝術家王大化是戴着“特務”帽子參加演出的）、《夫妻識字》、《十二把鐮刀》等秧歌劇曾引起很大轟動。許多老百姓跟着魯藝的演出隊從這村到那村地跟着跑，機關學校的幹部學員也是多看不厭。延安整風和其間的文藝座談會，影響到全國和長遠，把中國的文學藝術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丁玲在四十年後還回憶說，“文藝座談會以後，整風學習以後，延安和敵後各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都紛紛深入工農兵，面向群眾鬥爭的海洋，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文藝面貌煥然一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展開了新的一頁。”她說的“毛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教育了一代知識分子，培養了一代作家的成長，而且影響到海外，未來，”[66] 也並非誇大之詞。對《講話》本身雖然有不同的看法，但誰也不能否認它所發揮的廣泛深遠影響和劃時代作用。郭沫若當時看了《講話》後提出“凡事有經有權”，即文藝既有基本規律和普遍原則，也有適應當前需要的權宜之計。胡喬木認為，這也適用於《講話》本身。即以基本觀點而論，毛澤東去世後胡喬木就批評“文學服從於政治這種話是不通的”。[67] 但有些概括又確實是普遍規律，如錢鍾書在《宋詩選注·序》中大段引證的文藝來源於生活以及源和流、繼承與創造的關係，他就認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68]。可見，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需要“一分為二”。

延安整風的收穫和成就當然不只這麼四條。只是前面已說過，六十年來，有關這方面已經講得很多，這只要看各種正式的和雖非正式但能夠通過審查得以出版的黨史著作、無數的傳記和回憶錄等就可知道。因此這裏就不再錦上添花了。同時要說明，寫出這一段，也只是要表示對整風應該一分為二；雖無意對收穫和成就作全面概括，但卻有意反駁那些完全否定整風和把整風只看作幾個人爭權奪利的言論。

（四）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及影響

既然對延安整風要一分為二，因此在談過成績和收穫之後，自然就輪到談它的缺點和錯誤了。而且我以為，現在需要着重探討的，不僅是延安整風的缺點和錯誤，更重要的是一些對日後產生重大負面影響的問題。根據個人的體會和學習，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很好反思。但是由於每個問題都將分篇展開討論，所以這裏只列出題目，點到為止。

在我看來，延安整風的缺點、錯誤和長期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這些問題上。

一，延安整風開創了用群眾運動進行思想改造的先河，加深了黨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見，並進而造成對一切知識的輕視。在普遍整風中，知識分子作為改造的主要對象，受到無情批判和衝擊，使他們減弱以至喪失了敢想敢說、獨立思考和勇於創新的精神，基本上被改造成領導的馴服工具。整風造成的不信任知識分子和輕視知識的傳統與機制，長期影響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

二，延安整風貶低了理論學習的重要，妨礙了理論上的發展創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使黨（後來影響到全國）的理論水平得不到提高。胡喬木就說，“從整風以後，實際上很少有什麼創新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說過的，沒有說過的，沒有人敢研究。……實際上以後黨的理論水平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69] 無論從當時情況還是事後影響看，延安整風都不能稱為“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而是貶低理論學習以至理性思維；也沒有反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教條主義，像後來人們說的，而是照搬蘇共和斯大林一套。曾經在民主革命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毛澤東思想，定為一尊後就逐漸走向停滯和僵化，離馬克思主義越來越遠。

三，作為延安整風重要組成部分的搶救運動，是黨在肅反問題上一貫犯“左”傾路線錯誤的一次重要演練，還為以後各種政治運動創造了範式。這就是在對形勢（敵情）的過左估計下任意發動一場大規模運動，從動員群眾、挑選和培養積極分子、引蛇出洞，全面反擊、大轟大嗡，造成大批冤假錯案，然後倉促收尾、甄別定案。事實證明，搶救運動傷害了大批革命知識分子和幹部，給黨造成重大損失，延安氣氛也從生動活潑變為萬馬齊喑。但卻堅持不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遂使類似錯誤不斷重演。看來這不是偶然的，可能還有其他緣故，是否有如《禮記》上所說“百眾以畏，萬民以服”（害怕的就服了。錢鍾書說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也”。）的考慮，就值得研究。

四，延安整風從理論上到組織上為個人崇拜奠定了基礎，後來又不斷得到加強。當時的主要表現可舉出以下幾點：（一）1940年以前中共一直保持着不突出個人的傳統，此後即開始打破，有計劃地掀起學習毛澤東的運動。除王明的《學習毛澤東》經毛閱後見報外，毛的秘書張如心、和培元、陳伯達等已陸續有文章發表。還有選擇地編纂《六大以來》，以樹毛的一貫正確。（二）以活人正式命名“主義”或“思想”，在國際共運史上可謂只此一家。（三）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封建迷信稱呼和比喻流行全黨全國，如山呼萬歲、人民大救星、紅太陽等。（四）黨內的正確與錯誤以人劃線；制定出違反黨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70] 開始了個人的獨斷專行和領袖的終身制。（五）對領袖只能歌頌不能批評，否則就是反黨甚至反革命，使七大成了“歌頌的大會，檢討的大會”。僅以上幾點已足證明，延安整風開始並實現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黨史學界對個人崇拜儘量淡化特別是儘量後推（如否認建國前有個人崇拜現象），本身就是個人崇拜流毒繼續存在的表現。

五，延安整風確立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使一黨專政和書記獨裁（個人說了算）法制化。從“黨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演變為黨領導一切。胡喬木說，“簡單地說黨領導一切這個話，是非常不妥當的。這個話在外延上就沒有劃清楚。”[71] 其實是清楚的，那就是：凡是人世間事，黨都要管。事實上，中國的事沒有黨不管的。一黨專政和一元化體制使黨和國家不可能有民主，使憲法和黨章不過是一紙空文，選舉制和代表會制只能流於形式。實際推行的倒是終身制和變相

終身制、委任制和變相委任制、以及交接班制。權力的集中和壟斷、缺乏透明和監督，既談不上人民當家作主，還必然導致官僚主義和腐敗成為頑疾。

六，整風創立了壟斷與管理意識形態的體制及其表現形式延安文風。前者如限制言論與出版自由，嚴格的審核檢查和“輿論一律”，新聞管理和限制人民的知情權等。後者其實就是一種新八股，如預設前提，不留商量餘地，只下結論，不講根據，以及空話套話等。

七，既然談黨史，下面還將專門談一下整風中以《聯共黨史》為榜樣作出的《歷史決議》，和以此為基礎創建的中共黨史編纂學。斯大林主持編寫的《聯共黨史》，貫穿着突出個人，以人劃線，為尊者諱，隱惡揚善等個人崇拜精神。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和修改上十次的《歷史決議》，[72] 為黨史學以至整個現代史設定了框架和體系。黨史的研究和寫作，雖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中有一些突破，但基本框架至今未動，而且“只此一家”，不許爭鳴，遍設禁區，不得逾越，使黨史研究政治化和神秘化，成為一門不講科學的學科。

八，整風造成工作和時間的重大損失。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內外形勢對中國革命極為有利。這時蘇美英忙於打仗，對我均有所求。日本雖為鞏固佔領區不時發動掃蕩，但主要對付的已是美國。原估計的“片面抗戰必敗”和“蔣必降”證明不確，國民黨全面反共打內戰也無可能，且日益失去民心。正是此時我們卻集中力量搞整風，全黨主要領導幹部調回延安算歷史帳，不但沒能更好抓住發展機遇，還耽誤了正常工作和學習。其實，整風前全黨以毛澤東為首的團結統一已得到不斷加強；說新黨員多必須整風也屬奇談。花三四年時間搞整風，理由並不充分。蔣南翔也說，單是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就“使全黨損失了差不多整整兩年的寶貴光陰”。[73]

以上列舉，只是個人認為特別值得討論的幾個問題。而且如同上面談整風收穫時所說，這些缺點錯誤和負面影響同樣應該一分為二，特別要重視其轉化，因此必須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而這正是延安整風所沒有做到的，需要後人補課，而不是只在原有的框架內打轉轉，繼續重複前人的敘述和結論。

下面就分別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的討論。

註釋

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頁。

2 《楊尚昆和劉英的一次談話》，1997年3月22日，見《張聞天研究文集》第四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

3 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3，69，288，297等頁；《回憶張聞天同志》，《胡喬木文集》第三卷1993年版，第384頁。

4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1986年版，第740頁。

5 見《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6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10頁。

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簡史》，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頁。

9 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2001年版，第68頁；《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第611（；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1991年版，第197頁；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文集》第二卷，1993年版，第48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1994年版，第188頁，等等。

10 《整風問題》，《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2頁。

11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3頁。

12 見該書第188頁。

1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9頁，《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661頁。

14 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378頁；《周恩來傳》，第457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5頁；《彭德懷自述》第223頁，等。

15 《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頁；《彭德懷自述》，第222-223頁。

16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41頁。

1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755頁。

18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999年版，第70-72頁。

19 《周恩來年譜 1898—1949》，第 393 頁。

20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第 425 頁。

21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 406 頁。

22 《周恩來年譜 1898—1949》，第 399、401、406 頁。

23 《周恩來年譜 1898—1949，》第 403、404 頁。

24 王玉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見《中央黨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25 王明：《中共五十年》，現代史料編刊社 1981 年，第 192 頁。

26 見張聞天：《反省筆記》。

27 《周恩來傳》(二)，第 520-521 頁。

28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 163，231 頁。

29 王稼祥：《國際指示報告》，《文獻和研究》1986 年匯編本，第 70-71 造反

30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89 頁。

31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中卷，第 235 頁；《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 762-763 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191 頁。

3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193，53 頁。

33 吳亮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的前前後後》，見《懷念劉少奇同志》1980 年版，第 290 頁。

3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193 頁。

35 毛澤東：《反對折衷主義》(1965 年 12 月)，轉引自《毛澤東大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69 頁。

36 參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 322-323 頁。

37 《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7-373 頁。

38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2001 年版，第 70 頁。另見該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615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 203 頁；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 48 頁，等。

39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01頁；《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 614-615 頁。

40 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中共黨史資料》，1996 年 6 月，第 58 輯。

4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72 頁。

4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 85-86 頁。

43 《延安整風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第 57 頁。

44 馬文瑞：《發揚延安整風精神切實加強黨的建設》，《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 2-3 頁。

45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 1474 頁。

46 王明：《中共 50 年》，東方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16 頁。

47 見該書第 92 頁。

48 見該書第 87，116 頁。

49 張聞天夫人劉英1999年以來同本人多次談話（多有錄音），如該年 6 月 10 日的談話等。

50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7 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2 頁。

52 仲崇東：《全球化與三大意識形態》，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 第 5 期。他認為，“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三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又是三種不同的政治運動，還是建立在不同意識形態之上的不同政治制度。”其中“民族主義是一定歷史階段中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運動”。

53 何方：《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地位》，見《太平洋學報》1999年第2期，後收入《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

54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677頁。

5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76 頁。

56 如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第 679 頁。

5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188 頁。

5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188 頁。

59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319 頁。

60 程中原：《張聞天傳》（修訂本），第 566 頁。

61 高新民、張樹軍：《延安整風實錄》，第 287-288 頁。

62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劉尊棋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 299，303 頁。

63 《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2頁。

6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64頁。

6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0頁。

66 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作於1982年3月），《丁玲文集》第五卷，第283頁。

6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0，58頁。

68 錢鍾書：《宋詩選注》1982年版，第16頁。

69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1頁。

70 1943年3月中央領導機構改組時，毛澤東被選為三人書記處主席。這是關於書記處工作章程的規定。

7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09頁。

7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66，72，312，328頁，文獻全稱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73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4期。

（2000年5月23日完稿
2003年11日作了修改）

第八篇

普遍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

一，知識分子成為普遍整風主要對象的原因

前面的筆記中談過，延安整風分兩個層次。上層整風的對象即毛澤東說的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1]，實際上主要還是中央一級對“左”傾路線的清算。普遍整風的主要鋒芒，就是胡喬木說的針對着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2]（如前所述，實際上早參加革命的也不例外）。但什麼是知識分子，都包括哪些人，卻一直是個不大明確的概念。延安整風時對知識分子含義和範圍的理解顯然寬泛得多，既不是限於列寧、考茨基論述的那種同無產階級存在一定對抗的靠個人奮鬥立足於社會的“知識分子階級”[3]，也大大超出廣義定義的知識分子範圍（即有知識有文化和有某種技術專長的人）。那時投奔延安等地參加革命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除少數作家、學者和一小部分大學生外，絕大多數是高初中學生，甚至還包括一些小學生。因此，就其主體而言，也許稱為知識青年（如同“文革”中下放的“知青”）更合適些。正是那時的這些大小知識分子（由於絕大多數係1938年參加革命，所以通稱“三八式”幹部，其實也包括1938年之前和以後參加的，例如毛澤東就常把“一二·九”運動的幾位學生領袖也稱做“三八式”），先後成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特別是建國後頭三二十年，各條戰線上的中下層主要骨幹。

那為什麼知識分子會成為普遍整風的主要對象而總是挨整呢？

現在要討論的是，不僅延安整風，就是歷次的政治思想運動，知識分子都首當其衝。而且在平時工作中，對知識分子也總有點不夠重視和信任，“文化大革命”中更被稱為“臭老九”。所以對延安整風中“主要鋒芒針對知識分子”的問題有必要多說幾句。現在想來，對

知識分子的這種認識和態度，原因是否可主要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國際共運有一個不信任知識分子的傳統

這大概是基於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學說，一般把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範疇的緣故。上面提到的考茨基的論述就是證明（考茨基後期的看法有很大變化）。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也說，“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階層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和不能接受紀律性和組織性；……意志萎靡、動搖不定……。知識分子的這種特性是同他們通常的生活條件，同他們在很多方面接近於小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的謀生條件（單獨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體裏工作等等）有密切聯繫的。”[4] 事實上，蘇聯在十月革命後對知識分子就很不重視甚至加以排擠和打擊，因而造成流亡國外的高潮，其間約有200萬到250萬知識分子和富有階層的人自願或被迫離開蘇俄。[5] 這曾是高爾基和列寧發生衝突的一個重要原因。列寧臨終前的口授“遺囑”中還特別提到要擴大中央委員會特別是增加工人的名額。共產國際對各國黨也是一再強調在發展黨員和提拔幹部上要特別重視工人。對中國黨不但經常提醒，還直接干預。例如黨的六大，就是在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和米夫的坐鎮指揮下，選舉了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為政治局和常委的主席（四中全會改為總書記），五個常委中有三個係工人出身（即向忠發、項英、蘇兆徵，另兩位為周恩來、蔡和森）。中國黨不但接受共產國際這一“左”的理論，還有所發展，而且越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人越強調“出身論”。這在毛澤東身上體現得最明顯。 他有一句名言，“讀過馬克思主義‘本本’的許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識字的工人常常能夠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6] 他對知識分子也確實從輕視發展到了“敵視”（胡喬木語）。包括中國黨在內的國際共運對知識分子的這種看法和態度，似乎有點近於悖論。因為在理論上，不但列寧講過，歷史也證明，科學社會主義不可能在工人運動中自發產生，只能由有淵博知識的知識分子創立，並且還只能經由知識分子傳播才能和工人運動結合。這就是有名的“灌輸論”。在實際上，從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到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締造者和歷代領導人，絕大多數也都是知識分子出身。中國更不例外。對這一現象歷來

的解釋是，這些知識分子都是背叛了原來所屬的階級而自覺地站到了無產階級立場上。只是有的人轉變徹底，因而立場堅定；有的人轉變不徹底甚至發生倒退，因而犯嚴重錯誤直到“叛變”，如考茨基、普列漢諾夫、陳獨秀等。這種把政治思想問題直接和人的出身聯繫起來，如同劉少奇在作為“整風文獻”之一的《論黨內鬥爭》中說的“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7]一樣，排除了經歷變化和思想認識上的原因，顯然都是過分的簡單化和片面化。不過這裏不擬多談理論問題，只是順便提出來，希望引起討論。

（二）中國黨背負長期封建社會的歷史傳統

在封建時代，作為“士”的知識分子，雖為“士農工商”之首，社會地位在勞動人民之上，但卻依附於統治階級，缺乏獨立身份，而下層讀書人如落第秀才、教書先生，更被人看不起，成了所謂“九儒十丐”。統治者也常對知識分子視之為隱患，用之如玩物。“屈賈誼於長沙”，“竄梁鴻於海曲”，還算不錯的，更有“焚書坑儒”、興“文字獄”、“株連九族”等。而知識分子也是為了“學而優則仕”，即使爬上去，仍然自視為統治者的附庸，什麼“文死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韓愈替文王寫的檢討是，“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到了林則徐，還說“謫居正是君恩厚”。就是這樣的傳統，延續了兩千多年。而且直到近代，中國也沒有經過徹底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和爭取個性解放的啟蒙運動，更沒有實現現代化，因而封建流毒依然既深且廣。

既受國際共運影響，又有中國傳統的沉重包袱，這就使中國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表現得比蘇聯還“左”，而且越來越“左”。事實上，中國黨的許多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長期以來就一直對知識分子表現出輕視和不信任。早在1928年，毛澤東主持的湘贛邊“洗黨”，就把重點定為地富出身的知識分子，“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准）。”[8]開始於六屆四中全會前，在毛澤東領導的一方面軍和所轄的地方打“AB團”中，殺掉的中小知識分子就不知凡幾。其中有些人只是由於政見不同如江西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或因對領導有意見如黃克誠師的宣傳科長何篤才。也有些人只因偶然機會而得救，如傅連璋遇張聞天，黃克誠遇彭德懷，胡耀邦

遇馮文彬和顧作霖等。陳丕顯的哥哥因當小學教員被打成AB團遭處決，陳丕顯因沒文化就未受牽連，活了下來。至於張國燾在鄂豫皖和四川、鄧發在閩西、夏曦在湘鄂西，殘害的知識分子更是無法統計。著名的大知識分子瞿秋白，從四中全會起就一直挨批鬥，後派往中央蘇區，高層仍無人接近，連自稱崇拜魯迅的毛澤東等領導人也並不多和他來往交談，長征時又被“三人團”強行留下。在他就義近三十年後，還因那份自我解剖的《多餘的話》被定為叛徒，直到“文革”後才平反。[9] 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連毛澤東也曾承認過。例如他說，“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複。”[10] “在延安，首長才吃得開，許多科學家、文學家都被人看不起。”[11] 可惜實際上他自己並沒有接受這些教訓，不久後的普遍整風以及肅反搶救，就又把主要矛頭對準了知識分子。因為他們屬於小資產階級範疇，[12] 即使入了黨，也還是有點不大可靠。毛澤東說的：“有許多黨員，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有些人就是一輩子也沒有共產黨員的氣味，只有離開黨完事。”[13] 就是針對知識分子的文化人說的。知識分子要把小資產階級思想變成無產階級思想，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的改造（胡喬木在毛澤東審改過的《解放日報》社論中曾比之為脫褲子和割尾巴[14]），要一直“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周恩來語）。不僅如此，矛盾還會轉化，小資產階級思想不改造就可能走向反黨和反革命。整風中的肅反，對那麼多的人懷疑，也是源於這種認識。中央書記處1943年12月22日會議承認反特問題的偏向之一，就是“相當普遍地發生了懷疑新知識分子的現象”。[15] 建國後更把知識分子提升到資產階級範疇，他們也就越來越倒霉了。

（三）知識分子本身的原因

一方面，知識分子確實存在許多弱點，且不說以前強調的階級立場的轉變，即以思想和生活作風而論，如上文所說的自由散漫、驕傲自滿、脫離實際、崇尚空談、個人計較、容易動搖等，在革命隊伍中就很不適應。對這些，當時延安的知識分子也都承認，並深感思想改造的必要，而且真心接受，毫無抵觸。另一方面，更重要的還是因為知識分子感覺銳敏、意見較多，不容易變成完全的“馴服工具”，因

而不受多數領導者的歡迎。知識分子感覺銳敏，這是由於他們知識較多而帶來的一個重要特點。列寧在論及大學生時就說過，“大學生是一部分最敏感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識分子，就是因為他們最有意識、最徹底、最準確地反映了和表現了社會的階級利益的發展和派別利益的發展。”[16]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談到人們關心中國向何處去時也說，“特別是文化人和青年學生，感覺銳敏，首當其衝。”[17] 知識分子不但看問題銳敏，而且還總要表現出來。毛澤東說的，“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18] 就主要指知識分子。容易看出問題，並且有意見就提，本來應視為優點，但問題並不那麼簡單。應該說，抗日戰爭初期參加革命的知識青年(就是建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和十月革命後的俄國知識分子，有着根本性的區別)，一般的特點都是滿懷愛國激情，向往民主自由，為革命不惜犧牲一切，關心國家大事，喜歡獨立思考，還往往正道直行，仗義執言，看不慣等級和特權，顯得意見多，不安分。乍一看，這些都是不壞的品格和素質，但實際上卻經常碰釘子，不容易行得通。因為一則，這些人多是初出茅廬，對革命隊伍的道理和規矩知之甚少，又缺乏革命實踐，所以看問題有時也容易失之偏激。而革命隊伍卻需要統一思想、嚴格紀律，因此他們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二則不但言多必有失，而且許多領導人還不大願意聽逆耳之言。根據前面所引資料，毛澤東本人就“不願聽不同意見”(田家英語)，“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黃克誠自述》)。而知識分子卻大多不黯世故，不夠含蓄，直來直去，有話就說。有些水平高的知識分子還強調和堅持獨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有些人不但愛提意見，還講話尖銳甚至刻薄。這自然容易引起領導的不滿，有時就被上綱為反領導。要理順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使知識分子學會“循規蹈矩”，做黨的“馴服工具”，就必須加深他們的“原罪感”，磨掉他們的棱角，徹底改造他們的思想和作風。否則就是毛澤東說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總要用自己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所以“要向他們大喝一聲，說‘同志’們，你們那一套是不行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19] 這就是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必然性。

（四）出於對黨內主要不良傾向的估計

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就曾一再指出，“遵義會議以前，在黨內關係的問題上，主要偏向是過火的鬥爭。遵義會議以後黨內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義。”[20] 1937年他還專門寫了一篇《反對自由主義》的文章。雖然，毛澤東後來對自由和自由主義也作過解釋，說：“黨內與黨外的自由主義是有區別的，在國民黨統治區域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是進步的。思想自由與自由主義應有區別，黨內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義。”[21] 而實際上，豈但黨內，在革命隊伍中以至黨領導的地區，自由主義也是不合法的。而且思想自由和自由主義的區別也從來都模糊不清。延安整風後黨內有無思想自由，以及如何界定，也值得考慮，恐怕至今都還是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普遍整風主要整自由主義，則是越來越明確的。黨中央在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自由主義是目前黨內鬥爭中的主要的不良傾向。”“第一是因為我黨接收了約七十萬新黨員，而這些新黨員不論來自哪一階層，都未受過馬列主義的鍛煉，他們帶來了濃厚的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其中尤以許多知識分子黨員表現得最為嚴重。”[22] 這就是說，知識分子是自由主義的主要載體，普遍整風以他們為主要對象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這裏需要稍為一提的還有，整風在知識分子中並未多提反宗派主義。因為所謂反宗派主義是有特定含義和目標的，就是整掉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大宗派。對於知識分子，雖然“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延安的作家也確實分派，但反宗派的重點並不是他們。何況普遍整風的主要對象還是廣大中小知識分子，當時稱得上“文人”的也不多。而這些中小知識分子，當然也是喜歡和志同道合、談得來的人接近，但卻並不搞宗派。而且那時同志間的關係真是不分地區、不論年齡、不計學歷，都能和睦相處，團結互助，親密無間。有的同志調走，歡送會上哭鼻子是常有的事。但是有些黨史書，為了說明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延安普遍整風的必要和正確偉大，就儘量誇大那時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毛病，不但把他們的自由主義、平均主義寫得如何嚴重，而且還要給他們戴上宗派主義的帽子。如說，“有些人還搞小宗派，從上海亭子間來的是一夥，從桂林、重慶等‘大後方’來的是一夥，從香港、南洋作秘密工作的也是一夥，從不同學校出來的

如北大的、清華的、北師大的也結成小圈子，不願和其他學校出來的人在一起，文人相輕的習氣很嚴重。”[23] 這種現象不但聞所未聞，也不可想像。事實正好相反，分成兩派的少數作家恰巧都是來自上海亭子間。在這裏特別提出這點，是因為近來看到不少寫延安整風的書或文章太不真實。事實上，普遍整風批判的主要是自由主義，並沒有提什麼搞宗派，只是後來製造了幾個反黨小集團冤案就是了。

二，普遍整風中的一些實際情況

有關延安整風的研究、回憶和“實錄”，幾十年來出的書籍、文章已實在不少。而且由於對中央一級整風一直實行嚴格保密，能寫的基本上又都是普遍整風。所以一般情況，人們都大體瞭解，無須重複。但是也要看到，有許多對延安整風的論述和描寫，只是根據一些有關文件、領導人講話（有的還經過事後修改）和很多領導幹部或積極分子的回憶錄，以為實際情況就是如此，只要加以綜合甚至照抄即可，卻忽略了在運動中的口號和實際、做的和說的，往往並不一致。只看官方的文件和說法，不作深入的調查研究，也就很難做到實事求是。例如每次政治運動，都說要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不同意，可以申辯；對事不對人，等等。但是，只要是過來人，對這些都是心明如鏡的。即以中央級的黨內鬥爭而言，廬山會議上的彭、黃、張、周能申辯嗎？更不用說反批評了。正是由於看到一些研究延安整風的書有點紙上談兵，所以也想對普遍整風的實際情況作些補充和辨析。雖然在此無意寫個人的回憶，但由於要談延安整風，特別是普遍整風和搶救運動等，卻不能不聯繫到個人的某些經歷和所見所聞。不過我參加普遍整風，只限一隅，整個情況仍瞭解極少，這裏談的一些情況，也可能失之片面，因此寫出後已先送請一些老同學和老延安審閱指正。

（一）關於學習文件

整風開始後，大家（這裏和以下都主要指：先是抗大三分校和軍事學院俄文隊，後為俄文學校和外國語學校俄文系的許多同學）對於所發學習文件還是認真閱讀和積極討論的，但對文件本身一般缺乏新

鮮感，沒太大興趣，不像一些人説的那樣如饑似渴地閱讀鑽研。這是因為：一則大部文件都曾讀過，而且翻來覆去老是那些材料；二則有些文件既不大懂又覺得與己無關，如一再強調要高幹學的“十八條”(《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和《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學生就不容易弄明白；三則覺得自己不寫文章，談不上什麼“黨八股”。許多同學在業務學習與整風學習各佔一半的頭兩三個月裏（1942年4月到6月），實際上主要精力和興趣是放在學俄文上，甚至開整風討論會時有些人也在偷背單詞。但到同年7月，根據中宣部和中央軍委指示，學校停止業務學習專門進行整風。[24] 此後兩年多大體上是一半時間整風審幹，一半時間勞動生產，安排學俄文的時間很少。整風和勞動雖然安排得很緊張，總還是有一定的休息和空隙。在大反教條主義之後，基本上已沒人再讀馬列了。於是一些人就利用業餘時間爭相閱讀文學作品，特別是中外名著，以至古文詩詞。比起來延安後那一段時間學馬列和轉業後學俄文，整風學習在我校（以至一般機關學校）並未形成高潮。實際情況恐怕不像有些書上説的“高潮迭起”，“一浪高過一浪”，甚至“在整風期間，窑洞的燈火比平時亮得早，比平時熄得晚”。[25] 前面的抽象形容也許還可見仁見智，但後面的具體描述卻不會真實。因為當時延安除首長和特別部門供應洋蠟外，一般機關學校都是限量發土煉煤油，只能晚上點一會兒（連“搶救運動”中的“車輪戰”也是在外面分攤摸黑進行），不允許“亮得早”、“熄得晚”。而且那時挖的窑洞，土炕佔一大半，一個班開會也多是坐在炕上（沒桌子可以圍坐），大冒黑煙的煤油燈，點着了就放在洞壁的土龕裏，哪能看成書。我們單位有一陣倒是批評過讀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導致情緒消沉，但沒聽説過哪個單位把“讀書太晚影響了身體健康作為缺點提出來”。[26] 普遍整風開展後的兩個月，1942年6月13日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中已經説，“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在延安大見成效。”[27] 但基本上仍然是這些文件，此後又學了兩三年，自然不容易引起“如饑似渴”的熱情來。當然，整風期間，總學委和中宣部也曾隨時通知學習新的材料，除作為補發的幾份整風文獻外，多為與時局有關的材料，但往往也是用的時間太多。如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就學了一兩個月，[28] 以至有些段落都能背下來。1943年在打退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後，為揭發

國民黨、蔣介石的本質和認清三民主義，曾印發過一批材料，記得其中還有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致大隈重信書》等，也學了個把月。1944年學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蘇聯考涅楚克的劇本《前線》（均當作整風必讀文件），也用了幾個星期。翻來覆去總是討論和閱讀那幾個文件，實在很難掀起一些人形容的那種學文件的熱潮。

但這並不是說大家不同意文件的精神，更不是說學了沒用。相反，學習文件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還是很重要的。對照文件，大家對自身存在的弱點認識得更深刻了。經過這場鍛煉後，在實踐中也確實改正不少。其實，在投奔延安和學習一些馬列後，這批“三八式”知青就已下定決心革命到底並初步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也有了基本的組織性紀律性。每次抗大和陝公等校畢業分配，都是要求上前線，聽從組織安排，就是證明。抗日和反頑鬥爭中，許多知識青年的英勇悲壯表現也不是偶然的。因此不應貶低整風前革命知青的覺悟，而無限誇大整風對改造知識分子的作用。至於胡喬木說的，“黨採取了整風運動的方法，領導全黨的幹部和黨員來認識克服廣泛存在於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29] 不但有點神秘化，不着邊際，而且還是對廣大幹部和黨員，特別是對“大量的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新黨員”的大不敬。怎麼能說他們信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偽裝的”？何況胡本人後來也不承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存在。[30]

（二）關於聯繫實際

延安整風的重要特點是強調聯繫實際。上層主要聯繫的是清算十年前的第三次“左”傾和抗戰初期的右傾，並以人劃線，檢查各人的站隊。針對知識分子的普遍整風，則主要是聯繫自己，用整風文件的精神反省個人的思想和歷史。《四三決定》的第一條就提出，“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31] 毛澤東也說，“要把理論和實際行動聯繫起來，把文件上講的東西和自己的行動聯繫起來。什麼是實際？個人的歷史實際，機關工作的歷史實際，各個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實際。”[32] 聯繫的目的，除為了審查幹部外，主要還是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毛澤東強調整風的重點在自己。他說，“每個同志必須明

白，這次整頓三風，中心在自己身上。要反覆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工作，把它反省一下。”[33] 這些精神，均為一般幹部所瞭解和接受。所以整風開始後，大家都能響應號召，聯繫實際。一方面是個人檢查思想與交代歷史以及相互批評。另一方面就是對當前現實和領導提意見。例如我就曾給賀龍寫過一份書面意見，認為從一二〇師調來培訓的幹部，除軍事學院給他們和大家一樣發一套襯衣外，一二〇師系統還另發一套，這種做法不符合反對山頭主義的精神。賀龍還派人來向我作過解釋。總之，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個人檢查思想或交代歷史，還是對上級提意見，一般都是嚴肅認真和心平氣和的。自我批評也大有進步。以前我們在抗大曾實行過五分鐘檢討制，即在睡覺前每人反省一下當日的思想和言行，內容多是日常小事。由於為省油不點燈，基本上是躺在炕上講。說五分鐘，只是言其簡短，實際上無法計時。那時連隊沒有鐘錶，晚上輪流站崗都是以燒香計（燒完一根香換崗），何況開會。整風後經過學習文件，檢討和交代就深刻多了。特別是交代歷史，不但更為詳細，而且還坦白了一些過去對組織不夠老實的地方，如填表時多報學歷或提高家庭成分（說窮了怕人笑話），誇大曾參加過的救亡和進步活動，以及隱瞞某些事實等。[34] 總的說來，整風前期無論黨員還是非黨員對黨都是忠誠老實的。後來也出現過另一些偏向，如對歷史問題越摳越細，弄得自己前後矛盾，說不清楚。或者走極端，有的人為表現積極和交代徹底，就對個人過去的思想和歷史儘量上綱上線，甚至瞎編亂造。這些都給爾後的肅反帶來很大麻煩。

至於對工作和領導提意見，當時同學們意見最多的是官僚主義和1940年後較明顯的特權和等級制，普遍感到上下和同志間關係不如1938年前後那樣平等和融洽。對一些特殊待遇，如一樣進校學習，某級以上幹部可以帶警衛員和勤務員等規定，特別反感。這倒不是一些人說的，知識分子同工農老幹部之間的矛盾和相互看不起。其實，知識青年初來延安，對長征老幹部普遍都很尊敬甚至崇拜，即使相處幾年後，這種感情也沒有多大變化，只是對越來越明顯的等級制和某些領導的官僚作風頗為不滿。因此，我們學校，同其他知識分子成堆的院校一樣，開始時多數人同情王實味《野百合花》的觀點。後來《野百合花》作為反面教材印發下來討論時，仍有不少人一時轉不過彎

來，直到領導上一再指出和延安對其形成聲討之勢，大家才轉為參加批判和進行檢討（前後也不過二十天）。但也就是從這時起，普遍整風運動開始發生了明顯轉折。

（三）告別和風細雨

一些人談到延安整風，總要描繪出一種和風細雨的氣氛。如果指整風前期的幾個月，也確實如此。當時領導上對普遍整風採取的是“放”的方針，提倡自由討論、暢所欲言。《四三決定》規定：“在討論中要發展爭論，在規定檢查時間內，不管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意見，都得自由發表，不得加以抑制。”[35] 兩個多月後中央總學委還提倡：“各單位的牆報，要注意開展思想上、工作上的爭論，對於投稿的選擇，不論其正面的和反面的，正確的和不正確的，都應刊載，不得抑制。”[36] 實際上，普遍整風的開始階段，在討論中大家雖然也聯繫自己，但興趣和爭論多在對現實和領導提意見上。只是《野百合花》事件和整風試點單位中央研究院的鬥爭，才改變了（不是急剎車，其他機關學校還是繼續“放”了一陣後）普遍整風的方向。因為毛澤東讀了《野百合花》就極為憤怒，“曾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當即打電話要求報社做出深刻檢查。”[37] 後來聽王震看過中央研究院牆報的匯報後，他也連夜去看，還說，“這些東西很有教育意義，是很好的反面教材”，並斷言：“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38] 不久後，各機關學校就普遍發動了對《野百合花》的批判，整風運動的形勢也隨即變得日益嚴峻起來。運動的風向能夠迅速改變，說明黨員和幹部還是聽黨的話的。這裏既有認識問題，也有紀律約束，還有個人利害得失的考慮。即以中央研究院為例，整風開始後的兩個多月，經填表統計，全院研究人員中同意或部分同意王實味言論的佔89%。但在院領導李維漢的總結報告後，不出一周，多數人的態度就一下轉變過來，原來的座談會也很快成為對王實味的揭發批判會，延安各機關學校，就有七十多個單位的一千多人前來旁聽。[39]

王實味事件後，普遍整風聯繫實際的重點已從提意見轉為各人的檢查交代，討論會也就變成了思想鬥爭會和歷史清查會。而且這種檢查和交代是可以沒有盡頭的，如果領導上不扭轉方向，大概可以一直

進行下去。如思想檢查，一旦被定為重點，就總是過不了關。而追查某些重點對象的歷史，更是越搞越複雜，總是說不清楚。大約除組織上確定的骨幹和積極分子有所恃外，廣大幹部各自考慮的已主要是自己的問題，準備會議檢查和寫反省筆記。寫反省筆記，被毛澤東宣佈為“鐵的紀律”，“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40] 就是領導上看了認可才算。許多人對一再填表，寫筆記和自傳，實在感到有點頭疼。1942年底，總學委又發出肅清“小廣播”的通知，每人都要填“小廣播調查表”，內容包括自己散佈的和聽到別人的“小廣播”。本來在思想檢查中的揭發批判和歷史交代中的質問追查，就已使同志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現在一填寫“小廣播調查表”，互相間也不敢再隨便聊天談話了。所以從1942年夏秋起，已談不上什麼和風細雨、暢所欲言，整風的重點也隨之轉移，普遍整風實際上進入了以審查幹部為主的階段。而作為群眾運動，審幹、肅反和搶救實際上又是很難分清的，後來人們也就統稱之為搶救運動。這就是為什麼普遍整風不過三年，胡喬木卻說，“這個搶救運動，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有一兩年，恐怕有兩三年時間。”[41] 我個人的感受也確實如此。而且一些人因特務嫌疑被抓起來坐班房就是一兩年，兩三年，甚至直到抗戰勝利。還不算一些人長期沒能得到甄別的問題。

一些談延安整風的書，都要把整風分為幾個階段，如整頓學風、整頓黨風、整頓文風、以及檢查總結等階段，每進行完一個階段，還要考試。其實這多是紙上談兵。實際情況是聯繫到深挖思想和追查歷史後，已分不清什麼階段了。例如我們單位，在學習文件階段，大體上還能依據計劃，按部就班，比較平穩地進行。整頓黨風，似乎也宣佈過計劃，但因為重點已轉為聯繫各人的思想和歷史，學習計劃就自然成為具文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也一變而為激烈的思想鬥爭和追查歷史。學校已再也組織不起各種集體活動如時事報告、教唱歌、出牆報、同別的單位聯歡等。這就分成了前後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一些黨史著作或領導人的回憶錄，大多暢言延安整風如何開展民主，如何生動活潑、心情舒暢、言者無罪、治病救人等等，如果是指前面一個短時期，倒還可以；如果包括後來兩三年，那就只能是不顧事實的向壁虛構了。實際上對後一階段，過來人一直是心有餘悸的。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後，胡耀邦一次提到整黨時還說，“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來，有兩個問題總猶疑不決。一是整黨，一聽說整黨就害怕，因為幾十年搞整黨沒有哪一次不留下後遺症。這一次恢復了延安整風前期的好作風。”[42] 這也證明，延安整風分前後期，而且後期的作風不好。

大約是出於領導上有計劃的部署，普遍整風很快轉為肅反。有所謂“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43] 之說。因此，整風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應包括肅反搶救所起的威懾作用。有關搶救運動，下面還要專門進行討論。這裏只是要說明，談整風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必須把搶救考慮在內的。

三，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的一些消極影響

延安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對現代的中國革命、社會變革和歷史發展都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和影響。正是那次整風和通過思想改造培養出大批幹部，保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後來搞了三十年上下的社會主義探索。這方面的論述已是汗牛充棟，我們前面也略有提及，因此不必再多重複。但無庸諱言的是，延安整風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也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不少深遠的消極影響。當然，如前所述，中國黨對知識分子的“左”的政策並不自延安整風始，但由於延安整風確實繼承、實踐和系統化了這一整套“左”的政策和做法，才使它能夠長期傳下來。現在看來，主要的消極影響可否歸納為以下相互關聯的幾個問題。

（一）開創了輕視知識的風氣與傳統

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來說，從什麼時候開始輕視書本知識，我沒有研究，不能亂講。這裏用“開創”二字，只是從個人經歷和所見所聞得出的一個看法，就是延安整風前和整風後對於學習（主要指學書本知識）的態度有明顯的不同。

初到延安得到的最深印象，一個是“到處傳遍了抗敵的歌聲”，另一個就是人人都在抓緊讀書，於是就很自然地捲進了這個洪流，也如饑似渴地讀起書來。學習內容，主要是政治即馬列主義，但也重視學文化。那時書很少，有些書往往要排隊相約，按時交換。而且中央

和一些領導同志也在組織各種各樣的學習，如哲學研究會、《資本論》學習小組等。部隊戰士和機關勤雜人員學政治學文化的勁頭也不小。記得作家黃鋼寫過一篇報告文學《我看見了八路軍》，其中就講到戰士們的學習，還提到有一個“小鬼”(通訊員？)在日記中寫道，昨夜夢見了馬克思，給他提了意見，認為他的鬍子太長，不大衛生。至於機關和學校的學習，就更熱烈了。特別是學校，要求在很短時期學很多東西，準備畢業上前線。以我所在的抗大總校而論(1938年底已有八個大隊一萬人)，一期半年到一年，但卻要學一二十門課程。當然主要是政治課，記得的有：哲學、政治經濟學、唯物史觀(社會發展史)、馬列主義概論、中國問題(近代革命史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黨的建設、時事政治等。軍事課程雖不算主要的，但也有七八門之多，除游擊戰術、政治工作、各種條令、日常的制式教練和沙盤作業等以外，至今能記得的還有(其實大多只上三五次課，但由於教學方法結合實際觀察和演練，所以印象很深)：地形學(識別和利用地形地物，如開闊地、獨立樹、集團家屋等)、築城學(修築各種掩體、挖戰壕，有所謂蛇形壕溝、電光形壕溝之類)、軍械學(輕重機槍和各式步槍、木柄手榴彈和馬尾手榴彈等)、彈道學(只記得步槍的來復線)。寫這些只是想舉例說明，1938年前後延安學校學習的緊張和內容的豐富。[44] 1939年後，由於各方面的原因特別是國民黨的加緊封鎖，知識分子投奔延安的人數已急劇減少，中共中央雖然專門發了毛澤東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但已是馬後炮，並沒能扭轉局勢。這時延安各學校已只得主要從機關和部隊調來學員培訓。學生來源的變化和流動性的減小，就使學習時間有所延長，學習內容更加專業化。根據個人體會(這時我已調抗大三分校當政治助教)，此後的教育仍然是遵照原有精神，注重實際運用，並不是後來人們所說學的都是脫離實際的教條。

整風開始後，局面就全變了。不但以前的教育受到批判，而且對知識的看法也提出了新的解釋，實際上是在批判教條主義的口號下貶低知識和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在整風中提出的著名論斷，“書齋中不能發展理論”，[45] 證明了他一貫只重視實踐而輕視理論的觀點，也不合乎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一切理論的發展史實。他不但把所謂“教條”說得“比糞還沒有用”，而且就是“學生們的書本知識”，

“假定都是真理”，對他們也“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的”，“學這種知識……可以說是最容易的”，“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因為，“如果只是死讀書，那麼，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46] 諸如此類的話，不只是提倡讀書無用論，也違背起碼的常識。不信，請讓“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的人，去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看是否“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人們會說，這是有意曲解，因為原來的意思只是為了挖苦讀死書的教條主義者。但是，第一，這裏講明是指假定都是真理的書本知識。那麼，學生們（也應包括不是學生的人）要不要學書本知識？不要書本知識，一個民族的文化水平怎樣來提高？第二，既然只是挖苦教條主義者，那為什麼要在十年後修改發表時全部刪掉？[47] 可見拿不出來。但即使刪去這些話，也並未改變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原意。第三，更重要的不只是對這段文字的解釋，而應結合實際來瞭解這篇報告的精神和實質。如果考察一下整風以來的歷史事實，那麼就可看出，延安整風無論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都開了輕視知識的先河。在整風期間，各機關學校就以少則一兩年多則兩三年的時間，主要學那二十多篇《整風文獻》，其他知識基本上一律停學，包括馬列主義（只是高幹選學一點思想方法論）。專科學校也不例外。我所在的外語學校，就是“1944年秋收以後，俄文、英文兩系師生，（才）開始集中精力，投入外語教學活動”。[48] 抗大總校也是“直到1944年底，全校整風學習方全部結束，並轉入正常學習”。[49] 嚴重的是，延安整風開創的輕視知識和輕視科學文化學習的傳統，建國後還愈演愈烈，一直發展到認為“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50] 連作為指導黨和國家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如前所引，胡喬木也承認，經過延安整風，“實際上以後黨的理論水平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51] 其他就更可想而知了。這都勢必導致全民族的思想貧乏和文化落後，嚴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和國民素質的提高。

（二）加深了對知識分子的輕視與蔑視

這裏之所以用“加深”，是因為以前從國際共運到中國黨內就存在輕視知識分子的傳統。不過遵義會議後，這方面已逐漸有所改進，

抗戰初期知識分子成群結隊奔赴延安，以及抗大、陝公、魯藝、女大、馬列學院的輝煌成就，都是證明。可惜延安整風沒有很好繼承和發揚這一新的傳統，而是在相當程度上恢復和加深了老傳統，並且長期堅持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接連挨整受折磨，中國文化發展也受到嚴重障礙和摧殘，到反“右派”特別是到“文化大革命”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過程有稍加回顧的必要。

延安整風的結束，實際上直到日本投降。此後我們在無全國政權的條件下，必須着重同國民黨爭取群眾，當然也只能對知識分子執行爭取和團結的政策。而反獨裁、爭民主的廣大知識分子，對共產黨和解放軍確實也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黨同知識分子的這種關係一直持續到建國後。許多留學國外的優秀知識分子也突破重重障礙回國效力。這期間，雖然仍在提倡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但還注意方式；知識分子對黨的某些提法和做法開始也不大理解，但並非主流，有些還很快糾正了。例如吳晗在大約寫於1956年的《自傳》中就說，“初到解放區，聽到專政，擁護共產黨，毛主席萬歲，很不習慣，…… 但是這種錯覺很快就糾正了。”[52] 等到抗美援朝結束、三大改造完成，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已過了民主革命的關，現在要過社會主義的關了，因此需要大約也能夠騰出手來大抓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了。這也就是陸定一所談中宣部的工作，“無非是抓階級鬥爭，一個政治運動接着一個政治運動”。[53]

改造知識分子的辦法還是延安整風時用過的兩手，即說服（思想教育）和壓服（批鬥和肅反）。建國後，一方面是動員知識分子參加土改、抗美援朝等各項運動，另一方面也接連發動了對《武訓傳》、梁漱溟、俞平伯、胡適等的批判，不久後更挖出了“胡風反革命集團”。對知識分子的評估也從小資產階級升為資產階級，說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解放前受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54] 並且提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問題，認為現在知識分子“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的身上”，“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因此就要聽這些主人的話，否則“就要辭退你”。[55] 知識分子也真的聽主人的話，起來幫助黨整風，結果卻引起一場“反右派”鬥爭。在這次鬥爭中，被劃為“右派”的55萬餘人，加上其他挨整的（挨批和劃為“中

右”以上，以及在工作上受到影響的）當超過百萬，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不少人還是社會精英。

反“右派”被說成“擴大化”，是否妥當恐怕也值得考慮。因為過去說的許多擴大化都並不準確。如蘇區無中生有的“打AB團”、延安一個特務也沒抓到的“搶救運動”、“文化大革命”中純屬亂來的“抓五一六反革命”，都被說成什麼“擴大化”。其實這些說法不但談不上實事求是，冤屈了不知多少人，而且還妨礙汲取教訓，致使類似錯誤一再重演。按毛澤東估計，中國當時有高級和普通知識分子五百萬左右。[56] 挨整的一百萬紛紛繳械檢討，剩下的四百萬還是繼續聽黨的話，參加對“右派”的批判和對自己的檢查，這就使不久前才提出的“百家爭鳴”完全變成了空話。毛澤東自己就說，“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其實，兩家爭鳴之說仍然不實。因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環境是不會允許“資產階級一家”出來爭鳴的，只能實行“無產階級”的，也就是黨的“輿論一律”。而且反“右派”鬥爭既暴露了知識分子並不都聽話，也證明知識分子沒幾個人敢起來爭鳴，所以對他們反而更不客氣了。胡喬木就說，“經過反右派鬥爭以後，在毛主席的頭腦裏，知識分子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一直到最後都沒有改變過。”[57] 反映此後對知識分子看法的，還有因大搞個人崇拜和奉行極左路線而得到賞識和不斷升遷的柯慶施的妙論。“據老報人徐鑄成回憶，柯慶施在反右運動中對中國知識分子做過如此獨到的概括：知識分子的習慣，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平時懶於檢查自己，問題成堆就難挽救。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58] 主管文教工作的錢俊瑞在八大二次會議的小組發言中也說，“主席指示對知識分子必須戴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而把他們放在應該改造、消滅的階級之內。”[59] 對知識分子的這些看法和態度，根源都在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還有一個副作用，就是抑制了知識分子的長處而助長了他們的短處。對這個問題可以說的有很多，但為節約篇幅，只舉一個例子或現象。無論是思想檢查還是坦白交代（肅反和搶救），一些堅持實事求是不說違心話的人，往往被視為態度不好，即使最後作平反結論也要給留點尾巴。那種在思想批判和肅

反搶救中能夠衝鋒陷陣、按領導意圖辦事的人，就成為運動中的骨幹，即使搞得過火甚至違法亂紀，也不予追究，還會得到重用。還有些人不但在壓力下亂供亂咬，還搖身一變成為“積極分子”，去批鬥和搶救別人，並且被認為“態度好”而受到歡迎。整風運動中的這種做法，自然造成說真話吃虧、說假話佔便宜的效果，客觀上壓制了知識分子正道直行、仗義執言、堅持獨立思考和獨立人格等優秀傳統，助長了投領導所好、順着來、隨風擺、互相拆台、打小報告等不良作風。而這種現象不但屢見於歷次政治運動，即在平時也是大行其道。

（三）使整個一代“三八式”沒能起到應有的歷史作用

輕視知識與知識分子的觀點反映到幹部路線上，就是主要依靠和重用工農老幹部，而不大信任知識分子新幹部。延安時期人們說的老幹部，是指參加過內戰特別是長征的工農幹部，即使原來是知識分子，既已做了黨政軍領導工作，當然也屬老幹部。所謂新幹部，就是一代“三八式”。新老幹部的這種界定，一直保持到建國後好久。在領導和老幹部眼裏，也如同父母看子女總是孩子一樣，始終把“三八式”視為知識分子新幹部。而“三八式”們，在老幹部面前也自認低一輩，經過延安整風更增加了對他們的敬畏。後來的形勢變化，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有點加深新老幹部的這種界定和相互看法。正是在延安時期形成並由整風固定下來的這種看法與傳統，實際上決定了整個一代“三八式”在中國歷史上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應當說，這對我們黨是一大不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大悲劇。這並不是為“三八式”鳴不平，而只是要說明“三八式”一代的斷層，給中國黨和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嚴重後果。

從“一二·九”到“三八式”，這是中國人民空前覺醒的時代，是需要人才也湧現出大批人才的時代。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投奔共產黨，這是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空前壯舉，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正像《抗大校歌》中唱的，他們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擔負着民族解放的重任。按道理，在他們中間一定會產生一批政治家、軍事家以及大師級的專家學者(連沒有奔赴解放區的知識分子中都出現了一批堪稱大師級科學和文史方面的著名人才)，可惜結果並不理想。這除了那個時代的客觀環境外，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傳統

與政策也是重要原因。思想改造和思想管制限制了知識分子幹部在科學、文藝和學術諸方面的創作和成就，而不讓他們進入省部以上領導，特別是中央決策層，就使他們對黨的建設和社會發展無從發揮應有的重要作用，使黨和社會發展規律“長江後浪催前浪”出現長達三四十年的斷流。

延安整風結束時舉行的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是清一色的老幹部，絕大多數還是職業軍人，政治局十三人中的十人和書記處全部又來自中央蘇區（任弼時是從中央蘇區派往湘贛的），在中央委員會裏竟然沒有知識界的代表(也許靠鼓吹個人崇拜發跡的候補委員陳伯達可算一個例外)。這種人員構成雖然不盡合理，但在戰爭時期多少還可理解。違背黨章規定，缺乏充分理由地拖延十一年才召開的八大，已處在全面建設時期，可選出的領導機構卻和七大基本相同，全面排斥“三八式”幹部，不要知識分子和懂經濟建設的人才。毛澤東的不成其為理由的理由是因為人數多。他說，“現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培養出來的，這就是所謂‘三八式’的幹部。他們是我們現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礎，沒有他們不行。但是這部分幹部人數很多……所以這次就不考慮安排了。”[60] 但他同時也不能不承認，“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現在我們這個中央委員會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61] 這顯然與黨提出的“向科學進軍”、“向自然開戰”的任務完全背道而馳。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成員的知識與經驗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不相適應，這是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一再承認的。可毛澤東不僅沒有講一定要保持這個缺點的原因，反而說，“我們這個名單大概只管到二十世紀。”[62] 就是說，基本上由工農老幹部組成、排斥知識分子和“三八式”的中央還要管中國四五十年。而它也確實在一人的操縱下又拖了近十三年才召開立林彪為接班人的九大。八大產生的中央領導不適應中國建設的需要是如此明顯，所以有人認為，八大領導結構必然導致八大路線的中斷。因為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絕大部分出身於農民階級”；“從其職業構成和社會心理來看，他們大多數是職業軍人出身，而軍人的特點是服從命令和權威”；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經濟建設會變成群眾運動了。”[63] 七大和八大產生的中央實際上是個軍事司令部（劉少奇1947年7月4日

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向蘇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的報告，就承認聯共(布)為世界共運的統帥部，“而中共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64]，總司令一聲號令，整個中央以至全黨就立即照辦。例如沒有經過任何應有的黨內外會議，只是一個人的批示和政治局成員的緊跟就廢除了《共同綱領》，全國就開始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至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好”等就更不用說了。誰不服從，就“軍法”從事，還可得到整個中央和全黨的支持，如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等等。

當然，輕視知識與知識分子同“犧牲”（指排斥在決策層領導之外）一代“三八式”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關鍵在於指導思想和體制。即使“三八式”按常規逐漸參與領導和決策，甚至成為多數，但只要保持由延安整風固定下來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各方面照搬斯大林模式，恐怕局勢也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但“三八式”既然指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因此如果他們真的能夠當權，中國社會的發展總會好一些。例如對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反右傾、大躍進等就可能減輕(例如由有科學知識的人而不是大老粗管農業，也許就不會發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怪論），“文革”也許可以避免，中國社會的發展會少走些大彎路。而且，“三八式”能夠進入黨和國家的領導與決策層，這本身就意味着黨內還有一定民主，發展下去，必將直接影響以至動搖終身制和老人政治，起碼也會抑制和弱化專制獨裁的作用。試想，在廢棄《共同綱領》上，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如果中央委員的大多數不隨風倒，政治局和書記處有幾個人能頂住壓力，結果就可能是另一個樣子。可以肯定，毛澤東不會去，也沒人跟着“上山打游擊”。可惜這都只能是假設，因為“三八式”一代的中斷是延安整風注定了的歷史必然。

其實不大信任知識分子，更信任老幹部，也並非從整風開始(只是經過整風，理論上更有系統，如出身的“原罪論”和改造的強制性等，體制上更加固定化了）。在延安時期，早就是這麼做的。從一開始，各單位的領導（特別是第一把手）就一律都是老幹部，甚至包括一些小單位，例如抗大頭幾期的連隊長和指導員就都是長征老幹部，更不用說大隊一級和校領導了。著名的知識分子如任白戈、徐懋庸、張慶孚（還是老黨員）等，至多也是做到大隊的主任教員。建國後仍然堅持這一傳統，連選派駐外大使都非老幹部莫屬。原因就是毛澤

東接見他們時所說，"你們都是老戰士，雖不會外交，還要你們去幹外交，我看都跑不了。"[65] 將軍當大使，有些人還是勝任的。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既不懂外文，又不瞭解國際關係以及外交一套，多少有點像原四方面軍參謀長（1955年評為中將）的倪志亮所說，"中央要我當大使，是拿着黃牛當馬騎，難啊！"[66] 選派他們，只是因為"跑不了"。難道抗戰後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幹部當大使就會跑了？這也是太不信任"三八式"幹部了！當然，老幹部為革命立過汗馬功勞，在他們身上有很多長處，確實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應當受到後輩的敬仰和學習。他們中間也有些人，能夠勤奮自學，掌握淵博知識，保持思想常新，做到了與時俱進，如胡耀邦等，但終究是極少數，更不佔主流地位。就絕大多數或整體而言，對經濟建設，老幹部們的知識準備卻實在不足，視野不夠廣闊，思想認識很難跟上時代的發展。這是業經歷史證明的事實，絕不是對老幹部的蔑視。如果不是由於本身不懂業務，又受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傳統的影響，那就不一定會出現"大躍進"中許多違反常識、嚴重破壞生產力和生態環境的事來。鄧小平就承認，大家頭腦都發熱。[67] 其實這個"大家"，只能指中央和省級領導，總不會包括各方面的專家和科學家以及廣大工農群眾。而對於那些領導者，也並不只是個頭腦發熱的問題，而主要是缺乏應有的科學文化和業務知識。例如直到準備黨的十二大，胡耀邦首先提出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思想，于光遠鑒於從蘇聯學來的工農業總產值統計法極不準確，水分太大，建議改用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並打電話給在武漢的陳丕顯。陳卻說，"可是現在我們的幹部都不懂什麼叫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呀。"[68] 這就是輕視知識帶來的惡果。所以長期主管宣傳教育的陸定一曾對到醫院探視他的于光遠說，他的一個重大失誤和遺憾是解放後沒有提出組織老幹部上大學。這確是一個真誠而深刻的反思。因為延安整風立下的主要信任工農老幹部而不大信任知識分子的規矩和傳統，使從中央到省部一級的所有重要領導職務都只能由老幹部擔任，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是全部）並不懂新的業務，又輕視學習新的知識，還看不起專家學者，所以就只能跟着上面的風走，造成"大躍進"時期上下相互影響的惡性循環。例如冶金部長王鶴壽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題目是《十五年趕上美國》，說"鋼產量完全可以五年超英，十五年超美。"過了一個

多月後又向中央報告，把1962年的指標從三千萬噸提高到六千萬，[69]說超英用不了五年，有兩年就行。至於九千萬人上山砍樹煉鋼，造成多嚴重的後果，恐怕絕不只是個頭腦發熱的問題，主要原因還是不懂業務，迎合領導。因為生物學家頭腦再熱也不會提倡在除“四害”中消滅麻雀，農學家頭腦再熱也不信畝產數十萬斤糧。然而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卻在大力貫徹深耕密植等“八字憲法”、贊揚各地放“衛星”，把糧棉產量高估了又高估（因大躍進中表現突出，1958年5月八屆五中全會上與柯慶施、李井泉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直到1960年許多地方已在大批餓死人，他還在4月6日二屆二次人大會上作農業問題報告時講糧食增產，說“除四害、講衛生運動，成績之大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70]這不都是“外行領導內行”和輕視專家學者的結果嗎？

由於不遵“人事有代謝”之規，堅持偏信和重用老幹部的傳統做法，因而自然就形成老人政治。老人確實經驗豐富、見多識廣，但除少數例外，卻都容易情感上懷舊和思想上保守。例如毛澤東和某些老同志就常懷念並主張恢復供給制、游擊習氣和農村作風。[71]在改革開放以後，有些老同志還對特區有保留，對開放想不通，堅持“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提出“鳥籠經濟”。其權威和影響所及，曾使某些地區落後了好多年。還有個例子可以看出老人思想的守舊，就是當年在延安首先起來大罵丁玲《三八節有感》的人，在新時期又要大批巴金的《隨想錄》。更有甚者，有的領導人公然提倡老幹部子弟接班，說他們起碼不會挖祖墳。總而言之，歷史證明，工農老幹部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建國後由於執行極左路線的一貫制領導，卻也使中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四）給日後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損失

二戰後，世界經濟和科學技術得到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和最快的發展，知識分子可以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在我國，由於延安整風開創的輕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傳統在建國後反而愈演愈烈，因而使我們喪失了二三十年的大好時機，國民經濟和科學技術比人家落後了一大截。這本來是不爭的事實，鄧小平就曾多次指出過。[72]但是有關方

面和有些人卻硬是不承認歷史事實，總要把過去的成績儘量拔高，對錯誤遮遮掩掩不露真相。例如直到前幾年，還有這樣的權威說法：從1952年到1998年，我國經濟年平均增長7.7%，明顯高於世界年均增長3%左右的水平。這就太不實事求是了，也許是由於繼續照搬蘇聯那種水分極大的工農業總產值統計法的緣故。因此，為了汲取輕視知識釀成惡果的教訓，並還歷史以真相，這裏只舉經濟和文化兩方面的例子對解放後的損失作點說明，雖然有些問題在前面的筆記中也曾提到過。

1，以《聯共黨史》為學習中心造成實行“一邊倒”的惡果

“一邊倒”的靈魂是照搬蘇聯模式，這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而在“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和“沒有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事”方面，[73]我國可能還要大大超過蘇聯，因為我們強調“主觀能動性”（實為唯意志論）比他們更厲害。建國後二十多年的實際情況表明，我國經濟發展速度不是上述“明顯高於世界年均增長”，而是恰恰相反，大大低於世界水平。如前所述，1955年中國經濟總量（按匯率折算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經濟中所佔比重是4.7%，日本大約佔2.5%。到1980年，中國的份額降為2.5%，日本則升到10%。[74]同一些東亞“四小龍”的差距拉大得更快。如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情況可能稍有不同，但基本趨勢並未改變。至於人均產值，那差距就更大了。因為我們在發展，人家也在發展，近二十多年來，速度雖然我們快，但他們的基數大。例如美國年增1%就是八九百億美元，我們增1%只一百億美元。可見，錯過一次機會，落後二三十年，追趕起來用的時間就要多得多了。因此，我們對改革開放前所走彎路和所犯錯誤應有充分估計，更不可再用那些靠不住的統計數字自欺欺人了。蘇聯國力統計的虛假就是前車之鑒。

2，延安整風創立的對意識形態壟斷制妨礙科學文化的發展

科學文化的發展要求解放思想、獨立思考、百家爭鳴，而我們在整風中卻從蘇聯學來一套思想專政和輿論一律，這就與時代發展有點背道而馳。當時也提倡解放思想，但那主要指從馬列的書本知識中解放出來，從“左”傾中央時代的所謂“兩個宗派”的影響下解放出來。此後一直都在提倡解放思想，但思想統治也就隨之越來越嚴，思想越來越貧乏、越單調。例如“大躍進”就是在解放思想的號召下發動起

來的，但是農學家能對“八字憲法”提出懷疑、生物學家敢著文反對打麻雀、政治學家可被允許討論政黨制度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科學和技術怎麼能夠得到順利發展、怎麼能夠實現創新和突破？這種環境也自然難以培養出各學科的大科學家來。這就是我國經濟建設至今在技術上主要還得依靠外國、依靠引進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一切都不是絕對的。國人就一直以“兩彈一星”自豪。這確實證明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但從戰略上看，卻並不是完全成功的。因為在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下，一個大國要調動各方面的力量，辦成幾件事，相對而言是並不太難的。蘇聯就曾集全國的力量發展軍事技術和國防工業，結果也能在同美國經濟實力極為懸殊的情況下，取得軍事上同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成為兩個超級大國之一，在某些領域如核能和航天方面還一度領先美國（蘇聯首先發射人造衛星曾是毛澤東得出“東風壓倒西風”的重要依據之一[75]）。但它卻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水平大大落後於西方，據蘇聯崩潰前統計的經濟總量，也只相當美國的八九分之一。俄羅斯人早已在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但蘇聯／俄羅斯的軍事技術還比較全面，而我們只有“兩彈一星”，飛機、艦艇等還有求於國外。在這點上，也應以蘇聯為鑒，更不宜老是高談“兩彈一星”了。

不用說，思想統治和輿論一律，對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影響更大和更直接，馬克思主義本身也不例外。前面已經引證過，連胡喬木也承認，“從整風以後，實際上很少有什麼創造性的研究，要研究就要是毛主席說過的，沒有說過的，沒有人敢研究。”因而得出結論：“黨的理論水平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76] 那些研究延安整風的人，那些自認為是胡喬木學派的黨史工作者，請牢記和很好體會胡喬木這段話，因為幾十年的歷史也確實是如此。這不只是由於毛澤東的威信和黨的紀律，更重要的還由於新聞和輿論的壟斷（不同意見出不來）、現實利害得失的考慮（順着來寫作肯定佔便宜，發表不同意見可能挨整）、以及專政的作用。毛澤東在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上就說過，“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77] 這可不是隨便說說的，剛過去不久的反“右派”鬥爭中不知就有多少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後來更厲害，據胡耀邦說，單是在十年動亂時期，為堅持真理而鬥爭的“像張志新這

樣的優秀分子，……遭到殺害的，有三十萬人”。[78] 人身都不保，還遑論其他。所以延安整風形成的這種思想管理體制，很難在哲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的各領域培養出公認的大師級的專家學者來，即使原有的大師級人物也很難拿出大師級的作品。這曾使一些著名的學者和作家抱憾終生。他們想研究的問題不能研究，想寫的東西不能寫，想出版的書不能出，想演的戲不能演，哪裏有過什麼“雙百方針”，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看來要做到人文社會科學的百家爭鳴和文學藝術的百花齊放，求得學術的興旺和文藝的繁榮，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於多年來常說的要造成一種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局面，更只能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了。

在這一節原來還計劃寫兩個問題，一個是延安整風的結果宣佈了黨史上第二個生動活潑時期的結束；一個是延安整風中滋長起來的弄虛作假等不良風氣。但是現在已經寫得太長了，而那兩個問題又不能過分簡化，所以就只好另辟章節了。這樣，關於普遍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的反思就暫且到此為止。

註釋

1 1942年7月4日致聶榮臻電報，《毛澤東傳譜》中卷，第391頁。

2 見《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2頁。

3 見《整風文獻》中《列寧、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摘引自《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一步、退兩步》第十三章。

4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七卷，第256頁。

5 （蘇）德·安·沃爾科戈諾夫：《勝利與悲劇》中譯本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頁。

6 《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第51頁。

7 《劉少奇選集》，第179頁。

8 劉克猶：《回憶寧岡縣的黨組織》，載余伯流、夏道漢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頁。

9 瞿獨伊：《瞿秋白平反的前前後後》，《縱橫》2001年第一期。文內稱，1963年毛澤東看了《多餘的話》，就認為秋白叛變了。劉少

奇隨即向安子文等傳達說，“中央傳達最高意見，適當時候將宣佈。”“文革”後王任重還對獨伊說，不能給你父親平反，因為十二號文件所談秋白自首叛變是毛主席定的。直到1980年才在胡耀邦主持下平反。

10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20頁。

11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74頁。

12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包括一般幹部括一檔案黨》；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第6頁，第332頁。

13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75頁。

14 《胡喬木文集》第一卷，載《教條和褲子》（第47-50頁）等篇。

15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9頁。

16 《論青年的任務》（第一封信），《列寧全集》第七卷，第324頁。

17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02頁。

18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87頁。

19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375頁。

2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13頁。

21 1943年3月《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

22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33頁。

23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頁。

24 參閱《北京外國語學院簡史》《延安建校 艱苦創業》部分，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5年版。

25 如《延安整風實錄》的章節標題和190頁。

26 如《延安整風實錄》的章節標題和190頁。

27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7頁。

28 毛澤東對這項學習極為重視，曾要求各根據地：“一切幹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58-459頁。

29 《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48頁。

30 他在1980年11月12日說，“把一切問題都歸結為小資產階級思

想”，“這種說法不但是簡單化，而且是向壁虛構。說資產階級思想，說封建思想殘餘，確實還可以舉出來，但說小資產階級思想，說不出來。”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7-138頁。

31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

32 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學習組的整風報告，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21-222頁。

33 在中央學習組關於整頓三風的報告，見《毛澤東年譜》中卷第376頁。

34 這種現象相當普遍。例如1940年12月25日馬列學院幹部科在一份《馬列學院審查幹部中的一些經驗》的材料中說的，“從1940年6月馬列學院291個抗戰後入黨的黨員測驗中，前後表冊填寫一致的僅103人，佔全數測驗的33%，其他67%都是經過黨的無數次教育解釋工作才改正了、補充了自己的歷史的。”(《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其實，根據多年的見聞和經歷，有些填表前後一致的，往往是由於個人保留有底稿，到時照抄，其中一些人隱瞞問題的可能反倒大；前後不一致的，許多人則是由於問題不大因而馬虎所致。所以後來在審幹中，對前後表冊填得一模一樣的，反而有所懷疑，因為人們記憶不可能那麼準確。

35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第365頁。

36 1942年6月15日中央總學委第三次會議的第三項決定。見《延安整風五十年》，第231頁。

3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49頁。

38 轉引自《王實味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頁。

39 以上見《第一個平反的“右派”——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147頁；《王實味傳》，第190-220頁。

40 毛澤東：《關於整頓三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416頁；毛澤東1943年6月致彭德懷電，《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7-208頁。

4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1頁。

42 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對上海黨政幹部的講話。

43 這兩句話到處在引用，如《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49頁，都說是康生所說。

44 可參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

4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49頁。

46 毛澤東張聞天在七大七的七發，見《整風文獻》（訂正本）新華書店1949年版。

47 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整頓黨的作風》。

48 《北京外國語學院簡史》，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第10頁。

49 《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第171頁。

50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1頁。

51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31頁。

52 蘇雙碧主編：《吳晗自傳書信文集》，中國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頁。轉引自《隨筆》2002年第4期，第19頁。

53 《陸定一傳》，第587頁。

54 第三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09頁。

55 毛澤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52-453頁。

56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04，405頁。

57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21頁。

58 轉引自馮錫剛：《"好學生"的最後十年》，《隨筆》2002年第4期。

59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301頁。

60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93頁。

61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02頁。

62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08頁。

63 黎見春：《從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結構看八大路線的中斷》，《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2期。

64 共的歷程》聯共（布）中央及斯大林的報告》，載《黨史研究資料》1998年第2期。

65 王幼平：《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選派情況追憶》，《新中國外交風雲》（第四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

66 《首任駐朝鮮大使倪志亮》，載《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一

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5 年版。

67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296 頁。

68 于光遠：《紀念耀邦的六篇文章》，《懷念耀邦》(第二集)，淩天出版社 1999 年第 64 頁。

69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第 302，377 頁。

70 譚震林：《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新華半月刊》1960 年第 8 期，第 25 頁。

71 《毛澤東大觀》，第 610，611 頁。

72 參閱《鄧小平文集》第三卷，第90，116，137，266，383頁等。

73 《鄧小平文集》，第 116 頁。

74 見《人民日報》，1988 年 4 月 6 日；《經濟日報》，1993 年 7 月 20 日。

75 見《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 634 頁。

76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 131 頁。

77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第 296 頁。

78 1979年7月11日在中宣部例會上的插話，見《懷念耀邦》第四集載鄭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長紀略》。

(2002 年 8 月 1 日完稿)

第九篇

延安整風不能說是一次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

一，馬列主義教育運動的提法與實際不符

六十年來，對延安整風一直有個正式提法，即一次全黨範圍的普遍深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先後用詞雖有某些差異，但基本精神是一貫的和一致的。[1] 只是近些年來，根據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原有提法作了點修訂，改為："整風運動既是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也是破除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神聖化錯誤傾向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2] 所有這些，無論是以當時實際還是事後發展來衡量，都是不夠實事求是的。對此，前面幾篇筆記中曾提到過，但鑒於這個問題關係到對延安整風的根本評估，所以還需要再稍為系統地作點說明。

（一）先談幾個用詞問題

1，說整風是全黨範圍的運動就不是事實

除中央一級完全採取暗箱作業的方法清算所謂兩大宗派的鬥爭外，即以普遍整風而言，還是胡喬木說的主要針對機關幹部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而全黨這時（1942年初）已有八十萬黨員，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兵黨員並沒有參加整風學習。在延安參加整風學習的也只是一萬多名幹部，並不包括非幹部的黨員群眾。毛澤東1942年4月20日在中央學習組關於整頓作風的發言中，就明確要求："全黨幹部在現在這個時期，在一兩年內，能夠把作風有所改變"，"我們

的幹部就能夠提高。”還說，“延安的幹部教育好了，學習好了，現在可以對付黑暗，將來可以迎接光明……這都是全國性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上說，“從客觀條件看，毛主席認為，無論在延安還是全國各根據地，讓幹部集中一段時期學習、整風，也是可能的。”[3] 可見，說來說去還是幹部（當時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是幹部）的整風，所謂“全黨範圍”是把廣大的普通黨員排除在外的。當時的情況也確實如此。這並不單純是咬文嚼字和摳字眼的問題，而是說明一種精神，就是我們在黨內歷來依靠的是黨員幹部（全黨就是指他們），而不是黨員群眾。推而廣之，我們的政權所依靠的也是各級幹部，而不是廣大人民群眾。所以，名義上說是群眾當家作主，實際上是黨的領導和各級幹部當家作主。

另外，還要在此附帶一提的是，“全黨整風”的“全黨”也是不顧事實的說法。因為無論延安還是各根據地，凡搞整風的單位，非黨幹部都是參加了的。當時還沒有 1957 年那種要非黨幹部“幫助黨整風”的說法，而是黨內外幹部“一視同仁”，不曾聽說有什麼機關的非黨幹部可以“逍遙”於整風之外。現在有些談到延安整風的書籍和文章，還把當時的審幹和搶救運動說成是“開展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4] 更是脱離實際的天方夜譚，因為不少機關學校非黨幹部和群眾被搶救的反倒更多些。

2，稱為“普遍深刻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也不恰當，起碼屬於無限誇大

“普遍”，已如上面所說，實際上整風學習不但限於幹部，而且發展很不平衡，不少地方的幹部並沒來得及開展學習就被捲進了搶救運動；有些對敵鬥爭緊張和從事地下工作的幹部，也沒機會組織學習。至於說“深刻”，只是個空洞的形容詞，怎麼個深刻法，始終沒有講出幾個具體標誌。是否像《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書中為了說明全黨普遍整風的必要而編寫的一些理由：“在全黨，新黨員、新幹部佔 90%。他們沒有經過內戰，沒有參加過長征，共產主義的許多道理不熟悉，階級鬥爭是怎麼回事不懂得，雖然有的讀了兩年書，但只記得一些教條，不懂得馬列主義是什麼。”所引毛澤東的話要求更高，要全黨幹部在一兩年內“把馬列主義搞通”。[5] 是否經過整風，這些問題都解決了，所要求的目的都達到了，因此才叫“深刻”？其實，這

些話不但前後矛盾(整風到底是全黨黨員還是全黨幹部，或只是新黨員、新幹部），而且完全脱離實際，要求之高也只能是主觀主義幻想。例如説新黨員、新幹部，由於沒有經過內戰、長征，所以許多共產主義道理不熟悉，階級鬥爭、馬列主義都不懂得。那麼參加過內戰、長征的老黨員、老幹部對這些就都熟悉了、懂得了？我曾多次同長征老戰士共事，親自體會到，多數老長征由於出身於沒有文化的貧苦農民，參軍後又是緊張的戰鬥生活，很少學習機會，所以對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道理幾乎是空白，反倒不如那些被譏為“只記得一些教條”的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就算上引説法可以成立，那為什麼整風反而要以參加過內戰和長征的高級幹部為主要對象呢？何況鄧小平説，“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注，當然也包括毛澤東）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不過什麼叫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才解決。”[6] 連問題都還沒有弄清楚，怎麼能談得上以此進行“深刻的”教育？總不能像毛澤東常批評別人的那樣“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吧？

3，提“馬列主義”這個名詞不準確不科學

因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和馬列主義當同義詞用，這是我們一再講過的。[7]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新著的兩本黨史教科書（即本篇“注2”提到的簡史和長編）中已將以前慣用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改為“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這顯然是一點進步。但是兩本書又都增加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含義，卻是極不準確和違背歷史真實的。這大約是由於在“文革”後的撥亂反正期間，周揚、胡繩、溫濟澤等人著文把“五四”、整風和這次撥亂反正並列為近現代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所導致的結果。實際上，延安整風只是以反對存在於遵義會議以前的舊教條為名另立一套完整的新教條，而且束縛更嚴。整風前還有相當程度的思想解放和言論自由，領導上，如作為總書記並主管宣傳教育工作的張聞天，更“特別提倡發揚民主，培養敢作敢為、敢獨立思想的幹部”。[8] 報刊上確實也經常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和對工作的批評。還創立了針砭時弊的《輕騎隊》之類的街頭小報。整風後，這些都成了批判的對象和個人檢討的內容，搶救運動一來更是萬馬齊喑。這哪裏談得上思想解放，倒是真正實現了統一思想，輿論一律。整風學習給像我這樣的一般幹部所留下的最深印象，主要是列

寧的“鐵的紀律”、斯大林的“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劉少奇的馴服工具論。反對的教條主義是什麼，實際上是並不清楚的，無非是講話時少引證馬列，多引證毛主席等等。至於反對把國際指示教條化和把蘇聯經驗神聖化，那已是過了十多二十年中蘇關係出現問題後的提法，屬於慣用的事後諸葛亮的話，在延安整風時沒有也不可能有此提法，連暗示的含義都沒有。而且正好相反，整風中正是用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指示、斯大林言論與蘇共經驗來反對那些被稱為教條宗派的人，說他們是假的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擁護者，以毛澤東、劉少奇為代表的一派才是真的。所以經過整風，實際上倒是增強了對斯大林的崇拜和“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信念。

（二）延安整風學的是斯大林理論

延安整風不能稱為也確實不是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除了前面一再說過的，因為普遍整風的學習材料中，根本沒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著作，還特別是由於把斯大林的理論誤認成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所以對整風學習，毛澤東明確規定，“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因為照他說，“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9] 這種提法現在已經可以明確斷定是完全錯誤的。中國的官方輿論也早已不再提斯大林和聯共黨史了。因為多年來揭發暴露的事實和近百年的歷史演變充分證明，並得到舉世公認，斯大林的理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聯共（布）黨史》則是偽造歷史和搞個人崇拜的典型。以這樣的理論為中心的學習，怎麼能稱得上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

也許人們會說，《整風文獻》中除了斯大林的論著外，不是還有我們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以及共產國際的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文章嗎？確實如此，而且中國黨和領導人的材料還要更多些。但是應該承認，整風學習既然以斯大林的理論為中心，那麼其他材料一定是同這個中心保持一致，絕不會與其矛盾，更不能唱反調。這在邏輯上和常識上都是不成問題的。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讀《整風文獻》收錄的他們的文章，不但可以看出立論是以斯大林的理論為基礎，而且也都

只引證斯大林，有些還是大段的引證，卻看不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多少引語。這能說是偶然的嗎？就內容而言，像毛澤東在幾篇報告中那樣對書本知識、外來文化、理論研究和知識分子的輕慢和蔑視，就很難說得上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批評“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10] 還是在同列寧唱反調。因為如前所述，列寧15歲就開始閱讀《資本論》，17歲被捕，18歲組織馬克思主義小組，並講解《資本論》。[11]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和《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則是更明顯地立足於斯大林理論，有極大的負面影響。頭一篇就是要把黨員培養成黨的（實際上就是領導的）馴服工具。第二篇雖表明是要反對黨內鬥爭中“左”的傾向，但因為是以斯大林的論斷：“黨是在不斷的黨內兩條戰線的鬥爭中鞏固與發展起來的”和“黨內鬥爭是黨外階級鬥爭的反映”[12] 為依據，因此基本精神還是強調鬥爭，事實上也立竿見影地為整風和搶救中的殘酷鬥爭所證實。至於第三篇，所起作用主要是用斯大林黨同伐異的理論製造中國的個人崇拜。當然，這裏無意從理論上分析和討論《整風文獻》中選用的每篇文章，只是要舉例說明延安整風不可簡單說成一場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而是用斯大林理論（當時的毛澤東思想也是這一理論的中國化，所以被劉少奇稱為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統一全黨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思想的教育運動。

不但學習內容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理論，而且整風中特別是整風後實際上執行的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斯大林的原則。這裏只以整風期間違背黨章規定，一再推遲七大的召開為例做點說明。對於作為最高權力機構的黨代表大會，馬克思、恩格斯一直主張年會制，並要公開進行，以防止造成個人專權和脫離群眾的暗箱作業。列寧也堅持了這一原則，因此即使在國內戰爭的緊張時期，俄共的年會制也從未間斷，而且對社會特別是對全體黨員完全開放，不但公開進行，還在報上開闢爭論專欄。只是斯大林專權後才逐漸加以改變，致使聯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相隔十三年之久，更沒有不同意見發表。中國黨在被毛澤東稱為第一個生動活潑時期，即陳獨秀任總書記的年代，也是實行每次都有爭論的年會制（在國內無法舉行時還到國外去開了六大）。六大黨章仍寫明年會制，只是實際情況變得很難執行。1931年四中全會雖有決定，但未實現。直到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才認

為有可能決定“在最近時期”召開七大，並選出了準備委員會。此後政治局和書記處又多次作過討論和決定，尤其是1938年擴大的六中全會特別專門做出關於召集七大的決議，並確定了議事日程和代表選舉辦法，要求加緊準備工作，以便“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之”。[13] 但是後來已確立了領袖地位的毛澤東，卻置書記處與政治局的歷次決定以至中央全會的決議於不顧，要先統一思想再開會(從此，就都一直開成了無爭論的“團結的大會”)，各地選派的代表被安排參加整風學習和搶救運動，於是又經過五六年到1945年才開成七大，距六大已有十七年。此後在大半為和平時期又是拖了十年才開八大。這只是一個較顯著的例子。其實，七大以後的黨內生活以及國家體制的改革和建設，基本上也都走的是斯大林的路子。例如建國後，由於毛澤東個人想法的變化，決定立即放棄《共同綱領》、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樣一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卻既不經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也不打算經過制定《共同綱領》的新政協會議，但決不忽略向斯大林請教。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隨後即委托參加蘇共十九大的劉少奇向斯大林請示和徵求意見。10月20日，劉少奇致信斯大林。10月24日，斯大林在接見中共代表團的談話中，對中國從現在起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作了肯定的評價。第二年，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正式提出來了。[14] 又如在這之前，毛澤東原也想按照蘇聯、南斯拉夫的經驗，在革命勝利後取締各民主黨派，但由於在徵求意見時斯大林不同意才保留了下來。[15] 至於建設中的照搬斯大林模式，就無須多說了。可見，不但整風時的學習，而且整風後的實踐，都是貫穿着斯大林的理論。至於多年後說的，延安整風是反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教條主義，那也像經常用的以事後的形勢變化和新的認識修改幾十年前的文章一樣，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他們所寫《共產黨宣言》再版時，就一再說有些論斷已經過時或當時的提法本來就不完備，但總是聲明，“宣言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們已沒有權利來加以修改”。[16] 甚至連斯大林也都表示，對過去寫的文章，現在看來有些錯誤(所謂“顯得陳舊了的論點”)，但也不去修改原文了。[17] 有關這些，特別是整風後的學蘇聯、“一邊倒”和維護斯大林等問題，下面還將談到，這裏就不再多說了。

二，整風前倒是進行了幾年馬克思主義教育

（一）延安時期以前中國黨的理論水平不高

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一直不高。從以陳獨秀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人起，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重視不夠，加以時間和條件的限制，使他們沒能下大功夫進行學習和研究，還表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簡單化和片面性。他們很注意用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原則指導現實鬥爭，不斷探索着同中國實際的結合，即後來毛澤東、張聞天等人說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8] 也一直參加和領導着各個領域的革命鬥爭。黨從成立之日起，雖然理論準備很不充分，卻立即登上中國政治舞台，並發揮着越來越大的作用，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但由於黨的領導層，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特別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政治經濟學缺乏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所以使黨在路線和政策上總是容易出現隨意性和片面性，不斷犯右的和更多犯“左”的錯誤。

以中央到達陝北時的情況而論，領導層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掌握大致分兩種情況。一是，部分人在蘇聯學了些馬列書本知識，但不瞭解中國實際，一回國就擔負起領導工作，因而只能跟着共產國際犯“左”的教條主義錯誤。經過幾年實際鬥爭的鍛煉和吸取犯錯誤的教訓，他們中的多數人已較快地走上理論聯繫實際的正確道路，還增強了免疫力，避免了此後再犯重大錯誤。不過他們在領導層中屬於少數，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也沒什麼基礎。再一種，是更多的在實際鬥爭中湧現出的領導人和骨幹。他們一參加革命就捲入緊張的實際鬥爭，沒有時間和條件多學理論，更看不到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著作。例如毛澤東就說，“有三本書（即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特別深刻的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19] 此後在戰爭環境中也只能再讀點列寧、斯大林的小冊子如《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列寧主義概論》等。而且由於馬克思主義屬於西方文化，這本身就增加了中國人理解的難度，還往往容易搞偏，發生誤解。加之文字的隔閡（翻譯成中文的數量很少），更使黨的多數領導人和各

級骨幹無法閱讀許多馬列原著，更不用說廣大黨員群眾了。所以在很長時期，可以說黨和紅軍（黨的主要力量所在）的領導，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基本上還是處於小冊子階段，當然談不上做到完整、全面和準確。至於廣大的黨員幹部和群眾，多屬文盲和識字不多的工農。他們的參加革命和入黨，純粹出於反壓迫、求解放的純樸階級覺悟，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抗戰時期則是抗日救亡。中央進駐延安後，曾抽調一批有培養前途的幹部進黨校學習，其情況竟如李維漢所說，一些黨員幹部連“聽也未聽說過馬列主義”。[20] 1938年前後大批湧入延安的知識青年，像我們這類人，雖然讀過一些馬列和其他進步書籍，但確實極其膚淺，多數人並沒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真正的學習還是參加革命以後才開始的。還有一批理論工作者，過去在白區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社會科學戰線的鬥爭，但卻遠離黨中央的領導，對革命實際也不大瞭解，仍然需要重新學習和補課，使理論聯繫實際，更好地瞭解、掌握和宣傳黨的政策，以至對領導起點智囊參謀作用。

（二）延安前期的理論學習

上述情況說明，無論是黨的領導還是普通黨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已成為迫切需要，而且也是上下一致的要求。但是怎樣學習呢？根據考茨基、列寧的理論，馬克思主義既不可能在工人運動中自發地產生，工人群眾也不可能通過實踐就自然學到手，而必須讀書和聽講。[21] 正是根據學習馬列必須從讀書開始的原則，加之黨中央進駐延安後獲得了相對安定的環境，可以大辦各種學校和訓練班，培訓原有的軍政幹部和來自敵戰區或大後方的知識分子，也有可能較正規地組織在職幹部的文化和理論學習。於是在黨中央的號召和組織領導下，就掀起了一場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高潮。為了盡可能適應學習的需要，張聞天還親自主持和組織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其規模也屬空前，但因紙張和印刷條件的限制，仍滿足不了各地的需要。1938年擴大的六中全會決議更提出，“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22] 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些，更好一些”。[23] 這就把這次學習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而且學習範圍也從延安擴展到各根據地和全黨。

幾年的學理論熱潮，幾乎把革命隊伍中所有的人都捲了進去，人們都以極大熱情、爭分奪秒地擠時間讀書、討論、記筆記。因此，不但個人爭書讀(因為終究書少，一些書留在誰手裏的時間是有限的，例如《資本論》第一卷普通幹部一人只能借閱兩個月，後面還有好幾個人排隊等着），就是機關、部隊也扣書籍、“搶”教員，特別是敵後根據地。我就親自聽過朱總司令從前方回來不久講到的一些情況。他說：“前方學習中的困難首先是缺乏教師。去年鄧小平同志帶了兩個馬列學院的同志去前方，半途被扣，打了半年官司，總部才派人換了回來。第二個困難是缺書本子。最近延安給山東送去了一兩百本《聯共黨史》，但他們只收到七本”。[24] 當時那種學習情景，六十多年後想起或同熟人談起，還有些心潮澎湃。許多人一生好讀書的習慣就是那陣子養成的。

這段理論學習，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起了巨大作用。在抗戰特別是解放戰爭和建國後的各條戰線上起到骨幹作用的整個“三八式”一代，就是在這次學習熱潮中培養出來的。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感受，而是許多同代人的深切回憶，都證明那是不可忘卻的歷史事實。例如單是我們抗大，截至1942年整風前，總校和各分校培養出的幹部就近十萬，百分之九十上了前線，沒有多少人願意留在後方搞學院式研究或讀書。[25] 即以被毛澤東視為教條主義大本營並迫使張聞天承認過去方針錯了的馬列學院[26] 而論，三年培養了八九百人，據朱鳳熙 1982 年編同學錄時的統計，除一二個敗類外，都在各條戰線為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不少人後來還成了高級幹部）。所以他的結論與毛澤東相反：“可見當年教育方針與實施的正確”。曾在馬列學院學習過的許多學員，無論知識分子還是老紅軍，也都在五十年後提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建立和確定自己世界觀的那個重要時刻，是在馬列學院度過的，這是幸運”（王惠德）。“我一生當中，真正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是在延安馬列主義學院”（段蘇權）。“強調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對於理論修養底子很薄的我們中國共產黨，是十分重要的”（雪葦）。[27] 五十年後的回憶和總結，大家一致認為，那段理論學習，無論內容和方法還是事後的實踐證明，都是學用一致、密切聯繫實際的，並不是什麼被批評的教條主義。

與這次學習熱潮互相呼應、相互促進同時興起的，還有建黨以來

唯一的一次社會科學大繁榮。[28] 這首先表現在黨的領袖們有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和時間，系統地學習理論，並結合實際，對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思考和研究，最後昇華為新的理論。所以延安時期，是一個理論上出現飛躍和成果最顯著的時期。這不但出自領導層的集體努力，也得力於上下左右的相互促進和相互影響。在這方面起了不小作用的就是一大批理論工作者來到了延安，發揮了教師和智囊的作用。例如毛澤東親自組織有肖勁光、羅瑞卿等參加的“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就是請何思敬來翻譯和講授的。當時的學習熱潮和理論繁榮，還表現為延安的學術組織和機構也如雨後春笋，紛紛成立。我所記得的就有：張聞天主持的《資本論》學習組，艾思奇任會長的“延安新哲學會”，王學文、王思華等人組織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會，其他還有中國革命問題研究會、中國歷史研究會、政治工作研究會等幾十個。參加的人多是相互交叉的，其中不少人只是為了學習聽講而去。我個人就是毛澤東批評的那種啃起了《資本論》的十七八歲娃娃，17歲開始在抗大當助教，還參加過《資本論》學習組的旁聽。那時延安經常舉辦上大課（比較固定）、講演會和討論會（看到海報即可自由去聽），有些人禮拜天竟可參加兩場。所以，當時的理論繁榮並不只是一批領袖人物和理論家們的事，而是帶有相當廣泛的群眾性。因為在那全民抗戰的大時代裏，共產黨員和一切先進的人們，特別是聚集在延安的熱血青年，都有一種追求真理的激情和濃厚的理論興趣。

當時延安能夠出現這一學習熱潮和理論繁榮時期，除了處於民族覺醒（這是中國一次空前廣泛和深入的啟蒙）、全民抗戰這一大的時代背景外，還因為當時黨本身也處在一個生動活潑的時期。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實行着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重大問題都要開會決定，經常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在無法取得一致的情況下還會進行表決，沒有個人說了算的事。毛澤東雖然從1938年六中全會後已成為實際上的領袖，但在一個時期，黨還是保持了不突出個人的優良傳統，更未形成絕對權威和個人崇拜。黨內生活正常，強調發揚民主，保護少數，尊重不同意見。不但有“輕騎隊”之類的牆報，而且在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上也可經常看到爭論的文章。在這種民主氣氛和寬鬆環境下，人們雖然過着清貧的生活，但都感到心情舒暢、精神飽滿，為追求真理而學習和進行理論探索蔚然成風。加之當時的延安已多

少擺脱了內戰時期根據地受到嚴密封鎖、處於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有可能實行對外開放，外面的報刊書籍可以輾轉得到了，還和國統區以至美國等外國開展了一定的人員來往與學術交流。這不但有助於我們黨和解放區影響的擴大，而且也有助於我們自己視野的開闊和認識的提高。

延安時期的學習熱潮和理論繁榮是緊密相連的。正是在進一步深入學習的基礎上才有了廣泛的理論探索和創新。所以這段學習，不只對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已處於各級領導崗位的工農幹部極為重要，就是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也都從中獲益匪淺，使他們能夠在結合中國實際的研究中做出重要的理論貢獻。特別是毛澤東，他利用這一相對安定的環境和較多的讀書時間，又可得到許多過去看不到的書籍，進行了廣泛的閱讀和深入的研究，寫出了大量有創造性的理論著作。正像《毛澤東傳》所說，“通過刻苦學習和深入研究，毛澤東的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得以昇華為理論概括”。[29] 可以說，正是這段學習和研究，才使毛澤東思想臻於成熟。他的一批理論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和《實踐論》、《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都產生於這個時期。而《新民主主義論》，應該視為毛澤東思想正式形成的標誌。毛澤東思想固然包含中央領導的集體智慧，但主要還是毛澤東本人的理論和政策。

在毛澤東思想形成和毛的領袖地位得到鞏固後，毛澤東認為原來那種學習馬克思主義熱潮和理論繁榮的局面需要加以改變，改為以他的理論和政策統一全黨的思想。這在1940年就表現得日益明顯，使得主管宣傳教育工作的張聞天不斷挨批，並設法緊跟。不只張聞天如是說，[30] 我的一段經歷也可證明，這在過去紀念張聞天的文章中已多次提到。[31]

根據毛澤東的想法，張聞天很快就對延安的學校教育和在職幹部學習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1941年春，他要找一個在抗大作教育工作時間較長的人瞭解情況，剛由抗大三分校改組成的軍事學院就推薦了我。從談話中可以體會到，中央改革教育的決心以至具體方案均已醞釀成熟。按照他的說法就是，今後學校教育可以不再學基本理論，主要學一些有關中國的情況和黨的政策，馬列主義要在實際工作中學習，因此在學校的培訓時間應該縮短，免得鑽到書本裏出不來變成教條主義。這只是大概意思，不一定準確。但是過了一個多月，就聽說毛

澤東作了一個《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而印證了他談話的來由。

不過，事後的發展卻並非張聞天所談，改造學習只是個引子。隨着1941年“九月會議”中央政治局內部整風的“初戰告捷”，第二年春就開始了普遍整風，在民主氣氛、寬鬆與開放的條件下的學習高潮和理論繁榮時期也宣告中斷了。

三，整風中斷了馬克思主義學習熱潮和延安的理論繁榮時期

根據正統的提法和一些只是傳抄和附會的黨史著作，所謂延安時期，不但包括1942年到1945年的整風運動，甚至認為整風是延安時期的主要內容。在這種傳統教育下，人們看到這裏的提法自然會視作大逆不道了。但是，我們應當看事實，而不是背結論，否則還真成了教條主義。關於當時的實際情況（而不是抽象的“概括”），這裏只列舉以下幾點，做點簡單說明。

（一）整風停止了馬克思主義學習

延安整風規定學習的文件中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這是前面一再講過的，問題還在於全面停止了馬列理論的學習。被稱為理論學習最高學府的馬列學院，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即一再改組，最後合併到了中央黨校。而黨校則根據1942年2月28日政治局《關於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停止了過去規定的課程（馬列主義理論如哲學、政治經濟學等，中國和世界革命運動史，黨的建設），規定1942年內，學習黨的路線。[32] 至於1943年和1944年，那更是進行緊張的整風和審幹（搶救），然後是繁重的甄別、總結，直到日本投降分配工作。總之，整風開始後再也沒有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哲學和經濟學。其他學校和在職幹部也都一樣。以我們學校來說，1944年是領導和骨幹忙於進行甄別（搶救運動到了甄別階段已變成少數人的暗箱作業，而不是什麼“群眾運動”了），廣大群眾就是學外文和勞動（時間大約各佔一半），這樣直到日本投降後奔赴前線。總之，在整風期間，除高級幹部為配合路線學習的需要，選擇馬列著作的片斷或少數幾本小冊子（如為加強階級鬥爭觀念學《共產

黨宣言》，為強調鐵的紀律學《“左”派幼稚病》的有關章節等）外，無論是學校還是在職幹部，都完全停止了系統的學習馬克思主義。至於普遍整風中的一般中下級幹部，則連那幾本小冊子也沒安排學習。

（二）整風一開始，馬克思主義就不香了

整風期間不只是不學馬克思主義理論，過去學過的，特別是搞理論工作的還紛紛檢討，似乎沒學過理論的人倒還乾淨些，起碼不用檢討。例如著名經濟學家王思華就帶頭檢討說，“十三年前，當我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後，又把它‘生吞活剝’地搬到中國來。……在這種態度下，還是只想懂得希臘，不想懂得中國。”說他教學生“啃《反杜林論》則是為了迎合學生的好高騖遠的奇特心理”，聯繫中國只是為“裝飾門面”，其實還“只想在《資本論》本身來翻筋頭”，“只知背誦教條”。[33] 甚至連有些老幹部，如時任中辦副主任的王首道，為了表示和教條主義決絕，竟將一些馬列著作扔到了窑洞門外，曾被張聞天當作笑話。[34] 一時間，馬克思主義幾乎和教條主義劃上了等號，連一些人作報告或講演都不敢再引證馬列，也儘量避免分一二三四。例如我就聽過《解放日報》總編輯楊松、總政宣傳部長蕭向榮來給我們作報告時，在特別適合引證經典作家原話的情況下，總要笑笑說：我又要引證兩句“教條”了。原來人們感到很缺的馬列著作，有些人又感到無用而多餘，於是就拿到南門外新市場當廢紙論斤賣了。1945年春謝覺哉老人就說，“自從反教條，有人不講書本子了。”[35] 近年有的研究論文也說，“反教條主義的空氣，使學習理論的風氣大大下降，廣大幹部，包括高級幹部，幾乎都不學馬列了，學馬列‘無用’論普遍存在。”[36]

（三）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工作基本停止

在主管宣傳教育工作的張聞天親自主持下，延安翻譯出版了大量馬、恩、列、斯原著，成為全國翻譯出版發行馬列著作的中心。1938年馬列學院成立後，還專門組建了一個編譯部，主任由張聞天兼任。另外，中央軍委也有個編譯局，和我們外語學校合在一起。毛澤東做《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馬列學院改組，撤消了編譯局，基本上停止了馬列著作的翻譯編輯工作。雖然毛澤東有時也提一下翻譯馬列

著作，中央書記處還於1943年5月27日做出《關於1943年翻譯工作的決定》。[37] 但由於只限於口頭說說，即使形成決定，也缺乏具體措施，而且在學習馬列上歷來口頭說的和實際做的往往是兩回事，何況本年領導上主要抓的是搶救運動，這都注定了該決定只能最後落空。因為反對教條主義不僅反到理論工作者的頭上，也反對到理論書籍翻譯者的頭上。例如先前在國統區翻譯馬克思主義書籍的柯柏年就受到批判（可見當時是普遍把書本知識當作教條的），氣得柯柏年發誓以後再不搞翻譯了，雖經毛澤東親自勸解，柯柏年還是堅決不幹，後來就一直搞起了外交工作，所以跟我很熟。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七大講話中說的，做翻譯工作的同志“自己對這個工作的認識也有動搖”，“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說做這個工作吃不開，要求作別的工作”，[38] 其中所指可能就有柯柏年。實則根本原因還在於批判所謂教條主義用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辦法；後來的搶救運動更把知識分子，特別是把搞理論工作的同志整苦了；除極少數得到重用的之外，他們大多被打入了“另冊”。所以毛澤東在七大講話中對翻譯工作口頭上作了很高的評價，但延安理論翻譯的繁榮時期經過整風已徹底結束了，延安也從此失去了翻譯編輯馬列著作在全國的中心地位。

（四）有利於學習熱潮和理論繁榮的對外開放一時中斷

1941年到1944年，延安的對外交流與來往幾乎陷於中斷。這期間，延安同國統區還有點秘密渠道，但大量的來往已基本停頓；同外國人來往就更困難得多了，例如過去每年都有好幾起來訪的美國人，這些年就已完全中斷。這當然主要是由於國民黨加強了封鎖，但我們自己忙於整風搶救，停止對外聯繫和不願在全面戒嚴的情況下讓外邊人來視察訪問，也是重要原因。而且為了粉飾自己和應付參觀，還搞一套形式主義以至弄虛作假的招數。例如直到三年後的1944年7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21人訪問延安，我們就費了很大的勁，除打掃衛生等作表面文章外，各機關學校還要進行一點臨時訓練，由上面發下估計記者可能提出的二三十個問題，寫出標準答案，讓大家記住甚至背誦，以免答錯。那次沒來我們學校，我們算是白準備了。但其他被訪問者的答覆看來不見得效果就好。有的記者在報道中提到，大家的回答有點千篇一律且不自然。特別是對王實味的訪問，效果可能適得

其反。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弄虛作假和形式主義作法，似乎被當作“優良傳統”保持了下來，以此應付上級的檢查和外來參觀。

（五）整風停止了一切理論學習和理論研究

整風開始後，無論是學校還是在職幹部，都已完全停止了原來的政治學習（即正常理解的馬列主義教育），只學整風文件，其實主要時間還是開會（對照文件）進行檢查交代、批評質疑和沒完沒了地寫反省筆記、交代材料。因為毛澤東規定，各人都得寫反省筆記和思想自傳，而且這是鐵的紀律，“比孫行者的金箍還厲害”。過了不久，各單位就又先後開始了肅反。特別是10月19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的講話中批評了對敵特麻木不仁和提出要抓“第三個王實味、第四個吳奚如”之後，被稱作審幹運動的搶救運動就在延安普遍展開了。在這樣的氣氛下，誰還能顧得上學習理論？因為要學理論，起碼就得讀書。這是劉少奇當時還在強調的。他說，“任何比較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都必須經過這樣埋頭讀書與研究的階段”。[39] 可是在延安，這樣的環境和條件已經不復存在了。

在輿論一律和萬馬齊喑的情況下，也是根本談不上理論繁榮的。以第一個《四三決定》為標誌的普遍整風開始不到兩個月，就發動了對王實味和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的批判，所有原來從事理論工作的人，連參加批判尤其是進行檢討都有點來不及，哪兒還有心思和時間進行研究？無論是報刊還是會議，很快就實現了輿論一律，已無從看到和聽到理論上的爭鳴。及至搶救運動發起後，延安更是一片蕭索，人人自危，不但失去歡聲笑語，而且已沒有什麼人再對理論感興趣，理論研究實際上完全停止了，哪兒還談得上繁榮!

按照多年來的正式說法，情況似乎恰巧相反，延安整風本身就不只標誌着理論繁榮，而且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大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創造性的理論和政策，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毛澤東思想已被定為全黨以至全國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但這裏是預設了兩個很不準確的前提條件的。一個是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似乎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書本知識)已經學到手，只是不用或不會用的問題。二是把斯大林理論（以《聯共黨史》為代表）當作了馬克思主義活學活用的典範，而整風的目的正是使中共布爾什維克化，也就是用斯大林的理論武裝

全黨。這兩點合在一起，就得出一條結論：不要多讀馬恩著作了，只要着重讀一點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東西就行了，關鍵在於實用。毛澤東就說，“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贊曰：好箭好箭，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40] 雖然毛澤東聲明這是故意挖苦教條主義者的，但實際情況證明這倒是實實在在的真實思想，不僅整風時，而且此後一直輕視以至鄙視讀書和書本知識就是證明。這又是後來堅持知識分子和一切幹部都要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思想根源。其實，對於馬克思主義這枝箭是否已拿到手，老早就有人提出了質疑。[41] 實際上，這時黨的主要領導及其主要理論助手（或稱智囊）都沒有讀過馬克思的主要著作，很難說已把馬克思主義這枝箭拿到了手。因此射出去的箭就攙有大量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更多地是中國封建社會（包括農民起義）、斯大林專制主義、以至民粹主義的東西。例如在整風中大搞無法無天的搶救運動，就決不能說符合馬克思主義。後來許多做法更與馬克思主義大相徑庭。所有這些，下面將作進一步的討論。不過這裏還得附帶說明一點，就是整風中採用的學習方法也不是解放思想而是束縛思想，很難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倒是帶有中國封建社會私塾那種填鴨式的死讀書的味道。例如往往一個文件要反覆閱讀和討論一兩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幾乎可以背誦。那二十多篇《整風文獻》，就拖拖拉拉學了兩三年。這種號稱“少而精”的學習辦法，很容易使人思想受到束縛、禁錮和簡單化，妨礙個性的發揮、思路的活躍和境界的開闊。這也許正是領導上的要求，所以這一學習方法被視為好的經驗，一直傳了下來。至今這一反覆學一個文件或“重要講話”的傳統，仍是政治學習的主要方法。

由此可見，延安整風不僅打斷和改變了當時學習馬克思主義以及進行理論研究的秩序和環境，而且還產生了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後遺症。

四，延安整風對後來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影響

延安整風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學習和運用，有積極作用，也有消極影響。但是歷史地看，積極作用是短暫的，消極影響卻是長遠的、處在主要地位。長期以來對延安整風的那種全盤肯定，不但違背

歷史事實，而且給黨和國家帶來嚴重災難。下面作為舉例，只着重談三個問題。

（一）延安整風使學習馬克思主義之風日下，反而增加不少扭曲和誤解

上面說過，這是連胡喬木也承認的。[42] 古今歷史都一再證明，理論上的壟斷，是對理論繁榮的扼殺。對馬克思主義解釋權的壟斷，則不僅限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而且還會使它被修正和篡改，成為解釋者不正確的理解甚至只是他個人思想認識的宣傳。整風反教條主義的結果，使理論學習進入低潮，讀馬列不再是風尚了。雖然毛澤東有時也指定幾本馬列著作為“幹部必讀”，但由於只是說說而已，並無具體措施，所以從地方到中央機關，幾次都落空了。後來更逐漸形成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觀念。在這種情況下，各級幹部包括高級幹部，更沒有什麼人去讀馬列了（大約只是一些高等院校，由於照搬蘇聯，倒還有學馬列的課程安排）。黨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和領導人，不學馬列，缺乏馬克思主義常識，對工作曾帶來極大危害。例如鄧小平就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然而他（指毛澤東）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沒有按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法。”[43] 胡喬木也承認，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也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看法”。[44] 既然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其實，經濟是基礎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怎麼能不犯錯誤，怎麼能搞好經濟建設？這恐怕也是建國後中國經濟發展在世界上落後了三十年，被周邊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遠遠拋到了後面的一個原因。哪兒能談得上什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不學馬克思主義，但有些政策和做法卻又要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這就勢必出現一些歪曲和誤解。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再說，他們的學說只是提供一種方法，而不是現實的答案。事實上，由於時代的限制，馬克思主義本來就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有些設想帶有明顯的烏托邦性質。列寧就更不用說了。這都是不可苛求於前人的。問題在於，經過延安整風，我們已更不重視學習馬列，而只學毛澤東的幾本小冊子和各時期的中央文件，這才出現了上引胡喬木所說的現象。但

老祖宗的旗幟（毛澤東連列寧、斯大林也都稱為不能丟的兩把刀子）又必須高舉，於是就把一些民粹主義的東西、中國古人的設想（如張魯推行的“義倉”、康有為著的《大同書》之類）和我們自己過時的作法（如供給制、游擊習氣等），也硬要和馬克思聯起來。這，作為思想，是更多的烏托邦；付之實踐，最後必然失敗。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就是鐵證。這裏再根據個人的認識，舉幾個曲解和誤解的例子。

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對未來的社會作了許多設想，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十分科學和準確的。如果再加誤解，那就更屬“失之千里”了。例如馬克思提到，“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45] 於是，我們就抓住“過渡”二字大作起文章來了。人家說是“從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卻要急着從資本主義很少發展的所謂半封建社會直接過渡，還批評那種“說中國在全國解放以後，‘革命在最初階段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只是後來才逐漸地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對的”。[46] 實際上，我們說的過渡是名副其實的“窮過渡”，和馬克思說的過渡是兩回事。因為在毛澤東看來，“經濟愈落後，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難。人愈窮，才愈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國現在不富，將來富了，也一定會發生問題。”[47] 他談的過渡是不顧生產力發展，主要指所有制的轉變。他以人民公社為例說，最主要的就是要實現“從基本隊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轉變”，並預言，“將來人民公社從公社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我們就比蘇聯先進入了共產主義，就會同赫魯曉夫的意見分歧大起來，發生所謂“對表”問題。[48] 要知道，當毛澤東帶領幾個秀才在杭州這樣想入非非、坐而論道的時候，正是中國人民每日餓死數萬（單是四川一省，按官方統計，到1960年底已死了整一千萬）的人為“三年困難時期”。後來，他竟發現經濟發展的危險，即“富則修”。“因此，毛澤東同志認為，由窮變富就要變成反革命。同樣，……知識越多越反動。”[49] 所有這些，不是對馬克思的曲解又是什麼？

我們還可再以《哥達綱領批判》為例。馬克思說的“資產階級法權”（後譯權利），是指按勞分配中等量交換的原則，完全是在抽象意義上說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已經講的有點偏。到了毛澤

東，理解與馬克思就離得更遠了。他把按勞分配中等量交換原則體現的“資產階級權利”誤解成按勞分配本身就是資產階級性的權利，說社會主義社會的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跟舊社會差不多。[50] 而且早在1958年，他就曾一度主張恢復供給制，贊成吃飯不要錢，所以對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頗為欣賞。[51]

類似案例還可舉出許多。這都說明，延安整風造成了一個錯覺，不再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學習是由於認為已經掌握了，問題只在運用和發展。但是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許多問題，包括它的一般知識，特別是基本原則，都並沒有搞清楚，所以理解和實行的就自然不是馬克思主義了。

（二）只學斯大林也為建國後一切照搬蘇聯奠定理論基礎

關於延安整風，多年以後毛澤東曾一再說，“整風實際上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52] 其實，這只是黨史上常見的事後諸葛亮的說法，但卻沒有看到任何能拿得出來的證據。同這些事後的說法正好相反，當時的延安整風主要是學蘇聯的，不但公開提出以斯大林的《聯共黨史》為學習的中心材料，而且在當時完全保密的西北局高幹會上，毛澤東連續兩天的報告還是講解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12條。而對整風宣佈的宗旨也是要把黨建成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無論是高層整風還是普遍整風，學的都是斯大林理論，這是我們在前面一再說過的，而且有《整風文獻》為證。那麼，是不是在內部極小範圍的整風中指名或不指名地“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可以肯定地說，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事，連一點點暗示也不會有。任何人，包括毛澤東在內，當時還不可能有這種認識和膽量。實際情況相反，當時中央主流和非主流各方都要儘量把自己說成是忠於斯大林和擁護共產國際的，把批判對象的擁護說成是假的，甚至把“國際”也分成“真假”兩種，[53] 並用斯大林的教導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批判所謂教條主義宗派。例如1943年12月1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關於學習《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通知，文件中就完全是摘錄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論述和語錄。[54] 28日書記處和政治局又分別發出《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的指示》和《關於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

指示，都在於說明，王、博們的活動“是違背前共產國際方針的。現在共產國際雖已解散，但共產國際領導者們的指示原則依然適用，這些原則，完全與王、博路線的機會主義相反，而對於我黨中央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則是完全符合的。”[55] 這只是順便舉個例子。實際上，延安整風中不但上面沒有講過，下面也根本沒有感到有反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教條主義的意思。幾十年後翻過來的說法，自然舉不出任何根據，只能證明個人迷信影響之深和輿論控制之嚴。按我們這些普通幹部的真實思想情況，和這些事後說法相反，經過延安整風，進一步加強了我們對斯大林的崇敬(他死時，全國包括毛澤東本人的沉痛悼念就是證明）和對蘇聯經驗的向往，更加堅定了把中國變成蘇聯的決心。

說“整風是整蘇聯的風”，是“破除”“把蘇聯經驗神聖化傾向的偉大思想運動”，不但完全不符合延安整風的學習內容和從上到下的思想狀態，而且和我們在革命和建設中一直照搬蘇聯經驗是相矛盾的。既然那時就已“破除”了對“蘇聯經驗神聖化傾向”，為什麼後來還一切完全照搬蘇聯模式？實在不能自圓其說。而且不只建國後一切學蘇聯，在整風中就已盡可能地在以蘇聯為榜樣。這是我們當時在延安親身體會和親眼看到的。例如1938年前後延安那種生動活潑的局面，“首長” 現象並不明顯，人們星期天常在街上遇到中央領導同志，晚會上可以“拉”包括朱德、毛澤東等領袖們唱歌、出節目，等等，整風以後這些現象就完全消失了。這除了整風搶救造成的緊張空氣外，還由於任弼時出任中央秘書長以後就從蘇聯搬來了一套包括政治和生活待遇上的等級制度、領導幹部的警衛制度等規矩。從此，除開會外，在街上已再碰不到中央領導人，更不用說隨便談話和請簽名、題字和拉唱歌之類以前常見的事了。這大概是沒有哪個老延安能夠否認的。至於大的方面，特別是黨的建設和組織生活，也是儘量向蘇共看齊，連書記處的改組也以蘇共為榜樣。1934年蘇共十七大後，為了便於斯大林的控制，書記只剩下四個人，即斯大林、卡岡諾維奇、基洛夫、日丹諾夫。由於基洛夫擔任列寧格勒市委書記，而且不久後遇刺身亡，所以實際上書記處只有三個人。1943年我黨中央領導機構調整後，書記處也只剩下三個人：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而且乾脆規定“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其餘兩人只是主席的助手。[56] 從此，毛澤東作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主席(六屆七中全會後還是中央

委員會的主席），在黨內外就行使他的“決定之權”了。所以建國後曾兩次批評劉少奇和楊尚昆說，“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57] 在這裏，黨的紀律已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多數服從一人了。不僅在中央權力向書記處集中、書記處又賦予第一把手決定權上，中共完全按蘇聯的模式辦事，而且也正是從延安整風起，毛澤東開始以中國的斯大林自況。對延安整風、對毛澤東思想真正稱得上權威的胡喬木就曾說，“而蘇聯的那種模式，確實對中國黨影響是非常大的。毛主席在很長的時間認為，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不說中國的列寧了）。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這對毛主席的刺激是非常深的。”[58] 胡喬木還直截了當地說，“延安反教條主義對斯大林的一套體系沒有批判，對斯大林建設黨、領導國家、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原理、方法沒有批判。發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追根溯源還要追到斯大林。”[59] 由此可見，那種關於延安整風是批斯大林、是破除崇拜蘇聯經驗的教條主義的說法，是多麼不真實。而有些自認為喬木胡繩學派的黨史研究者又只是師承了他們不夠實事求是的一面。

正是延安整風掀起的全黨學習斯大林理論，把《聯共（布）黨史》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認定“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奠定了我們建黨、建國照搬蘇聯模式的基礎，使我們走了極大的彎路，遭受到無法彌補的損失，至今影響仍嚴重存在。

（三）中共自身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優良傳統也遭到損害

中共是在共產國際，實際上是在俄共的幫助下成立起來並接受其直接領導的，因此受俄共及其指揮下的國際共運的影響很自然，而且非常之大，在某種意義上說帶有決定性。這是無須多講的。但中共總是在中國的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不能不帶有很多中國的印記和影響，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值得強調的是，建黨初期的一批領導人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瞿秋白等，對此都有比較清醒的一定認識，所以從一開始就注意吸取西方的先進思想和國際共運的經驗教訓，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學習馬克思主義，從而培育出了一些好的作風

和傳統，為中國黨開創了毛澤東所稱的第一個生動活潑時期。這些好的作風和傳統，可以簡要舉出以下幾點。

一是充分發揚民主，反對個人獨裁。陳獨秀擔任中共中央領導後，即明確主張，“中國共產黨不採取黨魁制，如孫中山之任國民黨總理那樣，而採取民主的委員制，從委員中推選一個書記來負聯絡之責，其他委員分擔宣傳、組織等各方面的工作，權力不應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他指出，委員制，遇事公決，不但可以確立黨內民主生活，而且可以杜絕個人獨裁和官僚式的流弊。他雖然自視極高，脾氣很倔，但也經常警惕大家因對他的尊敬和畏懼而不願或不敢提不同意見，所以在1924年5月的中央擴大會議上還特別提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決於他的意見，難免發生偏差，要求會議予以糾正。李大釗的民主作風更受到黨員們的一致好評。[60] 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期間，雖然黨處在白色恐怖中，但他仍再三強調要擴大黨內民主生活，在《中央通告第六十九號》中指出，“黨內生活只有家長式的命令和機械式的服從”，是領導人犯錯誤的“組織上的根基”。在另一《通告》中還提出“反對封建社會的遺習，因為中國黨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很容易流於首領個人的獨裁形式”。[61] 這也確實為後來的事態發展所證實。

二是與民主有關的自由討論作風。陳獨秀已認識到，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不但不可能避免，且不應避免，有時還是萬分需要”。[62] 在這方面，瞿秋白的態度更開明，早在1927年2 月就批評那種不准討論政治問題的諸多“不准”，“不准說，不准問，不准討論……”的黨內消極紀律。[63] 他在 1928 年 7 月起草的六大《決議案》中還正式規定：“秘密條件之下盡可能地保證黨內的民主主義；實行集體地討論和集體地決定主要問題。”六大通過的黨章中也專門增加了如下內容：“在未經決議以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64] 而且事實上，那個時期不僅黨的會議上經常有爭論(六大就有激烈的爭論)，而且在黨的報刊上也總有不同意見的文章發表，討論各種重大問題。大家認為，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恩格斯就說過，“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65] 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就是批評輿論一律的。他寫道，“你們並不要玫瑰花和紫羅蘭散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

精神只能有一種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着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着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着多少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66]

三是與民主和自由都有關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早期黨的生活中，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公開進行的，黨員可以在黨報上公開批評領導包括總書記。當時就有不少人（如瞿秋白等）著文批評陳獨秀。而黨的領導既可作辯解和反批評，也常進行自我批評。陳獨秀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就公開講過，“陳獨秀由於對時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動，犯了很多錯誤。”同時他也指名批評了張國燾、鄧中夏。[67] 當了第一把手，就“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現象在以前是不存在的。

四是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延安整風後的黨史編纂學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向後推了十多年，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是受個人崇拜的影響。其實，建黨後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等就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李大釗很早就已提出，要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68] 黨的一大，陳、李因故未能出席，大會通過的黨綱只提出“推翻資本家階級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等。[69] 陳獨秀主持中央工作後，對中國現存階級和政黨以及經濟政治狀況進行了研究和分析，提出了民主革命基本綱領，為二大的召開作了一定的思想理論準備，使二大《宣言》正式提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70] 參與二大《宣言》和《決議案》起草工作的蔡和森也曾說過，要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上去”，“形成自己的理論”。[71] 可見，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理論聯繫實際，並非六屆六中全會或延安整風中的建樹。至於密切聯繫群眾，黨的創始人在建黨前就已注意和實踐起來。例如陳獨秀1920年就來了個創舉，把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編成《勞動節紀念號》，請了16個人題字，既有孫中山等7位名人，還找了9個名不見經傳的勞苦工人。李大釗親身參加群眾鬥爭，多次在反對軍閥的游行中衝鋒在前，更是早已出了名的。中國黨創建後的迅速發展壯大，是同這些領導人確立和奉行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分不開的。

五是嚴格保持清廉自律作風。1926年8月4日，陳獨秀親自簽發了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反腐文件：《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

污腐敗分子》，內稱："一個革命的黨若容留這些分子在內，必定會使他的黨陷於腐化，不但不能執行革命的工作，且將為群眾所厭棄。"[72] 為了保持黨的純潔性，陳獨秀採取了一些嚴厲的措施。同時，他和李大釗等人還以身作則，長期過着清貧的生活。他放棄了大學教授的優厚待遇，一心撲到革命工作上，生活十分清苦，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而且還是一個硬漢，從不開口向人要錢。李大釗作為教授，收入不菲，但他多用之於革命事業和接濟他人，自己卻常有斷炊之虞。他犧牲後得到的社會評論是："生時僅可供家食，歿後則一貧如洗，棺椁衣裳，皆為友助。"[73]

最後再提一點，就是我們黨有一個延續了二十年的不突出個人的傳統。

上述這些優良作風和傳統，經過延安整風，都被嚴重削弱以至破壞了。第一，關於發揚民主，以我個人感受而言，整風前還真有點民主生活的體會，整風後就再感覺不到什麼民主了，有時也參加選舉，但基本流於形式。至於個人獨裁，這是人所皆知，不用再講的。第二，關於自由討論，整風後即為輿論一律所代替，連黨代表大會的發言都要事先經過審查批准，瞿秋白批評的"不准"倒是"與時俱進"，越來越多也越嚴。第三，整風後已沒有人敢於批評毛澤東(開頭還可提點不同意見，後來也不行了），他自己又宣佈是不下"罪己詔"、不作自我批評的（那種空洞的承擔責任當然算不上），而對有些人的批評則實在是殘酷鬥爭、徹底打倒。流風所至，只有上級對下級的批評，很少下對上的批評，特別是第一把手不能碰。第四，說的和做的越來越分家，毛澤東本人的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更是寫到黨的歷史決議中了。第五，關於清廉作風，延安整風時就已從蘇聯搬來等級制，嚴格的保密制和警衛制等，背離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提倡和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強調的巴黎公社原則——"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及為此而採取的有關措施。[74] 這個變化雖然有個過程，但最後還是變了，而且首先從黨的領導變起。例如在"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的三年困難時期，各地為領袖所修豪華別墅之多，恐怕古今中外都是少見的。最後，關於不突出個人的傳統，大約從1940年起就開始被打破。這一年不但出現不少歌頌和學習毛澤東的文章，還辦了"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和"澤東日"。及至整風運

動開始，“紅太陽”、“大救星”、“萬歲”等同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稱呼和活動就日益普遍和升溫了。

提出上面這些問題，是為了說明，延安整風不僅沒有學馬克思主義，而且整風的結果還導致實踐上違背馬克思主義。現在有些研究黨的歷史和毛澤東思想等理論的人，過分注重書本材料和言論，而不去瞭解當時的實際，更不願把有關言論和當時實際相對照，只是紙上談兵。例如寫毛澤東如何講民主，善於聽取不同意見，根據無非是毛什麼時候說過關於民主的話。有的還舉例說，在轉戰陝北期間，毛澤東和任弼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不但未影響關係，反而更增加了同志之間的感情”。[75] 這顯然是屬於有傾向性的想象，提不出任何“增加”感情的根據。但人們卻知道，爭吵後，任弼時的“支隊司令換成恩來同志”。[76] 其他還有什麼毛澤東和文化人包括蕭軍、丁玲等交朋友；毛澤東如何尊重知識，愛護人才；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幾被消滅殆盡)的友好相處，等等，實在都是莫大的諷刺。如果光看言論，那斯大林也許是最反對個人崇拜和阿諛奉承的。你看他在聯共十七大的報告中對那些只會講空話和向上討好的人挖苦得有多厲害。另外，從言論中還可看出斯大林非常重視自我批評，是個很謙虛的人。然而實際情況卻都恰恰相反。何況我們和斯大林還有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對過去的講話和文章採取“與時俱進”的做法，按後來的思想不斷加以修改。至於那些用現在的認識去編寫多年前的《回憶錄》，就更不用說了。甚至搞文字獄的專家乾隆皇帝也冠冕堂皇地聲明，“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大清律例》也無“以文字殺人”的規定，但卻有“詩文書札”“顯有逆跡”和有“確實悖逆形跡者”，治罪。光看表面文章——公開言論和書面規定就下判斷，行嗎？

這就是為什麼在討論延安整風不能說是一場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時要談一些實際效果的原因。這也是試圖從理論聯繫實際的角度看延安整風是否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倒不是“離題萬里”的發泄。

註釋

1　如：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胡喬木文集》第二集，

第48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198頁。

2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1991年版第615頁；《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2002年版，第787-788頁，《中國共產黨簡史》，2001年版，第70頁。

3 均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5頁。

4 如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理論研究委員會編寫的《延安整風運動紀實》，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47頁。

5 見該書第205頁。

6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63頁，第261頁。

7 如另一篇筆記《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另見作者：《鄧小平理論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地位》，《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116頁。

8 張聞天：1943年《反省筆記》。對這些，他是作為教條主義錯誤檢討的。

9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引自《整風文獻》1949年版，第56頁。此文在1953年編入《毛選》第三卷時，刪去了“其他一切為輔助材料”的話，聯共黨史書名也用了全稱。

10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風文獻》，第51-52頁。這句雖在建國後編入《毛選》時刪去，但整風時起了很大作用的。

11 見《列寧傳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頁。

12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9（180-181頁。

1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774-776頁。

14 魯振祥、楊茂榮、王朝祥：《關於總路線的提出文獻發表情況簡述》；薄一波：《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問題致田家英的信》，以上均載《黨的文獻》2003年第四期。另參閱《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所收給斯大林的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4)，第262、258頁等的有關篇章。

15 《毛澤東1947年11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怨怨》，第263-264頁。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9，238頁。

17 “著者第一卷序言”，《斯大林全集》，1953年中文版。

18 見毛澤東、張聞天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658-659，709頁。

19 《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頁。

20 李維漢：《回憶中央黨校》，《回憶與研究》，第391頁。

21 參閱《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6頁(《怎麼辦》一書中“群眾的自發性和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一節)。

2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756-757頁。

23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33頁。

24 朱德：《在延安幹部學習周年總結大會上的講話》(1940年6月)。

25 參閱《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史》，國防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6 《張聞天年譜》下冊，第678頁。

27 以上所引均見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28 這是胡耀邦1986年11月1日會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談話。他的原話是：“從我黨成立起，六十五年了。我們的社會科學，只有一次大繁榮，這就是延安時期”。見《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360頁。我也參加了這次會見。

29 《毛澤東傳(1893—1949)》(下)，第497-498頁。

30 見張聞天1943年的《反省筆記》。

31 如1980年寫的《張聞天同志和研究工作》，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回憶張聞天》；1994年寫的《我在遼東同張聞天同志的接觸》，載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的《張聞天在遼東》，等等。

32 參閱《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122頁以下。

33 見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報》載：《二十年來我的教條主義》。

34 1999年2月26日劉英的談話。

35 《謝覺哉日記》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6頁。

36 宋金壽：《糾正反教條主義中不譯不讀馬列的偏向》，《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 ，第 42 頁。

38 《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7 頁。

39 《答宋亮同志》，《劉少奇選集》上卷，第 219 頁。

40 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見《整風文獻》，解放社 1949 年版，第 16 頁。

41 例如王惠德在《憶往昔》一文中就談到，沒說“箭”是怎樣拿到手的，怎麼就連聲贊曰好箭好箭。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

4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 131 頁。

43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116 頁。

44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 208 頁

4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 ，第 21 頁。

46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1959 年 12 月 10 日—1960 年 2 月 9 日) ，清樣本上冊，第 87 頁。

47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1959 年 12 月 10 日—1960 年 2 月 9 日) ，見《毛澤東大觀》，第 633 頁。

48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1959 年 12 月 10 日—1960 年 2 月 9 日) ，清樣本上冊，第 77-78 頁。

49 《會見美國記者白修德的談話》，《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 211 頁。

50 毛澤東 1974 年 10 月 20 日會見丹麥首相時的談話。

5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7) ，第 447 頁。

52 《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維塞林諾夫等人的談話》

53 這是周恩來在整風檢查中的提法，是既不能否認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估計和指示有錯誤，又不能批判和反對共產國際，於是發明了這種“真假”兩個籮筐，錯誤的就可裝到米夫之流的“假國際”籮筐裏，仍然保住了“擁護國際”的立場。這當然談不上批判國際的教條主義。

54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 ，第 111-135 頁。

55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 ，第 143 頁。

56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第754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73 頁。

57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 80 頁。

5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 122 頁。

59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 77 頁。

60 以上見沈建中：《陳獨秀李大釗開創早期黨風》，載《炎黃春秋》2002 年第 11 期。

61 轉引自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 378 頁。

62 陳獨秀：《國民黨黨內糾紛與中國革命》(1927 年 3 頁 6 日)

63 《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36 頁。

64 《六大以來》(上)，第 12 頁；(下)，第 7 頁。

65 恩格斯 1889 年 12 月 28 日給格爾桑·特利爾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第 471 頁。

6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第 7 頁。

67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 172 頁。

68 轉引自沈建中《陳獨秀李大釗開創早期黨風》，載《炎黃春秋》2002 年第 11 期。

69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 3 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 86 頁。

70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 61-66 頁；《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 100-102 頁。

71 轉引自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 376 頁。

72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 282 頁。

73 轉引自沈建中：《陳獨秀李大釗開創早期黨風》，載《炎黃春秋》2002 年第 11 期。

7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第 335 頁。

75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 450 頁。

7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70-71 頁。

(2003 年 12 月完稿)

第十篇

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之一

——關於搶救運動的評估、資料和一些提法問題

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一直是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一個禁區，比中央蘇區抓“AB”團還要嚴格。因為抓“AB”團後來一般都把責任推給尚未成立的“左”傾中央和並不存在的王明路線（即使按許多黨史書上的說法，也是大抓“AB團”後的四中全會上才出現所謂“王明路線”），[1] 但搶救運動卻無法可推，只能乾脆不提，因為不但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等人，連康生在生前也是沒人敢公開提的。例如被稱為中共黨史奠基作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就根本沒有提這個作者胡喬木自己也說是搞了兩三年的搶救運動。[2] 有些文件和文章如果提到，也說成審幹運動（至今還有審幹工作擴大化這種不通的提法[3]），或只把中間一小段說成“搶救運動”，而且都要強調審幹運動方針的正確和取得的偉大成績。其中最權威的，當數1955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所作的如下評價：“延安的審幹運動，中央定出了九條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審幹運動把許多的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清查了出來，純潔了革命的隊伍，在組織上保證了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這個成績是很大的，是應該加以充分的估計的。”同時指出，“這個運動第一階段發動群眾，第三階段甄別工作，都是做得對的，只是中間一段即第二階段的‘搶救運動’，是有偏向的。”“當時所以犯這個錯誤，除了有些幹部主觀上有‘寧左勿右’的錯誤思想以外，也有客觀原因。”如：“當時我們沒有全國政權”，“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用發動群眾的方法”來肅反“還缺乏經驗”等。[4] 現在看來，這個評價並不妥當。第一，關於“九條方針”是否“完全正確”，下面還要專門討論。而且蔣南翔早在1945

年3月的書面意見中就提出了批評。中央組織部1985年已為他徹底平反，指出他的書面意見和在七大小組會的發言，“不但符合組織原則，而且內容也是實事求是的”。[5] 第二，對審幹運動成績的估計不夠實事求是。因為實際上並沒有清查出幾個反革命分子，連1947年在晉西北被處決的王實味和蘭克義都是冤案。至於說沒有搶救運動，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就缺乏組織上的保證、就勝利不了，事實證明也許正好相反，只能說它起了一定的負面作用。第三，把犯錯誤的原因歸於客觀，責任完全推給下級幹部，完全不合乎事實。然而這個評價卻保持了幾十年，至今仍在起着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着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搶救運動的禁區也打開了一條縫，露出了一部分真實情況，也可以在一定範圍進行討論了。研究和討論比較活躍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期，只是後來才逐漸趨於沉寂。而且總的看來，即使較活躍的那陣，也不能說對延安整風特別是搶救運動設的禁區已經解除，例如重要檔案就繼續嚴格保密。但是無論如何，經過那段撥亂反正，搶救運動已不再是秘密，正式的黨史著作都不能不提到，人們也可以進行一定的研究討論了。雖然仍舊把關很嚴，卻還是暴露出不少問題和引起一些爭論。為了便於後面的討論，先根據接觸到的有關搶救運動的論述，談以下三個問題。

一，關於搶救運動的評價

一般說來，主流黨史論著和民間研究成果（其實，有些關於搶救運動的書籍和文章，只是互相傳抄，談不上研究），除了極少數例外，關於搶救運動的基本說法都是一致的，在相當程　度上體現了“輿論一律”，只是使用材料和敘述詳略有些不同。這些共同特點主要是：承認搶救運動是延安整風中主要為康生造成的一個錯誤；但只是一個支流，且時間很短，即為黨中央和毛澤東發現並糾正；同時為維護延安整風的正確和領袖及其他領導人的威信，對搶救運動儘量淡化，重要內幕和詳情實行嚴格保密。既有這些（或許還有別的）無形規定，自然就很難做到實事求是。不過在這幾條規定的框架內，有些問題似乎還可討論，因而也就出現了一些不同意見。後來的正史敘述和評論，一般都採取輕描淡寫和簡化的辦法，並且要說明審幹（肅反）運

動的必要以及方針和結果的正確；跟某些所謂民間著作不同的是，沒有把責任全部推給康生，也承認對敵情估計有些過分嚴重。除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完全回避了搶救運動外，撥亂反正後出的黨史書一般都會提及。比較標準的提法是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全書574頁，講延安整風不到7頁，對涉及全黨和黨所領導的幾乎所有地區的搶救運動用了還不到半頁。說是康生的"搶救失足者"報告，掀起了搶救運動，"在十餘天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中央及時作了糾正，"這個錯誤在延安整風中只是一個支流。"[6] 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 共836頁，談延安整風只有8頁，涉及搶救運動的半頁，精神與內容和胡繩說法大致相同。其他一些領袖的文集和傳記如《毛澤東傳》、《劉少奇傳》等和他們的《年譜》，也都詳略不同地稍有涉及，但都不出上述的原則和精神，而且特別明顯的是儘量簡化和多有掩飾。這點下面還會談到。

民間論述，包括許多人的回憶錄，雖然各有千秋，但出圈(違背上述框架和原則)的也不多。只是更多地把責任推給康生，描寫和敘述更生動具體，還揭示了一些歷史上回避的問題，但編造的成分也更多些，特別是一些所謂回憶錄和"演義"式的黨史著作。當然，對搶救運動持獨立看法的黨史著作也有，這裏只簡單提一下有代表性的兩本。一本是楊奎松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7] 對搶救運動只是附帶談到，所佔篇幅很少，敘述還比較客觀和真實，沒有夾雜多少主觀成分，雖然也多少受到上述框框的限制，但不那麼明顯。另一本是高華所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本書的特點（這裏只談有關搶救運動部分，其他不論）是：查閱的材料多，用了很大功夫；未受上述框框的限制，有更多自己的看法；還提出了一些新的和被忽略的問題。應該說，本書對瞭解和研究延安整風頗有參考價值。但也有些片面性，例如過分強調毛澤東個人的肅反情結，而對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和有關的國際因素重視不夠；特別是由於作者只是從書本到書本，所以不免有主觀臆測成分，一些事實也自然不夠準確。值得一提的是，前一本書還能在內地出版，後一本書就只能拿到香港去出版了。

對於遍及延安和邊區及其他許多抗日根據地前後歷時兩三年的搶救運動，究竟屬於什麼性質，過去討論還不多。但也有一些著作提

到，認為在我們黨有了地方政權後就一直存在一條肅反上的極左路線，直到“文化大革命”，搶救運動只是其中的一次重要表現。這當然是毛澤東和正式黨史所不承認，並極為忌諱的。所以陳毅在“文革”中的“二月逆流”批評整風和搶救運動，就曾引起毛澤東大發脾氣，受到痛斥。其實，陳毅當時只是輕微地提了幾句說，“在延安整風時，有人整老幹部就整得很凶。搶救運動搞錯了許多人，現在還有意見。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也挨整了嗎？”[8] 何況黨史界現在已從過去濫用路線的極端走向主張一概不用路線的另一極端，這就更不能說搶救運動是路線錯誤了。但鄧小平在講“十次路線鬥爭”中有好些次算不上，卻也沒有否認以往的肅反曾經存在過一條錯誤路線。而且毛澤東在搶救運動中就已提到“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錯誤路線是：逼，供，信。”[9] 對此，至今也沒有人否認過，官方黨史著作為了說明“九條方針”的正確和毛澤東反對“逼、供、信”，也還在經常引證。但是，事過境遷，毛澤東卻改變了說法。在1944年10月25日的報告中的提法是：“‘搶救運動’有錯誤，錯誤是誇大了問題方面，但不能說是路線錯了。”[10] 這就同以前說的“錯誤路線是：逼、供、信”相互矛盾了。其實不管毛澤東怎麼說還是黨史書上怎麼寫，瞭解情況者還是心中有數的。1944年北方局黨校搶救運動中整人的與被整的幾位老同志，1983年12月24日在一起的議論就是證明。當楊獻珍向劉建章道歉後（楊在搶救中曾動手打過劉），劉就說，“當時發生的錯誤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個人之間不存在什麼恩怨，那完全是一種‘左’的路線造成的。”在場的張策接着說，“回顧我們黨幾十年走過來的歷史，值得總結的經驗教訓很多，而‘左’的思潮、‘左’的路線，對我們黨和國家、人民的危害，尤為慘重。”[11] 連師哲都說，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是“一條錯誤路線”，只是認為是由康生“推行”的。[12] 總之，搶救運動是“左”的路線錯誤，不論是否承認這一定性，都不能改變那個黨史階段發生過的事實。猶如1959年的廬山會議，不管你承認與否，都是一場路線鬥爭，而不是“階級鬥爭”，只是鬥爭結果極左路線佔了上風。

最近聽到一位黨史工作者說，她訪問過的歷次政治運動參加者，往往聽到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運動的領導者和積極分子總要強調運動的必要性和成績，而把錯誤和缺點看得輕一些。被整者則相

反，總是強調錯誤而看輕以至否認成績。這被人們視為一般“規律”，奠定爾後一切政治運動模式的延安整風搶救自不例外。由於延安整風中創立的中共黨史編纂學一直佔統治地位，因此對整風搶救的評價就只能以它為准。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著書立說回憶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的，就多是一些領導幹部和運動中的積極分子，而且黨史界也多將其作為第一手的正面材料加以引用。至於在運動中挨整的、被搶救的、蹲過保安處、西北公學班房的，一些人在解放後還成了領導幹部，但是很少看到他們對整風特別是審幹搶救所寫的回憶，大多保持緘默。原因是不難想象的。

其實，這個“規律”能否成立，倒也不一定。例如對搶救運動始終持否定態度的中央領導同志中就有周恩來、張聞天等多數人，只是他們當時說話的作用不大，事後也不便提起。就是積極分子和骨幹，對搶救的評價也不盡相同。例如1933年入黨，曾是“一二·九”運動領導者之一的蔣南翔，當時主持中央青委的整風和搶救，本人並未被搶救，但卻出於一個共產黨員的公心和知識分子的正直，還在運動尚未完全結束的1945年3月就忘身進諫，向劉少奇並中央寫了《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很難得的是，他那時就能點名批評康生並對搶救提出十分尖銳的意見，如說青委的搶救是“石子裏榨油”，“根本失敗”；說搶救中的“群眾路線”是“瞎子摸魚”、“亂作鬥爭”；說搶救是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相當沉重地打擊了黨內相當廣大的新知識分子黨員的革命熱情”；說搶救暴露了黨的領導上“存在很嚴重的弱點”，缺乏民主作風和自我批評精神；說搶救產生了許多消極因素，包括造成同志間的隔閡等，事後領導上的解釋並沒有解決大家的思想問題；說搶救期間幾乎停頓一切正常業務，“使全黨損失了差不多整整兩年的寶貴光陰”，等等。[13] 又如批鬥王實味的積極分子溫濟澤，在被改正錯劃“右派”後，不但竭力促成王實味的平反，還發表了一些跟中央不同的意見，批評關於“九條方針”的中央決定對敵情估計過火，認為搶救運動不是什麼“支流”，“而是一次爆發的山洪”，是在提倡“實事求是”的整風中幹出的“不‘實事求是’的壞事、蠢事”。[14]

當然，現在已沒有人敢再否認搶救運動的錯誤了，但對錯誤的性質、程度、因果、責任等的看法仍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正式黨史著作和許多當時的積極分子至今對搶救運動的論述和評價，就同蔣南翔、

溫濟澤、韋君宜[15]等人有根本的區別。例如現任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鄧力群，在事過半個世紀的1991年底發表的一篇《回憶延安整風》的文章，談到搶救運動就很不實事求是。如說，“毛主席的‘九條方針’”“解放了被審查者，也喚醒了審查者”，說“甄別工作一直到七大前後才結束，沒有一個同志受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實際的結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審查者向被審查者‘脫帽鞠躬，賠禮道歉’，實現了同志間沒有芥蒂的真誠團結。”[16]

可以說，這裏沒有一句話符合實際。關於“九條方針”及其是否解脫了被審查者等問題，以及文中所提壞事變好事，“沒有‘搶救運動’，恐怕就沒有九條方針”的說法，下面還要做些討論。這裏先指出一點，即在這篇文章發表前不太久才做了兩件重要的平反工作。一件是1982年2月中組部作的《關於潘芳、宗錚、陳傳綱、王汝琪等四同志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問題的平反決定》。[17]一件是全國上下特別是學界、文藝界幾乎無人不曉的王實味一案。先是1986年8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在注釋中修改了以前對王實味的無據罪名，說“關於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據查，不能成立。”[18]後來就是1991年2月7日公安部發出的《關於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復查決定》，宣佈為他“平反昭雪”。[19]僅據此兩例，人們就可以看到，上引《回憶延安整風》中所說的不實。因為既然“沒有一個同志受冤屈”，“全都作了符合實際的結論”，那還搞什麼平反和昭雪？而且還應特別說明的是，恰巧王實味和“五人反黨集團”兩案，正是《回憶延安整風》作者親自參加批鬥的（所謂“大會一起開，小會分別開，連續開了七十二天”），文中對王實味等有關問題也有詳細描述。既然如此，怎麼能得出上述那樣絕對化的結論呢？是否仍然認為整風中對王實味、陳傳綱(未等及平反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等人的處理是“符合實際、”並不“冤屈”的？因為無論是作者還是組織和整理這篇回憶的單位《黨的文獻》編輯部，都不致忽略三中全會後對延安整風搶救中一些冤假錯案的平反，其中也包括中組部1985年給蔣南翔上述《意見書》的平反。問題還不在於這些具體案例，更重要的是這篇《回憶》反映了黨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因而受到重視。例如作為正史的《毛澤東傳》在《整風運動》一章中就有三處引證，[20]成了除毛澤東本人外，被引證頻率最高的一

個文件。而被中組部在平反決定中肯定為“實事求是”的蔣南翔當時的《意見書》，卻無一處引證，別的黨史著作和主要領導人傳記也沒見到引證過，可見其不受歡迎。這也是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權威的黨史界對延安整風中搶救運動的評價。

對於已經過去六十年的搶救運動，是應該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了。無論從當時情況還是六十年來的實踐檢驗看，搶救運動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一場自己人把自己人當敵特整的大混戰，收穫極小，損失極大，沒有抓到什麼敵人，自己卻有一定傷亡(例如不少人含冤自殺或被逼瘋、致殘，包括搶救中自殺在1945年即予平反的原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鳳平等)，特別是造成人力、物力、時間、精神的巨大浪費，還為以後許多運動開了不良的先例(有些完全是依樣畫葫蘆，如某些地區解放後的肅反和“文革”中抓“五一六反革命”等）。如果認為這種估價錯誤，那就請有關單位和權威機構公佈一些早應解密(其實並無密可保，主要還是為了掩蓋錯誤）的文件和材料，以及抓到幾個真特務、姓甚名誰；假坦白者及其檔案的處理；搶救中的傷亡和致殘情況；搶救運動耽誤了多少戰鬥、工作和時間，等等。有關搶救運動造成的損失和影響，下面還要加以討論。總之，搶救運動已經事過六十年，現在不應再由於“為尊者諱”，而對實際情況和史料加以遮掩，也不必只作沒根據的斷語結論，而應趁着參加過搶救運動的還有許多人健在，由有關單位組織和進行真正實事求是的總結，以便汲取教訓，也對那段重要的歷史作一個交代。這當然就要開放禁區，放鬆在檔案資料、發表權利和觀點看法上的壟斷，允許不同意見在平等條件下的爭鳴。其實，這點希望恐怕在相當時期還辦不到，因為要維護延安整風創建的政治體制和思想原則，對意識形態的管制是不會放鬆的。這從對史料的使用和處理上也可看出來。

二，研究和討論整風搶救所用資料問題

(一)對所用資料必須去偽存真

在研究工作中常聽到的一句話是，要掌握第一手材料。那麼整風搶救的第一手材料是什麼呢？按理，主要應為：有關整風搶救的檔案，包括正式文電，會議記錄等；當事人的見證；人們當時所寫材

料，如表格、自傳、日記、建議，以及證明、交代、申辯、控訴等。其實這些所謂第一手材料中，假的就不少，特別是個人填寫的表格、寫的自傳，以及檢舉證明和坦白交代等。我們上面論及張聞天的《反省筆記》和其他檢討時，尚且提到許多不夠實事求是之處。我也多次聽到過一些領導人如周恩來、陳雲等的過頭檢討。那時才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小幹部就更不用說了，在整風搶救中許多人的坦白交代和檢舉證明，完全是瞎編的假話。我自己就曾犯過嚴重錯誤，一度為了過關寫了承認是特務的假材料，雖然清醒過來後又很快推翻，但仍是"鐵案如山"，被放進檔案袋。除上面所說的這些情況以外，就是中央文件和重要會議記錄，同實際情況也有很多不一致。所以即使對這樣理解的第一手材料，在引用時也有個去偽存真的反覆對比和調查研究過程，千萬不能以為當時文件或記錄上怎樣寫，實際情況就是怎樣。例如，文件上寫明"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說了四十多年，結果證明完全錯誤。因為說"托派"，還多少有點影子（本人早已交代清楚），說成"國民黨探子"就只能是毛澤東的主觀推斷了。

一些人幾十年後寫的"回憶錄"和對當時運動的領導幹部或骨幹的訪問記，能不能算第一手材料，恐怕很難算，即使算，可靠性也是大成問題的。我們在前面曾提到過，列寧就從來不相信人們的回憶錄，因為寫回憶錄的人總要把自己說得好些。董必武老人對回憶錄所說，除了前篇引的"回憶因為各人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時間距離又長，特別是"難於擺脫現在的思想"等以外，他還接着說，"兩個人回憶同一件事，如果事先不商量，回憶的結果就不可能一樣。"[21] 可見回憶錄上說的東西不一定可靠。但是我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卻掀起了一個領導人和名人寫回憶錄的熱潮，而且至今不衰。據我所知，除極個別領導同志如李一氓以外，多數領導人都是組織一個少則兩三人多則幾十人的班子，幫他查找材料、執筆整理，在既無詳細日記又無紀錄更無錄音的情況下，竟然可以對三五十年前的事寫得生動活潑、有鼻子有眼、以至大量用帶引號的對話。這只能是按照當年歷史的大致情況和現在的思想認識，共同編造出來的，其真實性，可想而知。然而由於是應運而生，還真派上了用場，許多正式黨史出版物，特別是領導人傳記，也按其"所需"在大量引用。例如《聶榮臻回憶錄》談遵義會議的一段，會前醞釀和會議期間竟然沒有張聞天的

名字，有的倒是“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見是一致的，堅決主張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這能是歷史真實嗎？可就是這樣的“回憶”，竟被作為正式文件列入《遵義會議文獻》[22]。這只是順便提到的一個例子。事實上帶有明顯編造和炫耀性質的所謂“回憶錄”，真可謂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這本來是古今通例，原不足怪，問題就在於對這類歷史資料如何看待和如何使用。中共黨史研究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還真有它的特色。

延安整風創立的中共黨史編纂學，對黨史設置了一個比較固定的框架和原則（如上面列舉的幾條），不但史實的研究論述，而且史料的取捨使用，都得合乎這些框架和原則。不但頭幾十年，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雖曾一度有所放鬆，但這一框架和原則仍然不許突破，後來反而更嚴格了，並設立了專門機關負責編寫和把關，以保證黨史的資料管理和研究著述不出這個圈。關於整風搶救的檔案是一貫嚴格保密的，三中全會後，特別是前段時期，倒還一時稍為開放了一部分。一是公佈了少數檔案中的中央文件，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毛澤東文集》中有幾篇，還在1984年專門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延安整風的一組文件》(一九四一年九月—— 一九四三年三月)[23]；二是一些領導人在個人的《回憶錄》中使用和涉及的有關檔案，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薄一波的《七十年奮鬥與思考》、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等；三是一些研究論著中透露的檔案材料，如《延安整風五十周年》一書，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24] 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25] 以及其他一些書籍和論文；四是許多人靠自己記憶寫的回憶錄和一些人的日記。現在人們的研究恐怕主要就靠這些一二三手資料。但是在使用這些材料時也得注意兩點。一是公佈的檔案和領導人回憶中所透露的點滴，都是經過特別篩選的，不但沒有越出固定框子的圈，而且毋寧說是為證實和加強有關原則服務的。二是領導人的論述和回憶也要打折扣。被稱為“中共黨史研究和編纂的開拓者”[26] 的胡喬木的不少論述就不符合實際，我曾一再指出過，下面還會多次談到。

就是寫回憶錄別開生面、“也寫了自己錯誤”、 因而受到鄧小平贊揚的李維漢，[27] 也有不少為自己開脫之處。例如他說的陝公創辦之初製造了一件冤假錯案，把一批好學的進步青年組織的名曰“卡爾學

會”的讀書會，毫無根據地（只是因為名字叫的怪，為什麼叫卡爾不叫馬克思）打成反革命組織，開除了七八名，幾十個人不分配工作。其實，抗日戰爭前，上海左翼人士多稱馬克思的名字卡爾，目的在減少國民黨檢查官的注意。對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也是這樣。李維漢在四五十年後還就此進行檢討，“深以為咎”，這種精神確實少有，令人感動。但中間卻加了一句“那時王明、康生剛回國，他們把蘇聯鬥爭搬到延安，也影響了陝公。”[28] 就顯得有點牽強。因為陝公創辦於1937年8月，王明等11月才回來，他們影響不會傳播得那麼快。又如他在1942年4月6日毛澤東主持的會上的發言，把中央研究院在整風中出現的偏向歸咎於“過去教條主義的教育”。[29] 事實證明並不正確。涉及個人責任問題的更多，如把王實味打成托派和在邊區政府搞搶救的責任推給康生，把長征前夕提出政府系統人員去留（包括瞿秋白等）名單的責任完全推給三人團，以及許多敘述的跟風表現，都是不夠實事求是的。

至於一些權威著作如毛澤東的文章，經過篩選發表出來的是否就是原文呢？大多不是。不合上述框子和原則的，把關的單位仍然要加以刪節改動，而且往往不作說明，不留痕跡。例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其中有一篇1943年8月8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注明是“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紀錄稿刊印”，按理應當是真的原文了。但楊奎松在《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一文中引證的，毛澤東在同一天同一篇講話中卻有：一個2500人的黨校已挖出250個特務，而且估計不止此數，“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數目”。還舉了行政學院的例子說，“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30] 看來楊奎松大概沒有這樣大的膽量，敢編造這麼一大段“最高指示”。實際上只能是有關單位對原文作了刪節改動，說根據紀錄稿刊印，自然不是真話。又如《毛澤東文集》同卷載1944年5月24日《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也注明是根據紀錄稿刊印，但卻刪掉談王實味等的有關問題。如說，“整風審幹改造了人，我們有一條，叫一個不殺方針。王實味是托派，又是特務，我們也不殺。……王實味也變了，有進步。西安給他開了追悼會，還說延安殺了好多人。現在我們把王實味的照片一登，送給他外面的朋友。”[31] 這是

從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的陳晉著《文人毛澤東》一書中所引，大約決不會是捏造領袖的言論，差錯更不會出在紀錄稿的身上。這裏只是為了說明有關問題順便舉兩個例子，類似情況還可舉出不少。

對毛澤東的文章、言論尚且如此，對其他的人和事，就更不在話下了，因此也無須多所列舉。但有一件事卻不能不在此一提，就是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的親啟電報，和毛澤東1944年1月2日和1月7日的兩封覆電，對中蘇關係、黨的政策、黨內鬥爭和整風審幹都有巨大作用，在某些問題上可以說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特別是促成搶救運動在延安的剎車和上層路線鬥爭的顯著緩和。對這樣的重大事件，奇怪的是，正式黨史著作一律不予理睬，《毛澤東年譜》和《毛澤東傳》隻字不提，似乎這樣一件大事從未發生過一樣。[32] 同樣，毛在這個時期同共產國際代表兼塔斯社軍事評論員弗拉基米洛夫的頻繁接觸和長時間重要談話，這些正式著述和資料中也都不見痕跡。對於這類有意“忽略”，我們下面還會回過頭來談到。

人們也許會問，延安整風時不是特別強調實事求是，而且一直強調到現在嗎？為什麼正好會在整風期間幹出這樣的“壞事、蠢事”來呢？既然明知是犯了錯誤，卻又為何既不總結經驗、汲取教訓，還要長期刪削文件、修改歷史？其實道理很簡單，都是為了維護上述的框架和原則。而且對於“實事求是”或“尊重事實”，我們也有獨特的解釋，就是要符合毛澤東所提“革命的功利主義”，一切都看是否對革命“有利”。按以前的說法，“實事求是”也是講“階級性”的。例如那時陸定一就談到“兩種真實性”，一種是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哪怕還處於萌芽狀態甚至還沒發生的“本質真實性”，一種是只反映事物“表像”和“假像”的“虛假真實性”。[33] 所以要遵守“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的原則。[34] 現在更有人提出，講實事求是也要顧全大局、有利於穩定。當然，這絕不是說我們的黨史研究完全不講實事求是、一點也不尊重事實，而只是說實事求是和尊重事實必須遵守延安整風及此後確立的各項重要原則。設立有關的權威機構，一個重要原因和它們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嚴格把關。

（二）《回憶錄》不可靠的舉例

為了表明在黨史資料上也是定論第一，事實第二，同時也要着重

說明一下被黨史界廣泛引用的回憶錄的不可靠，這裏再特意舉兩個例子，並要多說幾句。

1，《楊尚昆回憶錄》談搶救柯慶施是後來編的

對於2001年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我在本書前面篇章中談到遵義會議確立的黨中央領導時，曾指出這本《回憶錄》有關遵義會議的一段論述和楊本人生前的說法截然不同，並指出只能斷定他生前的說法是真，死後由別人整理的“回憶”是假。這是明顯地要把楊的“回憶”納入黨史的固定框架內（諸如要求毛主席領導全黨是眾望所歸，張聞天不是總書記，只是分工“負總責”之類），因而要編造一些話來代替本人生前一再發表過的觀點和說法。現在我們討論到搶救運動，還可再以該《回憶錄》的有關部分（其他無關的不談）為例，來看一下是如何在為維護固定框架（為毛澤東開脫，把罪責推給康生）服務的。關於搶救，《回憶錄》寫得最有聲有色的是關於搶救柯慶施的大會[35]，而正是這一段可以看出完全是編造的，與當時的實際情況相差太遠。

關於開柯慶施的會，近年來曾同一些老同志多次談到，[36]不但印象和看法與《回憶錄》所寫大為不同，而且覺得《回憶錄》的許多提法不近情理。如說楊自己（才從華北局書記任上回延）和李富春（中央副秘書長兼中辦主任）、鄧發（當時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去找康生，康生竟“躺在床上，聽都不聽”。這可能嗎？據過去許多接觸過和同康生一起工作過的人如曾彥修等說，康生的待人接物根本不可能是這樣的，他對人，包括青年，還是挺客氣的。“說常委決定了”中的“常委”又何所指？那時政治局常委早已不存在，沒聽說過總學委設有常委。而且既然系“常委決定”，毛澤東怎麼會不知道，還問“你們開什麼會呀？”豈非自相矛盾。何況毛澤東已於1943年初搬住棗園，遠隔延河和十里山溝，怎麼能聽到他們“又叫又鬧”呢？楊尚昆怎麼會“回家經過毛主席的窑洞”？據在楊家嶺大禮堂正對過（中有山溝）、與大禮堂直線距離在百米以下的窑洞中住了幾年的曾彥修說，“兩三年間，大禮堂內除演京戲時偶能隱約聽到一點兒鑼鼓聲外，其他什麼聲音也聽不着”。毛住的一排窑洞，起碼在上述距離的三倍以上。因此，毛就是沒搬家，也不可能聽到大禮堂的開會聲音。另外，會上根本沒有人提過書上引號中那些幼稚的問題，即使真提了，也根本不起作用，因為會議是相當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的。[37]會

議由李富春主持，先談的是別的問題，已到下午四時後，李富春突然提出有人在禮堂內牆上寫了“柯慶施是特務”等字樣，要柯說明。在柯嚴正否認後就開始揭發和提問。首先發言的是李克農，鑒於他社會部副部長的身份，人們在吃驚之餘也難於理解，大多抱將信將疑態度。第二個重點發言的是陳伯達，問題提得極尖銳，講話雖有口音，但意思還聽得懂。第三個發言的是個姓張的東北軍中的老地下黨員，馬列學院已畢業的學員。提問題最積極的是中組部幹部科長王鶴壽，如問為什麼北平黨組織遭破壞時柯慶施恰巧去外地，一次就去了綏遠。據曾彥修談，那天各個揭發發言重點幾乎全是這同一性質的問題，只是時間、地點不同而已，可見均是事先佈置好了的。徐以新坐在前排呼口號。由於柯慶施態度堅決，會議無結果而散。此後柯實際上即被軟禁。他的妻子曾憲蘭在婦委搶救中被逼跳井自殺後，領導上還故意找柯追問，說是他放跑的。曾彥修說，當時聽到的傳達是，曾憲蘭是延安特務和境外特務裏應外合逃出邊區的，號召大家提高警惕，不可大意云。直到1944年4月，才發下中央文件為柯平反，說當時所提問題均已查清。在延安搶救中，這大概也是中央在短時間內對第一個人的正式平反，以後就沒聽說對第二個人再這樣做了。從這些情況可以做出這樣幾點判斷：第一，搶救柯慶施是有計劃的一個重要行為，決非康生一時心血來潮。第二，毛澤東、劉少奇等主要領導事先不會不知道，康生膽子再大也不敢擅自作此決定，李富春等也不會那樣順從康生。因為外號“柯大鼻子”在當時是延安的名人，又是領導幹部。他是1920年的團員，1922年轉黨，誰都知道他是延安唯一見過列寧的人，時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因王明生病住院，實際上是他負責)，非一般幹部可比。毛、劉當時主要抓整風審幹，而且抓得很緊，決不會讓這樣的大事漏掉。第三，楊尚昆等三人如果真的會前去見康生，那也是商討做法，而不是去勸阻。而且估計三人不會結伴去見康生，既然來回要“經過毛主席住的窰洞”，那為什麼不先見一下毛澤東？難道那時不是毛領導康，反而是康領導毛? 總之，在僅一頁書中就存在這麼多問題，是極不合理的。何況參加那次會和瞭解情況的老同志還有不少人健在，如果整理時能訪問幾位，也不致搞得很多情節都像小說似的。

2，師哲著《在歷史巨人身邊》關於搶救運動的敘述多有不實

師哲著《在歷史巨人身邊》是一本較有影響和被引證較多的回憶

錄，因此這裏要多說幾句。影響大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書名響亮，又經過中央文獻研究室“鼎力協助”和派黨史專家整理出版，還有王震給寫《序》，因而受到普遍重視，印數那時就近七萬冊，為一般回憶錄所少見。但是只要看有關整風和搶救的部分，就會發現編造和炫耀的成分實在太多。此後出版的一本《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38] 硬傷還要更多。例如開篇《整風運動之初》第一段，只有兩三句話，卻有幾處硬傷。劉少奇1942年底才回到延安，怎麼可能同毛澤東、康生三人組成第一次成立的總學委。說毛在總學委“只掛了個名”，更是毫無根據。說“劉少奇是政治局委員，也沒有管”，也完全違背歷史(劉當時還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為什麼會出現這類差錯，而兩次編輯又都輕易放過（先發表於1989年第4期《中華英烈》，1997年出書）？原因就是黨史工作中的把關，主要看是否合乎所需要的原則，至於合不合乎事實似乎倒在其次。而師哲這樣說，正可以為毛、劉開脫，把責任推給康生。所以《劉少奇傳》上談到肅反擴大化時，也樂於引證他的回憶：“劉少奇因自己剛到延安，對延安的整風和中央機關的情況都不大瞭解，很多事實際上還是康生在主持這方面的工作。”[39] 其實，延安的搶救高潮出現在1943年下半年，這時劉少奇已回延安大半年，並出任“中央反奸鬥爭委員會”（成立於4月28日）主任，在肅反上直接領導康生、彭真、高崗等也有好幾個月，何況上面還有總學委主任毛澤東在直接抓整風審幹，怎麼可能是師哲“回憶”的那樣讓康生成了總學委的“實際負責人”。而且就在引證這句話的一段裏也有好幾處硬傷，如說“1943年3月，劉少奇回到延安”（實為1942年底），說“毛主席、劉少奇同康生都住在楊家嶺”[40]（這時毛澤東、康生住棗園)等。既然在一小段話裏就有這些明顯的硬傷，定然說明這段“回憶”的不可靠，怎麼還能引證其中“有利”的那一句呢？綜觀師哲兩部《回憶錄》，可以說都是儘量按現在的思想認識和輿論導向，編寫幾十年前的故事。這裏只就兩個較重要的問題，提出來討論。

第一，回憶錄似應有別於傳記文學，應該完全寫實，不可任意虛構，特別是一些重大事件和領袖人物的談話。而這兩本《回憶錄》卻很不嚴謹，除了明顯的硬傷外，有許多描述也是經不起推敲和不夠真實的。例如作者個人同領導人的對話，不但不說明時間、地點、場合和旁證，還要加上引號。那麼這些領導人的話能否當真呢？恐怕不

能。否則單是這兩本《回憶錄》就可編一本《毛主席語錄》。而且有些話，一看就不真、不像、不可能。例如總學委成立後，“毛澤東對康生說，‘總學委的實際工作由你做’。”[41] 又不談此話的來源與根據，人們能信嗎？又如，“毛主席先找康生談過，指出要糾偏，康生卻置之不理”。[42] 這可能嗎？康生和毛康關係會是這樣的嗎？

有些話顯然是越編越離譜，如敘述毛澤東對他講中央蘇區反“AB”團的問題，在《峰與谷》中一文（按：文在前，出書在後）先寫為：“毛澤東要瞭解其中的奧妙，有一天他悄悄從窗孔看如何審犯人，原來是‘打雷公’。”[43] 到《在歷史巨人身邊》就變成了毛澤東引號內的原話：“半夜三更，我睡不着覺，悄悄地走到審問犯人的地方，用舌頭將窗紙舔了一個洞，偷偷地看，看見審訊人員正在搞逼供信。”[44] 固然越編越有趣，但編造的痕跡也越明顯。應當指出的是，在我們討論的這段搶救運動期間，作者既未“在歷史巨人身邊”，實際上也不再是任弼時的政治秘書了。1943年4月5日，書記處會議決定，“取消政治局委員的政治秘書，另行分配工作”。[45] 何況在這之前的1943年1月他就被調去當邊區保安處一局局長，一年半後又調社會部任室主任。就是在巨人身邊時，也是主要只做一部分俄文翻譯工作，不能和他列舉的某些政治秘書如胡喬木、陶鑄等相提並論。既然如此，他對中央的事和上層整風就不可能瞭解太多，所以寫得也比較膚淺，而且可以看出許多明顯的不真實。

不信，這裏就舉幾個例子。如說中央總學委“主任先是毛澤東，後是劉少奇，都是掛名”，康生“是整風運動的實際領導人”。這些話完全是海外奇談。實際上，劉從未當過主任，兩人也決非掛名，康生更不是整風運動的實際領導人。說向忠發叛變後，王明就“直接接替了總書記”，“但任總書記才一月，便辭去該職，……”還“在1935年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長篇報告，後來印成小冊子，即臭名昭著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其實，王明既沒當過總書記，他的報告也不是那本小冊子。王明在國際七大上的專題發言題為《論反帝統一戰線》，相當於一個有關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副報告(同樣性質的還有德共皮克與意共愛爾科里即陶里亞蒂的兩個長篇發言)。這三個重要發言，延安均有蘇聯運來的不少小冊子。而《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則是王明在

1930年黨的四中全會前夜寫的一本小冊子。

又如說江青和毛澤東結婚時，毛是“中共中央主席”。（1938年還根本未設中央主席，毛當時只是軍委主席。）[46] 說“在張聞天出使蘇聯期間”，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之間“建立了較密切的關係，常在一塊交談，就某些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47]（對此，我倒可負責地證明：絕無此事。否則，1959年廬山會議定的“裏通外國”罪名還真可成立了），等等。

其次，這兩部《回憶錄》寫到一些領導人的事或其他人的政治問題時很不嚴肅，也是信手編來。如談劉少奇和王前的離婚是康生挑撥，[48] 說明作者根本不瞭解這件事。《峰與谷》中“綏德的故事”一節，寫得更離譜，還竭力炫耀自己。[49] 如說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和專員袁任遠親自主持搞的肅反“騎虎難下”，於是（大約五月底）他帶了七八個人，突擊了一個月，三個縣的局面就“安定下來”，並受到林伯渠和西北局的表揚。還說徐向前是“綏德抗大分校的校長”（實際上當時駐綏德的是抗大總校，徐為總校校長），“重大問題都是徐向前、習仲勛、袁任遠和我一起研究”。情況恰巧相反，正是1943年6月後，綏德專區的搶救才鬧得更厲害了。9月，綏德師範還連開了九天的控訴坦白大會，9月22日的《解放日報》以《綏德失足青年紛紛悔過，控訴國民黨特務機關萬惡罪行》為題作了詳細報道。“1943年10月9日，毛澤東看了綏德反奸鬥爭大會後才批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鬥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50] 抗大總校的搶救運動起步更晚，1943年8月開始，10月才大幹，搞出特務和特嫌602人，佔全校排以上幹部57.2%。[51] 可見當地情況和師哲所寫，差別有多大！還有一個談七大代表的審查問題，兩本書都提到了一個叫“小米”的人。在《峰與谷》中，說他是湖南代表，學文件時發現他說話不對頭，總提錯誤路線誰負責的問題，後來找他一談，他承認變節，當了特務，“那時並沒有逼他”。[52]《在歷史巨人身邊》已描繪得更具體了，說“大約1942年5月間，冒出了一股蠱惑人心的陰風，說對黨內歷次錯誤的發生要找根尋底，追查責任。”“後來在肅反中查明他是隱藏在黨內的一個叛徒。”並由此引起了他同毛澤東一段加引號的對話。[53] 情況到底如何，再看當時中辦秘書處一位負責人曹瑛的說法。“秘書處的密家凡同志，是湖北地下黨送來的七大

代表，由於七大一時開不成會，就調他來中央秘書處暫時工作。這個同志思想活躍。在大搞逼供信的情況下，有人咬他”，於是“大家‘搶救’他”，提一連串很離奇的問題要他回答。“小密很年輕，他就反駁。我覺得他駁得很有道理，所以我在會上幾天沒發言。後來，在半夜裏社會部派來一輛馬車把他抓走了，關在‘西北公學’……我對那樣搞有些想法，認為不對頭，但不敢說。”[54] 經訪問劉英等當年在中辦工作過的老同志，大家叫的小密（師哲誤為小米）就是密家凡，但沒人說他有問題。瞭解他的曹瑛既然在五十年後仍以同志相稱，且認為那種作法不對頭，卻沒指出最後處理，不知是否有不便說之處。因為搶救運動中自殺的、逼瘋的不少。該同志如果還活着，恐怕是會跟師哲打官司的。還有提到其他七大代表的審查及其與搶救的關係，[55] 也值得懷疑。例如所指河南省委書記，係七大後自己交代並要求取消中央候補委員的，中央向全黨發過通報，內容我至今還記得。至於回憶錄上提的另外兩個候補委員，卻沒聽說過，有點不信。但這類問題一查就清楚，只是我沒有這個條件。

對師哲《回憶錄》的訛誤之處所以談這麼多，並非苛求於這位老前輩，其實這是普遍情形，只是想借此說明《回憶錄》並不可靠，而黨史研究又似乎有點濫用《回憶錄》的現象。特別是一些名人傳記，往往“各取所需”，大量摘用許多《回憶錄》，很容易把一些歷史事實弄得更亂。常看到一些引證是當時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或使用的語言。但研究歷史又不能不使用《回憶錄》的資料，所以這是一個需要慎重對待而且值得研究的問題。恐怕只有多讀、多問、多疑、多考證才可能好一些。關鍵在多讀、多比、多思。

在學習黨史的過程中看了一些人的《回憶錄》，覺得類似的問題不少。原打算專門寫一篇讀書筆記進行討論，但後來一想，這與改行學黨史寫筆記的主旨關係不大，所以決定作罷，只是在此以這兩種《回憶錄》為例，多說了幾句。

三，對搶救運動中幾個具體提法的辨析

由於對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至今沒做過什麼總結，在黨史研究和論述中，除了注意維護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則外，涉及具體問題就

只能各說各的了。而且原則第一、事實在次，這一條還越來越盛行，因此有關搶救的一些說法也就和當年的實際距離越來越遠。為了使討論時所用概念的含義明確一些，這裏只提出幾個較常見也較重要的問題，作點辨析。

（一）是“搶救運動”還是“審幹運動”

從前，搶救運動一直屬禁區，史書很少提到，所以名稱也無定規。“文革”後黨史研究談及整風搶救的多了，於是就發生了“正名”問題。事實上，從1942年到1947年延安撤退，除常說的搶救運動外，也還有坦白運動、反特運動、鋤奸運動，惟獨沒聽說過有“審幹運動”這個詞，這可能是許多年後人們為遵守中央1955年8月指示中的提法，才普及起來的。但是這一名稱，既不科學，也無根據。審幹是組織上對所有幹部定期或經常進行的(據我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從1939年起，對黨員和幹部的審查就沒有停止過)，內容包括政治、歷史、能力、表現等，一般是和群眾運動掛不上鈎的。大約除1955年8月指示[56]中這一不確切的提法外，歷史上似乎再沒提過還有其他什麼審幹運動，但審幹卻一直在進行。說這一提法沒根據，是因為整風期間以及此後，從來沒見到和聽到這種說法。整風期間的指示、文章，提審幹很多，但未和運動連在一起。而且整風中的審幹也不是通常的審查幹部，一開始就明確為反特或肅反，所以實質上就是搶救，而不是審幹。因為審幹是中央一貫重視並作過多次指示的。例如1940年8月1日就做出關於審查幹部問題的指示，認為審幹是鞏固黨的一個重要方法，要求各級黨委和各單位成立幹部科，擔負有關工作。[57]但這次審幹並未變成搶救。

還應指出的是，審查幹部一貫是組織部門的事，這次則由社會部直接抓，怎麼能還是審幹呢？可見，把肅反等同於和叫做審幹都並不合適，搶救運動更不是什麼審幹運動。之所以事後改稱審幹運動，可能只是為了淡化甚至掩飾延安整風中這一嚴重錯誤而特意想出來的一個名詞，並不是當時實際上存在過這麼一個運動。1955年8月的文件還把這個運動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第三階段的甄別工作，只能是也完全是極少數領導骨幹的“暗箱作業”，沒有也不可能成為群眾運動。而且這三段論也從側面說明應稱搶救運動。因為，第一階段發動群眾

幹什麼，還不是為了第二階段的搶救。第三階段的甄別，則是由於搶救出了亂子。可見中心還是搶救，人們一直稱為搶救運動也是確有道理的。例如整風運動（或稱整風學習運動、整頓三風運動），就是一開始就有的提法。[58]

搶救運動也是隨着運動的開展，各機關先後叫起來的。最早可能源於毛澤東1942年6月19日在政治局會議上説的“發現壞人，拯救好人”。[59] 後來在坦白運動（1943年4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中直軍直單位和邊區各機關開全體人員會議，號召特務分子自首[60]）中，逐漸演變成挽救失足者或爭取失足者，作為運動，就叫搶救運動。[61] 而實際上延安各機關單位叫得最普遍的還是搶救失足者。搶救運動與坦白運動是無法分開的。大體上講，自上而下發動的是搶救運動，對被搶救者來説是坦白運動，被指定施行搶救的小組則叫“勸説運動”或“勸説小組”。三位一體，但根本上還是個搶救運動。大概1943年四五月後，由於估計國民黨將趁共產國際解散機會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並斷定它已準備好以武力進攻陝甘寧邊區，因此中央總學委於7月11日發出《在延安進行反對內戰保衛邊區的群眾教育運動的通知》。其主要內容就是“繼續加緊反奸細鬥爭”，要求開各種形式的會，包括群眾大會、大小座談會、坦白大會等。[62] 於是延安各機關學校便在緊急備戰聲中相繼提出了“搶救”的口號。我所在的學校領導在全體大會上的説法是，如在平時，還有時間説服教育，而現在已是非常時期，可能馬上就打仗，所以必須緊急搶救，否則一旦開戰，對這些特務就只能就地處決了。就這樣，搶救失足者和搶救運動的提法，在1943年夏已很快在延安普及。後來中央文件也加以確認，又一下傳遍各根據地。如1943年8月5日中央總學委通知的第一句話中就有：“延安對失足分子的搶救運動亦已告一段落”[63]；1944年11月26日中央給晉察冀並發其他根據地的指示中。提到的也是“鑒於去年延安搶救運動時”；[64] 1943年12月22日，書記處會議主要討論反特鬥爭，也一再稱“搶救運動”，而沒有叫“審幹運動”。[65] 毛澤東的一再稱呼同樣是“搶救運動”，而不是“審幹運動”。例如1944年1月10、11日書記處會議上聶榮臻報告中，他的插話就有：“過去延安重視知識分子，不重視工農分子，‘搶救運動’以來，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識分子。”[66] 他在延大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説的也是，

"'搶救運動'那時候，空氣緊張得很，'搶救'了好些人，許多是搞錯了的……"[67] 總之，長期以來，人們一直都把那次運動叫做搶救運動。多年後才編出來的這個"審幹運動"，既不科學，又沒根據，名不正，言不順，自然以不用為好。

（二）搶救運動的時間到底多長

對此說法很多，但基本上是兩種，即十多天和兩三年。前者以各種正式黨史為代表，如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把時間定為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報告後的十餘天。根據大概是毛澤東1944年10月25日講話中所說，"去年'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我們馬上就使它停止了。"[68]（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話。）雖然這裏沒有說這"十多天"的起訖時間，也沒說是怎樣"使它停止"的，以及是否合乎實際情況，但因為是領袖所說，所以就定下來了，成為黨史上的正式說法。此後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歷史》自然沿用此說，並明確為半個月，即1943年7月15日康生報告後開展了"搶救失足者運動"（按，這可能是為了把發起搶救的責任推給康生和運動開始時間從康生報告後算起，特意將當時及此後叫了多年的"搶救運動"改稱"搶救失足者運動"），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69] 其他較正式的有關搶救運動的論著和一些領導同志的回憶錄，也大多持此說法。如前面引證過的鄧力群在《回憶延安整風》中就說，"到1943年7月搞了十來天的搶救運動。"[70] 但是所有這些說法都是只有斷語，不提根據；只講虛，不講實，例如什麼地方、什麼單位、是怎麼個搶救法、又是怎樣"馬上"停止的等等，這當然就無法，其實也不容許討論了。

後者以蔣南翔的《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為代表，其中明確指出"使全黨損失了差不多整整兩年的寶貴光陰"。一些討論搶救運動的文章，如《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在詳述具體經過後，也說是從1942年底的坦白運動起到1945年甄別工作結束，"歷時兩年多"。[71]（這裏附帶說一句，當時和事後這兩文的標題都稱"搶救運動"，可見"審幹運動"和"搶救失足者運動"是後來特意制定也極少使用的名詞。）連親自參加搶救和恢復總學委後任秘書的胡喬木也說，"這個搶救運動，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有一兩年，恐怕有兩

三年時間。”[72] 這是1981年9月14日回答問題時本人親自所談。至於《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說的，“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毛主席就指示讓它停下來”[73]，則是由別人整理（顯然是按上述“正史”的統一口徑），且本人生前未及審閱的。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毛主席何時和怎樣指示讓它停下來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寫的雖然更具體，說是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但也沒有交代這個“指示”是用什麼形式下達的。當然，兩本書都是由權威機構和權威黨史學者所整理和編著，是不應有什麼懷疑的。但奇怪的是，這樣重要的史實和文獻，《毛澤東年譜》、《毛澤東文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等竟都沒有提。7月30日毛澤東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只提了審幹的九條方針，也並未提停止搶救運動。[74]

當然，更重要的還在於事實。而事實是，搶救運動7月後在許多機關和地區，特別是一些敵後根據地，反而進行得更猛烈了，有些還是1943年底或1944年才大幹的，如晉冀魯豫邊區等。我所在的單位和親身經歷，以及一般機關學校均可姑置不論，就是毛澤東親任校長並抓得很緊的中央黨校，作為延安整風審幹（搶救）的重點，直到1944年初也還沒有停止。據被搶救的黨校一部（高幹）學員曾志說，“春節過後，大約是三月份（引者注，1944年），我作為重點審查對象又被編入了黨校臨時支部……雖然中央有了‘九條方針’但這裏的‘逼供信’仍相當嚴重，與以前相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打、罵、踢，刑罰各種各樣。”[75] 駐綏德的抗大總校，搶救運動1943年8月份才正式開始，還是“從十月下旬起，兩個月的時間裏，抗大整風被弄得一塌糊塗。”[76] 延安和綏德等地區，九月份搶救也還熱火朝天，《解放日報》還作了詳細報道。直到12月，中央才提出“坦白大會要更慎重更有準備的召開”（以後又提出停止開），指示“不能到處採用搶救運動的簡單方式”。[77] 12月22日書記處討論反特鬥爭，決定向高級幹部傳達的內容中也才有“今後延安審查幹部應進入新的階段，即甄別是非輕重階段。”[78] 而且這些都只適用於延安，一些敵後根據地並未停止，還要他們繼續進行或補課。中央書記處1943年11月15日才致電華中局，要他們“即在軍部與二師一部附近進行一般的清查特務分子的運動（公開名義為審查幹部），以便能在華中突破一點，推動全局”。並介紹了搶救的具體做法。[79]

另如前所述，直到1944年，北方局黨校也才大搞搶救，劉建章、李爾重、任仲夷等正受折磨。1984年7月4日中顧委第三支部開會時楊獻珍就檢討說，“1944年我在北方局領導整風，犯有錯誤。當時從延安刮來一股‘搶救失足者’運動的歪風……”[80] 1944年2月26日毛澤東和康生還聯名覆電鄧小平、滕代遠說，“你們的審查幹部工作，已進入坦白運動”。[81] 也正是1944年，中央才派舒同去山東任分局總學委副主任，具體主持山東的審幹工作，推廣延安(特別是中央黨校)搶救運動的經驗，只是由於羅榮桓的抵制才沒全面展開。所有這些都說明，1943年7月後，搶救運動無論在延安還是其他地區不但沒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毛澤東7月30日是不是有一個明確的關於停止搶救運動的指示，否則各地怎敢拒不執行。事實上，各地停止的時間也不同，有的也許是1943年底，有的則是1944年，總之都決不是“十餘天”或“二十天”的事。

再說，搶救運動更不能說是從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後才開始。實際上，1942年底許多機關學校即已開始，只是全面展開則是上面說過的任弼時4月9日和12日的報告之後。但這時叫法仍然不一，有坦白運動、肅反運動、搶救運動等，後來才逐漸統稱搶救運動。所以4月28日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延安各機關、學校、部隊討論任弼時的報告，還說是“繼續進行坦白與檢舉內奸運動”。[82] 中央總學委7月11日通知中的提法，又是“繼續加緊反奸細鬥爭”(請注意前後都有“繼續”二字)，要求把對幹部群眾的教育“必須與審查幹部坦白運動密切的結合起來”。[83]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有根有據的研究論文也都指出是開始於1942年，只是要按正史說法稱為“審幹運動”，再在下面注明為反特鬥爭。[84]

至於親身經歷過的人，說得就更具體了。例如住在毛澤東隔壁、天天同毛澤東見面的葉子龍夫人蔣家英(江英)在回憶文章中就明確說，“1942年延安搞了‘搶救運動’。”在被搶救了大半天後，她跑回去找毛澤東說，“主席，他們搶救我了。”但最後還是被送去黨校一部繼續審查。[85] 曾志也說，1942年她調黨校一部學習，有天晚上全體去聽“失足青年”的報告，“以後這樣的會隔幾天就要舉行一次。”“有一天黨校一部又舉行全體學員和工作人員動員大會……講到黨內成分不純時，特別提到：河南從省委到基層都有紅旗黨問題，

所有黨員都是紅皮白心的假黨員。”會後，河南省委組織部長、著名的長征女戰士危拱之就回窑洞自殺了(雖經救活，最後還是得了精神病）。[86] 再看作家劉白羽所說：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以後，就“使得延安生活的氣氛慢慢緊張起來”。他由“文抗”到中研院才分配到歷史研究所，“就在這時，一陣暴風驟雨，驟然平地而起了”，“審幹之中所謂的‘搶救運動’開始了”。[87] 不用再多引證（其實我自己就是那一陣開始受到車輪戰搶救的），就可看出，一些黨史論著和專家所說搶救運動開始於康生 1943 年 7 月 15 日《搶救失足者》報告之後，距離實際情況有多遠。因為在中研院揭開王實味的“托派問題”後，審幹的重點單位中央黨校就“查出”吳奚如的“特務案”，隨之反特鬥爭就在全校展開，一些單位也聞風而動，搶救運動就實際上在延安開始了。特別是1942年10月開幕的西北局高幹會，毛澤東在講話中批評了對敵特破壞麻木不仁的自由主義，康生和彭真又先後作了肅反問題的報告。在這種情況下，哪個單位還敢怠慢？因此，只能說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又掀起了中央機關和學校一輪搶救運動的高潮，但決不能說是搶救運動的開始。至於剎車，則是 1944 年的事。對於這些，在後面談“九條方針”等問題時還要進一步討論。這裏只是要說明，搶救運動決不應從1943年7月康生報告算起，更不能說只搞了“十餘天”，這些說法完全與史實不符，這樣說的黨史著作當然不能算信史。

（三）整風和搶救的關係

本來，搶救運動就是延安整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文獻上還是事實上都沒有分開。但是有些人為了維護延安整風的崇高聖潔，不願讓純屬錯誤的搶救運動（多按正史提法稱為審幹運動）玷污，於是就把它們說成是兩個運動。例如有一篇《審幹運動與延安整風運動》的文章，就認為“延安整風與審幹運動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運動”。[88] 還有些談及延安整風的黨史論著，也或多或少或顯或隱地包含着這個意思，說明這也是個較普遍的問題，值得一談。其實，從搶救運動一開始就沒有這種提法。相反，無論領導人講話還是正式文件，都始終把審幹(肅反或反特、反奸，意思是一樣的，實際上就是搶救）當作整風的一部分、整風的兩大任務之一。早在 1942 年 4 月 7

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已提出在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要審查幹部，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89] 6月1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又明確指出，“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托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90] 即將肅反和糾正路線錯誤並提。1943年3月《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中更明確指出，“有步驟地清除內奸分子，這就是整風的第二個目的。”[91] 第二個《四三決定》[92] 同樣可以說明問題。它的宗旨就是肅反，但題目卻是《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其中還一再強調肅反是整風的一部分，是整風期間要辦的大事。如說：“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當時最常用的說法還是，整風要同時解決半條心（糾正錯誤思想）和兩條心（肅清內奸分子）的問題。兩個問題的性質完全不同，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同一個運動，還被明確定為“是整風過程中互相聯繫着”的兩件事。只是在搶救運動進行了幾個月後，中央才做出專門的審幹決定，提出“九條方針”，但仍然不是要把審幹（反特）和整風分開，還是說“這一次我黨在整風中審查幹部”，為了審幹“各地整風須延長至一九四四年”。劉少奇也明確指出，“審查幹部與清查內奸的運動，是整風運動的繼續發展及整風精神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運用。”[93]

當然，有時為了便於操作或訂計劃，也把整風中的這兩件事分別稱為整風學習和審查幹部，或簡稱整風和審幹，但並無人說這時延安進行了兩個運動。其他根據地也並未把整風和搶救當作兩個運動來抓。晉綏分局的林楓就說，“整風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主要是整學風……第二個時期是反特鬥爭，這個時期是從黨內鬥爭轉到黨外鬥爭；第三個時期又開始整風，成為黨內黨外兩種鬥爭的結合。”[94] 事實上，差不多1943年全年和1944年大半年，包括我們學校在內的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機關學校，都是以大部以至全部時間搞搶救運動的。在此期間，幾乎再未討論和批判什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1943年九月會議後，上層在批王明右傾路線和“左”傾路線，中下層幹部根本不知道）。在這兩年左右，普遍整風就是搶救運動，並不是許多書本上和後來某些黨史學者想像的那樣在“整頓三風”。對於搶救運動，既然黨史著作都要儘量加以淡化和遮掩，那麼一些人進而設法把它和延安整風分開來，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四）向搶救錯了的人賠禮道歉問題

刹住搶救，進而向搶救錯了的人賠禮道歉，是由於1943年底季米特洛夫以“個人”名義致書毛澤東對整風搶救干預的結果，同時也是由於廣大幹部包括許多高幹和一些中央領導同志，越來越對搶救運動發生懷疑和不滿。為了應付這種局面，但又在不能承認搶救運動搞錯了的前提下，才想出和採取了這一似為檢討而又不作認真的自我批評的奇特作法。但這卻被整風搶救中的積極分子和後世黨史研究者大書特書，當作毛澤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自我批評”。

關於毛澤東對搶救運動主動承擔責任和向搶救錯的人賠禮道歉，一些書寫的最早的一次是：“1944年元旦，王諍帶着中央通訊部門被錯誤地打成‘特務’的同志來給毛澤東拜年”，毛講話說，“這次延安審幹，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灰錳氧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這不好，今天我向你們敬個禮，你們回去要好好工作。”（之所以安排這次活動，是因當時通訊部門絕大多數人被打成“特務”，已“使延安同各根據地和各省黨組織的聯繫一時中斷”，所以要急於解決他們的問題。）[95] 後來在大會上的正式賠禮道歉，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所載，前後共有三次，[96] 而且還描述得甚為生動感人：“許多受過冤屈的同志最初氣很大，經過毛主席這樣多次地賠禮道歉，不僅氣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對運動中的事大家不再計較了，同志間的團結增強了，心情重新舒暢了。”[97] 這段描寫雖然不是胡喬木自己所寫，但看來是合乎他的意思的。以他為代表的黨史學派（稱得上學派的，中國恐怕也就這一個）和其他整風搶救的積極分子，所寫的黨史著作和回憶錄，基調都是一樣的，區別只在於有繁有簡，還有些更屬於誇張和編造。

奇怪的是，寫被搶救者如何感動、如何感到不安的，好像都是搶救別人的積極分子和一些領導人。而被搶救者（建國後當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委書記、政府部長和司局長等各級幹部的都有），不知什麼原因，卻很少見他們寫搶救，更沒見到說如何感動和自己為此如何不安之類的話。我至今只讀過被搶救和關押過的李銳、任仲夷等少數人的片斷回憶，但他們的重點都在反“左”。也許是其中多數人不願或不能（有禁區）談那段歷史，而不是如此健忘或沒感覺。於

是積極分子就替他們“感覺”了，也因此才使“感動”、“不安”、“消除芥蒂”、“增強團結”、“心情舒暢”等寫進一些黨史讀物。為什麼有些積極分子不去“回憶”自己如何整人、如何搶救、如何傳授和學會“車輪戰”、“假槍斃”等方法，以及如何罵人、打人、污辱人，當時靈魂深處的活思想是什麼，事後有無懺悔之意，等等，卻要越俎代庖地去琢磨被搶救者的感情和反應，以致使我們至今看不到一本搶救者寫本人真實思想的《回憶錄》，更不用說《懺悔錄》了。

其實，這倒是可能起源於延安整風搶救，從而成為歷次運動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例如錢鍾書在《幹校六記》的《小引》中就說，幹校兩年的重要任務是搞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最後“水落石出”，一個也沒有。“按道理”，那些“充當旗手、鼓手、打手”的積極分子，最應當寫出“記愧”的文章。“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於心”。[98] 所以這種文章至今未看到。錢先生着重講了人性上的原因，“記愧”吃虧。但我看主要還是體制上的原因。我們一貫實行保護積極分子的政策，即積極分子在政治運動中的極左和過火行為不但不予追究，而且不用檢討（甚至不讓檢討，否則會泄密），經過運動的考驗還會得到重用。在這種政策下，會有“記愧”文章嗎（個別例外也許有）？

根據我的所聞所見和親身體會，情況則是有些和上述積極分子的描述大不相同，甚至有點相反。而且這決非個別現象，不但在延安，後來遇到其他根據地的被搶救者所談也大體一樣。實際情況是，當時被搶救者的氣主要是向着本單位各級領導（因為“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和積極分子的，多數人不但對毛澤東，連對康生也沒有什麼氣。所以毛澤東的賠禮道歉，不僅沒能消氣，反而使那種對本單位搶救者的氣發作出來了。因為以前無論自己承認與否，總是被戴上特務帽子，不斷挨鬥，許多人心中有氣也不敢發作，處於“被動應戰”態勢。現在連毛主席都承認弄錯了，你們還有什麼話說，被搶救者腰杆硬了起來，不怕再挨鬥了。而整人者，正如上面所說，自以為是響應號召、執行任務，服從組織，自然“心無愧怍”，仍然“理直氣壯”，給被整者作甄別時還要留尾巴，寫成“事出有因”（給搶救找個藉口，如說因為你有些自由主義、黨性不強或社會關係複雜等），雙方進行着激烈的“討價還價”。在這種情況下，不是一些積極分子說的消除

了芥蒂、增進了團結，而是矛盾進一步激化（這是蔣南翔當時就在《意見書》中提到的），有的當時爆發，有的長期積怨（上引陳毅在“二月逆流”中的發言就提到）。

我所在的軍委編譯局，就在聽了毛主席賠禮道歉的傳達後，發生了一個被搶救者拿起凳子去打一個假積極分子(自己假坦白，又去搶救別人)的事。至於發脾氣、同領導頂牛和不理睬積極分子的情況，當然更多些。而且許多被搶救者的甄別結論這時還沒下來，頭上那把達摩克利斯劍還在懸着，心情怎麼可能“舒暢”。即使拿出了結論，本人滿意的也不一定是多數。這種悶悶不樂的日子，在我們單位，大概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離開延安。至於我和周圍的一些同學，對毛澤東的賠禮道歉只聽過一次傳達。聽後也感到高興，那是因為眼看這場冤枉人的搶救運動有了結束之日，弄清個人的問題更有希望了，但談不上感動和不安。其實在這之前就已開始了甄別工作，但因弄得很神秘（少數人的“暗箱作業”），大家還是不太清楚，這一傳達就等於公開化了。對於毛主席主動承擔責任，當時並無感覺，既然發號施令的是你，當然應當負責。“文革”後由於把搶救說成是康生搞的，毛澤東似為代人受過，所以黨史學才又出現了一個強調所謂“主動承擔責任”的偉大精神問題。總之，我沒有見到聽傳達後如何感動和過意不去的人。現在看來，這幾次講話和賠禮道歉，實在算不得列寧所說的自我批評。列寧的要求是，“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誌”。[99] 可毛澤東從來也沒有承認過搶救運動是錯誤（更談不上路線錯誤），自然也不會滿足後面那些要求了。至於他在整風中一再強調的，對錯誤必須採取主動態度，要深挖思想根源，詳細說明犯錯誤的經過和後果，提出改正的措施和努力方向，還要反覆寫反省筆記，“以寫好為度”等等。所有這些，似乎都不適用於搶救運動，當然更不適用於他本人。所以對搶救這樣的嚴重錯誤，由毛澤東以偉大領袖的身份，向整錯的人敬個禮再講幾句詼諧的話也就行了。這哪裏像鄭重的自我批評，簡直有點像兒戲。例如，把自己的同志當“特務”整，刑訊逼供，還整死了一些人，怎麼能和洗澡多放了點灰錳氧相提並論！這不但對受害者交代不過去，而且注定類似錯誤以後必然會不斷重犯。事實也確實如此。搶救運動過後不久的解放戰

爭期間，就有使許多幹部挨整和受委屈的所謂“三查”和“搬石頭”等運動。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每次整錯的不是全部也是多數。而“文革”中純係無中生有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就冤枉了幾千萬人，迫害致死者自然不少，但也是不了了之。搶救運動，如果沒有最後找出來個康生負責，大概也會像抓“五一六”一樣，逐漸從歷史書上消失掉。因此，以後的黨史著作，恐怕不宜再強調和渲染什麼“主動承擔責任”和“賠禮道歉”，更不要提倡這種不承認錯誤的“自我批評”如何偉大，而應適當揭示搶救運動的內幕和着重應汲取的教訓。

註釋

1 反“AB團”可分兩個階段。頭一段為1930年至1931年初四中全會後，由毛澤東主持。第二段1931年4月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江西蘇區，此後即由中央代表團領導，毛澤東配合。

2 見《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1頁。

3 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0頁中寫道，“對審幹工作中擴大化的錯誤……”。其實審幹是每個幹部都應審查，並且經常進行的，因而談不上什麼擴大化。

4 轉引自賀晉：《對延安搶救運動的初步探討》，《黨史研究》1980年第6期。

5 吳學昭（蔣南翔夫人）：《韋君宜在“群花”中遠行》，《炎黃春秋》2002年第4期。

6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02-203頁。

7 此書在以前的筆記中曾多次引用，在此不再詳述。

8 仲侃：《康生評傳》，第210頁；《陳毅年譜》，第1184頁；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566頁；紀希晨：《二月逆流始末記》，載《歷史在這裏沉思》(2) 反覆研究、商1986年。

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48頁。

1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53頁。

11 蕭島泉：《楊獻珍的自責與反思》，《百年潮》2002年第9期。

12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 249 頁。

13 蔣南翔：《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1945 年 3 月），《中共黨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14 《溫濟澤自述》，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0-161 頁。

15 見韋君宜著《思痛錄》，十月文藝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20 頁。

16 《黨的文獻》，1992 年第 2 期。

17 《延安整風實錄》，第 363 頁。

18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 836，890 李維

19 《王實味傳》，第 264 頁。

20 見《毛澤東傳 1893—1949》（下），第 639，654，666 頁。

21 李劍主編：《關鍵會議親歷實錄》（上冊）《前言》，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22 見《遵義會議文獻》，第 93-102 頁。

23 《文獻與研究》，1984 年第 9 期。

24 《黨的文獻》，1990 年第 3 期。

25 《中共黨史資料》，第 37 輯。

26 李鐵映在《喬木文叢》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光明日報》2002 年 5 月 22 《張

27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317 頁。

28 李維漢：《回憶陝北公學》，《中共黨史資料》第 15 輯（1985 年）。

2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 486 頁。

30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53 頁。

31 轉引自黃昌勇：《王實味傳》，第 237 頁。

32 參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 13 輯（1989 年）；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59-162 頁。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 588-591 頁；以及《毛澤東年譜 1893—1949》、《毛澤東傳 1893—1949》、《毛澤東外交文選》等。

33 1942 年 11 月 17 日《解放日報》載《給黨報的記者和通訊員》。

34 陸定一：《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1943 年 9 月 1 日《解放日報》。

35 《楊尚昆回憶錄》，第 216 頁。

36 1998年以來曾和延安整風時任中央辦公廳行政處學委會副主任的劉

英談到幾次（如1999年1月18日，21日，28日），一些談話有錄音或記錄，並有別的同志參加。最近還同當時在中央政治研究院和中央宣傳部工作的曾彥修幾次談及此事。2002年8月6日曾又特別來電話提到，《楊尚昆回憶錄》關於搶救柯慶施的描寫是不合乎實際的，他從頭到尾參加會議，至今記憶猶新。

37 以下情況，除曾經與會的劉英、曾彥修等所談外，還可參閱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1996年6月）。

38 《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但內收文章多在《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寫作之前。

39 《劉少奇傳》（上），第495頁。

40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46頁。

41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45頁；《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2頁。

42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59頁。

43 《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16頁。

44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56頁。

45 《任弼時年譜》，第442頁。

46 以上分別見《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237，258，270頁。

47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183頁。

48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60頁。

49 《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8-10頁。

50 見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載《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

51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462頁；《徐向前傳》，第399頁。

52 《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5頁。

53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43-244頁。

54 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原載《中共　史資料》第58輯，後又收入《親歷重大歷史事件實錄》，第三卷。

55 《領袖毛澤東——師哲回憶：峰與谷》，第5頁。

56 1955年8月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57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166 頁。

58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1942 年 6 月 8 日)；《解放日報》1942 年 6 月 5 日社論《延安一個月學習運動的總結》，其中就叫“整頓三風運動”。

59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中卷，第 388 頁。

60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中卷，第 433 頁。

61 還可參閱毛澤東給康生的信(1943年7月1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 448 頁。

62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 74-78 頁。

63 中央總學委《關於進行一次國民黨的本質及正確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教育問題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 85 頁。

64 《中央書記處關於審幹反奸工作給晉察冀分局的指示》。

65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中卷，第 413 頁。

66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頁中卷，第 413 頁。

67 《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 155 頁。

68 《毛澤東年譜 1893-1949》中卷，第 553 頁。

69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毛澤東 616 頁。

70 《黨的文獻》，1992 年第 2 期，第 19 頁。

71 《中共黨史資料》，第 37 輯。

72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 151 頁。

73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78 頁。

74 見《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52-53頁；《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 82-84 月。

75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0 頁。

76 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 461 頁。

77 轉引自賀晉：《對延安搶救運動的初步探討》，《黨史研究》1980 年第 6 期。

78 《毛澤東年譜1893年1949》中卷，第487頁。《劉少奇年譜》上卷，第 435 頁。

79 中央書記處關於《關於發動華中反特運動指示》給華中局的電報

（1943年11月15日）。

80 《百年潮》，2002年第9期。

81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96-497頁。

82 《彭真年譜》上卷，第216頁。

8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75頁。

84 如上引王素園、賀晉等人的文章。

85 江英："姓名惹的禍"，《眾說紛紛話延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4頁。

86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第333頁。

87 劉白羽：《平地風雷——我經歷的整風搶救運動》，頁心靈的歷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5月版。

88 夏宏根作，載《毛澤東1986年第3期，"黨史通訊"同年第9頁。發。

89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8頁。

90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232頁，《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8頁。

91 《中共中央關於整風的一組文件》，《文獻與研究》，1984年第9期。

92 《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28-33頁。

93 劉少奇：《關於審幹中幾個問題的意見》（1943年7月）頁《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29頁。

94 《林楓同志在分局高幹會關於整風審幹的結論》（1944年7月7日）。

95 梅劍主編：《延安秘事》（第十三章伍修權'搶救運動'寫真》）（下冊），紅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545，540頁。

96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0-281頁。

97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81頁。

98 楊絳：《幹校六記》，三聯書店1981年版，第1-2頁。

99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第213年。

（2002年10月1日完稿）

第十一篇

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之二

——關於搶救運動的發起和領導問題

一，關於搶救運動的發起

（一）問題的提起

在整風中進行審幹（即歷時兩三年的搶救運動），是由毛主席、黨中央發動領導進行的。這本來不成問題，歷史也確實如此。在整風搶救期間，無論是大會號召還是小會勸說，都是用的黨中央、毛主席的名義，說是黨中央、毛主席號召你們這些失足者坦白，誠心挽救你們等等。例如最近看到一篇紀念楊獻珍的文章，[1] 其中就提到任仲夷回憶1944年在北方局黨校被搶救的情況。任說，“我相信黨。”楊就說，“黨認為你有問題。”任說，“我相信毛主席。”楊就說，“毛主席認為你有問題。”其實在整風搶救中，這是一種普遍現象。而且可以斷言，沒有任何人能夠提供任何材料，可以證明當時某個人（無論是高級領導還是“文革”後寫這方面《回憶錄》的人）曾公開或私下把毛澤東和搶救運動分開過。是什麼時候才開始設法分開的呢？是在“文革”後經過撥亂反正和把康生揭發出來以後。因為這時需要也可能對延安整風中搶救運動的歷史做點修改了。

說需要，是由於在撥亂反正中，搶救運動的真像被暴露出了一部分。即使在這一部分中，也有兩大問題對維護毛澤東作為偉大領袖的歷史地位和最終使黨成為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的延安整風極為不利。一是那場大規模的持久的搶救運動竟然沒有抓到幾個特務，這連參加搶救別人或被搶救的人也多少有點出乎意外。因為搶救運動是公開進行的，誰被搶救過，大家一般都知道，何況有些人在坦白大會上還亮了相。但後來的甄別卻是秘密進行的，即使作了平反也是個別

通知，並未在原來搶救的範圍宣佈。所以人們互相並不知道誰搶救對了和誰搶救錯了，即使知道，也是自己猜出來或因關係好對方私下告訴的。直到離開延安，慢說外單位，就是本單位，到底在運動中抓到多少特務，是哪些人，除了“親自動手”的首長，恐怕誰也沒有底。例如我們外語學校，直到1986年看到北京外國語學院編的一本1941—1985年《校史》，大家才知道在只有180名學生的學校裏被搶救的師生竟有75人，最後甄別結果，一個“失足者”也沒有。[2] 而且有些人的甄別結論是很晚，包括離開延安後、建國後和“文革”後才做出的。加之甄別結論不像打成“特務”時那樣張揚，當年聽到傳達或現身說法的人一般不會瞭解到當事人已摘掉帽子。例如我知道張克勤、吳奚如（著名的老黨員作家）等不是特務，就是在“文革”後。由於平反的晚，大約多數人也是四十年後才知道王實味不是國民黨探子的。二是在革命聖地延安和偉大的整風運動中竟會發生這樣草菅人命和踐踏人權的事情，真是匪夷所思。使人看到，搶救運動（就算叫審幹吧）中的殘酷無情，像薄一波、曾志等描述的延安中央黨校和任仲夷等回憶的北方局黨校的情況[3]（比這更嚴重的還有），較一直批判的所謂“王明路線”時期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不知要厲害多少倍。而這些，當時恐怕也是很少人知道的。所以在很長時間裏，人們基本上還是相信毛澤東的估計：搶救運動“成績是偉大的”，“性質根本上是正確的”，因為“拿件數來算還不能否定我們運動的性質”。[4] 現在經過撥亂反正，已經露出來一部分真像，人們看到搶救運動不僅談不上什麼成績（既未抓到特務，又沒很好總結和汲取教訓），只能說是對廣大幹部和革命群眾的一場災難。而且還在搶救運動期間就估計和斷定，陝甘寧邊區黨政軍中的國民黨特務有一萬人，“各根據地合併就有十萬大軍”，[5]“大後方的黨幾乎全部被國民黨破壞”。[6] 被搶救的人大部分是新參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但也有一批當時就擔任領導工作，特別是建國後升任為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委書記、國務院部長的，如柯慶施、陶鑄、劉瀾波、劉建章、武競天、任仲夷、周建南、李爾重、張維楨、雷任民、宋維錚、梁膺庸等，還有許多十幾歲天真無邪的中小學生和目不識丁的工人農民。無論從什麼角度看，這場運動都是實在荒唐，事後很難想像的。這樣的運動還能說成“性質根本上是正確的”？怎麼能同偉大領袖和光榮

正確的黨相聯繫？因此，對這段黨史必須作些修改。於是，名稱從搶救運動變成了審幹運動，時間從兩三年變成了十來天，特別是發起者和領導者從毛澤東變成了康生，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配套說法，等等。

說可能，是因為“文革”後提出了康生的問題，並作了永遠開除黨籍的處理。而他正是整風期間總學委副主任和社會部長，又是“文革”中大量製造冤假錯案的專家和“國人皆曰可殺”的小人。於是康生這個確也作惡多端的傢伙一下變成了個大籮筐，整風搶救中的什麼錯誤和罪惡都可往裏裝。正式的黨史論著、許多領導人的傳記和回憶錄，都把搶救運動的罪責推到了康生頭上，有些還強調，多虧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及時察覺和糾正等。康生被描寫得極其神通廣大，不但在延安和邊區到處點名抓特務，指示和派人到敵後根據地搞搶救，而且其他壞事或錯誤(如薄一波筆下的華北工作座談會對彭德懷的過火鬥爭)也總是有他的插手。想當年康生得寵時，哪一個敢把整風搶救中的錯誤和罪行同他掛鈎。但當康生被打倒後，說也怪，搶救運動就一下被說成完全是他搞的了（胡喬木說的“康生這些人”，不知還有誰）。而且“曾參殺人”，“三人成虎”，宣傳多了也似乎真的變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連被搶救和關押了一年多的李銳都說，“延安‘搶救運動’由康生發起並執行”，“幸有毛主席的九條方針”云。[7]可見輿論導向和意識形態管理的作用之大。這也就是為什麼黨史的研究和論述一直受到重視和一些問題得到及時定調或修正的原因。例如“文革”才過去不久，就確定一切罪責都歸之於林彪、“四人幫”。於是，上自國家主席劉少奇，下至一般幹部群眾，凡在“文革”中被整的，都說成是由於林彪、“四人幫”的迫害。而且連胡喬木也硬說，許多重大事情如劉少奇、陶鑄、彭德懷等人在什麼地方和受什麼虐待等，毛澤東並不知道。[8]但他們的家屬卻說，不僅中央主要領導人的“疏散”和安置是毛澤東親自定的，連他們的子女能否升學、能否探親，也必須經過毛澤東的批示。[9]更具體的證據是，1967年1月1日彭德懷就給毛澤東寫信，說他“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周恩來第二天就批道，“碰頭會上已宣讀，即送主席、林彪同志、江青同志傳閱，擬退彭德懷專案組存。”[10]諸如此類的證據，真是不勝枚舉。為毛澤東開脫的專家學者，不可能不知道，更不用說胡喬木了。如果真不知道，那也不應假裝知道而說些不符合事實卻又以權威自居的話。

看來這大概是我們的黨史編纂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既從蘇聯學來，更繼承中國封建傳統），即一方面，竭力維護黨和領袖以及其他領導人的威信，實行“為尊者諱”，把他們說成一貫正確，對一些無法推卸的錯誤則儘量採取淡化、含糊或《紅樓夢》裏“真事隱”的辦法不提名道姓（至今傳媒仍如此，凡正面報道均提名道姓；凡負面報道，除被打倒者外，不但一般不提人名，連地方、機關也以“某”代）。另一方面，被打倒者往往成了錯誤和罪行的大籮筐，盡可能地把壞事往他頭上推。有的人以前被捧上了天，後來又一下變得一無是處。這當然不能叫做實事求是，但卻是延安整風以來存在的普遍現象，且有日益發展的趨勢，所以有必要以搶救運動為例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有的黨史專家在談到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問題時提出，“誰應負責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更好的汲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11] 其實正是由於對搶救運動不追究責任，大搞逼供信以至有人命案的領導者和積極分子普遍得到保護和重用，被搶救錯者得不到揚眉吐氣，許多人長期背黑鍋。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也不可能進行總結，當然無法汲取教訓，更嚴重的是使類似錯誤不斷重犯。也許是由於認識上的這種“差之毫厘”，才得出了“怎樣對待‘反對者’？毛澤東為後世做出了表率”（還特別提到蔣南翔對搶救提了意見反而得到重用這一與事實正好相反的例子）[12] 的結論。通過對延安整風的研究，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反對者”幾被消滅殆盡之後，還會得出這種結論，就使人在吃驚之餘頓生“失之千里”之感。如果我們還要認定，搶救運動由康生發起和執行，為毛澤東察覺並糾正，現在大概會和幾十年來一樣，仍然不能“更好地汲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所以研究搶救運動，弄清運動的發起和領導，還是十分必要的。

（二）搶救運動是由誰和怎樣發起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對搶救運動允許稍作討論後，就由領導定調，多數人緊跟，很快形成了一種佔主導地位的意見，即上面提到的：運動為康生發起和執行，幸虧毛主席及早發現並制止，沒有造成什麼嚴重後果，所以只是延安整風中一個小的曲折。不但各種記述和討論延安整風搶救的正式黨史及有關的文章書籍，而且許多領導人和積極分子的回憶錄，大都是按此路子寫作和整理的。特別應該一提的

是，對搶救運動非常瞭解、且親自參加過搶救別人，又是中共黨史學的開拓者和領導者的胡喬木，就在一次談話中說，“比方像搶救運動，確實是康生這些人搞起來的，並非出於毛主席的發動。”毛主席只是“在一段時間裏相信了康生，支持了他，以後才糾正了這些錯誤。”[13] 這不但不合乎事實，而且有悖於邏輯。按照胡喬木所說，康生成了毛澤東的領導者了。因為稱得起運動的發起者，至少得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首先倡導，二是得到響應。對搶救運動，最先在中央的重要會議上提出“要發現壞人”、“要查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等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康生。康生即使有這些想法，他也只能向毛匯報，由毛出面號召。而且涉及全黨和普及到所有根據地的搶救運動，康生本無資格號召；即便想號召，大約也不會有多少單位和地區響應。我就沒有聽到一個搶救者或被搶救者說過他是響應康生的號召。連“文革”都還沒有人說是林彪、“四人幫”等人所發動，難道搶救運動由於事隔久遠，知之者少，就可以任意修改了？

其實，正因為不顧事實，所以胡喬木這篇談話本身就破綻不少，自相矛盾。例如前面才說過，“這個搶救運動，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有一兩年，恐怕有兩三年時間。”[14] 緊接着，為了減輕毛澤東“左”傾錯誤的分量，又很快改口說，“不過，這些確實是很短暫的。”[15] 後來大概有些人覺得這種說法太不合情理，所以就作了一點調整，指出搶救運動是黨中央決定和部署的，但又要設法讓康生負主要責任，如說他謊報軍情欺騙中央，到處插手製造混亂，是搶救運動（肅反）的“主要領導人”等。[16]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雖然有關討論日趨沉寂，但是正式黨史著作和少數人的論述，已多以這種說法為基調了。這當然比以前那種眾口一詞卻不近情理的說法強一些，但由於只是在上述規定的框架（即淡化和簡化搶救運動、為尊者諱、加重壞人的罪責等）內進行微調，所以還是不能自圓其說。例如：在大講實事求是、大搞調查研究的整風運動中，中央其他領導人怎麼都會受康生一個人的欺騙；在中央的眼皮底下康生竟然可以隨意鬥這個整那個，包括柯慶施等不少高幹、各地選出的大批七大代表、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身邊的人、以及不少領導人的妻子；康生有那麼大的權把幾乎整個國統區的黨打成“紅旗黨”，把審幹權從中組部拿到社會部，把陳雲擠出中組部；列為康生製造的一些重大假案，多是只有

結論，不講根據，又怎麼能證明是康生製造的；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還可列舉很多，都是從來沒見過有人能解釋清楚的。原因就是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上述框框的限制。

如果真正講實事求是，那麼在大量的史實面前就只能得出結論：搶救運動是毛澤東發起並在他親自關注和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作為整風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也是中央的決定和部署。康生既不是搶救運動的發起者，也不是它的主要領導者，而只是善於揣摩領袖意圖，並據此上竄下跳，推波助瀾，把錯誤引到極致的一個小人。所以康生雖然早在1939年2月已擔任了中央社會部部長，下半年中央就接連作出了兩個有關審幹和鋤奸的決定，即8月25日《關於鞏固黨的決定》和10月10日《關於反奸細鬥爭決議》，[17] 卻也並沒有見到他曾借此興風作浪，發起什麼運動。至於這時期的“肅托”和康生在其中的作用，至今仍是糊塗帳，各種黨史也從不提起。就是在1940年8月全面審查幹部工作開展後，如前所述，社會部1941年關於清理嫌疑分子的兩份文件也還比較穩妥與溫和。直到1941年9月政治局宣佈成立以康生為主任的中央黨與非黨幹部審查委員會以後，也沒看到揭露出他有什麼重大劣跡。看來，康生真正放開手腳做壞事，主要還是在1942年開始的普遍整風後。因為他已完全揣摩到整風中要大搞肅反，在這方面對他會有更多依賴，他也正可大顯身手。如果將整風中毛澤東和康生關於肅反的言論加以排列比較，就可以看出康生基本上是緊跟和充當打手的角色，並不是什麼發起者和主要領導者。

這並不是說毛澤東一開始整風就要發動搶救運動。但正如人們所傳康生的話：“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18]（延安整風中說的審幹，從頭到尾都是指的肅反，第二句話實為同義反覆），事情也真是這樣發展的。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目的，就是他一再說的“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並以高級幹部為重點，因為他們在這方面起着決定性作用。整風中的反對主觀主義，實質上就是要把全黨首先是高中級幹部的思想認識統一到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上來；反對宗派主義，就是要實行高度集中和絕對服從；反對黨八股，則是要打擊那些身份高或知名度大的知識分子(即被稱為教條主義者)的“威風”，全面推行可稱為“延安文風”的一種文風。

在1941年“九月會議”上層整風已取得決定性勝利，中央領導對

整風認識基本達成一致（對沒參加“九月會議”的兩位重要領導人周恩來和彭德懷，由毛澤東親自不斷通報情況和做工作）的條件下，1942年開始了普遍整風。其主要目的是把知識分子幹部改造成黨的“馴服工具”。但同時還有兩個作用。一是發動群眾批判領導上的三風不正，使“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的人們受到上下夾攻，處於孤立，同時也燒一燒各級領導中的官僚和軍閥作風。所以一開始就提出學習文件和檢查工作相結合，意在使矛頭向上。二是通過運動暴露錯誤思想和階級敵人，以便批判和清查，就是後來所謂的“釣魚”或“引蛇出洞”。為此，頭幾個月都是強調“放”，提倡不同意見的爭論，不准歧視和壓制。[19] 這在中央決定、內部通知和一些電函中說得更清楚。[20] 其實不用到1943年，1942年普遍整風一開始，知識分子們的“錯誤思想”已以《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等為標誌紛紛暴露了。在整風肅反的最高領導分清兩文作者的錯誤性質後，就開始了全延安對王實味及其所代表思想的批判和聲討，普遍整風也就逐步轉入肅反。

而在這之前的4月上旬，政治局會議聽取康生關於國民黨對延安動態反應的匯報，提到《輕騎隊》時，與會者就已反應強烈，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歷數延安“特務分子”的種種罪行。聽了匯報和發言後，4月17日毛澤東說，“在檢查工作與審查幹部中發現反革命分子，應加以清除，以鞏固組織。這次高級組學習計劃的改變，由研究歷史到注意十八個文件的學習，到現在審查幹部，是很有益處，很有必要的。”[21] 這是最早佈置審幹肅反，也是緊接着毛澤東看了《野百合花》拍案而起之後。可見五至七月的王實味事件，只是從整風轉入肅反的導火線和使審幹肅反走向半公開化而已。所以王實味被揪出後，延安的普遍整風已不大再提反對三風不正，重點隨即迅速轉移到思想上批判自由主義、平均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組織上追查內奸分子（辦法除內查外調、會上會下交代歷史和社會關係外，還反覆填“小廣播調查表”，以發現破壞分子），而且越往後越向肅反傾斜，終於進入全面的搶救運動。

由此可見，發起搶救運動既有其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沒有那樣的暴露，不發生王實味事件呢）；既是原有的計劃（出於領導人的肅反情結而非一些人所說出於客觀形勢的需要），又是發動群眾造成的結果（每次群眾被運動起來後總是越來越“左”）。這些，

在建國後都是屢試不爽，得到再三證明了的。例如所謂的“胡風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就立即認定暗藏的反革命還很多，於是1955年7月1日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定陸定一“掛帥”，在全國發動了一個有四百多萬人參加的肅反運動。“運動開展以後，鬥爭對象超過了5%的比例。陸定一覺得不對頭，於是向毛澤東請示，不能再發展了。毛澤東表示同意，並稱贊他說：‘你有大將風度，能進能止。’”[22] 至於稍後的反右派鬥爭以及其他大的運動，就更不用說了。對照這些，對普遍整風轉入搶救運動也就不難理解了。

作為轉折點的王實味事件，近二十多年已有大批文章書籍介紹和討論，而且幾近一致地認為這是康生製造的。[23] 但仔細考究起來，似乎康生還沒有這個資格。他可極盡煽風點火、添油加醋之能事，但整個指揮權還輪不到他。先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的權威論述。毛主席“在整頓學風階段（大約指1942年5月到10月）主要抓了兩件事：一是……多次主持文藝座談會；二是從5月27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對王實味同志錯誤思想的揭發轉變為對其政治歷史問題的審查。這在當時是轟動全延安城的一件大事，對後來整風運動發展為審幹（引按，即搶救）運動有直接影響。毛主席非常關注事態的發展。”[24]

其次，從批判的陣容和安排看，只有毛澤東有權作此部署，如派曾長期任中央重要領導、對鋤奸既有經驗又不手軟的李維漢前去主持（掛帥）；派李富春、楊尚昆等領導人和毛的秘書陳伯達、胡喬木、張如心等參加批判；審改並送《解放日報》發表李維漢給王實味定性的總結報告和范文瀾、周揚、艾青等人的批判文章等。這些難道是康生能辦得到的？

第三，毛澤東的直接過問還表現在不但隨時有單獨批示，而且幾乎每次都有會前研究和會後總結。例如4月6日在毛澤東主持的高級學習組會議上，李維漢匯報了中央研究院的整風情況；第二天（4月7日）中宣部就專門約集中研院領導和積極分子開會，部長凱豐在總結發言中已直接批評到《野百合花》及其代表的偏向；6月3日晚，更在毛澤東住處開會研究對策，有人提出王實味發表長篇謬論怎麼辦，毛指示：“准許插言。”這些又難道是康生所能左右的？

第四，宋金壽兩次專訪中組部，瞭解到中組部保存有1942年10月開除王實味黨籍的決定，“是由凱豐簽署，毛澤東親批的，文字很少，只說王實味因托派反革命，開除黨籍”。

第五，說“王實味案”係康生製造，都是只有結論，不提根據。李維漢是最早提出復查的。他對幫助他整理回憶錄的宋金壽說，“王實味的問題是由我引發的，我有責任把它搞清楚。王實味被定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據是什麼，大家都不大清楚。這個責任要康生負。康生說過，王實味不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復興社（藍衣社）分子。”其實，說王實味是托派分子，到底是誰先說的，至今還是糊塗帳。看來還是李維漢先說的可能性大，在1942年6月11日他對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的座談會作總結時，就已給王實味定了性。他說，“根據座談會上揭發的許多事實，說明王實味是一個托洛茨基分子，他的言論不僅有政治的目的，也有組織的企圖。”直到1981年6月，宋金壽將整理好的李維漢回憶錄《中央研究院及其整風運動》的稿子送給李看，此時李已病重，在病榻上給宋寫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條是：“⑤王實味是托派，在報紙上發表過沒有？我覺得在寫批判王實味時，只提康生說他是托派就可以，不必扯開。”這種說法顯然有隱情，更沒說出王實味的托派和反革命是康生所定的根據。至於宋金壽所引證的康生談所謂“五人反黨集團”的原始記錄，其中雖然也提到王實味，但主要是講“五人集團”，而且講的時間已是1943年8月，帶有內部總結經驗的性質，並不能證明王實味的托派問題為康生先提。

第六，據我所看到的材料，主要是上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溫濟澤在他的回憶文章和書籍中把康生說成“王實味案”的直接製造者，所提具體根據就是他所記得的鬥爭王實味時李言對他的幾次談話。例如在《溫濟澤自述》中提到，李言告訴他，康生說王實味是托派，還是藍衣社特務。但與溫寫這類文章的同時，李言卻對訪問他的宋金壽說，當時是他到組織部去看了王實味的檔案才知道王交代的與托派來往情況。而且還特別聲明：“關於揭發王實味的托派言論，集中地反映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談會上。我所知道的也就是這些。有沒有別的材料，我們不知道。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也沒有告訴過我們。”眾多回憶材料中提到王實味與托派的關係，也都說是潘芳、雪葦等人在座談會上的揭發，並非李言或他找人給捅出來，溫濟澤的回憶錄和李言所

談也完全不同。從現有材料看，第一個指明王實味加入了托派組織的倒是陳伯達，也還不是康生或李言。[25] 由此可見，實際上，“王實味案”為康生製造之說，在黨史上只是一樁人云亦云（最初說的人可能是依照黨史傳統筆法）的事情，沒人能說清來龍去脈。而且溫濟澤的說法就矛盾百出。例如照他說來，“五人反黨集團”中的王里被康生說成是她的堂兄“王昆侖派到延安的藍衣社特務”。而且他的說法表明，不僅延安的所有領導人和黨中央有關機構都不知道王昆侖的政治面目，就連周恩來、董必武回到延安也只說王“思想進步，是我們的朋友”。一直“到建國以後，人們才進一步知道王昆侖從1933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秘密黨員。”[26] 全黨沒有一個人知道本黨有這麼一個黨員，這可能嗎？又如說，李維漢1942年9月，“下放（原文如此）到陝甘寧邊區政府任秘書長。四十多年之後，李維漢有一次和我談話，才告訴我，這是當時康生向中央提出的打擊他的建議。”[27] 但是胡喬木卻說，“李維漢去當秘書長，這是毛主席下的很重要的決心，”“是很重要的一着棋，這在陝甘寧邊區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別是在協調林老、謝老和高崗之間的關係上。”[28] 稍微瞭解那段歷史情況的人恐怕只能相信胡喬木而不會去相信溫濟澤。

最後，也並非不重要的是，從現有文獻看（我能看到的），在中央領導層把王實味說成是托派加特務的，首先還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而且用“國民黨探子”、“蹲班房”這類詞匯的也只能是毛，而不像康生或其他人）。他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5月23日）中說，“當然還有一種比這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隨後又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掛着‘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29] 其中指的大概就有王實味。事實上在內部很快就挑明了。他在6月1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的整風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托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托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30] 而且他估計，“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還提出，“對過去參加過派別活動的老的壞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對於意識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31]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在王實味事件後，毛澤東已從思想認識到具

體部署上準備進行全面肅反了，只是還沒公開號召，先在內部進行。緊接着就是中央黨校查出“吳奚如特務案”和中研院與中央政研室的“五人反黨集團案”。但其他機關學校卻沒有什麼大的動靜，更沒抓到多少暗藏的壞人。於是在10月開幕的西北局高幹會上，毛澤東講到整風問題時就批評了對敵特破壞缺乏警惕的自由主義。在後來的報告中，他更明確宣佈：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與非無產（半條心），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提出要重視反特鬥爭，要各單位抓第二、第三個吳奚如、王實味這一類人，也點了“五人反黨集團”的名。[32] 半個月後的12月6日，一方面中央總學委發出《關於肅清延安“小廣播”的通知》；[33] 一方面是康生在高幹會上作關於審幹肅反的動員和情況介紹的報告，並嚴厲批評對反革命的麻木不仁態度和自由主義傾向。1943年1月4日，彭真也在會上作了反奸肅反報告，結合中央黨校破獲“吳奚如特務案”，介紹如何與反革命鬥爭的實際經驗。高崗也趕快緊跟，使會議做出決定，要清洗黨員10%。[34] 也就在這個期間，康生和社會部領導在自家門內製造了“張克勤特務案”，做出了“示範”。所以西北局高幹會後，接着就是1943年的“四·三”決定和幾天後的動員大會，於是肅反運動(即後來所稱的搶救運動)就在延安遍地開花了。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研究延安整風的著作和一些真實回憶，都把搶救運動的上限定為1942年底甚至更前一些的原因。

談及“張克勤特務案”的論述實在不少，而且更眾口一詞認為是康生製造。其實，對此也需要稍作辨析。當然，這事出在社會部辦的西北公學（簡稱西公）裏，康生出任總後台是不成問題的。但把製造此案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康生卻有失公允，所以我在前面加上了社會部領導。因為在當時的氣氛下，難道只有康生要對上迎合、表現自己，而專事鋤奸工作的社會部其他領導同志就對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與部署置若罔聞而不積極響應？因此，“張案”應看作社會部集體創作，不能只往康生的“籮筐”裏裝。當時西北公學的正副校長李克農和李逸民都是我比較熟悉的老首長。正是這位李逸民，1941年還任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時，硬是把我這個馬列主義小教員調去學了俄文。我瞭解李逸民是位忠厚長者，因此也完全相信他在《參加延安“搶救運動”的片斷回憶》中有關搶救張克勤具體情節的敘述。這就是：1942年11月間，在李克農親自佈置和直接領導下，西公審幹領

導小組幾位成員李逸民、吳德、汪東興、王濤江、毛誠在汪東興辦公室提審張克勤。在張拒不“交代”的情況下，他們根據汪東興提供的在中央蘇區肅反鬥爭的經驗，分為兩組連續突擊審問，即使用車輪戰（可見車輪戰也非傳說中的康生發明）。經三天三夜連續作戰，張克勤終於招認，並根據康生和李克農的指示讓他在第二天的全校大會上作現身說法。[35] 另據說，後來張克勤曾翻案，氣的李克農用手抽他耳光，從此他再也不敢翻案了，而且還被安排在各地坦白大會上作典型報告。“張克勤案”對康生來說確有重大作用，既可向上交差並邀功，又可作為重要經驗向各地推廣，把本來就是不該發動的搶救運動搞得更亂。[36]

經過上述這一系列的發展演變，毛澤東遂決定以1943年為審幹年（有些敵後根據地則規定推後一年或半年）。這年春天，延安整風即“轉入以審查幹部、清理隊伍為主要內容的第二階段。”[37] 根據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的講話，中央發佈了主要內容為佈置肅反的第二個“四三決定”（《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4月9日和12日，在延安分別召開了中直、軍直和邊區系統各機關兩萬多人的幹部大會。任弼時代表中央書記處在會上作了《特務活動和中央對特務的方針》的報告，號召“誤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時警告說，寬大政策的反面就是無情的鎮壓，不願坦白的人是在走一種自己滅絕的死路。[38] 會上還由張克勤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報告。於是搶救運動就在整個延安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並且完全公開化了。到6月24日，中央發出《關於國民黨的特務政策和我黨反特鬥爭的指示》已指出，“延安各機關學校各級幹部一萬人中，在整風及全面清查幹部思想歷史的過程中，發現國民黨特務及日本特務將近一千人。”在幹部中抓到十分之一的“特務”還不滿足，7月11日，中央總學委又發出通知，要求加緊對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突破。[39] 可見，從4月份起，延安的搶救運動已經不再是風雨滿樓，而是山洪暴發了。那些堅持把搶救運動寫成開始於康生7月15日《搶救失足者》報告之後、而且只進行了十多天就被毛主席發覺和制止了的黨史研究者，（他們許多人看到的資料比我多得多，更不用說那些可以翻閱機密歷史檔案的人了），請設身處地和真正實事求是地想一下，這些說法能站得住嗎？

從以上的簡略敘述中，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

動完全是毛澤東既有計劃又隨着形勢發展而發展地發動起來的，並得到中央主要領導人（不是全部）的支持，以及大批骨幹和積極分子的響應和創造性地貫徹執行。康生無疑在搶救運動中做了許多壞事，但說是他“發起的”、“製造的”，甚至說成是違背毛主席的部署、是對毛主席指示的“陽奉陰違”等等，[40]卻都沒有大約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能站得住的根據，而且邏輯上也說不通。以康生的地位和權力，怎麼可能在延安那塊巴掌大的地方和毛澤東及其他中央領導人的眼皮底下，製造那麼一場捲進全體幹部和許多群眾、時間又長達兩三年的驚天動地的運動？但是這種說法的流行和佔主導地位，也說明封建傳統和個人迷信的影響之深廣和黨史編纂學上“為尊者諱”等原則執行的嚴格。

二，關於搶救運動的領導

（一）搶救運動始終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

這同樣也應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而且毛澤東歷來對他發動的運動都一抓到底，毫不放鬆，從開始部署（如規定指標、安排步驟和宣傳口徑等），不斷督促檢查，到最後結束，都管得非常具體、細緻。凡對建國後各種政治運動稍有瞭解的人，對此大概都不會有什麼懷疑。先不說抓潘漢年、反胡風及其他政治運動，就是對1951年開始的“三反”，他也管得具體、細緻。高崗在東北抓到個把“大老虎”（大貪污分子），趕快上報表功。但毛澤東回電卻潑了冷水，還下達了5%的指標。由於毛澤東提出“上海可能有上千隻老虎”，大約為了完成任務，地方上就想出了個“思想老虎”的名目，於是兩袖清風的顧准和黎玉、惲逸群等一批高幹隨即中箭落馬，其中就有毛澤東親批的黃逸峰（這些“思想老虎”，“文革”後均已平反）。[41]這還是在“邊抗（抗美援朝）、邊建（恢復和建設經濟）”、日理萬機的緊張時期。而整風期間的延安（1941年秋到1945年夏），則處境相對安靜、工作較為輕鬆，也不用直接指揮打仗（抗戰時期敵後根據地基本上是各自為戰），所以毛澤東主要就是抓整風審幹。他也不斷強調整風審幹的重要，並要求各級領導務必抓緊。不過根據他的總體安排（他也多次說過），1942年是整風學習年，1943年才是審幹肅反年。因此，1942年多強調整風，他在4月20日的講話中就“要求全體幹部把整風學習

當成一項中心工作”。[42]《解放日報》6月5日社論《延安一個月學習運動的總結》中也明確提到，“中央已經決定成立學習總委員會，由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來更細密的及時的領導整個延安的學習運動。”[43] 毛澤東也確實抓得很緊很細，不斷督促檢查。1943年2月10日還致電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等各地領導人，要求他們回答的問題之一就是：“各級負責同志是否以身作則，親身負責領導學習，有無放棄職責，將學習領導交給秘書或他人管理之事？”[44] 及至1943年第二個“四三決定”發佈、全面展開肅反後，毛澤東就已密切關注和指導着肅反運動的進展，不但整風審幹並提，且對兩者的評價提得同樣高。如1943年6月6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中就說，“如能在今年真正做好整風，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審查幹部（前面曾注明“主要是清查內奸”），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績，我黨百年大計即已奠定，請你緊緊抓住此關鍵”。[45] 只是從這一簡單敘述中，人們即可看到，對這樣大的“關鍵”問題，怎麼可能像許多人後來說的那樣讓康生去領導，甚至說毛澤東在總學委也只是“掛個名”，劉少奇更不大瞭解情況，所以“很多事實際上還是康生在主持這方面的工作”。這都實在把康生抬得太高了，當然不可能是事實。其實，康生不但無權領導全局，許多系統、地區和單位也是他管不了的，如任弼時、高崗領導的西北局和邊區系統，彭真（上面直接管的還是毛澤東）主管的被稱為延安整風審幹重點的中央黨校，更不用說一些敵後根據地了（以黨中央名義派舒同赴山東推廣延安搶救經驗的作法都沒行得通）。

其實，毛澤東本人倒是一直承認搶救運動是他發動和領導的，多次說，“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我。”他也從來沒有把罪責向康生身上推，而且相反，在重要關頭還為其辯護和開脫。例如針對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電函中的如下指責：“我對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慮。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把黨團結起來的黨內正確措施，被康生及其機構扭曲得面目全非，這樣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緒，引起普通黨員的無比憤怒，幫助敵人瓦解黨。”[46] 毛澤東在1944年1月2日的回電中答覆說，“康生是個值得信賴的人。他的部門並不負責審查幹部。他們只調查證據確鑿的特務。我們審查幹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隨後即和蘇共駐延安代表符拉基米洛夫進行了談話，當符提到一些黨的領導人對康生有看法時，毛澤東毫不客

氣地批評了這些人的說法。[47] 後來在七大會議上，康生發言主要講黨的農民政策等問題，對搶救運動不作檢討。一些代表對此寫條子質問，他卻回答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執行毛澤東路線。[48]

寫到這裏，實在有點想不通，那些把搶救運動的罪責完全加給康生的黨史專家，為什麼在這方面一定要和毛澤東唱反調？有什麼根據不相信毛澤東說的對搶救運動中的錯誤他負責，因為發號施令的是他，而偏要製造一些既違背歷史真實又自相矛盾的說法？這裏僅以比較權威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為例，細加揣摩，也許能看出一些問題。先是說，“延安審幹（按，即毛澤東注明的‘主要是清查內奸’，很快發展為坦白運動或曰搶救運動）從1942年冬季開展後，毛主席密切的注視着運動的發展，”（可見不是“掛名”）還很快成立了以劉少奇為主任（也不是“沒怎麼管”）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以“加強領導”。[49] 可是在敘述了毛澤東如何重視之後，筆頭一轉卻來了個“但是，審查幹部的實際工作卻沒有像毛主席設想的那樣順利發展。”又不說明原來的設想是什麼，只是把沒“順利發展”的責任推給了下面“負責審幹工作的同志”和“專門負責審幹”的康生。[50] 那毛主席和那個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幹什麼去了？須知延安並不大，人口只四萬，其中幹部和學生約佔一半，一切都在毛澤東、劉少奇的眼皮底下，他們對當時全黨這一中心任務又是情況明、決心大，怎麼能讓康生和其他“負責審幹工作的同志”（按“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的規定，應為所有領導幹部）長時間搞“特務如麻”，還在“不少單位”“採用‘逼、供、信’”？[51] 又是什麼原因才使“毛主席逐漸（引注，為什麼不是很快）發現了審幹工作的偏差，不斷地（引注，為什麼不立即）採取措施予以糾正”？[52] 而且如上所述，在“正式發佈毛主席提出的首長負責等九條方針”後，為什麼反倒使搶救運動更加猛烈？這樣的敘述和論斷，能講得通嗎？能使當年在延安和敵後根據地參加過搶救運動的人相信嗎？在此還應順便一提的是，最近看到新出版的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經過修訂的正式《1921—1949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有一段題為“整風過程中的審幹工作”。其中寫道，“(194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反特務鬥爭問題，認為‘搶救運動’應予否定。”[53]

這一論斷大約仍然是為淡化搶救的錯誤而想出來的。因為第一，

文中未提哪怕一句當時紀錄上的根據；第二，事實是這次會議後許多地方搶救運動搞得更厲害了，包括毛澤東直接領導、彭真經常匯報的中央黨校（如薄一波、曾志等的揭發）；特別是一些敵後根據地；第三，這一說法同其他正式黨史著作如《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等以及《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的介紹也大不相同。胡書上說，“對於搶救運動以來的反特鬥爭，會議認為應從兩方面分析”，而且首先指出五條成績，可見並沒有“認為‘搶救運動’應予否定”；[54] 第四，如果1943年底搶救運動即已否定，那在黨史上也不會長期成為禁區，中央對搶救運動唯一的一次評價（1955年8月《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也不致說，“延安的審幹運動，中央定出了九條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只是中間一段即第二階段的‘搶救運動’是有偏向的。”只有“偏向”，當然不等於“否定”，兩者精神有本質的區別。僅就以上所述，也可看出，官方的黨史編纂學仍然繼續堅持因政治需要而定的框框第一，歷史真實倒在其次。

實際上，由於1942年底以後，整風中的審幹已是中央所抓的頭等大事，所以毛澤東、劉少奇和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其他成員，對搶救運動的進展以至許多具體的人和事，都是一清二楚的，並不是“逐漸發現”“偏差”和“不斷採取措施予以糾正”。即以毛澤東而言，延安搶救運動的發起、領導、進度、作法、存在問題、抓到“特務”人數、以及一些具體案件，他每天聽匯報、看材料，基本上可說瞭如指掌。例如，任何人不可能提供任何證據，說明毛澤東對以下列舉的人和事及有關情況竟然不瞭解，或者是後來才“逐漸發現”的。以人頭論，從王實味、吳奚如、“五人反黨集團”、張克勤到那些被搶救的著名人士，包括在邊區政府工作的張曙時（原國民黨左派，南昌起義時任革委會委員，1933年入黨，1943年5月李維漢親自主持搶救[55]），吳伯簫（著名作家）、黃亞東（邊區銀行行長）；中直的柯慶施（統戰部副部長、參加整風高級組學習）、武競天（中組部秘書長）；地方黨的四川工委書記鄒鳳平，甘肅省委書記孫作賓，河南省委兩任書記王志杰和張維楨、組織部長危拱之、宣傳部長郭曉棠；毛澤東自己身邊的葉子龍妻子蔣家英（送黨校搶救）、公務員羅海章、苟興錄（抓到西北公學搶救）、秘書處工作的七大代表密家凡（被社會部抓走），以及積極搶救別人的胡喬木（他曾晚上提着馬燈向行政處學委負責人

劉英建議對凱豐妻子和鄧潔妻子使用車輪戰，說這樣可使其在疲倦頭暈時講出實話）[56]；投奔延安的二戰區少將參議錢來蘇（其子彭爾寧、還有女兒、女婿均被搶救。錢被軟禁在交際處，常發脾氣以至絕食，處長金城多次報告均無下文，直到1944年2月8日才得到毛澤東模棱兩可的批示："金城同志：錢拯（按，即錢來蘇）應優待他，他可能不是漢奸，他的子婿是否特務也還是疑問，如不是，應平反的。"[57]）；在搶救中被迫自殺的鄒鳳平、柯慶施妻曾憲蘭、原凱豐妻（逼瘋後死的）等等。

至於各方面的實際情況，如延安從1943年4月起開各種坦白大會、聲討大會、搶救大會，任弼時、康生等代表中央講話或作報告；1944年初，主要由綏德師範和米脂中學的學生組成的"坦白運動先進典型代表團"到延安一些機關學校作報告（我就參加了一次在中央大禮堂的報告，小孩們上台後先向台上坐的一排中央首長鞠個躬）；1943年延安和邊區機關學校以主要力量搞搶救；幾乎整個大後方的黨（十多個省，如四川、河南、甘肅等）被打成"紅旗黨"，等等。所有這些，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當時肯定都是知道的，而且這一時期《解放日報》有大量報道和文章，總不能說他們不看報吧。因此，在搶救運動問題上，後來經過多方製造並終於形成的這種"由康生發起和執行，幸虧毛澤東發現和糾正"的說法，竟然可以長期流傳，得到人們相信，甚至包括某些過來人。這一似怪不怪的事，既說明思想改造和控制意識形態的作用之大，也說明個人崇拜流毒之深和廣。

毛澤東指揮和領導整風搶救，交替使用的機構主要是三個：政治局、書記處、總學委。整風開始，主要還是利用原有的書記處和政治局。因為自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已基本上可以控制這兩個機構，他的意圖也基本上能夠得到貫徹。但由於沒有經過改造，還由原有人員組成，並依原有機制運行，因此就不會十分得心應手。例如1940年底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就因在政治局討論時遇有不同意見而不得不做出妥協。書記處的組成則更不理想，被劃歸"教條宗派"的人就佔了一半，擔負重要領導工作的如劉少奇、任弼時等人卻仍被排除在外，這當然不妥當。於是1941年8月27日政治局會議決定，七大前不改組書記處（但後來還是改組了），只是為增強中央工作效能，組成書記處工作會議，由住在楊家嶺的政治局委員

參加。實際上，不住在楊家嶺，也不是政治局委員甚至不是中央委員的重要部門負責人，如主持中央黨校的彭真，就一直列席政治局會議和書記處工作會議。但這還不能適應整風時期的領導體制。為使毛澤東的領導和指揮更加靈活自如，1942年5月21日政治局又決定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負總責，康生副之，委員：陳雲、高崗、彭真、李富春，並自成系統，直接管下屬各級的分學委。[58] 由於整風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毛澤東1942年3月16日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風學習，是整風學習年。”[59] 實際上1943年的整風搶救還更緊張），學委會又由各級領導掛帥（“首長負責”），所以整風中總學委所起作用，在一個時期就相當於“文革”時期的“文革小組”，幾乎可以號令一切。但在當時，人們還保留有某些傳統觀念，總覺得學委只是管學習的，涉及其他工作（而整風又必然衝擊其他工作）就有點名不正了。所以6月2日成立了總學委，6月22日書記處會議就決定今後書記處和總學委會議合併進行。這樣就可根據問題的性質以不同的名義作決定發通知，也可使彭真、高崗、李富春等正式參加進來。

後來，隨着整風的深入和各方面條件的成熟，已經可以和需要改組中央機構和正式在組織上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了。於是，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會議，遂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新的書記處，推選毛為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並根據劉少奇所提可以不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和少數服從多數的紀律，規定書記處“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60]。這就使黨內從此也實行起了一把手拍板的領導體制。雖然《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中對此解釋說（其他一切正式黨史著作如《毛澤東傳》等都如此說），“這裏所說的‘最後決定之權’，是書記處處理日常工作的決定之權。政治局決定大政方針。”這一辯解是與實際不符的。事實上後來的許多重大政治問題還是由書記處決定，有時向政治局報告求其批准通過，但也是形式，因為從未聽說過有政治局否決書記處建議的事。成立不久，書記處即提出對幾個黨內問題和歷史問題的看法，包括王明、博古屬黨內問題，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合法的，六大方針正確等，這些恐怕就不能算“日常工作問題”。至於以書記處名義對地區或全黨所發指示、通報等，如中央局的組成、關於戰爭和工作的安排等，有些也不屬日

常工作範圍。特別重要的是，“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運用到整風搶救上就更得心應手了。這從毛澤東發給各地領導的電文中即可看得很清楚，指示有些地方如延安，開始甄別；有些地方如晉冀魯豫等根據地，開始進入坦白運動等。這說明，書記處改組後，毛澤東對上層整風（主要是1943年的“九月會議”）和整個搶救運動的領導指揮可以更具體更靈活。但一切都以書記處名義號令又太過正式、不好變通，所以不久後的4月24日又恢復了一度停止運作的總學委（10月5日改組後仍由毛任主任，加劉少奇為副主任，排在康生前面，胡喬木為秘書）。此外，就是4月28日成立的以劉少奇為主任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協助毛澤東，具體抓肅反即搶救運動。作為整風審幹（肅反）重點的中央黨校，毛澤東早已於1942年2月親任校長，主持常務的副校長彭真既列席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又經常向他請示匯報，使他對黨校情況知之甚詳。至於全面搶救，毛澤東和劉少奇、康生也有密切聯繫。特別是康生，由於同住棗園，所以接觸更多。據說，毛澤東每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聽取康生對搶救運動的匯報。[61]

所有這些都說明，主管搶救運動的一切機構和負責人，都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之下，聽從他的指揮。而毛澤東又是一個自稱“從來不讓權的”、對主持各種政治運動極其認真和非常仔細的人。何況，那時他又年富力強、精力旺盛，怎會把關乎百年大計的整風審幹的領導權交給別人，自己只“掛個名”？

（二）劉少奇參與搶救運動的領導

劉少奇1942年底回到延安前，既未出席1941年中央整風的“九月會議”，也沒參與1942年普遍整風的領導，而且看來他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意圖和部署還不一定十分瞭解。例如他領導的華中局和新四軍，對整風就沒有像毛澤東抓得那麼緊。毛曾說，“1942年基本上是停止工作搞整風學習，是整風學習年”；可劉在回延安途中奉命指導各地工作卻很少強調甚至沒怎麼提整風問題。對書本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提法兩人也不盡相同。毛在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貶低書本知識和知識分子；劉在稍後的7月13日《答宋亮同志》中卻提倡埋頭讀書，說“黨員在黨校中學習，……應當埋頭讀書，埋頭從事理論的研究。”[62] 但是兩人在整風的基本目標上還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需要互相支持。他們在政治路線上一直比較接近，都曾受過“左”傾中央的壓制，都反對所謂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兩大宗派”，主張徹底改造中央。毛澤東雖在六中全會後已實際上成為黨的領袖，但基礎還不十分鞏固，還需要像劉少奇這樣的幫手並借重他在華北和華中以及原來白區的力量。劉少奇雖在瓦窑堡會議後因張聞天的推薦而得到重用，在華北和華中工作中很有建樹，又團結和培育了一大批幹部，但無論是為了推進革命還是黨內鬥爭，都還需要依靠毛澤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整風開始後，毛澤東即請劉少奇回延安參加中央領導，並對其一路安全關懷備至。劉少奇也適應形勢需要，回延安後很快就提出從組織上正式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任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毛澤東則在改組書記處中使劉少奇從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躍而升為黨內第二把手，成為他領導全黨全軍(當時主要則是整風審幹和召開七大)的第一得力助手。從此也就建立起了延續二十年的毛劉領導體制。

劉少奇回到延安，普遍整風開始進入審幹（肅反）階段。他經過兩三個月的觀察和瞭解後，就積極參加了對審幹和搶救運動的領導。1943年3月16日和20日的政治局會議，除討論和通過《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和精簡的決定》外，還聽取和討論了康生關於反特工作的匯報，並決定向全黨發出開展反特鬥爭的指示（也許就是那份沒有載明時間和發文機關的《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63]）。不久，中央又發佈了以開展肅反為主的第二個“四·三決定”，全面開展審幹反特鬥爭，很快就發展成為搶救運動。在這次機構調整中，劉少奇除參加三人組成的書記處和增補為軍委副主席之一外，還和毛澤東兩人分別主管一個方面的工作，任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領導中組部、統戰部、民委、中央研究局、海外工委等部門。為了加強對肅反運動的領導，4月28日政治局又決定成立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以劉少奇為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為委員。[64] 這就使劉少奇成了延安及各地肅反、搶救運動的最高負責人(實際上為第二把手，因為上邊還有抓得很緊的毛澤東），康生還在他的領導之下。而在1943年“九月會議”前，中央層整風也無大動作，延安和邊區各地在集中力量搞反奸搶救(學校停課，機關大部工作暫停，地方政府連農忙時也只留很少幾個人值班)，劉少奇當然也主要抓這方面的工作。但他作

風穩健，不大出頭露面，很少參加坦白大會，更不作鼓動性的報告，所以對他的領導作用，瞭解的人實在不多。例如他在七月所作《關於審幹中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像我這樣的一般幹部，當時和事後長時期都不知道。

看來，劉少奇當時領導審幹反奸工作大概着重在兩方面。一是研究和制定政策。他確也一貫重視實際工作中的理論和政策研究。在進入書記處後的3月20日，他即向華中局陳毅、饒漱石發出《關於警惕國民黨特務政策問題》的電報，要求仿效延安作法，立即開展審幹，其中提到，“今天國民黨向我們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特務鬥爭。”[65] 6月29日給陳、饒的電報中除此以外，還說，“大後方的黨幾乎全部被國民黨破壞”。“我們要把反特務鬥爭看成和軍事政治經濟鬥爭一樣的重要”。並提出一些具體方法，如注意審查“韓（德勤）武裝經過和駐扎過之處”的幹部，“尤其被韓捕後釋放之黨員”；對被俘之國民黨軍官要“用說服利誘與威逼等辦法令其自首”，但要選好對象，“選擇那些在他不肯自首為我做事時，我能長期拘押或秘密槍決的人威逼之”等。[66] 七月所作報告還從理論上說明，“審查幹部與清查內奸的運動，是整風運動的繼續發展及整風精神在實際工作中的具體運用。”並從方針政策上提出，“審幹運動的全部任務是：‘清查內奸，爭取失足者，訓練幹部。’”[67] 二是抓有關幹部的調動和組織安排。從1943年3月，連任六年多中組部長的陳雲被批准離職養病，從此組織部的重要向題即請示劉少奇決定。一年後彭真正式接陳雲任中組部代部長，就是在劉少奇住處並當着劉的面進行移交的。[68] 新書記處成立後，已正式進入審幹搶救階段，所以日常會議的主要議程之一也是這個問題，而有關組織方面的事按分工自然由劉少奇負責處理。如4月5日的書記處會議就正式決定：“由劉少奇準備對晉西北、晉東南、晉察冀三個區域各派一個整風學習組，負責幫助該區域內整風學習。”[69] 8月9日書記處會議又決定：“派幹部去華北、華中各根據地幫助整風。”[70] 這自然又屬劉少奇的分工範圍。此外，有關審幹反特，劉少奇還為中央（對華中多以個人名義）起草了一些指示電。總之，劉少奇出任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主任和組織委員會書記，決不是虛位。所以《劉少奇傳》上特別指出，“這一時期，他還協助毛澤東參與領導了審幹運動”，因此對審幹肅反（搶救運動）中的錯誤，

"也要負一定的領導責任"，[71] 作用自然遠非康生之流可比。

他對搶救運動的全面情況和許多具體問題應當說也是比較瞭解的。第一，作為肅反的主要領導（毛澤東倒是喜居幕後），他要經常在書記處和其他有關會議上聽取匯報、瞭解情況、研究問題、討論對策。（例如從3月20日書記處改組到6月24日，在短短的三個月內，加上政治局，兩者共開會研究肅反問題十一次，還不算總學委等組織討論肅反搶救的。[72]）第二，他必須閱讀各地和各機關報來的有關反奸搶救的大量材料，包括康生等送來的許多假材料。第三，他的住地楊家嶺的中直機關，正常工作早已停頓或打亂，搶救運動鬧得熱火朝天，晝夜連續作戰。特別是他分工主管的統戰部、民委（工、青、婦）等單位，更是搞到全延安出名，如搶救柯慶施，婦委絕大多數被打成"特務"，其中不少是高幹妻子。青委的蔣南翔（還有王世英等一些人）直接找他反映過不同意搶救的意見，還受到他的批評。第四，有他身邊工作和他比較瞭解的人被搶救。如他的政治秘書因坐過國民黨的牢被抓走，他曾要康生動員張聞天夫人劉英來繼任，但被劉英堅決推掉。他在白區工作時曾在一醫生家住，受其掩護。後來該醫生到延安在楊家嶺醫務室工作並負責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搶救運動中也被打成"特務"。[73] 由此可見，劉少奇是瞭解情況並盡職盡責的，在認識上也和毛澤東基本一致。據劉英說，直到1943年底，劉少奇才對延安的搶救運動開始從懷疑到不大相信了。主要有兩件事對他的觸動較大。一是那位掩護他的醫生被搶救；二是聽了綏德"坦白運動先進典型代表團"一批小孩的報告（那次會我也參加了並坐在前面，看到劉少奇與會），認為那些十幾歲的小孩竟然當了特務，不可信。正是他和任弼時的覺醒，促成了1943年12月22日的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在延安停止搶救運動，"進到甄別是非輕重階段"。[74] 不過，在這之後，延安一些單位如中央黨校，搶救運動並未完全停止，有些敵後根據地不但沒受到書記處決定的影響，還進一步加緊了搶救運動。

劉少奇作為搶救運動的僅次於毛澤東的主要領導人，無論當時還是事後，一般人都不大清楚。這是因為：搶救運動一直屬於禁區，有關檔案資料至今嚴格保密；對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主要領導人採取"為尊者諱"的方針，有關他領導搶救的言行儘量加以掩飾；"文革"後可以談搶救，但這時劉已成為受人們同情的最大受害者，而且從正史

到野史，又把搶救的責任幾乎全推給了康生，連毛澤東都從發起者和發號施令者變成發現偏差並加以糾正的人，更何況劉少奇。但是，延安整風後，中央層和高幹中對劉在搶救中的領導作用還是有所瞭解和議論的，劉本人當然更清楚，而且一些受過委屈和不服氣的人適當時候也會提起。所以在事過八九年之後的1954年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還不能不在最後一天作自我批評時包括對"1943年延安審幹期間的一些問題"做出"檢討和說明"。[75] 如果對搶救運動的錯誤沒有什麼責任，何用"檢討和說明"？在這次會上就搶救運動作檢討的，據知還有原中央黨校一部主任古大存。但眾所周知，這次揭發"高饒聯盟"的中央全會，毛澤東以在杭州休養為由，沒有出席，委托劉少奇主持。康生則因病假缺席。

（三）搶救運動中的中央黨校

1，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中的地位

討論搶救運動必須專門談一下中央黨校。這是因為，黨校在延安整風和審幹（搶救運動）中處於特殊地位和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像中共中央黨校黨校教育歷史經驗編寫組在《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所說，"中央黨校的整風學習，對於全黨的整風學習起着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由於中央黨校集中了黨的相當多的高級領導幹部進行整風學習，實際上是全黨整風學習的一個縮影。中共中央經過中央黨校這個點的實驗，取得經驗，運用這些經驗指導全黨幹部的整風學習。"又說，"黨領導的整風學習，以中央黨校為重點，逐步推向全黨。"[76] 而且整風也正是從黨校發軔，開始於黨校開學典禮上毛澤東所作報告《整頓黨的作風》（原題為《整頓黨風學風文風》，編入《毛選》時改為現題）。中央黨校既是整風和審幹（搶救）的源流和樣板，就不能不多說幾句了。

中央黨校地位之特殊和所起作用之重要，首先是因為它不僅是毛澤東整風的試驗田，而且是他對黨的高幹和精英進行思想改造和政治審查的基地，甚至還擔負着其他某些份外的重要任務，如對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當然，中央黨校所負擔的任務和它的重要性也是逐漸增加的。一開始的重視是由於把它當作訓練高中級幹部的基地（原來馬列學院起此作用，但後來認為它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所以整風

一開始即被取消，最後合併到黨校），不久才被用為整風的試點和重點，並大力加強了對它的領導。首先是1941年“九月會議”期間任命彭真為黨校教育長，由他負責制定新的黨校計劃。1942年2月28日，政治局會議做出《關於黨校組織及教育方針的新決定》：停止原有課程，學習黨的路線（也就是集中搞整風）；延安高幹三到四百人參加黨校學習；黨校直屬書記處，政治指導毛澤東，組織指導任弼時；取消原黨校管委，整風由彭真負責。[77] 1943年3月20日中央機構調整，黨校劃歸毛澤東任主任的宣傳委員會管理，並由毛澤東親自兼任校長、由延安當時傳為兩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為政治，一為軍事。傳為毛澤東所說）彭真、林彪分別任副校長。但因林彪受委派代表毛澤東去會見蔣介石並滯留重慶一年多（毛澤東為培養林彪，說光懂軍事不行，還必須懂政治。這次適值蔣介石邀請毛去西安會談，所以雖有周恩來在渝，還是派了林彪），實際並未到任，主持黨校常務的一直就是彭真。

毛澤東放手讓彭真管理黨校（他自己也極為關懷，如上大課、作報告、聽匯報、找人談話等，事無鉅細經常過問），並非偶然。除賞識彭真的政治素質（和他思想一致並擁護他）和工作能力外，也還有些歷史淵源。作為全黨領袖，毛澤東不只要團結中央蘇區幹部和紅軍官兵，而且需要團結原在白區工作的幹部（雖然他說白區損失了百分之百），這首先就是劉少奇和他領導下的北方局班子。1936年春，劉少奇到天津後，撤換了原來執行“左”傾中央政策的高文華（書記）、柯慶施（組織部長）等人，當年夏末即任命同他意見一致的彭真任組織部長。 1937年4－5月，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上，彭真完全支持劉少奇的意見。 正像他後來所說，“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完全失敗，蘇區工作大部分失敗。”[78] 可見，在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上，他是完全擁護毛澤東、劉少奇的觀點的。抗戰開始後，彭真協同聶榮臻創建晉察冀邊區，被譽為模範抗日根據地。1941年初奉命回到延安，在政治局會議上陸續作了七次匯報，匯總寫成《關於晉察冀邊區黨的工作和具體政策報告》一書，毛澤東稱其“講得很好，是馬列主義的”。[79] 主持改組中央黨校也很合毛澤東的意。他又是第一個喊出“毛主席萬歲”口號的人。[80] 因此得到毛澤東的高度信任和超常重用，如：以一個非中央委員的身份，到延安後就經常列席政治

局和書記處會議，所起作用超過一些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在組織工作的關鍵時刻（審幹的甄別結案和七大的籌備），接替由政治局委員和曾是書記的陳雲擔任中組部代理部長（1940年周恩來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中有一條是成立幹部局——相當於中國黨的組織部，領導人應是書記處成員。對此，中共中央覆信表示同意）[81]；七大開幕前出任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七大一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委員，後來還和陳雲一起成為候補書記；抗戰勝利後即派赴東北任東北局書記（成員包括陳雲、高崗、張聞天、林彪、李富春等）。由此可見，毛澤東放手讓彭真長時擔負管理中央黨校這樣的重任，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中央黨校集中了全黨大批高幹和精英。自從六中全會後，各地即先後選出參加七大的代表，其中許多代表來到延安，由於七大一再推遲，大部分就被送到黨校參加整風審幹。另一方面，中央為了貫徹保存實力的方針，還於1943年1月1日做出“關於徵調敵後大批幹部來陝甘寧邊區保留培養的決定”。[82] 1月12日政治局會議又決定，為準備培訓從華北、華中徵調來延學習的幹部，在中央黨校設中級班，由任弼時、陳雲、鄧發、王稼祥、彭真、葉劍英六人組成委員會籌劃一切，[83] 表現出中央的高度重視。此外，除上述在延高幹三到四百人參加黨校學習外，還陸續將軍事學院、中央研究院、文聯、[84] 西北文工團、西北局黨校等單位合併到中央黨校。這就使中央黨校在1944年全盛時期擁有的教職員工和學員（各佔一半）達到六千人（那些時而旁聽和走讀的幾百延安高幹未計算在內），佔當時延安脫產人員的五分之一，[85] 而且教職學員多是前後方的黨政軍骨幹和知識界精華。全校編制分為六個部：一部為地委、旅級以上高幹和七大代表；二部為縣團級以上幹部；三部為原馬列學院和文聯的知識分子與文化人（包括非黨人士如蕭軍、塞克等）；四部為文化低的縣團級工農幹部；五部為陝甘寧邊區的縣區級幹部；六部為敵後調來的縣區級幹部和國統區來的知青。集中這麼多重要幹部和精華的中央黨校，無疑對全黨統一思想和統一行動起着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經過兩次改組，黨校也發生了一些帶根本性的變化。例如教學內容和課程不再學哲學、經濟學等馬克思主義的系統知識（有時也指定閱讀兩三本馬列的小冊子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特別是《“左”派幼稚病》中有關集中和紀律的章節），而是主要學整風文獻、中國

革命基本問題、黨的路線和歷史等，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其次是將一切人員按工作地位、級別和資歷從學習內容、政治待遇和物質享受(吃、穿、住、行、警衛服務人員等)上進一步加以明確區分，形成固定的等級制。三是集中全力從事整風(進行思想鬥爭和路線鬥爭)和審幹（主要是肅反，並有權對在校學習的七大代表資格進行審查[86]），有關經驗和做法還通過中央機關發文件電報或抽派人員去外地向各根據地推廣。僅舉這三點，就可看出中央黨校在全黨整風審幹中所起作用及其以後的長遠影響。

2，中央黨校是延安搶救運動的重災區

中央黨校改組後的三年（1942－1945），也就是整風審幹的三年。鑒於教職學員的構成，政治審查(即政治面目、出身、歷史等，主要還是肅反）自然佔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審幹中大搞“逼、供、信”，很快就發展成了搶救運動。其在搶救運動中的無法無天、殘酷無情、吊人打人，在當時的延安就是出了名的。大約由於黨校各級領導和學員們的前後身份，很少有人寫黨校搶救運動的真實情況，一些領導人寫的回憶錄也多是從正面寫整風學習和思想轉變，只顯得春風化雨、正確偉大。這當然是不會全面和真實的，因為即使都是事實，也只寫了事物的一面，終究經不起歷史的考驗。例如中央蘇區的反“AB團”和“富田事變”，現在情況和性質都已基本弄清。當時毛澤東先後派李韶九、古柏等去富田在紅二十軍中抓“AB團”，又以曾山取代李文林任江西行委書記。可在事隔三十年後，曾山作為參與者回憶對“富田事變”主要領導人的公審時竟還說，“在公審中，毫無逼供現象，被審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談他自己的意見。”[87] 這只好信不信由你了。關於中央黨校的搶救運動，也是過了五十年才開始有了一些權威性的片斷透露。我和周圍的熟人係一般幹部，當年在延安得之於道聽途說的情況可以不算，但以下三人所談卻是不容懷疑的。因為根據他們的地位、名望和思想傾向等，他們談的只會少不會多、只有保留決不會誇大，因而是完全可信的，可以從中瞭解到黨校整風審幹的陰暗面，雖然很不全，卻可以此類他，瞭解個大概。

一是薄一波的敘述。

他於1943年11月回到延安，被安排到黨校一部學習。跟他一起去的母親住在深溝的一個窑洞裏，一天對他說“這裏不好住，每天晚

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窑洞，關着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什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員才無可奈何的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分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我初到延安時，還是看到了逼供信的情況。我進中央黨校後，校方給了我一個好差事，讓我一邊學習一邊參加甄別平反工作。當我開始甄別平反工作時，就馬上發現在中央黨校西南角的窑洞裏，也關押着‘搶救運動’中‘搶救’出來的150名幹部，如武競天、宋維靜等。”因此，他評論搶救運動中的錯誤說，“我看這不僅是‘錯誤’！簡直是對嚮往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老幹部的迫害、摧殘！”結論是“中央黨校是‘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之一。”[88] 這裏照錄這麼多，是為了說明兩件事。第一，才進黨校學習的薄一波就對黨校的搶救運動有如此瞭解，那麼長期主持黨校工作並直接領導搶救運動的副校長彭真、秘書長黃火青以及各部主任古大存、張鼎丞、郭述申、張啟龍、白棟材、馬國瑞等人，難道竟然一無所知？可能嗎？根據當時情況，連“密切地注視着運動的發展”、[89] 對黨校給予特別關懷的校長毛澤東，從聽匯報和看材料(除各級的報告外，被搶救者的書面申訴就極多。例如曾志在一年多的審查批鬥中就給毛寫了一封長信。1944年12月給毛祝壽，跳舞時她“乘機問：‘收到我的信沒有？’‘收到了，很理解你的心情。’”[90]) 中也是基本上瞭解的。這也許是他向黨校一再賠禮道歉的原因之一。第二，長期擔任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的薄一波（排名在另兩名副組長之前），關於搶救運動結束的時間及殘酷程度等的敘述和正式黨史（更不用說許多領導人的回憶錄和民間的演繹之作了）的寫法竟然大不相同。後者多是說，1943年7月15日康生報告後發起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30日毛澤東就讓它停下來了。[91] 而薄一波卻在搶救運動“停下來”四五個月後，發現幾百人被關押以及“鬼哭狼嚎”、“逼供信”等現象。至於薄一波把黨校搶救運動的責任一股腦兒推給康生，卻顯得極為牽強，後面有關康生的一節還會一併談到。

二是曾志的回憶。

曾志是作為被搶救者寫回憶的，同樣可信。她說，在黨校一部學習時，“‘搶救運動’陰風陡起，河南省委成了‘紅旗黨’，我也成

了小組審查重點，……有人罵我是吃屎的，歷史比狗屎還臭。”坦白大會“隔幾天就要舉行一次。”“有一次黨校一部又舉行全體學員和工作人員動員大會，校長（原文如此）彭真、教務主任（？）黃火青都參加了……主要是動員失足的人自首坦白。”審查方法是，以小組為單位，各人報告歷史，經過背靠背地分析、找疑點，再到會上當面質疑和作答，如此反覆多次，“經歷簡單的也要半個月才能過關，經歷複雜些的，至少要一個月，認定有問題的，半年一年也結束不了。”1944年“春節過後，大約是三月份，我作為重點審查對象又被編入了黨校臨時支部。”“新搬來的黨校一部黨員七十多人中有二十多位是來自全國各地的七大代表……雖然中央有了‘九條方針’，但是這裏的‘逼供信’仍相當嚴重。”“有一位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叫易季光，被審查時，有人用皮帶抽他，把他身上的皮襖都抽破了，遍體血跡斑斑，有人用嘴咬他的胳膊，肉都咬掉了一塊。有一次用繩子只吊着他兩手兩腳各一個指頭，高高懸在窑洞的梁上再用皮帶抽，真是慘不忍睹。”“還有一位被鬥的女同志被打昏過去了，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卻說她裝死狗，反而用腳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滿臉儘是血污。月經來了，也照鬥照打，結果褲子都洇透了，還把窑洞染紅了一大塊。”曾志還說，她自己“在高壓下沒有講過一句假話，而在臨時支部七十多位受審查的同志中沒有講過假話的只有四人”。但支部給她審查的最後結論卻是：“有特務嫌疑”，“問題掛起來”。[92] 這裏要作點解釋，又從這本公開發售的書上摘這麼多，還是想說明，中央黨校搶救運動中這種無法無天的逼供信，包括彭真甚至毛澤東在內的學校領導不可能一點也不知道，下面誰有那麼大的膽量擅自成立一個黨校臨時支部，任命耿飈為支部書記，關押二十多個七大代表和一批老幹部（曾志本人就是中央婦委秘書長）？同時也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編寫黨史教科書的作家，儘量能以學者的良知和求實精神論述搶救運動，而不應再輕描淡寫甚至有意地以訛傳訛了。

三是劉白羽的描寫。

堅決擁護延安整風的作家劉白羽，雖然對搶救運動大為頌揚，說“是一堂必須上的課，必須經過的磨煉”。它“打掉了我那小資產階級無謂的自尊心，而不打掉它，是不可能嚴格地進行自我解剖的”，

所以“從審幹（按即反特）到整風，是思想改造不可分隔的整體步驟”。但他也還是以文藝手法描繪了審幹和搶救的一些真實情況。如說，從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實味後，“這時，整個延安處於一種非常狀態之中”，他和在不同單位的妻子都不能見面。談到中央研究院（1943年5月4日）合併到黨校後的一次坦白大會，說“一位廣東哲學家在台前不斷聲嘶力竭地奮臂高呼口號，這裏的氣氛突然熾熱得變為一場騷亂。我站在人群的後面，眼看一個一個走上台去，還不斷有人向台上遞紙條。愈是親近的人，愈要表明態度，於是夫婦之間、朋友之間喊得愈加聲嘶力竭，以表示自己的忠誠。‘搶救運動’是由康生的極左路線造成的(按，連他也提到了路線高度，雖然歸在康生名下)，但是這麼多人這麼盲從，經過十年浩劫，我有了較深的理解。我認為這是民族陳腐淤積的湧動。在這種關頭，只要被遞上紙條，念出來，就得表示坦白，這樣一次又一次輪回旋轉，人們腦子糊塗了，思想混亂了。”經過坦白大會，“平時活躍的三部，整個落入沉悶之中。人們走着路，誰也不看誰，誰也不說話，大家的嘴巴都像貼上了封條。”此後，“鬥爭轉入各個支部，一個一個審查，有的大哭大鬧，有的吵嚷不息”。這些還只是“形容審幹像是狂風暴雨，而真正‘搶救’高潮，卻像延安夏天的山洪，充滿巨大的恐怖，挾持無窮的威力，一下衝擊而來。當時我們常常到中央黨校去參加坦白交代大會，……”不久，劉自己也被捲了進去。有人交代：“說他來延安時，《大公報》的一個特務，就告訴他劉白羽是我們的人。”[93] 他的這些描繪不是也足以說明：搶救運動的真實情況、時間長短、嚴酷程度，同一些官方黨史著作所寫，相差有多遠！

談了以上情況，就不難得出結論，中央黨校的搶救運動，中央領導特別是黨校領導都是清楚的，要求達到的目的和許多措施也只能是領導上做出和決定的。因為1943年延安主要做的就是審幹和搶救，直到年底才進入甄別階段，而且許多領導人的妻子、戰友和某些身邊的人都在黨校接受審查，哪有不透風的牆！例如毛澤東身邊的葉子龍妻子蔣家英，被送去黨校一部審查，中秋節仍不准回家（可見那種說7月30日搶救已被“指示停止”的黨史教科書是多麼地不可信），她一怒之下就領着一歲和三歲的兩個孩子說，“走，媽帶你們游行示威去！”在校園轉悠時終於碰見彭真，問明了情況，還是沒解決問題。[94]

對中央黨校那麼長時間、那麼殘酷的搶救運動，造成大批冤假錯案的“重災區之一”，彭真應負直接的重要責任是很自然的。他在1944年6月8日的黨校支部書記聯席會上也做了點檢討，說：“那次鬥爭（原注，指1943年的搶救運動），有的同志受到一些打擊，我要負責，接受那次錯誤，把方法搞對，立場搞對，自己先解決。”[95] 不論這是否算得上檢討，但他在已經提出要搞甄別時還說過一些很不實事求是的話卻是事實。如在1943年12月3日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搶救運動是“一個革命”，“沒有殺一個人，也沒有毀滅一個人。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96] 其實，這時已有鄒鳳平、危拱之、曾淡如（四川省委婦女部長）等一些老同志和知識分子幹部被“毀滅”了（自殺和瘋癲等），還有一批七大代表如河南省委負責人張維楨、郭曉棠、王志杰等，則因“特嫌”或其他罪名未通過資格審查沒能與會，至於甄別結論中留或大或小的尾巴而受到長期影響的人就更多了。作為搶救運動中僅次於毛澤東、劉少奇、康生的領導人，特別是中央黨校運動的主持者，彭真是從未承認過這一造成嚴重後果的錯誤的。只是由於上面有毛澤東頂着，他又掌握着中組部和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所以這個問題並未影響他七大後的地位上升（連康生都沒受影響），而且也從無人提起。只是“文革”開始時，周恩來在1966年5月2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彭真時，說他在延安整風中，“整別人不整自己，個人主義極端嚴重”。但由於他和劉少奇一樣因受到嚴重迫害而獲得大家的同情，搶救運動又找到康生作為罪魁禍首，所以就沒人提到他了。又如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在搶救運動中搞得也很厲害，但因他1962年後長期挨整，韋君宜還是筆下留情，點了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的名卻沒點他的名，只說“當時，地委書記天天拍桌子大發雷霆。”[97] 但最近還有人著文，介紹習仲勛說自己“一輩子沒整過人，一輩子沒犯左的錯誤。”[98] 這就不夠實事求是了。在一個“左”傾路線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國度裏，作為國家領導人，特別是領導過中宣部的人，說從沒犯過“左”的錯誤，恐怕難以講得通。

中央黨校搶救運動錯誤的嚴重，也在於它是整個運動的試點單位，創造的經驗要向全國推廣，還由它那裏抽調人去別地或別單位指導整風審幹（搶救）。所以黨校搶救的錯誤影響到全黨全國。各地搶救運動中的作法、用語等幾乎一模一樣，與此不無關係。例如前面提

到1944年北方局黨校搶救那套打人，車輪戰等作法和“黨認為你有問題”等說法，大約都是從中央黨校傳過去的。因為主持北方局黨校搶救運動、並動手打冀南行署副主任劉建章的楊獻珍，1943年中央黨校改組時就和劉芝明同任教務處副主任（主任為張秀山）。[99] 1944年派往山東專門去協助羅榮桓搞整風審幹、任分局總學委副書記的舒同，也是由黨校一部學員中抽調去的。但由於路途遙遠，1944年9月到任後，全國各地搶救的高潮已過，問題也暴露得越來越多，特別是由於羅榮桓的抵制，所以“延安經驗”沒能行通。中央書記處幾次決定派人去敵後根據地指導整風審幹，多是從黨校抽調，因為那裏儲存着大批高中級幹部，而別的機關幹部卻都有現職工作。至於中央所發有關整風審幹的文件中，有哪些是出之於黨校的經驗，自然無法說清。但彭真1944年1月14日直接覆信抗大總校李井泉政委和何長工副校長，介紹黨校整風經驗[100]（按，這時抗大早不是整風學習，而是搶救運動的甄別階段），恐怕也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因為當時向黨校“取經”是常事。

最後需要說明一下的是，對歷史人物的點名和評論，我認為應採取歷史唯物主義態度，也就是繼承中國史傳的優良傳統：“不虛美，不隱惡”，追求“實錄”；反對個人迷信和封建專制主義提倡的那一套，如：一切功勞歸領袖，“為尊者諱”，對認為好的人“隱惡揚善”，認為壞的人給追加罪責。這些將在下面〈延安整風與中共黨史編纂學〉一章中專門討論，這裏只是先提一下，也許有助於人們不忘過去。在中央黨校的負責人中，就有些人過去也曾被自己的人幾乎整死，現在卻對以同樣方法整人的搶救運動，或熟視無睹，或參與其中。時任教務處主任的張秀山（還有上面提過的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就曾在1935年同劉志丹等一起被關起來，刑訊逼供，打個半死。據郭洪濤說，他就是從審訊張秀山中引起對陝北肅反的懷疑。他說，張秀山被吊起來打，就承認“反革命”，一放下來又翻供。如此一再反覆，郭洪濤才認定劉志丹等不會是反革命，因而在中央紅軍到陝北前，就已同朱理治、程子華等研究決定，停止了抓人。[101] 正是這些不久前才挨過整的同志，在搶救運動中卻把自己過去蒙冤受屈的事給忘掉了，又來參與製造新的冤假錯案。我還親眼看到有些在延安被搶救過的人，在建國後的肅反等運動中，搞起逼供信來並不手軟，

甚至連方法都和搶救運動時一樣。其中也可能有人在下一次什麼運動中又栽了跟頭。為了避免這種“天道輪回，周而復始”的毛病繼續變相重演，指名道姓講得具體點可能有好處。反正這多是涉及到一些有地位的人，大概不會被誤會為有什麼個人恩怨。

（四）地方和單位領導所起作用更重要

由於搶救運動已經打亂了以前黨內有關的規矩和系統（如審幹一般由組織部門負責，鋤奸一般由安全情報部門負責等），又實行了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並明確規定“首長負責，自己動手”，[102] 這就使各地區和各單位的領導，特別是第一把手的認識和態度，起着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央雖有統一部署和不斷發文電或派人檢查督促，但各地和各單位做的卻並不一樣，有些甚至完全不一樣。這除了某些客觀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第一把手的思想認識和人品個性。對於多數人來說，恐怕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認識上的“左”，真的相信毛澤東和黨中央關於“特務之多，原不足怪”的提法和搶救中的“延安經驗”，[103] 其結果必然導致認識上的“特務如麻”和做法上的“逼供信”。二是組織紀律的約束和整風造成的威懾力量。許多人經過一陣搶救後已感到有點不對頭，但由於怕挨批，不敢表示懷疑和提不同意見，還是硬着頭皮繼續蠻幹或做點表面文章，應付上面。當然也不能否認，不少人抱有個人打算的成分，要在運動中爭當積極分子和培養對象。因為從來都是響應號召、緊跟領導、衝鋒陷陣的人會得到重視和重用，何況這次還明確地提出通過運動“培養幹部”是肅反（搶救）的一項重要任務。這就使“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思想和抓到“特務”越多成績越大的動機，驅使着越來越多的領導者和骨幹分子搞起逼供信。而且歷史和眼前實際都一再證明，由於搞逼供信和製造冤假錯案而受批評和處分的極少，甚至沒有；謹慎行事、搞不出“特務”或者被認為搞得太少的，就不斷挨批，很難過關。不管是出於思想認識、組織觀念還是私心雜念，地方或單位首長都在相當程度上決定着本地區或本部門搶救運動的命運。遇到開明的首長，可以少犯甚至不犯錯誤。遇到“左”的首長，大家可就倒霉了，會製造一大批冤假錯案，毀滅不少人（如中央黨校的鄒鳳平、危拱之，中直婦委的曾憲蘭，1947年被晉西北處決的著名

“愛國五青年”之一藺克義等），使更多的人不但一時受屈，還背了一輩子黑鍋，結論留尾巴或受控使用，每遇運動都挨整，等等。由此可見，遇到什麼樣的領導，對參加革命的每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重要機遇，這也體現了某種封建因素。

由於搶救運動是自上而下發動的，因此一般說來，愈接近上面，“災情”就可能愈重。邊遠地區和非直屬單位，由於領導人的“左”，也有搞得很厲害的，但總是少數。在延安，除作為試點和重點的中央黨校成了“搶救運動的重災區之一”外，在我看來，中直（中共中央直屬機關）比軍直（中央軍委直屬機關）就要嚴重一些。例如中辦秘書處（處長王首道）是專為毛主席和書記處服務的機要單位，五六十人中也有十幾個被打成“特務”。據劉英說，民委下的婦委一大半女幹部被打成“特務”，而且使用刑訊逼供。她們就打了曾憲蘭，把她逼得實在受不了了，才跳進枯井自殺，婦委還造謠說她是柯慶施放跑的。搶救凱豐原來的妻子時，胡喬木也積極參加了晚上的車輪戰，還動員劉英去勸。劉英一勸，她就哭，說“我是愛凱豐的呀！我什麼目的都沒有。我很單純的。”[104] 相比之下，我所在的軍直，除三局的電訊學校（駐安塞）的200人就有170人被鬥外，總政、總參等直屬單位還是比較稍為穩一些。而總政各單位中，胡耀邦領導下的“組織部系統就沒有一個人受到衝擊”。[105] 就是總參大本營，相對而言，也還平和點。譬如說開坦白大會吧，也頂多是大喊大叫，推推搡搡，並沒看到打人現象。我參加過幾次軍委所在地王家坪桃林裏的坦白大會。當時的情況是：軍委首長坐在台上，旁設“特務”當場坦白後的“光榮席”，放有茶水香煙等。葉劍英（大家稱“參座”）主持並作動員講話，編譯局長兼外語學校校長曾湧泉甩着他的白頭髮領呼口號。下面就是拉人上台“坦白”。有一次是專為編譯局和外語學校而開，我也被幾個男女同學連勸帶拉，但卻因“太頑固”而沒拉上去。（最近還和同班同學藍曼回憶往事，談到搶救時他笑說，那次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抱住小桃樹死不放手。可惜這次談話後一個月藍曼就與世長辭了。）我們學校這時已按中央第二個“四三決定”，實行了全面戒嚴，外出勞動規定“三人同行”，個人日記、筆記、小刀等用具一律上交，顯出一派“赤色恐怖”氣象。不過搶救時也只是勸說、圍攻、車輪戰、假槍斃，以及各種威脅；但還沒有中央黨校那種腳踢吊

打，刑訊逼供。我感到最受辱的就是一位女同志(當時三五九旅副旅長劉轉連妻子邸桂芳)向我臉上吐痰和謾罵，而最難挨的也只是車輪戰不讓睡覺。可見，我們學校比起一些中直單位還是比較文明些。

地方上的情況大體上也是如此。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就搞得凶一些。西北局系統是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成員高崗負責，自然不會手軟。不但民運部全部打成“特務”，直屬單位如西北黨校、行政學院等，也搞得相當厲害。毛澤東8月8日《在中央黨校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就舉例說，“行政學院除了一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很多是特務，恐怕過半數。”[106] 邊區政府由李維漢負責（林伯渠、謝覺哉二老實際管不了），搞得要比他在中央研究院厲害得多。不但林老的秘書區棠亮被打成“特務”，而且總務處的勤雜人員還在老處長的帶領下“集體坦白”成“特務”。[107] 至於李維漢親自搶救參加過南昌起義年屆六十的張曙時，更是有聲有色。李說，“有些老同志回延安已經有些時候了，但問題沒有交待。”張問，“這話是不是對着我講的？”李大聲說，“就是對你講的，今晚的火就要燒到你的頭上去。”後為林伯渠所挽救。[108] 陝甘寧邊區各地情況也大多如此，據瞭解，搞得厲害的有延屬地區、綏德專區，隴東專區。延安縣由康生的老婆曹軼歐蹲點任宣傳部長，進行調查研究，要證實：特務已滲透到農村；以外來知識分子為主的小學教員基本上都是特務；可以分化瓦解為我所“用”等。延屬各縣共挖出了2463個“特務”，一個縣長就打過17次人。[109] 隴東專區搞的也不輕，外來知識分子百分之九十以上打成了“特務”，這是蔣南翔在他的“意見書”中已提到過的。大約最出風頭的還是綏德專區，除派示範團去延安中央禮堂、邊區政府及一些機關學校作報告外，在地委所在地更鬧得熱火朝天。單一個綏德師範就開了九天控訴大會，在教職員和學生中挖出“特務”230人。佔全校人數73%。[110] 後來又擴大到小學生，最小的據說只有六歲。[111] 這都是公開的。地委的《抗戰報》整天發表搶救運動的消息和一些學生寫的“坦白”和“控訴”。運動從綏師發展到社會再到機關。於是國民黨統治時留下來的共產黨員幹部全部被鬥，機關裏面外來的知識分子大多難免，《抗戰報》的楊述（解放後當過北京市委宣傳部長）也被迫承認為“戰略特務”了。[112] 有些外縣，地委首長顧不

上，也可能稍為緩和些。

搶救運動搞得“熱鬧”的，陝甘寧邊區之外大概就算晉西北了。一則是因為“近水樓台”，和陝北隔河相望，所以陝北一有風吹草動就先影響到晉西北。雖然敵情嚴重，但還是早在1943年3月18日就發出《關於整風學習中配合審查幹部的指示》，全面推廣延安經驗，各地軍政幹部集中起來搞整風審幹。同年9月，駐軍和邊區一級機關分頭召開“反特務”大會。參加搶救運動的幹群約三萬三千人，有的單位抓出特務達20%到30%。[113] 二則是任晉綏分區代書記的林楓，對整風審幹既知之甚詳又執行堅決。1942年夏他從延安匯報回來後，就毫不客氣地立即送走了在晉西北作農村調查的張聞天；搶救期間又不理睬周恩來給穆欣的證明。[114] 因此晉西北照搬延安經驗就是自然的事了。曾任新軍副總指揮的張文昂和一些領導幹部如雷任民、張雋軒、梁膺庸等都被搶救過。分局黨校也是重災區，70－80%被搶救。師範學校幾乎是全部。但發展也不平衡。例如據羅貴波說，八分區整風審幹就比較穩一些，沒發生過逃跑自殺等現象。[115]

其他根據地搶救運動情況，輕重情況不一，主要也是看領導。例如上面提到的晉冀魯豫北方局黨校就曾經是重災區，太行等地還發生殺人現象。所以1943年11月5日，毛澤東致電北方局並轉太行、太岳、冀南各區黨委：“據彭（德懷）、羅（瑞卿）諸同志說，太行太岳兩區反特鬥爭中在許多地點捉了並殺了許多人”，他要求“必須立即檢查這種現象”，“立即停止殺人”。[116] 這才制止了太行太岳地區的胡來。

搶救運動中領導人的決定性作用，從華中各地情況的不同可以看得更明顯。據時任新四軍三師師長兼政委和蘇北區黨委書記的黃克誠說，“1943年4、5月間，華中局和軍部召開會議，佈置開展‘搶救’運動。會議期間，我向華中局和軍部建議，華中不要搞‘搶救’運動了，以避免發生逼供信、傷害無辜同志之事，要接受中央蘇區打‘AB’團的教訓。”但這是中央指示，華中局不能不執行。只是由於各地不同的領導，所以執行情況產生極大甚至根本差別。搞得最凶的就是譚震林任政委和區黨委書記的新四軍二師和淮南區。每個團都搞出了“數以百計”的“特務”。該師政治部一個女同志被迫承認是“特務”，還供出了第七師政委曾希聖的妻子，弄得曾希聖極為苦悶。可

黃克誠的三師和蘇北地區就沒搞“搶救運動”。黃克誠還替曾希聖查清他妻子的冤案。[117] 據林穎（原彭雪楓夫人）說，彭雪楓、鄧子恢領導的四師和淮北地區，以及鄭位三、李先念領導的五師和鄂豫邊區也沒搞搶救。

就大區而言，大概惟獨山東沒有搞搶救運動。這是因為，1943年山東戰事頻繁，形勢嚴峻，劉少奇又才解決了分局的爭論，調整了領導班子，書記朱瑞換成了羅榮桓，需要些時間進行整頓，因此一直到1944年才開始整風。但更重要的還是由於羅榮桓的領導。他不但反對利用“民主檢查大會”搞“釣魚”，而且還明確不讓開展搶救運動，認為山東情況特殊，敵人已為我們審查好了幹部，如果按延安的搶救辦法搞審幹，一定會搞垮山東根據地。所以延安發來康生的《搶救失足者》，他下令分局辦公廳“不要向下發”。一開始民主檢查，在分局機關工作的王若望就跳出來大反黎玉，被稱為“山東的王實味”。舒同等人已將其定為“特務”並報告延安，延安也回電同意。但羅榮桓不以為然，說王是思想問題，不是特務，單獨找王談話，加以批評。羅榮桓1944年12月21日在發給全區並報中央和毛澤東的《關於審幹問題的意見》中提出，不應把整風與審幹混淆起來，要避免“形成一種突擊的傾向”，“輕易發動坦白的嚴重的逼供信”，認為整風的正確方法應是“以檢查領導開場，以檢查領導結束”。[118] 此時適逢延安的搶救高潮已過，正忙於甄別平反。這樣，羅榮桓就使山東避免了一場搶救運動的大災難，事後還得到了人們贊揚。在羅榮桓百年誕辰紀念會上，江澤民就特別提到，“1943年，他正確領導山東軍區和115師的整風運動，制止了絕對化、擴大化的錯誤做法，使這次運動真正起到了團結教育幹部的作用。”[119]

* * * *

關於延安和各地的搶救運動，已有不少書籍文章介紹，這裏無須作詳細敘述。之所以談上面這些片斷情況，只是為了說明這樣幾個問題：第一，搶救運動（正史稱為審幹運動或“搶救失足者運動”）是黨中央的統一部署，中央向各地發文和派人推廣的延安整風審幹經驗，對高級領導主要是分清路線統一思想，對廣大幹部主要就是從

“引蛇出洞”到搶救運動。第二，搶救運動雖為中央統一部署，但如何執行和所犯錯誤大小，則決定於地區和單位的領導。實際上進行抵制（不敢公然抗拒）的領導也有，如山東、蘇北等。第三，由於搶救運動是中央的部署，所以在運動中犯錯誤甚至草菅人命的錯誤，如一些“搶救運動的重災區”，其領導者都沒什麼責任，不會受到處分，相反還往往因表現積極而受到重用和提升。這只要看一下一些人在七大後的安排，就會得出或證實“左”比“右”（並非真右，故用引號）好的結論。第四，實際情況證明，搶救運動並非康生發起，而且災情重的單位和地區大多是他不能隨便插手的。輕災和無災區，他也不一定沒有插手，如山東就曾派要員去推廣延安經驗。許多史書對康生在搶救運動中作用的評估和描繪，實屬有意誇張和以訛傳訛。下面就來談這個問題。

註 釋

1 蕭島泉：《楊獻珍的自責與反思》，《百年潮》2002年第9期。

2 《鄧小平文選》校簡史1941—1985》，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第6，16頁。

3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361-363頁；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第334，340-341頁；任仲夷回憶見2000年8月17日《南方周末》。

4 毛澤東：《時局問題及其他》(1945年2月15日在中央黨校的報告)，《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360-361頁。

5 毛澤東1943年10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見《延安整風實錄》，第379-380頁。

6 劉少奇：《對反特政策與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給陳毅、饒漱石的電報）。

7 李銳：《世紀之交感言：還是要防‘左’》，《書屋》2001年第3期。後收入《直言》(見第438頁）時刪去“發起”。但說搶救運動由康生“執行”也不確切，因為根據中央規定，是由各單位各地區領導“自己動手”執行的，所以才出現大不相同的情況，有的地方厲害，

有的地方甚至沒“執行”年這點，後面還要談到。

8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215頁。

9 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等。

10 薛鵬、孔繁玲：《彭德懷晚年歲月實錄(之五)》，《中華兒女》2002年6月。

11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53頁。

12 馮建輝：《從陳獨秀到毛澤東》，第463，291-292頁。

13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2頁。

14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1頁。

15 《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152頁。

16 例如直到2002年《百年潮》第5期發表李東朗的一篇《康生與延安搶救運動》，仍持此論。

17 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第155和181頁。

18 《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第249頁。其他地方引證的也很多。

19 例如1942年3月19日《解放日報》社論《發揚民主作風》，就公開號召黨員幹部要“傾聽各種不同意見”。

20 《中共中央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就明確寫道，“在領導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繼續整風的第一階段，必須極大地提倡民主，公開號召參加整風的一切同志大膽說話……批評領導，批評工作，……絕不加以抑制。”“這樣做的目的，第一，在於使下情獲得上達的機會……第二，在於讓有錯誤思想的同志儘量表現其錯誤觀點……第三，在於使內奸分子利用我們的民主政策，認為有機可乘……以便誘使他們盡情暴露”。“領導人員對之均要鎮靜忍耐，不慌不忙”。(《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30－31頁)。這已說得夠清楚了。

21 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75-376頁。

22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99-402頁。

23 包括當時參與此事的某些領導和積極分子如李維漢、溫濟澤等。後

輩的黨史研究者就更不用說了。直到2002年第5期《百年潮》載文《康生與延安搶救運動》，還將製造“王實味案”列為“製造一連串錯案影響中央決策”、“將運動引上了歧途”的第一樁。

2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07頁。

25 以上材料來源見：《王實味傳》，《中央研究院回憶錄》，《溫濟澤自述》，《延安整風實錄》，宋金壽：《為王實味平反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第50輯）。

26 《溫濟澤自述》，第149頁。

27 《溫濟澤自述》，第147頁。

28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4頁。

29 《整風文獻》1949年版第316頁，編入《毛選》已刪掉。

3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88頁。

31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43頁。

32 引證毛澤東這兩次講話（一為10月19日的開幕詞，一為11月21日和23日《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報告）中有關反特鬥爭的材料很多，有詳有簡，但多係個人著作，如《延安整風實錄》，第368-369頁，《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所載《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等等。正式的文獻和著作，如《毛澤東文集》、《毛澤東傳1893—1949》、《毛澤東年譜1893—1949》，以及其他黨史論著，都一概不公佈、不敘述。這也是黨史編纂學中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為尊者諱”的表現。

33 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

34 對以上情況，《延安整風運動紀事》、華世俊和胡育民的《延安整風始末》等均有介紹。這裏主要參考了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九到第十二章。

35 《革命史資料》第3集，1981年版。

36 有關張克勤案，黨史著作多有敘述，特別是各種民間的編著。談得較詳細的，除上述《李逸民回憶錄》外還有；高新民、張樹軍著《延安整風實錄》；曾繁正主編、紅旗出版社1988年版的《紅色風波中的交鋒與較量》(上）；郝景泉編著、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的《黨史風雲實錄》(下）；文聿著《中國“左”禍》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

去脈》，等等。

37 《延安整風實錄》，第 369 頁。

38 《任弼時年譜》，第 442 頁；《延安整風實錄》，第 372-373 頁。

39 《延安整風實錄》，第 373 頁。

40 如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和後人編寫的《楊尚昆回憶錄》中的敘述。

41 高建國：《顧准全傳》，上海文藝文藝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29 章。

42 《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 220-221 頁。

43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3)，第 514 頁。

44 《毛澤東年譜 1893 — 1949》中卷，第 427 頁。

45 《毛澤東年譜 1893 — 1949》中卷，第 444 頁。這是由於敵後情況與延安不同，整風、審幹各推遲一年。

46 《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 13 輯，社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 頁；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60 頁。按，這時季米特洛夫雖已不是共產國際總書記，但仍在蘇共中央任職，因此他用的是個人名義，代表的卻是蘇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意見，毛澤東不能不重視。對搶救運動，蘇聯駐延和駐渝人員當然知道是毛澤東直接領導，季氏只指摘康生，也是由於不便於直接批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而康生及其機構在搶救運動中也確已惡貫滿盈。

47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 161 頁。

48 《康生年譜》，見仲侃：《康生評傳》，紅旗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3 頁。

49 見該書第 276-277 頁。

50 見該書第 277-278 頁。

5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77，278 頁。

52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77，278 頁。

53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21 — 1949 中國共產歷史》第一卷下冊，中央黨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90 頁。

54 《毛澤東年譜 1893 — 1949》中卷，第 486-487 頁；《劉少奇年譜》上卷，第 432-435 頁；《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 278-279 頁。

55 《林伯渠傳》，紅旗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86 頁；陳永清：《紀念

林伯渠同志一百周年》，見《懷念林伯渠同志》，第136頁。

56 劉英曾多次談到這一情況，如1999年1月28日，6月1日，6月10日等。

57 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頁。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593頁。

58 以上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彭真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任弼時年譜》、《陳雲年譜》等有關部分。《彭真年譜》總學委中有高崗，《任弼時年譜》和《陳雲年譜》則無，且指明為五人。不知孰是。也可能是因高崗為壞人，故有意抹掉。

59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6頁。

60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30頁；其他日期也均據該《年譜》。

61 金城：《延安交際處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頁。轉引自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第577頁。

62 分別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795-803頁，《劉少奇選集》上卷，第218-219頁。

63 載《文獻與研究》1984年第9期。

64 以上情況見《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3-277頁；《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15-420頁；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黨的文獻》1990年第3期。

65 參見王秀鑫：《延安“搶救運動”述評》。《劉少奇年譜》將此電列為6月29日，但《陳毅年譜》同日卻無此記載。無論時間如何，這一電報總是有的。

66 劉少奇：《對反特政策與方法指示》(1943年6月29日覆陳饒27日電）。

67 《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29頁。這一報告的全文未能看到。

68 《陳雲年譜》上卷，第375、381頁。參閱劉家棟：《陳雲在延安》中“嚴格要求 真心愛護”一段；葉永烈：《陳雲之路》中“當上紅色掌櫃”一節。據時任陳雲秘書的劉家棟在書中說，陳雲被調離中組部是因為他在組織工作上“右”(吸收了大批“特務”），又不贊成搶救運動，還反對過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所以反特鬥爭和搶救

運動開始後，他就離開中組部閑居棗園“養病”，1944年才當上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賀龍的副手——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

69 《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19頁。

70 《劉少奇年譜》上卷，第429頁。

71 《劉少奇傳》上卷，第495頁。

72 見《毛澤東年譜》、《劉少奇年譜》、《任弼時年譜》、《彭真年譜》等。

73 以上情況，有些是在延安時的瞭解；有些則是近年的調查研究，特別是訪問當時在楊家嶺工作的老同志所談。如康生、李富春等要劉英兼劉少奇政治秘書和那位醫生被搶救的事，就是劉英多次所談（1999年1月18日，21日，28日，6月10日等）。據劉英說，兼政治秘書事因她不同意也就算了。她的理由是忙不過來，一則她在行政處雖為學委會副主任，但主任鄧潔因被敵人逮捕過，已靠邊，實際上一切都她管，且已因搶救不力受到批評，壓力很大；二則她還是張聞天的政治秘書（由於張靠邊，實際上工作不多，但名分還在）。她說，當時沒講的重要原因還有兩個：一是覺得劉少奇太嚴肅，有點怕；二是劉晚上辦公，她熬不起夜。民委特別是婦委的搶救情況，劉英、曾彥修都談到不少。另，蔣南翔在《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也提到婦委的搶救和他找劉少奇反映情況等問題。

74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8頁。

75 《劉少奇傳》（下），第754-755頁。

76 見《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147-148頁。

77 《彭真年譜》上卷，第191，198-199頁。

78 《彭真年譜》上卷，第191頁。

79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第359頁；《彭真年譜》上卷，第192頁及其他有關條目。

80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百年潮》1998年第4期。據他回憶，1966年5月11日彭真向他交接工作時，聽後面有人念材料，“彭一聽就火，態度激昂，回過身朝着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他是先喊主席萬歲的。”

81 李永昌：《周恩來赴蘇治病始末》，《百年潮》2001年第7期。

82 《任弼時年譜》，第438頁；《彭真年譜》上卷，第213頁。

83《任弼時年譜》，第438頁；《彭真年譜》上卷，第213頁。

84《彭真年譜》(上卷217頁）稱“延安中央文聯”，別處均稱“文協”或“文抗”(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會延安分會之簡稱），不知是否一回事。

85 延安當時的總人口為四萬，“三萬黨政軍，一萬老百姓”。見《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第94頁。

86 彭真作為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在向七大的報告中指出，“這次到會的代表大多數經過1940年、1941年中央指定的小委員會做過初步審查，以後在黨校一部、西北局組織部、聯政組織部又做過一些審查。”見《彭真年譜》上卷，第264頁。在這之前毛澤東就說，“在黨校的七大代表是在學習中進行審查的。實際上將來也要根據黨校審查結果作為結論。”同前，第233頁。

87 曾山：《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歷史的回憶》(1959年），見《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8 薄一波：《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363頁。

89《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6頁。

90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44頁。

91 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78頁；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03頁；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616頁；經過十年磨一劍修訂的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第790頁甚至說，在康生報告之前，“中共中央曾發現審幹工作中有‘左’的錯誤發生，……試圖予以糾正。”但後來卻搞出了個“搶救失足者運動”。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

92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下），第333，340-341，343頁。

93 劉白羽：《心靈的歷程》，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轉摘自《眾說紛紜話延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209頁。

94 江英：《姓名惹的禍》，《眾說紛紜話延安》，第174頁。

95《彭真年譜》上卷，第244頁。

96 《彭真年譜》上卷，第231頁。

97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1998年版，第12頁。

98 吳江：《秦川談習仲勛二三事》，《炎黃春秋》2003年第11期。

99 《中央黨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第138頁。

100 《彭真年譜》上卷，第236頁。

101 1999年3月20日和張培森、葉輝南一起訪問郭洪濤的談話。

102 最先提出“首長負責，自己動手”，概為1943年5月21日政治局會議關於防奸工作應遵照六項原則的決定。7月1日毛澤東致康生信談“防奸工作的兩條路線”時又重申，8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最後形成為著名的“九條方針”中的第一條。以上均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劉少奇年譜》等的有關條目。

103 《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4)。

104 劉英1999年1月28日談話(錄音)。她講得具體生動，還一再說，“延安肅反，可以寫篇東西，非常生動的。”

105 秦川：《1983年風雲中的胡耀邦》，見《懷念耀邦》第二集，香港淩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頁。

106 見上引楊奎松：《莫斯科與毛澤東的恩恩怨怨》，第153頁。

107 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

108 陳永清：《紀念林伯渠同志誕生一百周年》，載《懷念林伯渠同志》，第136頁。參閱1986年出版的《林伯渠傳》，第286頁。

109 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中共黨史資料》第37輯。

110 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詳細報道登在1943年9月22日的《解放日報》上。

111 韋君宜：《思痛錄》，7-14頁。

112 韋君宜：《思痛錄》，7-14頁。

113 張稼夫：《庚申憶逝》(之二)，《中共黨史資料》第8輯。

114 這兩件事，前面均已提到。按，穆欣(“文革”後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當時在晉綏《抗戰日報》工作，被誣指為“特務”。周恩來

於1943年9月托韓鈞給晉綏分局和報社社長廖井丹捎話，分局未理周的證明，對穆仍予批鬥。見穆欣：《劫後長憶》香港1997年版，第132頁。

115 羅貴波時任八分區司令員兼政委和地委書記。見羅貴波：《革命回憶錄》，檔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235頁。

116 《文獻和研究》，1984年第8期。

117 《黃克誠自述》，第177-179頁。

118 李維民、潘天嘉：《羅榮桓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312，313頁。參閱王力：《王力反思錄（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351頁。

119 新華社2002年11月26日電。

（2003年1月15日完稿）